

FLC

外国语言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季刊

| 第2卷 第4期 | (总第6期) | 2018年12月 |

外国语言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第2卷 第4期 | (总第6期) | 2018年12月 |

主 编: 蒋洪新

Editor-in-Chief: Hongxin Jiang

副 主 编: 邓颖玲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Yingling Deng

执行主编: 曾艳钰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Yanyu Zeng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宁 上海交通大学
王守仁 南京大学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学
马歇尔·布朗 美国华盛顿大学
申 丹 北京大学
许 钧 浙江大学
克劳德·劳森 美国耶鲁大学
张隆溪 香港城市大学
李德凤 澳门大学
束定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杨金才 南京大学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
布鲁斯·罗宾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金 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
安·海尔蒙 英国卡迪夫大学
聂珍钊 浙江大学
黄友义 中国翻译协会
黄国文 华南农业大学
黄忠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劳瑞·瑞米 湖南师范大学

Editorial Board

Ning W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ouren Wang, Nanjing University
Kefei Wa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Hongzhi Wa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rshall Brow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Dan Shen, Peking University
Jun Xu, Zhejiang University
Claude Rawson, Yale University
Zhang Longxi,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feng Li, University of Macau
Dingfang Shu,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Jincai Yang, Nanjing University
Jiande L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ongyi Che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ruce Robbins, Columbia University
Li Ji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nn Heilmann, Cardiff University
Zhenzhao Nie, Zhejiang University
Youyi Huang,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Guowen Huang,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onglian Hua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Lauri Ramey,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主 管: 湖南省教育厅

主 办: 湖南师范大学

编 辑: 《外国语言与文化》编辑部

邮 箱: jflc@hunnu.edu.cn

地 址: 湖南长沙岳麓区麓山路 36 号

电 话: 0731-88873041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6-4366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1536/H

印 刷: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 年 12 月 28 日

定 价: 28.00 元

海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海外发行代号: QR9393

国内发行: 湖南省邮政报刊发行局

国内发行代号: 42-380

整体设计: 周基东

排版制作: 书亦有道

本刊已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 (CNKI) 收录, 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期刊基本参数: CN43-1536/H*2018*q*16*160*zh*P*¥28.00*3000*16*2018-12

目 次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 001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中国化”和全球化——重读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王宁
- 011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考察文学阶级性的三个维度←季水河

文化研究

- 024 《英格兰，英格兰》中的景观社会与超真实的“英格兰特性”←苏忱
- 035 从史诗《尼伯龙人之歌》看鹰隼在中世纪欧洲宫廷文化中的意涵←史敏岳
- 044 《安德鲁的大脑》中的个体创伤与记忆伦理←朱云
- 053 民族性格格式下的美国革命——霍桑革命题材短篇小说的新历史主义研究←胡杰
- 061 论女侦探为主角的早期英国小说的文化功能←李琼

翻译研究

- 070 创榛劈莽，前驱先路——论《海国图志》中的地理术语译名←张景华
- 079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观照下的翻译现象剖析——以徐光启、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为例
←辛红娟 费周琪
- 089 寻根小说文化特色词英译过程研究——以蓝诗玲版《马桥词典》英译本为例←卢晓娟 岳霞
- 098 中国网络文学外译与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武侠世界”为例←彭石玉 张慧英
- 108 中央文献中的副文本翻译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例←陈双双
- 116 执拗消解与多元建构——《语言之会》评介←刘宏

语言学研究

- 126 创造力及英语水平对外语学习者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的影响研究←蔡晨
- 137 国家安全视角下新疆高校外语规划研究←贾春燕
- 146 近代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英语口语教科书——《英华学生口语手册》研究←卞浩宇

Contents

- 001 **Ning Wang** The Sinic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Marxist Literary and Art Thought: Re-reading Mao Zedong's "Yan'an Talks"
- 011 **Shuihe Ji**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lass Nature of Literature by Chinese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 024 **Chen Su** The Society of Spectacle in Julian Barnes' *England, England* and the Hyperreal Englishness
- 035 **Minyue Shi** The Connotations of Eagle and Falcon in the Medieval European Court Culture in *Das Nibelungenlied*
- 045 **Yun Zhu** Individual Trauma and Ethics of Memory in *Andrew's Brain*
- 053 **Jie Hu** American Revolution under the Paradigm of National Character: A New Historical Research on Hawthorne's Tales of Revolution
- 061 **Qiong Li** On the Cultural Function of Early British Detective Fiction Featuring Women Detectives
- 070 **Jinghua Zhang** A Pioneer in Introducing Western Knowledge: On Translated Geographic Terms in *Haiguotuzhi*
- 079 **Hongjuan Xin, Zhouying Fei** Rethinking Translation from a Bourdieusia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Euclid's Elements of Geometry* Translated by Xu Guangqi and Matteo Ricci
- 089 **Xiaojuan Lu, Xia Yue** Studies on the Translating Procedures of Culture-Specific Words in Root-Seeking Novels: Exemplified by Julia Lovell's Translation of *A Dictionary of Maqiao*
- 098 **Shiyu Peng, Huiying Zhang** O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and Chinese Strategies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 108 **Shuangshuang Chen** Th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Paratexts in CPC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Xi Jinping: Governance of China*
- 116 **Hong Liu** De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A Review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Tongues*
- 126 **Chen Cai** The Effects of Foreigner Language Learners' Creativity and English Proficiency on Their Multi-modal Metaphorical Interpretation Ability
- 137 **Chunyan Jia** A Study of Xinjiang Higher Education Language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ecurity
- 146 **Haoyu Bian** The First Oral English Textbook Compiled by a Chines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 Study o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Students Assistant, or Colloquial Phrases, Letters & c, in English and Chinese*

FLC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中国化”和全球化 ——重读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王宁

内容提要: 毛泽东思想是由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提出并发展起来的一种“全球本土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本文认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他最有代表性的文艺理论论著。毛泽东思想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式的照搬,而是将其中一些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文学艺术实践相结合,生成一种“全球本土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全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即使在当今的中国,《讲话》的精神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并被认为是中国的文艺理论批评和研究的指导原则。现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北京《讲话》继承了毛泽东的文学艺术遗产,并将其推向一个新阶段。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毛泽东思想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遗产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8) 04-0001-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14ZDB082)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上海 200240

Title: The Sinic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Marxist Literary and Art Thought: Re-reading Mao Zedong's "Yan'an Talks"

Abstract: Mao Zedong Thought is a "glocalized" or "Sinicized" Marxist theory initiated and developed by Mao and his comrades in arms and successors in China. The present essa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literature and art with Mao's famous "Yan'an Talks" as one of his most representative work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lthough Mao Zedong Thought is not a dogmatically "imported" Marxism from the West, it has indeed grasped some fundamental Marxist principl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ncrete Chinese literary and critical practice. Thus a "glocalized" or "Sinicized"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has contributed and will continue to contribute a great deal to the global Marxist literary and art theory, especially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Even in today's China, his "Yan'an Talks" and the essence of his literary and art theory is still influential functioning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in current China's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and studies. The Beijing talk given by the current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 has inherited Mao's legacy in literature and art and pushed it forward to a new stage.

Keywords: Marxism, sinicization, Mao Zedong Thought, "Yan'an Talks", Mao's legacy

Author: Ning Wang,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今中国已经不是十分新鲜的话题了。长期的中国革命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直接产物。今年恰逢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和毛泽东诞辰 125 周年，此时重读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篇纲领性文献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新中国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指导性文献，对全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贡献巨大，其中许多精辟的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没有过时。但是根据中国当下的新形势，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也应该得到发展，以便能更有效地指导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本文将以此《讲话》为主要文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新的阐释。

一、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

中国的现代性作为一种另类的现代性已经越来越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同样，探讨毛泽东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及其广泛的国际影响，也已成为一个前沿理论课题，英语世界更是如此^[1]。作为我先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观研究的继续（王宁 1-29），本文将集中探讨毛泽东的《讲话》。这一纲领性文献是中国文化土壤里的硕果，启迪了许多当下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知识分子。我在文章中试图证实，马克思主义全球化也像文化全球化一样，有着两个发展方向：其一，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普遍的革命原则引入一个特定的文化语境，发展出一种有着当地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版本；其二，将诸如毛泽东思想这样强有力的、产生自特定地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全球，使之具有世界性影响。分析毛泽东思想的全球化经历，我们很容易发现，它是第一种发展方向的典型体现。其文艺理论尤其如此，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启迪下，结合中国的具体文学艺术生产和理论批评实践后产生的。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其主导意识形态。但这种马克思主义并非教条机械地从西方或俄国“进口”而来，而是毛泽东和其他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建构或重构出来的一个产物。正如刘康所指出的：

毛泽东的遗产，尽管有着争议和矛盾，但一直有着持久的影响，因为他不仅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政治基础，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有着全球意义的理论，至少在 1960 年代和 70 年代是如此，当时那个时代以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和社会波动而著称。毛的理论尤其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诸国得到响应，正是那些国家和地区共同形成了一个第三世界。（Liu 12）

因此，在中国革命漫长进程中能动地“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具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代特征。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毛泽东依然号召人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确实像从西方引进的其他哲学和文化思潮那样，是一种从西方和俄国“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能动的理解和创造性建构意识的阐释，同时也加入了一些中国的元素，例如儒学及其他传统中国文化。在过去的近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其早期领导人，翻译了大量马恩列斯的著作，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建党之前，马克思主义的译介是片断式的，它最初的译本并非译自德文原著，而是从日文或俄文转译而来。熊德山作为马克思著作的最早译者之一，早年学习日文，后来从日文将马克思的许多著作译成中文。朱执信作为另一位早期译者，也从日文翻译了一些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并且基于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理解和建构性解释将之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他积极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且帮助编辑了一期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特刊（第6卷第5期，1919年9月）。在那本特刊中，李大钊发表了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李大钊所做的这些奠基性工作对同时期身处北大图书馆的毛泽东起到了某种启蒙作用，使不懂得外语的毛泽东得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过翻译和阐释的“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或“全球本土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带有正统马克思主义与某些儒学教义结合的特征，因为李大钊和毛泽东都对中国文化典籍，尤其是儒学典籍，有着深厚的造诣。毛泽东痛恨对马克思主义持教条主义态度的做法，主张通过创造性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把握其精神实质，并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特别重视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并试图证明它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真理。他成功地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毛泽东实际上发展了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内被称为毛泽东思想，在国外则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知识分子称为毛泽东主义，或简称为毛主义（Maoism）。讽刺的是，尽管毛泽东本人并不喜欢这一标签，更喜欢将自己的思想观念称为毛泽东思想，但在国际上，人们却普遍地称他的思想和教义为毛主义。正是在这面大旗下集合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追随者。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过翻译又从中国走向世界，为全球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中国的经验和教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我认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双向旅行所导致的结果。但是国内媒体通常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当然继承者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的阶段。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政治领袖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作家。他热爱文学艺术，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戏曲情有独钟。他本人是位优秀的诗人，擅长古典诗词的创作，即使在长征的艰苦岁月里，他也没有忘记填词赋诗，以抒发其伟大的抱负。因此他特别重视与中国的文学实践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并作出了创造性的发展，将其用于中国的文艺批评和研究。即使在革命年代，他仍然十分注意培养文艺人才，认为这是中国革命事业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讲话》标志着他的“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生产和批评的指导原则的形成。在《讲话》中，他试图为中国的文学艺术回答这些问题：文艺究竟是为谁创作的？文艺的作用是什么？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的文学艺术应当首先为最广大的人民利益服务。具体说来，它应当首先为工农兵服务。即使在1949年以后，他仍然坚持这一原则，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毛泽东看来，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艺术应当“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毛泽东838）。因此对毛而言，文学艺术的政治实用性比其审美和娱乐性更为重要。这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也是颇有必要的。

在毛泽东文艺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对中文语境下的世界作品的选择也有一定的主体性（Sun 13-27），这显然受到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2]。通常，在中国高校里的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课程中，这五位世界文学经典作家是必须讲授的：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在有些大学，这个名单还包括荷马和但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原则，有关部门组织翻译了这些经典作家的主要作品或全部作品，从而使得中国的世界文学有了自己独特的经典，并且与西方和苏俄的经典书目不尽相同。当然，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翻译的重点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做出了相应的调整。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和巴尔扎克给与了高度评价，他们的作品便成了必读物，必须翻译并予以批评性的讨论和学术研究；由于列宁将托尔斯泰的作品喻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托尔斯泰也就一直在中国学界受到高度重视，并得到学者们持续地讨论和研究，直至今天也是如此；由于高尔基与列宁和斯大林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他本人也为确立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他的作品在中国得到了大面积的翻译和讨论，在文革前尤其如此。

有时，西方世界的非经典作品也能够阴差阳错地在中国走红，甚至成为经典。例如，爱尔兰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说家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描写意大利烧炭党人革命活动的小说《牛虻》在50年代中国的突然走红，同时走红的还有高尔基的《母亲》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作品的作者是革命者，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都符合中国革命的要求。也因此，在文革期间，几乎所有的西方文学作品，连同中国的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都难逃大批判的厄运，只有上述三部作品依然在广大读者中流行，尤其在青年读者中颇受欢迎。文革期间的中学生就是读着这些“经典”文学作品、受到书中的英雄人物的启迪和熏陶而成长起来的。这些“经典”作品中的一些人物格言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他们的脑海里，甚至一度成为他们的座右铭，可见文学作品的教诲作用之大。毛泽东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二、重读《讲话》及其当代阐释

上面提及的做法不一定是毛泽东亲自规定的，但究其根源，势必追溯到他的一系列关

于文学艺术的指示，尤其是那篇经典的纲领性文献《讲话》。下面我将尝试从今天的角度对这部写于七十五年前的经典著作进行重读和阐释。

毫无疑问，在毛泽东所有关于文学艺术的讲话、文章和书信中，《讲话》在海内外最为有名，并且最常被人们讨论和引证，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作品。其中许多原创性的思想观点已经为今天的习近平总书记所继承和发展^[3]。在今天隆重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毛泽东诞辰125周年的语境下，重读这篇经典文献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这篇《讲话》最初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为根据地的一些党政干部、进步作家和艺术家的两次演讲，后稍作修改，发表在《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号上。毛泽东本人与文学艺术的联系十分紧密，而这篇文献集中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并将其运用于中国的文学艺术研究。

正如前文指出的，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文学艺术应当首先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因此《讲话》的“引言”中，毛泽东提出了四个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1）立场问题；（2）态度问题；（3）工作对象问题；（4）学习的问题（848-52）。这些问题都服务于一个中心点：文学艺术应当为人民群众服务，尤其在抗战时期要为工农兵服务。如果一位作家或艺术家并非来自工农兵（例如来自上海这类大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应当努力改造自己以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者来说，这是一个痛苦但必须经历的过程。毛泽东向听众讲述了他从一个小资产阶级学生转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员，最终完成自我“改造”的过程（852）。显然，他希望向这些作家和艺术家表明，自己是从一个小资产阶级学生转变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因此对底层群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指出：

……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852）

毛泽东十分重视中国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服务对象。在过去，文学艺术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利益服务，普通的人民大众无法欣赏。毛泽东认为他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就应当推广一种无产阶级文学。在《讲话》中，他尖锐地批判了诸如梁实秋、周作人和张资平这些资产阶级作家和知识分子，对作为中国新文化和文学旗手的鲁迅则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不难看出，这一评判的政治倾向性十分明显，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相吻合。即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否认文学艺术的政治倾向性。

虽说毛泽东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造诣很深，非常关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悠久而辉煌的传

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喜欢外国文艺。恰恰相反，他认为两者都要继承，或者说批判地继承，以便建立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这一点贯穿于他在1949年后的文学思想中，后来江青在文革前后进行的京剧样板戏实验也得到了他的首肯和支持。

《讲话》中一个最为突出的观点就是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这也是争议最大的一点。实际上，在他看来，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865-66）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说过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话，但是由于列宁的阐释和对党的出版物（文学）政治倾向性的强调，毛泽东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此给予特别关注。诚然，这样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必然会使人们误以为毛泽东并不重视艺术本身的规律。其实，毛泽东十分讨厌那些现代主义作家及其中国追随者所进行的纯粹的艺术实验，这一点与列宁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厌恶几乎如出一辙。在这方面，毛泽东依循列宁的文学艺术观，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

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865-66）

但是另一方面，他仍然号召人们拥抱过去的所有文学艺术作品，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只要是健康的、对人民大众有益的都需要，以便服务于今天的目的。当然，认为中国的文学艺术应当服务于当时抗战的需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是当时最大的政治。但是评价这些作品健康或者有害需要一个标准。在毛泽东看来，“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868）。对于这两个标准的关系，他这样区分：“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869）即当政治与艺术发生矛盾时，他自然会将政治放在第一位，关于这一点，毛进一步阐述道：

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

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869)

在这里,毛泽东试图论证,强调文学艺术的政治倾向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发明,因为所有的阶级早就有了这样的规定。正如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文学艺术只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普通人民大众无法欣赏艺术作品。因此,毛泽东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一切文学艺术都具有某种政治倾向性。在战争年代,这种倾向性愈加明显:好的文学艺术应当激励人民群众去反抗敌人,而坏的作品则只能帮助敌人削弱统一战线。在此意义上,毛试图说明,文学艺术应当被排斥、批判还是得到弘扬,其衡量标准就是它们是否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是否推动历史的进步,或具体地说来,就是能否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的现实和具体的文艺实践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艺术标准,即“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869-70)。这是对之前强调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一种修正和补充。因为他也明白,“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870)。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马克思主义关于莎士比亚化(Shakespeareanization)的概念:优秀的文艺作品必定是意识到的思想内容和莎士比亚式的人物刻画的完美结合。莎士比亚在艺术上更胜席勒一筹,因为前者通过艺术本身的力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后者则充当了时代精神的简单传声筒。毛泽东认为,深刻的思想应当用完美的艺术形式来表达,这显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的。在这里,我想论证的是,毛泽东并不反对艺术实验,但是他将政治倾向性放在第一位常常会引起人们的误解,认为他割裂了文学艺术评价的整体标准。实际上,他心目中理想的衡量标准应是正确的政治立场与卓越的美学再现的完美结合。这二者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这也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辩证统一的哲学观。

所以在毛泽东看来,“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855)。如果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想在革命过程中得到发展,应当做到这一点,“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855)。坚持文艺的人民性便是衡量文学艺术是否优秀和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准。毛泽东虽然不反对学习外国文学,但十分注重对外国文学的引进选择。与马恩列斯不同,受语言所限,毛泽东对外国文学的了解主要依靠翻译,并且即便是翻译作品他也读得不多。他的著述中极少引证外国作品。整个《讲话》他只提到一部外国小说,即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这部作品在当时的苏联和中国的抗日根据地里有较高知名度,但在西方国家却鲜为人知,因为其政治倾向性太过鲜明而艺术上无甚特色。时至今日,这部作品几乎被俄罗斯文学研究者所遗忘。但毛泽东却对它评论道:“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876)显而易见,正是他的政治倾向性让他做出了上述误判。在以后的

著作中，他就更少提及并引证外国文学作品了。

毛泽东在相当一些著作中坚持批判地继承一切古代的和国外的文学艺术。1949年后，他对外国文学也保持了“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态度。这一观点通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理解和注重实践的态度得到了发展。毛泽东生前对那些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人深恶痛绝，他自己在成为中共和红军最高领导人之前也曾经深受其害。因此他在《讲话》中告诫人们，“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858）。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这是他毕生所强调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也体现在他的文艺思想和理论之中。不同于王明那些只会照本宣科般传达斯大林的旨意和共产国际的指令，并试图以此来指导中国抗战的教条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坚持活的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而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在后来中国几代领导人建构中国的文学话语的过程中，这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光大^[4]。就此层面而言，发表于七十五年前的《讲话》绝没有过时。虽然有些提法现在看来不那么恰当，但它依然对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及文学理论家和学者有所启迪^[5]，在全世界范围内，也不断地引发批评性讨论和学术研究甚至辩论^[6]。

三、《讲话》之于当下的意义

毛泽东去世后，虽然因为其晚年的一些错误受到不少批评乃至于诋毁，但毛泽东思想在今天仍然被当作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方针。毛泽东思想并非毛泽东一人所专有，而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产物。在这方面，毛泽东的贡献最大。今天看来，我认为在整个20世纪，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与他相比。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的国际声誉及影响已经得到国内外的广泛认可，毛泽东思想不仅影响了法国的阿尔都塞、萨特等法国理论家（Liu 12-28），也启迪影响了波伏娃这样的女权主义思想家（Houten 112-29）和巴迪欧这样的毛主义者（Huang 29-46）。此外，它还吸引了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每次他来中国访问讲学，都要设法寻访毛泽东的足迹以表达敬意。在今天的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毛泽东的崇拜者更是数不胜数。这不仅与他的个人魅力有关，也因为他的思想和理论对这些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发展自身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影响。

应该承认，毛泽东的遗产已经成功地被他的几代继任人所继承，尽管有时不乏对他的错误的批评。邓小平所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重要的一项，这是不可动摇的。而后来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新近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继承毛泽东的遗产的结果，也都是由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而来的。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这就是当代中国的一种活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思想和理论也是如此，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学艺术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这些思想观点也不断地得到他的战友们的补充和完善。因此毛泽东的遗产并不仅仅属于中国共产党人，它也属于全球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进步的人民，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毛泽东和他的许多战友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除了建国后访问苏联两次以外，一生从未去过其他国家。因此，他是一个典型的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热爱自己的祖国，从不允许国家主权受到侵犯，不管是美国那样的帝国主义国家还是前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毛泽东主要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但他从不拒绝新的文化，他认为应当继承古代的和外国的先进文化，因此他也十分重视建构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原则。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就是他能动地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理解和发展的结果，这显然超越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教义。也就是说，他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给予同样的重视，认为它们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了另一次文艺座谈会，并向与会的作家、艺术家代表，以及党和政府负责文艺工作的官员代表作了讲话。在讲话中，他着重谈了五个问题：（1）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中国文化的繁荣；（2）必须创造不负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3）必须坚持为人民而创作的方向；（4）中国的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5）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显然，习近平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继承了毛泽东的文学艺术遗产，这一点尤其体现于最近举行的中共十九大及其一系列文件中，这次会议标志着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然受到高度重视，并被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习近平在他的北京讲话中发展了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并试图将其作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指导原则。比较一下这两个讲话，我们可以发现，它们都体现了各自所处的时代精神：在毛泽东的讲话中，强调的是民族性；而在习近平的讲话中，更多强调的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国际重要性。而且习近平的讲话提及了许多世界文学名著，从而表明，中国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是为中国人民创作的，同时也是为全世界人民所创作的。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说，习近平将继续毛泽东的抱负，中国不仅在全球政治和经济方面，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应该有所作为，为全世界人类做出更大贡献。我最后想强调的是，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提升，毛泽东思想的普遍价值和意义，尤其是他的文学艺术观点，将越来越得到世人的认可。他的文艺思想对全球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贡献将越来越得到世人的认可。在这方面，本文仅作为一个初步的尝试。

注释 [Notes]

[1] See Ning Wang, editor. *Global Maoism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Global Context*, a special issu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 52, no. 1, 2015.

[2] See D.W. Fokkema. *Literary Doctrine in China and Soviet Influence 1956-1960*. Mouton & Co., 1965.

- [3] 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
- [4] 对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取代一切的教条主义者，毛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不能代替物理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874）非常有趣的是，文革后，当有人指责邓小平修正毛泽东思想时，他也照样对那些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予以了严厉的驳斥。邓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应当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不只是照搬他们的一些只言片语。在这方面，邓小平实际上继承了毛泽东的遗产，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以了发展。
- [5] 习近平也对中外文学情有独钟，他在近几年的一系列讲话中不时地引证他所读过的文学作品。在习近平看来，中国当前处于全面实现现代化和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代，在这样一个新时代，确立文化自信就显得更为重要。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
- [6] See Bonnie McDougall. *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0.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Huang, Yiju. "On Transference: Badiou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 52, no. 1, 2015, pp. 29-46.
- Liu, Kang. "Maoism: Revolutionary Globalism for the Third World Revisit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 52, no. 1, 2015, pp. 12-28.
- Mao, Zedong. "Talks at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vol. 3, People's Press, 1991, 2nd edition, pp. 847-79.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847-79页。]
- McDougall, Bonnie. *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0.
- Sun, Yifeng. "Opening the Cultural Mind: Translation and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an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 69, no. 1, 2008, pp. 13-27.
-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CCP Central Committee, editor. *Reader's Guide to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 at the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Xuexi, 2014.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
- van Houten. "Simone de Beauvoir Abroad: Historicizing Maoism an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 52, no. 1, 2015, pp. 112-29.
- Wang, Ning. "Marxism and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Frontiers of Literary Theory*, no. 12, 2014, pp. 1-29. [王宁：《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载《文学理论前沿》2014年总第十二辑，第1-29页。]

◇责任编辑：罗辉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考察文学阶级性的三个维度

◎ 季水河

内容提要: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阶级性的考察包含三个维度。一是主体维度,肯定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学家都有阶级立场,他们生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超越阶级性,总会成为一定阶级的代言人并为特定的阶级服务;二是客体维度,阶级社会中的生活与人都是阶级性的存在,因为阶级社会的主旋律是阶级竞争,生活于社会生活中的人无法摆脱阶级关系的制约,他们的思想感情都带有明显的阶级性;三是本质维度,阶级社会中的文学作品都归属于一定的阶级,带有一定的阶级属性,承载着阶级的内容,发挥着阶级的功能。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阶级性 维度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8) 04-0011-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11AZD048)

作者单位: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Titl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lass Nature of Literature by Chinese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Abstract: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lass nature of literature by Chinese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The first is the subject dimension, which affirms that writers who are the subject of creation all have class stand. They are born in class society and cannot transcend class nature, always become spokesmen of a specific class and serve it. The second is the object dimension, which suggests life and people in class society are beings of class nature. As the main feature of class society is class competition, people in social life cannot stay away from the restriction of class relations so that their thoughts and feelings partake of obvious class nature. The third is the nature dimension. Belonging to a specific class, all literary works have certain class attributes, carry the contents and play the role of the class.

Keywords: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class nature, dimensions

Author: Shuihe Ji, Professor,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China.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阶级论，是20世纪初期至今学术界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却很少得到全面的言说和理性的评价。从20世纪初期至7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阶级论占据了在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中心地位，学术界对其多是尊崇与膜拜，缺少审视与反思；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学术界对其多是否定与批判，缺少客观与理性。在这一背景下，客观还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阶级论的全貌，既有利于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整体形态，也有利于我们正确评价20世纪至今100多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意识形态都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作为意识形态之形象表现的文学，也不可能超越阶级而独立存在，并从文学创作主体、文学创作客体、文学的本质属性和发展历史三个维度考察了文学的阶级性。

一、主体维度：作家都有阶级立场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阶级论，首先是从阶级社会中作家的阶级属性方面去认识文学阶级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们一致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作家无疑是阶级的一员，他的立场始终是站在一定阶级方面的，他的意见始终代表着一定阶级的表达。自然，他的作品也就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具体言之，创作主体的阶级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作家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作家总是有意无意地站在一定阶级或阶层的立场上，来看待和评价生活与作品中的人、事、物及其相互关系，或隐或显地表达具有一定倾向性的思想和感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作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史上，最早明确提出在阶级社会没有超阶级作家的批评家是鲁迅。1929年至1930年，围绕文学的阶级性问题，鲁迅与梁实秋展开了激烈的论争。1929年，梁实秋在《新月》上发表了《文学有阶级性吗？》一文，否定文学应该表现阶级性，肯定文学应该表现永久不变的人性^[1]。该文发表后，引起了以鲁迅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的反驳。鲁迅于1930年在《萌芽》月刊上发表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针锋相对地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既没有超阶级的文学，也没有超阶级的作家。他说：“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210）在鲁迅看来，在阶级社会中，作家说自己是超阶级的，并非是对现实存在叙述，而是作家的一种自我感觉、自由幻想。在现实生活中，作家是受阶级意识支配的，是阶级的作家；他所创作的作品，自然带有阶级性。他还形象地描述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452）

随后，瞿秋白、周扬、胡风等人，都对鲁迅的观点表示了认同与支持。并在他们的批评

实践活动中,进一步拓展和强化了作家阶级属性思想研究。在这一点上,瞿秋白非常具有代表性。他1931年至1932年发表在《现代》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在批评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时,充分肯定了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艺术家这个观点^[2]。1932年,胡秋原在《文化评论》上连续发表了《阿狗文艺论——民族文艺理论之谬误》、《文化运动问题——关于“五四”答〈文艺新闻〉记者》、《勿侵略文艺》等批评文章。这些文章的重要观点之一是艺术家是自由的智识阶级,文学和艺术至死都是自由的、民主的。各种主义、政治、阶级都应“勿侵略文艺”。瞿秋白认为,胡秋原的所谓超阶级的文艺自由论,本身就带有阶级性,宣扬的是资产阶级文艺自由观。他指出,在阶级社会里,艺术家是不可能脱离阶级而自由的。要求艺术家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其本身就站到了资产阶级立场上,成为了资产阶级的“留声机”。“事实上,著作家和批评家,有意的或无意的反映着某一阶级的生活,因此,也就赞助着某一阶级的斗争。有阶级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实在的自由。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瞿秋白61)。

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艺术家,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个基本观点,贯穿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得到了集中、完整的表述。毛泽东将抗日战争时期的艺术家分成三个阶级类别:资产阶级艺术家、小资产阶级艺术家、无产阶级艺术家,每个类别的艺术家都分属于不同的阶级,都为不同的阶级服务,歌颂各自所属的阶级。一般情况下,不同阶级的艺术家也不会跨越自己所属的阶级去为另一个阶级服务:“你是资产阶级艺术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艺术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毛选》3卷873)当然,不同阶级的艺术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和背景下,也是可以转化和联合的。如小资产阶级艺术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可以“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甚至转变成为无产阶级艺术家。同时,在抗日救亡这个特殊环境下,“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艺术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艺术家)团结起来”(867)。即使这样,他们也是站在不同阶级的立场上来为抗日救亡服务,并不意味着他们阶级属性的消失,更不意味着他们是超阶级的艺术家。

(二) 阶级社会要求作家为一定阶级代言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认为,既然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艺术家,那么,所有的艺术家也都会选择并归属于一定的阶级,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发表意见,表达感情,为自己所属的阶级代言,成为一定阶级的代言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史上,最早涉及艺术家为一定阶级代言这一问题的是沈泽民。1924年,沈泽民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

了《文学与革命文学》一文，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应成为无产阶级的舌人（即代言人），为无产阶级民众代言，渲染人民大众的痛苦，表达无产阶级的愿望，进而达到组织人民大众情绪之目的。他说，对无产阶级而言，“文学者不过是民众的舌人，民众的意识的综合者；他用敏锐的同情，了澈被压迫的欲求，苦痛与愿望，用有力的文学替他们渲染出来；这在一方面，是民众的痛苦的慰藉，一方面却能使他们潜在意识得到了具体的表现，把他们散漫的意志，统一凝聚起来。一个革命的文学者，实是民众生活情绪的组织者”（沈泽民）。

沈泽民之后，郭沫若、鲁迅、瞿秋白、周扬、冯雪峰等人，也都论及了文学为阶级代言的问题。郭沫若1926年发表在《创造月刊》上的《革命与文学》一文，在讨论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时认为，在革命时期，一般都存在着两个阶级的对立，每个阶级也都会有文学上的代言人为本阶级代言。他说：“每逢革命的时期，在一个社会里，至少是有两个阶级的对立……这样的時候，一个阶级有一个阶级的代言人，看你是站在哪一个阶级说话”；“你是反对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反革命的文学，是替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你假如是赞成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革命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郭沫若）。瞿秋白也表达了与沈泽民、郭沫若相似的看法，并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艺术家是阶级代言人的观点。其重心从艺术家是阶级代言人转向了艺术家是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突出了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和不同阶级文艺意识形态的差异性。瞿秋白关于艺术家是阶级意识形态代表的观点，是针对“第三种人”的无阶级倾向的文艺论提出来的。1932年，苏汶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该文明确表示作者想做“在一‘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这两种之外的第三种人”，即没有阶级倾向和党派立场的中间派（苏汶）。瞿秋白批评了苏汶的观点，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既没有胡秋原的自由人可做，也没有苏汶所说的“第三种人”存在，“每一个作家，不论他们是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70）。艺术家是阶级代言人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史中，到毛泽东那里得到了完善，在建国以后进一步强化，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被推向极端化。

（三）阶级社会要求艺术家为特定的阶级服务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文学都是为特定阶级服务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是这样，无产阶级也是这样。只是有的阶级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甚至隐瞒和抹煞这一点；有的阶级敢于公开承认这一点，甚至公开倡导和宣传这一点。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所谓的“自由人”“第三种人”属于前者，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属于后者。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史上，最早明确提出文学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观念，主张无产阶级文学应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革命文学讨论。在革命文学讨论中，沈泽民、冯乃超、成仿吾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沈泽民不仅主张无产阶级文学应为无产阶级服务，而且

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好务的方法。他说,无产阶级文学要为无产阶级服好务,必须深入无产阶级生活,表现无产阶级情绪。“因为现代的革命的源泉在无产阶级里面,不走到这个阶级里面去,决不能变通他们的情绪生活,决不能产生革命的文学”(沈泽民)。成仿吾认为,资产阶级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都是为本阶级意识形态服务的。无产阶级文学要为无产阶级服务,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第一,“驱逐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在大众中的流毒与影响,获得大众,不断地给他们以勇气,维持他们的自信”;第二,“以真诚的热诚描写在战场所闻见的,农工大众的激烈悲愤,英勇的行为与胜利的欢喜”(成仿吾)!

到左联时期,阶级社会文艺家为特定阶级服务,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们的一种共识。鲁迅、瞿秋白、周扬等都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瞿秋白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的观点,一方面接续和深化了成仿吾无产阶级文学应驱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观点,指出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要肃清统治阶级的思想上的影响,肃清统治阶级的意识上的影响”;另一方面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要成为本阶级思想改造的武器,强调“要用文艺来帮助革命”,“要用文艺来做改造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武器”(瞿秋白 65)。当然,对阶级社会中文艺家应为一定阶级服务这一思想研究最深入、论述最系统、影响最广泛的还是毛泽东。他 1942 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说是这一思想的集中展示,主要强调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阶级社会的文艺家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地主阶级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当然是为无产阶级的;二是无产阶级的文艺家,“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歌颂无产阶级,推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三是在抗日战争这个特殊时期,无产阶级文艺家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重点是工农兵,工农兵是当时无产阶级的代表(《毛选》3卷 855-58)。

二、客体维度:生活与人都是阶级性存在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阶级论,也是从阶级社会中的现实生活去认识文学阶级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人们主要生活于阶级博弈和阶级竞争中。作为文学创作客体对象的社会生活,是一种阶级性的存在;作为社会生活反映的文学作品,也无疑是带有一定的阶级色彩。创作客体的阶级性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阶级社会中的主旋律是阶级竞争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深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观点影响和启发,也主要用阶级斗争观念去评价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从阶级论的视角去观察人类的社会生活现象。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中,最早用阶级和阶级分析去评价重大历史事件的是李大钊。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美、法为首的协约国集团的最终胜利而告终。这是 20 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一场全球性大战,人们也

普遍认为其结果是协约国的一次伟大胜利。但李大钊不这么看。他站在阶级的立场，从阶级分析出发，认为这场战争“是阶级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胜利也是“全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的胜利（《李全集》260）。可以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中，李大钊开了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认识社会、评判历史的先河。李大钊之后，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社会发展，分析社会变革，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的一种自觉意识，而且与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变革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在革命文学的讨论中，沈泽民就依托阶级分析法，分析了革命文学产生的阶级原因，肯定革命文学是阶级关系变动的结果，也是阶级斗争的需要。他说，正是“旧的阶级已自己走到他的灭亡的道路，新的阶级觉醒起来凝聚他自己的势力……世界的无产者正从沉睡中醒来，应着时代的号声的宣召，奔赴历史所赋予他们的使命”，无产阶级才应运而生（沈泽民）。到左联时期，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生活，分析社会，成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的共同行动。他们一致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不仅在生活中广泛存在，而且构成了社会的主旋律。他们进而肯定，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强调自有阶级社会以来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自身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尖锐的对立中的产物……它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目的意识性的产物”（冯乃超）。

当然，将阶级斗争看成是阶级社会主旋律，并对其论述最充分的，还是毛泽东。他不仅认为人类的历史和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且认为即使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也基本结束，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就没有阶级斗争了。他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文集》230）毛泽东的这段论述，不仅总结和升华了他之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们关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生活主旋律的观点，而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近20年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实践的指导思想。

（二）阶级社会中人的生活无法摆脱阶级关系的制约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关系的基础是阶级关系，社会关系对人产生影响的主要表现是人受到阶级关系的制约。无论人们在思想上如何幻想着自由，但在现实社会中他却无法超越阶级关系的制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中，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毛泽东等人从不同侧面讨论了阶级关系对人的强调制约性。李大钊最早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说明阶级社会中人是受阶级关系制约的。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但无论是社会学现象，

还是经济现象，都是人类阶级关系的体现，也都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制约性（《李文集》3卷21-35）。陈独秀从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性质和剩余价值创造的角度，论述了现实社会中的阶级对立与阶级关系。他说：“资本既然是私有，结果有资本的人才有机具做工生产，并且自己还可以不做工，只拿出资本来雇人替他做工生产；没有资本的人便无工可做，只能卖劳力给有资本的人替他做工生产。其结果是生产事业越发达，雇人的游惰阶级和被雇的劳苦阶级底分离越发显著……工人血汗所生产所应得的，被资本家用红利的名义掠夺去了。”（陈独秀338-39）在陈独秀看来，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剩余价值创造，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关系，这种关系在制约工人阶级和资本阶级的同时，也在冲突中预示着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如果说李大钊，陈独秀主要是从经济关系来谈阶级关系和阶级关系对阶级社会中人们生活的制约，那么，鲁迅和毛泽东更侧重于从社会批判、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谈阶级关系及其对人们生活的制约。鲁迅是在批评抽象人性论，“第三种人”“为艺术而艺术”等观点时，指出阶级社会中人受阶级关系制约的，无论人们怎样幻想超阶级的自由性，但他在现实生活中无疑受到阶级性的影响，无法超越阶级性的限制。他说，“‘思想自由’，想想而已，决不实现的思想。而不料遇到了别一种维持治安法，竟连想也不准想了”。因为，现实中的阶级关系牢牢地制约了他的生活（陈独秀163）。毛泽东更多地是从社会实践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待阶级社会中阶级关系对人的制约和影响。他不仅充分肯定了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而且明确肯定了阶级关系对社会实践的限制和影响。他指出，阶级社会不同于非阶级社会的突出标志，是人们的各种活动都与阶级关系相联系并受其影响。“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种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成员所构成的生产关系，远比没有阶级的社会复杂，具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对从事生产活动的人产生制约作用并“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毛选》1卷283）。

（三）阶级社会中人们的思想感情都带有明显的阶级性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普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唯物史观中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影响观念，一定的社会存在和物质基础影响人们思想感情的形成和性质的思想。他们一致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思想和感情都是带有阶级性的，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这方面，鲁迅、瞿秋白、周扬、毛泽东等人的观点比较有一致性。鲁迅在考察文艺的阶级性时，认为文艺阶级性的重要来源之一，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想感情本身就带有阶级性。他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影响思想感情的角度，论述了阶级社会中人们的思想感情、个性特点必然受制于经济组织并带有一定的阶级性。他说：“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之说（鲁

迅 128)。瞿秋白则从剥削制度下的阶级关系与意识形态统治入手，讨论了阶级社会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必然带有阶级性，只不过这种阶级性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后天赋予的。“现在剥削制度下的一定的阶级关系，规定着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然而群众之中的一些守旧的落后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并不是群众自己所‘固有’的，而是统治阶级用了种种方法和工具所规定的，所灌输进去的”（瞿秋白 65）。周扬是从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和政治利害的相关性角度，论述人们思想感情是具有阶级性的。他指出，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思想感情、意识观念同“任何意识形态（包括艺术在内）都有一定的阶级性，和一定阶级的政治利害相依靠，这已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只是这个依靠关系，在过去，常常是被掩盖的，不自觉的，无政府状态的”（周扬 85）。

相对于鲁迅、瞿秋白和周扬从文艺与社会的联系去看待社会生活中人们思想感情的阶级性，毛泽东的突出特点则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从阶级社会阶级性的普遍存在，阶级性对人们生活的普遍制约，阶级性对人们思想感情的普遍影响，来肯定人们思想感情的阶级性。他认为，阶级社会生活中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去认识和评价事物，形成特有的思想感情，从而使其具有一定的阶级性。他说：“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与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选》1卷 283）。在毛泽东看来，阶级斗争在各种政治文化生活中，对人们思想感情的影响最普遍、最强烈，因此赋予人们思想感情的烙印也最突出、最鲜明。

三、本质维度：作品都具阶级性归属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阶级论，从阶级社会中文学主体与文学客体两个方面，赋予了文学作品的阶级性特点，指明了文学作品的阶级性归属。从创作主体看，他不能超越阶级性而独立于阶级之外，他作为阶级的代言人为特定的阶级代言和服务，必然要将自己阶级立场、阶级倾向、阶级使命，渗透于文学作品之中；从文学客体看，生活中的阶级斗争，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阶级成员的思想感情，也必然成为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二者共同构成了文学作品的阶级性内容，使作品归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其服务。

（一）阶级社会中的文学作品都带有一定阶级属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一方面考察了自阶级社会以来文学演变的历史，发现几乎所有时代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描写社会现实生活，反映社会历史变革的文学作品，都带有一定的阶级属性并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另一方面又考察了他们同时代国内外的文学主张和文学作品，发现它们同样具有明显的阶级色彩和属于一定的阶级。他们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

否定了超阶级性、永恒不变的人性等文学观念，肯定了阶级社会中的文学作品都带有阶级性这一科学论断。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讨论，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深化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文学阶级性讨论，完善于40年代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阶级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占据文学批评的中心地位，但在内容上仅是対以前文学阶级论的发挥，在理论上缺少新意。

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中，最早明确论述文学具有阶级属性并旗帜鲜明地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沈泽民、蒋光赤、沈雁冰等人。他们认为，从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变，明显的标志是启蒙观念向阶级观念的变化，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等多元艺术观向为革命而艺术的变化。沈泽民在《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中指出：过去提倡的文学革命，一个突出的缺点是“没有把文学的阶级性指示出来，也没有明白指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文学”。而“现代的革命的泉源是在无产阶级里面，不走到这个阶级里面去，决不能交通他们的情绪生活，决不能产生革命的文学”（沈泽民）。沈泽民着重突出了两个重点：一是革命文学要突出无产阶级观念，二是明确革命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蒋光赤在《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一文中认为，文学革命时期所涌现出来的作家们，大多都非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如：冰心“是个小姐代表”，“郁达夫是颓废派”。他大声呼吁，希望无产阶级队伍中能够产生“反抗的，伟大的，革命的文学家”，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代表民族性，能够代表民族的解放运动的精神”（蒋光赤）。沈雁冰在《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中，追溯了无产阶级艺术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批评和否定了“全民众”的艺术论，指出“我们看见的是此一阶级和彼一阶级，何尝有不分阶级的全民众？我们如果承认过去及现在的世界是由所谓资产阶级支配统治的，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否认过去及现在的文化是资产阶级独尊的社会里的孵化品，是为了拥护他们统治者阶级的利益而产生的，我们如果也承认那一向被騙着而认为尊严神圣自由独立的艺术，实际上也不过是统治阶级保持其权威的工具”。他还认为，阶级利益是每个阶级进行艺术选择的标准。无产阶级艺术作为一种崭新的艺术，要求内容与形式的和谐^[3]。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文学阶级性论争，是以梁实秋的文学人性论、胡秋原的文学自由论和苏汶的第三种人文学观为代表的文学超阶级性观念，与以鲁迅、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为代表的文学阶级论之间的争鸣。这场论争，强化了文学的阶级性主张，深化了文学的阶级论，使阶级社会的文学都带有一定的阶级性这一观点，在人群中形成了基本的共识。1928年，梁实秋在《新月》上发表的《文学与革命》一文，明确提出“文学是基于固定的普遍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所谓“无产阶级的文学”“是不能成立的名词”，因为“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梁实秋）。随后，胡秋原、苏汶分别从文艺“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文艺家是“自由人”（胡秋原）；文艺创作者群体是处于“知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阶级论者之间的“第三种人”（苏汶）等不同侧面，呼应了梁实秋的文学超阶级的人性论观点。而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批判

了梁实秋文学的超阶级人性论，肯定了阶级社会中的文学作品都带有阶级性的观点。鲁迅认为，阶级社会中的文学作品都是带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在文学上的一种表现。这是因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自必然”。“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鲁迅 208）。鲁迅的论述充分说明，文学的阶级性，是阶级社会文学表现人的必然结果。因为阶级社会中的人有阶级性，如果文学必须描写人，那么，阶级社会中的文学就自然而然地带有阶级性，文学的阶级性并非批评家们强加给文学的，而是文学自备的。瞿秋白也同鲁迅一样，明确地肯定了阶级社会中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他说，我们应“指出一些文学的真面目——阶级性”。因为，“文学是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许多阶级各有各的文学……新兴的阶级，从前没有文学的，现在正在创造着自己的文学；而旧有的阶级，从前就有文学的，现在是在企图剿灭新兴阶级的文学”（瞿秋白 69）。瞿秋白的论述非常鲜明地表达了一个观点：阶级社会中的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文学，旧阶级的文学历史久远，新阶级的文学正在创造。同时，旧阶级的文学还企图剿灭新阶级的文学。在这样的前提下，文学又怎会没有阶级性呢？

（二）阶级社会的文学作品都承载着阶级的内容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讨论，不仅肯定了阶级社会中文学作品都带有阶级性，揭示了其阶级性形成的原因，而且还探讨了阶级社会中文学作品阶级性的体现，认为文学作品所承载的阶级性内容，是文学作品阶级性的重要标志。他们指出，文学作品所承载的阶级性内容，既可以体现在其题材、主题中，又可以体现在其思想倾向、感情色彩里。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活动中，最早提出阶级社会的文学表现阶级内容的是郭沫若。他认为，阶级社会和革命时期的文学，即阶级的文学和革命的文学，虽然它们作为名词是固定的，但它们的“内涵是永不固定的”。也就是说，不同时代阶级的文学、革命的文学，虽然名称不变，但它们所承载的内容却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他要求无产阶级文学要表现无产阶级的理想愿望。他说：“无产阶级的理想愿望革命文学家早点醒出来，无产阶级的苦闷愿望革命文学家实写出来。”（郭沫若）李初梨的看法也和郭沫若相近，但他的观点更明确，态度更肯定。他强调，阶级社会中的文学作品一般都承载着阶级的内容，始终脱离不了阶级性。这是因为，阶级社会中的作家，都受到阶级意识的支配；阶级社会中的文学创作，很难出于自我表现，主要是阶级意识的表现。因此，这就注定了阶级社会中的文学，一般都带有阶级的背景与阶级的痕迹。他说，在阶级社会中，

文学，与其说它是自我的表现，毋宁说它是生活意志的要求。文学，与其说它是社会生活的表现，毋宁说它是反映阶级的实践的意识。因为无论什么文学，都有它的主张。一个作品越是伟大，它的主张的魄力愈强。然此主张，突出于作家的生

活意志；而决定此生活者，则为作家所居之阶级。所以，我们可以说：一切的作品，有它的意志要求；一切的文学，有的他的阶级背景。（李初梨）

克兴认为，统治阶级和无产阶级文学的重要区别，主要体现在它们所承载的内容上面，特别是二者意识形态的不同。他说：“统治阶级的文学，并不是因为描写过封建地主，资本家等，而是因为它所反映的意识形态，是利于统治阶级拥护它们的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底文艺，也断不是因为描写了工农，为工农诉苦；就是因为它所反映的意识形态，是促进农工的解放为工农谋利益的意识形态。”（克兴）当然，克兴的观点也有可斟酌、可完善之处。他强调不同阶级文学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这是正确的。但他认为不同阶级的文学与所选择的题材、所描写的对象无关，这又是不科学的。应该说，不同阶级的文学，不仅仅在于其题材的不同、描写对象的差异，更在于其意识形态的不同、思想感情的差异。一方面，我们反对题材决定论，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强调不同题材价值的差异性。

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全面考察了阶级社会的文学性，充分肯定了阶级社会的文学作品都承载着阶级的内容，从多个侧面论述了不同阶级的文学，不仅在题材、主题上有差异，而且在思想感情上也有所不同，并从与创作主体的联系中揭示了这些差异和不同所产生的原因。毛泽东指出，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文学所承载内容的差异，是为不同阶级作家的阶级立场、情感态度所决定的。在一般情况下，“你是资产阶级艺术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艺术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毛选》3卷873）。

（三）阶级社会的文学作品都发挥着阶级的功能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基本上都是文学的阶级功能论者。他们一致认为，阶级社会中的文学，大多具有阶级的功能；不同阶级的文学，都对自己所属的阶级起着维护与宣传作用，也对敌对阶级起着攻击与瓦解作用。他们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文学应成为宣传的工具、斗争的武器，要在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中，充分发挥其阶级功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史上，蒋光赤是最早强调无产阶级文学要充分发挥阶级功能的批评家之一。他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作家的生活受制于社会关系，而阶级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核心要素，对作家有无形的支配作用，使作家有意无意地成为某一阶级的代表并为其服务。因此，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一方面要暴露旧势力的罪恶，攻击旧社会的破产”；另一方面要“促进新势力的发展”，要“歌咏革命”，为无产阶级“创造出自由和幸福来”（蒋光赤）。李初梨同样认为，阶级社会中的文学都承担着阶级的任务，发挥着阶级的功能，任何一个阶级的文学，都会宣传、组织自己所属的阶级，欺骗、麻醉敌对的阶级，从而达到巩固自己所属阶级、瓦解敌对阶级之目的。他说：“无论什么文学，从它自身说来，有它的阶级背景，从社会上看来，有它的阶级的实践的任务”；“所以支配阶级的文学，总是为它自己的阶级宣传，组织。对于被支配的

阶级，总是欺骗，麻醉”。每个阶段的文学都有自己的目的“使他们自己的阶级更加巩固起来”。对无产阶级文学而言，面临的最重要任务是“要把一切有产者的黑幕揭开，把它一切的欺瞒，虚伪，真相，赤裸裸地呈现于大众面前”。从而“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李初梨）。鲁迅在批评梁实秋文学无阶级界限论时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文学不仅有阶级界限，而且阶级界限很明确，阶级属性很鲜明，阶级功能很突出，比如“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212）。

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中，毛泽东是阶级社会中文学阶级功能论的集大成者。他总结和升华了20世纪初到4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关于文学阶级功能的论述，并结合中国革命和抗日救亡的社会需要，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社会功能作了最全面、最深刻的论述。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功能有三个方面。一是揭发暴露功能。毛泽东指出，任何阶级的文学都会将敌对阶级作为揭露和批判的对象，无产阶级文学也不例外。揭发敌人欺骗，暴露敌人罪行，是革命文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与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毛选》3卷848-49）二是宣传歌颂功能。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文艺之所以称之为人民的文艺，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对人民大众的态度，在于它宣传人民和歌颂人民，即“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的赞扬（849）。三是社会改造功能。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作家，是中国革命和抗日救亡中不拿枪的军队；无产阶级文学，是鼓舞人民团结斗争，促进社会改造的有力武器。他要求无产阶级作家“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么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861）。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从文学主体、文学客体、文学本质三个维度，全面考察了文学的阶级性内容，论述了文学阶级性形成的主要原因。它是20世纪中国社会特殊背景下的产物，具有较大的历史合理性。但不可忽视的是，它也有过度夸大文学阶级性的倾向，更没有看到文学本身的复杂形态，将阶级性作了某种程度上的简单化理解，也给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带来过一些负面影响。

注释 [Notes]

- [1] 参见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载《新月月刊》1929年第2卷第6、7期，1929年6月10日，7月10日。
- [2] 参见易嘉：《文艺的自由与艺术家的不自由》，载《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1日。
- [3] 参见沈雁冰：《论无产阶级艺术》，载《文学周报》第172，173，175，196期，1925年。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Chen, Duxiu. *Selected Works of Chen Duxiu*, vol. 2.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2009.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Chen, Fangwu. "From Literary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Creation Monthly*, vol. 1, no. 9, Feb. 1928.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载《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
- Feng, Naichao.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China's Proletarian Literature Movem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Leftist Writers' League." *Embryo Monthly*, vol. 1, no. 6, 1 Jun. 1930. [冯乃超:《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左联生产之历史的意义》,载《萌芽月刊》第1卷第6期,1930年6月1日。]
- Guo, Moruo. "Revolution and Literature." *Creation Monthly*, vol. 1, no. 3, 16 May 1926.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载《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16日。]
- Hu, Qiuyuan. "On Literary Theory by Agou." *Cultural Criticism*, vol. 1, no. 1, 25 Dec. 1935. [胡秋原:《阿狗文艺论》,载《文化评论》创刊号,1931年12月25日。]
- Jiang, Guangci. "About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Sun Monthly*, no. 2, Feb. 1928. [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载《太阳月刊》第2期,1928年2月。]
- Jiang, Guangchi. "Modern Chinese Society and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wakening, Supplement to Republican Daily News*, 1 Jan. 1925. [蒋光赤:《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载《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5年1月1日。]
- Ke, Xing. "Fallacy of Petty Bourgeois' Literary Theory." *Creation Monthly*, vol. 2, no. 5, 10 Oct. 1928. [克兴:《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载《创造月刊》第2卷第5期,1928年12月10日。]
- Li, Chuli. "How to Develop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Cultural Criticism*, no. 2, 15 Feb. 1928.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
- Li, Dazhao. *Complete Works of Li Dazhao*, vol. 2. People's Publishing, 2006.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 *Collected Works of Li Dazhao*, vol. 3. People's Publishing, 2006.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Liang, Shiqiu.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Crescent*, vol. 1, no. 4, 10 Jun. 1928. [梁实秋:《文学与革命》,载《新月》第1卷第4期,1928年6月10日。]
- Lu, Xun. *Complete Works of Luxun*, vol. 4. People's Literature, 2005.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Mao, Zedong.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vol. 1. People's Publishing, 199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vol. 3. People's Publishing, 199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 *Writings of Mao Zedong*, vol. 7. People's Publishing, 1999.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Qu, Qiubai. *Collected Works of Qu Qiubai*, vol. 3. People's Literature, 1985.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 Shen, Zemin.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wakening, Supplement to Republican Daily News*, 6 Nov. 1924. [沈泽民:《文学与革命的文学》,载《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年11月6日。]
- Su, Wen. "On the Literary Debate between *Literary News* and Hu Qiuyuan's Literary Theory." *Modern*, vol. 1, no. 8, July 1932. [苏汶:《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载《现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
- Zhou, Yang. *Collected Works of Zhou Yang*, vol. 1. People's Literature, 1984. [周扬:《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吴晋先

FLC

文 化 研 究

《英格兰，英格兰》中的景观社会与超真实的“英格兰特性”

◎ 苏忱

内容提要：当代英国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凭借小说《福楼拜的鹦鹉》和《10½章世界史》于20世纪80年代蜚声西方文坛。两部小说中显见的拼贴、戏仿和碎片化等革新实验的叙事手法，以及小说对真实历史的质疑、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挑战都曾一度将作者推向后现代文学代表作家的宝座。然而，巴恩斯1998年出版的小说《英格兰，英格兰》却致力于剥去作者后现代作家的外衣，转向了政治小说。“英国特性”和“被发明的传统”成为小说《英格兰，英格兰》讨论的主题。小说犀利地揭示了所谓民族身份仅仅是大众心理在拉康镜像中的投射，是想象界中占据了真实主体的虚假形象，同时又是代替真实主体在场的言语建构的象征化产物。另一方面，小说中大众的选择也揭示了德波所讨论的后工业时代景观社会中隐性意识形态对大众的奴役。巴恩斯对虚构性民族身份的批判并不仅仅否定民族身份本身，更进一步揭示了想象性民族身份与英国社会现实之间的断裂处，栖居着真实的英格兰特性。

关键词：英格兰特性 景观社会 超真实 朱利安·巴恩斯

中国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 (2018) 04-0024-11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Title: The Society of Spectacle in Julian Barnes' *England, England* and the Hyperreal Englishness

Abstract: Julian Barnes, the contemporary English writer, used to be valued and labeled as a postmodernist fiction writer since his two well-know novels, *Flaubert's Parrot* and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½ Chapters*, used such postmodern writing techniques as pastiche, parody and fragments. However, *England, England*, the novel published in 1998, has shown the author's intention to distance himself from postmodernist tags with his serious reflections on Englishness and invented traditions. The novel manifests that the common sense understanding of Englishness is just a projection of mass desire in terms of Lacanian concept "mirror stage." At the same time, the novel exposes how the tacit ideology enslaves people in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of specta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uy Debord. All in all, Barnes's critique of the imagined national identity in *England, England* is not to deny the existence of Englishness, but to distinguish the imagined and the genuine.

Keywords: Englishness, society of spectacle, hyperreal, Julian Barnes

Author: Chen Su,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当代英国小说家巴恩斯(Julian Barnes)凭借小说《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和《10½章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½ Chapters*)于20世纪80年代蜚声西方文坛。两部小说中显见的拼贴、戏仿和碎片化等革新实验的叙事手法,以及小说对真实历史的质疑、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挑战都曾一度将作者推向后现代文学代表作家的宝座。然而,巴恩斯1998年出版的小说《英格兰,英格兰》(*England, England*)却致力于剥去后现代作家的外衣,转向了政治小说(Freiburg and Schnitker 61)。在此之前的1995年,巴恩斯曾出版了一部随笔集《伦敦书信》(*Letters from London*),在其中一篇题为《虚假》的文章中,作家直言:“英国人好传统,也好发明传统。”(qtd. in Guignery and Roberts 27)作品问世后,巴恩斯在访谈中也曾介绍说:“小说讨论的是有关英格兰的概念,真实性问题及对真相的探求、传统的发明和我们是如何忘记我们的历史的。”(27)“英国特性”和“被发明的传统”成为小说《英格兰,英格兰》讨论的主题,也成为评论者们关注的焦点。

《英格兰,英格兰》由三个章节构成。第一部分题为《英格兰》,描绘了女主角玛莎的回忆。她试图记住童年的重大事件,同时高度怀疑这些回忆的真实性。成年的玛莎后来被傲慢和狂暴的亿万富豪皮特曼爵士雇用。皮特曼想要通过在怀特岛上建造一座英格兰主题公园来赚钱。小说细述了这个方案的实施过程和最后的效果,整个描述充满讽刺和机智,而且皮特曼爵士的计划似乎显得越来越荒谬。尽管玛莎与保罗——皮特曼爵士的个人“思想捕手”——发展了一段恋爱关系,她也设法在短时间内主持企业,但她从来没有相信过这个项目,而保罗却深陷其中,以此为真。玛莎越来越不满意与保罗的关系,最终被迫离开岛屿。小说的最后一部分描绘了年迈且孤独的玛莎,她居住在一个脱离工业化的“英国”,仍在寻求真理和意义。小说由此塑造了一个在表象和拟像等超真实充斥的世界中苦苦追求真实性的主人公玛莎,围绕“英格兰,英格兰”岛的建造,她经历了“真实世界”的幻灭和“超真实”世界的成功,“英格兰特性”随之被解构又重构。

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大众文化领域,有关英国民族身份的话题近年来都颇受关注。在过去十多年间,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历史著作,以及文化评论界的研究者们都在此问题上著述丰富。例如:科尔斯(Robert Colls)的《英格兰的身份》(*The Identity of England*), 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的《英格兰挽歌》(*England: An Elegy*), 朗福德(Paul Langford)的《鉴别英国性》(*Englishness Identified*), 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的《英格兰——英国想象的起源》(*Albion: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的《英国人——一幅人民的画像》(*The Englishness: A Portrait of a People*)等,都致力于探讨英国或英格兰的民族身份问题。无可否认,“英格兰特性”是个复杂的概念,它的复杂性在于它不可一概而论。阿克罗伊德在《英格兰——英国想象的起源》的结论中指出:“英格兰特性本身具有多样性。在英国文学、音乐和绘画中,多样性成为艺术的形式和类型。这种境况既反映英语语言的混杂性,也反映了英国种族文化的多元性。”(448)但是在大众文化中,“英格兰特性”却在消费文化中变成庸俗的陈词滥调。巴恩斯在小说中批判了消费文化中诞生的“英格兰特性”,揭示了其虚幻的本质。

一、“超真实”的英格兰

小说围绕着另一个“英格兰，英格兰”的建构而展开。很多评论者都指出了小说对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超真实”和“类像”等理论的戏仿。小说中的一位法国学者曾如此夸夸其谈：

我们喜欢复制品胜过喜欢原作的习惯已经确立——这一点已经无可辩驳地由许多我前面提到的那些人证明了。……

曾经有一个世界，我们直接生活其中的世界。现在有了这个世界的表现形式——分解一下这个词，就是再次呈现的意思。不是对那个质朴原始的世界的替代，而是一种提升和丰富，是对那个世界的整理和总结。这就是我们如今生活的所在。一个单色的世界变成了彩色影片，单一的沙哑之声变成了各种声音的混响。这是我们的损失吗？不是。这是我们的收获，是我们的胜利。

我们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要服从这样的现代性，摒弃一切感伤的天生就带有欺骗性的对可疑的所谓“原件”的渴求。我们一定要有复制品，因为复制品所具有的现实、真理和真实性我们能够拥有、占据、重整，并且从中获得享受，最后，如果我们做出了决定，一旦我们做出了决定，这就成了我们要去迎接，去面对和摧毁的现实，因为这是我们的使命。（巴恩斯 62，64-65）

这种对复制品的推崇、对原件的摒弃恰恰是鲍德里亚所描述的现代消费社会的特点。皮特曼爵士极为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建构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本源的、自然的状态。即使是远离人类生活的大自然，在皮特曼爵士看来也是人工制作的结果。

前几天，我站在山坡上，看着山下绵延的田野经过一片灌木林，一直延伸到一条河，我正看着的时候，一只野鸡从我的脚下飞起。作为一个路过的人，你肯定会认为自然之母（Dame Nature）正在忙于从事其永恒的事业。我知道得更加清楚，马克。那座山是黑铁时代的一座坟墓，那起伏的田野是撒克逊农业的遗迹，灌木林之所以是灌木林是因为无数其他的树木都已经被砍倒了，那条河是一条运河，而那只野鸡则是一位猎场看守人养的。我们改变了一切，马克，树木，庄稼，动物。现在，请随我再往前走。你看到的地平线尽头那个湖是一座水库。不过在它建成几年之后，当鱼儿在水中游，迁徙的飞鸟把它当作聚集的港湾的时候，当它的周围绿树环绕，小船在其中悠然荡漾的时候，当所有这些都发生了的时候，它就成功变成了湖，你明白了吗？它变成了事物本身。（巴恩斯 71-72）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自然风景在皮特曼爵士眼中都离不开人的设计与创造。自古至今，人们一直在根据自己的理念和欲望改造着身边的自然之物，使之成为可供观赏与怡情的风景。所以，皮特曼爵士坚信“只有通过复制品才可以到达真正的实物”（巴恩斯 70）。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皮特曼爵士在怀特岛上根据自己的构想，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英格兰，他称之为“英格兰，英格兰”。它“源于他的纵横无忌、特立独行的灵感，在一百五十五平方英里的区域内呈现游客也许想看的、我们一向认为代表了英格兰的一切”（215）。

评论者米拉奇（J. J. Miracky）指出，巴恩斯在小说中既嘲讽又赞颂了鲍德里亚的“超真实”之论（165）。所谓“超真实”，是指“用模型生成一种没有本源或现实的真实”（Baudrillard 2）。鲍德里亚曾断言，超真实已经融入现实和真实之中，现实就是超真实，超真实已经完全本体化了：

事实上，我们应该把超真实颠倒过来：今天的现实本身就是超真实的。超现实主义的秘密是可以将最平淡的现实变成高于现实的东西，但只是在艺术和想象发挥作用的某些特殊时刻才能如此。今天，日常的政治、社会、历史以及经济的整个现实从现在起都与超真实的拟真维度结为一体，我们的生活处处都已经浸染在对现实的“审美”幻觉之中。（147-48）

在巴恩斯的小说中，鲍德里亚的论断被皮特曼爵士淋漓尽致地实践于“英格兰，英格兰”的项目中。“在这个壮观的、设备齐全的宝石般的岛国上，你可以完全方便地体验到英格兰的过去和现在所拥有的的最好的一切”（巴恩斯 221）。在项目践行之初，人们也曾就新英格兰所展示的皆为赝品，而老英格兰才是原版的问题发出诘问。时任“英格兰，英格兰”执行总裁的玛莎对质道：“上世纪末，米开朗基罗制作的大卫雕塑从弗洛伦萨的市政广场移走，取而代之的是一件复制品。这件复制品和‘原作’一样受到游客们的欢迎。而且，93%的受访者认为看过这件完美的复制品后，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博物馆看‘原版’了。”（217）在小说结尾处，“英格兰，英格兰”蓬勃发展，世界各地游人趋之若鹜。相形之下，旧英格兰，那个原本作为“元初时刻”或“原版”而存在的国家却持续衰退。“最终，旧英格兰宣布更名为安吉利亚，从此宣告自绝于这个时代”（302）。由此，皮特曼爵士所建构的由“类像”拼贴而成的“超真实”世界完全战胜了传统意义上的“真实”世界，“当‘英格兰’被人们提起的时候，人们知道的仅仅是‘英格兰，英格兰’而已”（302）。

皮特曼爵士在建构“英格兰，英格兰”这个旅游项目的同时，也在建构着英格兰的民族身份。为什么皮特曼复制的英格兰岛会变得更加“真实”？为什么人们宁愿选择被复制改写的英格兰岛，而不是原初的那个呢？这是巴恩斯小说中隐含的问题。一方面，它指向了英格兰民族身份的建构性和想象性本质。小说犀利地揭示了所谓民族身份仅仅是大众心理在拉康镜像中的投射，是想象界中占据了真实主体的虚假形象，同时又是代替真实主体在场的言语建构的象征化产物。另一方面，小说中大众的选择也揭示了德波（Guy Debord）所讨论的后工业时代

景观社会中隐性意识形态对大众的奴役。巴恩斯对虚构性民族身份的批判并不仅仅否定民族身份本身，他的小说更进一步揭示了想象性民族身份与英国社会现实之间的断裂处，栖居着真实的英格兰特性。

二、作为镜中之像的英格兰

《英格兰，英格兰》中译本的腰封上引用了作家巴恩斯自己的评述：“我感兴趣的是你们所谓‘传统的发明’。曲解自己的历史，是一个国家的题中之义。”小说第二章的标题就是《英格兰，英格兰》，它占据了叙事的主体。小说以宏大的篇幅描述了皮特曼爵士在怀特岛重构英格兰之国的过程，凸显了民族身份的建构性与超真实性。小说中民族身份的建构和认同过程恰恰投射着拉康在个人主体性讨论中提出的镜像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想象界、象征界和真实界的论说。拉康的视角彰显了英格兰民族身份建构与认同中隐含的大众欲望，而当代英国社会中大众欲望的生成与消费正是作家意欲批判的对象。

身份是如何建构的？小说的回答是“记忆就是身份”（巴恩斯 300）。小说中玛莎的第一段记忆是关于英格兰的地理拼图游戏。玛莎幼年沉迷的拼图不仅仅是记忆的隐喻，也是小说主题的提喻。玛莎在记忆的碎片中努力拼凑着自我的身份认同。小说从个体的身份建构引入国家身份的形塑问题。英格兰特性，即英格兰所具有的特质，依赖于那些历史的碎片。评论者裴特曼（Matthew Pateman）指出，拼图是一个“非常适宜的比喻，暗示着国家的概念是被建构的，可以随心所欲地被分割为多个行政中心，并随着历史变化而变更”（76）。

玛莎想要在自己记忆的拼图中建构自己的主体性身份，然而，最终却发现，“‘做自己’——人们这么说，但本意并非如此。他们的意思是——她的意思是——‘成为她自己’，无论那个自己是什么，无论如何获得”（巴恩斯 247）。玛莎在小说中逐渐认识到无论她如何拒斥超真实的假象，她也无法摆脱自我身份的建构性本质。“成为她自己”也是拉康对主体性形成的描述。在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中，“个人主体不能自我确立，它只是在另一个对象化了的他人镜像关系中认同自己……这种认同却以他者对主体自己的取代而告终”（张一兵，《拉康镜像》36）。因此，自我其实只是超现实的幻象，是一系列认同行为建构出的伪自我。“我”只是镜中的那一个影像，但是“我”却将它误认为是自己。所以，小说中的玛莎想要获得“真实”的自我，在皮特曼爵士等人摒弃真实构建超真实的世界中，她以一种愤世嫉俗的姿态、以不与皮特曼爵士妥协的方式追寻自己信奉的真实。长久以来，“玛莎知道她想要什么：真实，简单，爱情，善良，友情，乐趣”（巴恩斯 161）。在成为“英格兰，英格兰”项目的执行总裁之后，她也认为自己清楚地知道她与皮特曼爵士的区别：“杰克·皮特曼爵士坚定地相信他的产品，而玛莎·柯克伦私下里却不相信。”（230）玛莎认为自己一直保持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觉意识，即使看到人们对新英格兰岛上的赝品趋之若鹜，她仍然竭力划分虚构与真实。玛莎的顿悟在一定程度上来自马克斯博士的犀利言辞：

在我看来，所谓赝——品指的是遭到了背叛的真实性。可是，我问我自己，目前的这个案例是吗？难道这个真实性的理念本身不是某种程度上的赝品吗？

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元初时刻，至纯时刻，不管其追随者如何伪装。我们也许可以选择冻结某个时刻，并指出那就是一切的“开始”，可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要告诉你，这种贴标签的做法在理智上难以自圆其说。我们所寻找的几乎总是更早期时期的物品的复制品。

至于说到被构——建出来……嗯，你也一样，柯克伦小姐，我也是，构建而成。也许我可以这么说，我比你稍微精妙一些。（巴恩斯 157-59）

马克斯的这段话不仅迎合了皮特曼爵士对“真实”的质疑，也粉碎了玛莎对真实自我的坚守。小说开始时，玛莎虽然质疑了记忆的可靠性，但是仍然认为存在着未经加工的真实记忆（4）。她接受一个故事“在原故事基础上的改进”，“只要它是真的”。但是，随着皮特曼爵士“英格兰，英格兰”项目的深入发展，以及玛莎在此项目中的深度介入，玛莎不得不面对自我建构的虚构性和主观性：你无法“做自己”，只能“成为自己，无论那个自己是什么，如何获得”（247）。

玛莎对自我的否定引向了人们对英格兰民族身份的质疑。“英格兰，英格兰”的奠造者杰克爵士也曾对真实性问题提出质疑：“什么是真的？……比如说，你是真的吗？……当然，你对你自己来说是真的。但这并不是判断此类事情的最高境界。我的回答是‘不’。”（84）在杰克爵士看来，绝对的真实是不存在的，或者是难以追溯的。因此，他质疑了每个人身份的真实性，也摒弃了在英国民族身份问题中的真实性探寻，仅凭着一己之力，凭着自己的设计与构想，在怀特岛上重新建造了一个想象中的英格兰。弗尔布鲁克（Mary Fulbrook）曾写到：“民族身份作为可被追溯的本质是不存在的。它是人为建构的，当足够多的人共同信奉一个版本的集体身份且视之为社会现实的时候它才会显现。国民身份是被嵌入在社会制度、法律、风俗、信仰和习俗之中的，并由此得到传播。”（1）皮特曼爵士的英格兰不仅仅是人为建构的，它还是英国大众集体想象的产物。在皮特曼的“英格兰，英格兰”岛，不是英国大众在历史的记忆中建构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是皮特曼爵士和英国大众共同谱写了有关英国民族身份的形象，再由皮特曼爵士践行于怀特岛上，随之受到大众的一致追捧。英格兰特性由此成为了拉康理论中“镜中意象”。

怀特岛上的英格兰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想象中的产物。它的存在恰如拉康在镜像阶段中所论述的“镜中之我”，是在想象性认同中形塑和产生的。在拉康的论述中，“形象（image）在这里不是简单的外部对象，而是一直缘起于人的感性存在的构形物，具体说，即是从人的镜像和他人的表情、行为接受的一种非我的强制（或者叫‘侵袭性’）投射。这种投射即形成作为小他者意象（imago）结果的伪自我”（张一兵，《拉康镜像》37）。在皮特曼的“英格兰，英格兰”项目中，被投射在所谓伪自我英格兰特性上的是皮特曼爵士通过大范围的问卷调查而

得到的“英格兰的五十条精华”（巴恩斯 100）。这五十条精华投射的是大众想象中的英格兰。皮特曼爵士的官方历史学家曾对此表示质疑，认为大众想象中的民族身份是缺乏历史基础的。他在与普罗大众的交谈中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许多人记忆历史的方式就像他们回忆自己的童年一样，自以为是，瞬息万变。对于马克斯博士来说，对于祖国的起源和发展进程知之甚少，这绝对是不爱国的表现。不过，这里也存在着一个悖论：最乐于与爱国主义同床共枕的是无知，而不是知识。”（99）马克斯博士在皮特曼爵士的项目中最终意识到，英国大众只愿意通过自己想象中的历史建构自己的民族身份；没有人在意这个身份的真实性，因为人们在拥抱自己建构的身份之时，也自欺欺人地变成了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大众想象中的英格兰特性映射着当代英国民众对辉煌的英帝国的怀旧以及对衰落中的英国形象的不满。当马克斯博士想要向英国民众展现真实的历史之时，皮特曼爵士犀利地指出：“问题在于许多人并不想要你和你的同事们所理解的历史——就是你们在课本里看到的历史——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应对那样的历史。”（84）“英格兰，英格兰”的建造恰恰满足了人们内心的欲望。皮特曼爵士的怀特岛引领着大众走入期望的梦境之中：

我们要的是此地，我们要的是当下，我们要的是这座岛，但是我们也要魔力。我们要让我们的游客们感觉到他们走过了一面镜子，离开了他们自己的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似曾相识又完全不同，这里的一切与这个星球上的其他有人的地方完全不同，恍若进入了难得的梦境。（144）

三、作为景观呈现的英格兰

巴恩斯笔下超真实的“英格兰，英格兰”不仅展现了民族身份的建构性以及社会民众在建构民族身份的过程中隐含的欲望，小说中大获成功的怀特岛项目也暴露了当代英国已彻底沦为德波意义上的景观社会的现实。小说通过皮特曼爵士青睐的法国知识分子之口直接援引了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德波在《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中的原文：“所有那些曾经直接存在的都已经变成了纯粹的表现形式。”（64）^[1]德波在其著作中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景观是人们自始至终相互联系的主导模式”（174）。固然，对于景观的这种被制造性，人们心知肚明，可却始终沉迷其中无法自拔，以至于将自己本真的社会存在忘得一干二净。巴恩斯的小说通过“英格兰，英格兰”的空前成功与“原版”的“旧英格兰”的衰落的对比，印证了德波的论述。

巴恩斯笔下的景观社会揭露了景观对主体的奴役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景观的迷恋。景观，是德波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关键词，原意为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客观景色或景象，意指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做秀。德波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特质，乃是当代社会存在的主导性本质，主要体现为一种被展现的图景性。人们因为对景观入迷而丧失对本真

生活的渴望和要求,而资本家则依靠控制景观的生成和变换来操纵整个社会生活(张一兵,《译序》10)。因此,景观首先是“少数人演出,多数人默默观赏的某种表演”(11)。少数人指作为幕后操控者的资本家,他们制造了充斥当今全部生活的景观性演出;而多数人指的则是那些被支配的观众,即我们身边的芸芸众生。皮特曼爵士的怀特岛上,大本钟、哈瑟维的农舍、多佛白崖、温布利球场、巨石阵、王宫和舍伍德森林栩栩如生,应有尽有。在岛上,莎士比亚、德雷克、约翰逊博士、格温、波阿狄西亚、维多利亚女王、罗宾汉和他的逍遥帮等各色英国历史上的名人均由著名演员扮演,他们各司其职,逼真而又不厌其烦地向游人演示人们熟知的历史故事。正如小说尾声中讲述的,怀特岛上各种英格兰式的表演使“英格兰,英格兰”成为英格兰的代名词,而原本的主岛却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直至被世人遗忘。“英格兰,英格兰”是皮特曼和他的皮克特公司营造出的宏伟景观,它原本只是空洞的表象,但是人们却在一种痴迷和惊诧的全神贯注状态中沉醉地观赏着由皮特曼等少数人制造和操控的景观性演出。巴恩斯笔下微缩的“英格兰,英格兰”岛也映射出当代英国社会景观对大众的控制。通过小说暗示,景观乍看起来去政治化,然而隐性控制才是最深刻的奴役。

景观何德何能?它到底凭借哪一点,牢牢地掌控现代人呢?德波给出的答案如下:“景观自身展现为某种不容争辩的和不可接近的事物。它发出的唯一信息是:‘呈现的东西都是好的,好的东西才呈现出来。’原则上它所要求的态度是被动的接受,实际上它已通过表象的垄断,通过无需应答的炫示(appearances)实现了。”(5)皮特曼爵士深谙此道,他知道人们想要的是什么,且不遗余力地将之呈现给大众。他对自己的雇员说:“悠久而丰富的社会和文化的历史,极具市场价值,在当代尤其如此。莎士比亚,维多利亚女王,工业革命,园艺,等等等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过去作为他国的未来卖给他们。”(巴恩斯 45)在这里,“我们的过去”是指英帝国辉煌的历史。二战之后,英国国力衰弱,英属前殖民地纷纷独立,自 80 年代以来,怀旧的情绪一直在英国社会蔓延。大众文化在各个领域掀起怀旧的风潮。虽然在英国文化中,怀旧的话语从未缺场,每一个时代都曾表达过对逝去时光的怀念与感叹,但是当代英国社会的怀旧却与景观社会紧密相连。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罗萨尔德(Renato Rosaldo)和萨缪尔(Samuel)等社会学者都曾讨论过当代社会对于已然消失或行将消亡的世界的怀旧问题。在消费社会中,怀旧与资本联合,共同造就了以表象或鲍德里亚所称的“拟像”为基础的“超真实”世界,人们以表征的方式再现了想象中的过去,在整个社会建造着迎合大众趣味的景观。小说中“英格兰,英格兰”的执行总裁玛莎对于岛上呈现给大众的英格兰景观曾断言:“难道你们不觉得不论是早餐还是历史景点,给人们更多的选择正是自主权和民主精神的体现吗?我们只不过是遵循市场的逻辑而已。”(217)但是,这些表面上的市场逻辑,却形塑了一个民族的民族身份,制约了人们的身份认同机制。所以,德波说,在生活中,景象成了决定性的力量。景象制造欲望,欲望决定生成,也就是说物质生成虽然是客观的,但却在景象制造出来的假象和魔法操控之下劳作。景象叠映景象,人就生活在这光怪陆离的虚假幻象之中,悲情地依靠幻象而活。

在景观所制造的“超真实”的世界中，表象代替了真实之物，它让人悄然忘记曾经存在过的历史。以德波之见，

景观统治的绝对优先权就是根除历史知识；首先根除的正是全部理性信息和关于最近之过去的评论。关于这一点的证据是如此明显，几乎用不着进一步的说明。伴随着完美的技巧，景观组织安排对什么将要发生的无知，及紧随其后的对如何理解的忘记。某事越是重要，它就越是被隐藏起来。（113）

巴恩斯透过皮特曼制造的“英格兰，英格兰”警示人们景观社会对历史的毁灭。在皮特曼的岛上，英格兰的历史被随意篡改，但是人们对此安之若素，对各种面目全非的历史情景表演趋之若鹜。与此同时，那些受雇担任各种历史角色的人，“他们很高兴充当那个他们要扮演的角色，而不想做自己”（巴恩斯 238）。在那个以假乱真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欣然接受着幻象建构的景观，沉迷在景观的世界里，乐此不疲。与此相对照的，那个享有悠久历史、曾经作为原版而存在的旧英格兰，“已经成了一个经济和道德的垃圾坑”（243），“旧英格兰失去了她的历史，它也就完全失去了自我意识——因为记忆就是身份”（300）。

小说中旧英格兰的衰落与消亡是巴恩斯为读者们敲响的一记警钟。它提醒人们，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中诞生的景观社会，正在奴役人们的思想，抹杀民族的历史，而景观中造就的民族身份终究只能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巴恩斯通过一个反乌托邦的“英格兰，英格兰”，开启人们对英格兰民族身份真实性的探寻。

四、断裂处的真实之像

德波在就景观社会的论述中提出，景观是一种由感性的可观看性建构起来的幻想，它的存在由表象所支撑，以各种不同的影像为其外部显现形式。尤为重要的是，景观的在场是对社会本真存在的遮蔽。巴恩斯小说中的“英格兰，英格兰”正是对德波论述的完美再现。在这部犀利讽刺的作品中，尽管舞台上呈现的是插科打诨的小丑，但小说并没有放弃对英国民族身份严肃性的探寻。恰如主人公玛莎在离开“英格兰，英格兰”之前反省的那样，当世界被戏仿、超真实和表象等淹没，人们如何对待生命的严肃性？

刚刚过去的那个时候被挪用，被再造，被复制，被粗化；她自己也在其中推波助澜。但是这种粗化总是发生。严肃性在于赞美原始意象：回到它跟前，注视它，感觉它。这是她和马克斯博士的分歧之处。一部分的你可能会怀疑神奇事件从未发生，或者至少不像人们现在设想的那样，但是你也必须赞美这个意象和这个瞬间，即便它从未发生。这就是生命小小的严肃性所在。（巴恩斯 286）

对真实的探寻变成了一种信仰。在小说结尾处，玛莎回到已然衰落的旧岛，发现即使生活回到了农耕时代，人们依然孜孜不倦地为自己的社会创造着想要的传统。玛莎想要追求的“元初时刻”依旧停留在欲望的彼岸。综观整部小说，巴恩斯在讥讽被建构、被发明的“英格兰特性”时，在小说的留白处隐藏着对真实的民族身份的探求。作家并没有告诉读者“英格兰特性”到底是什么，相反，小说反复想要证实的是“英格兰特性”不是什么。玛莎在否定“什么不是真实”的过程中寻找真实，就如同拉康对真实域的讨论，它是想象域和象征域的失效或断裂。

小说中皮特曼爵士的“英格兰特性”被概述为50条代表英格兰的精华，如“皇室、大本钟、等级体制、板球、帝国主义和莎士比亚等”（巴恩斯 100）。虽然这50条英格兰精华为小说所虚构，但是这一英格兰特性列表确实符合英国本土大众和海外游客对英格兰的想象。从拉康的视角出发，这50条英格兰精华成为一系列的能指。在拉康的分析中，围绕一个“词”或者说一个能指，从它的发音到它所意指的概念，从它的概念所表征的形象再到该概念所意指的含义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差异，这整个就像一个妄想症式的联想。在极度凝缩的句式、在文字游戏的功能机制中、在语境和语义的迅捷滑动中、在从神话到宗教到诗歌，乃至历史文化的跨界旅行中，完成了对这个词作为一个能指的意义生产机制的说明。巴恩斯的50条英格兰精华中，无论是皇室或者大本钟，还是板球或者等级制度，这些词语作为能指，与英格兰的民族身份并无直接关系。但是，这些能指组合在一起，在一定的语境中形成能指链。虽然，能指本身并不直接产生意义，能指链的运动只是为意义生产提供一个意指语境，而所谓的意义实际是主体在能指链的回溯运动中，在某一能指的垂直轴上经由选择被缝合出来的。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中，通过问卷调查而形成的这50条精华似乎构成了完整的英格兰特性。因此由一系列能指构成的英格兰特性实则只存在于拉康意义上的象征界。

那么巴恩斯在对于“英格兰特性”的一系列证伪过程中是否真的否决了英格兰民族身份的真实存在呢？如同拉康对真实界的讨论，真实存在于想象界与象征界的断裂之处，它是不可能存在之真。但是，不可能恰恰是可能的条件。在拉康的讨论中，“拉康的想象与象征都已经是超现实或构成现实的，真实并非想象和象征之外的东西，而就是由想象和象征构筑起来的个人主体生活本身的断裂和失败，是指人的存在在被象征性符号杀戮后的一种不可能在场的关系存在”（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91）。巴恩斯笔下的英格兰既是大众欲望的实体化，也是语言所能固化的景观存在。但是在小说所呈现的存在于想象界与象征界的英格兰民族身份中，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个英格兰中从未出现过少数族裔，也不存在老人、穷人和罪犯等位处社会边缘的人。正如小说中介绍的：“皮科特集团将老年人、长期生病的人和依赖社会的人都打发到英格兰主岛上去了，但是岛上的居民对此并没有什么抱怨，倒是会埋怨说犯罪太少，使得警察、监护官和监狱都变得可有可无了。”（巴恩斯 219）虽然小说中只有这样一句话暗示皮特曼的“英格兰，英格兰”岛上的人口属性，作家仍然在此埋下伏笔，暗示这个岛上种族和阶级的单一性。这种单一性恰恰与当代英国社会多元文化融合的现状自相矛盾。在这重矛盾中，存在于想象界与象征界的英格兰身份出现了断裂，真实的英格兰特性恰

恰隐藏其中。

《英格兰，英格兰》为读者呈现了一场代表垄断资本的大财阀与普罗大众群策群力为英格兰发明其传统，锻造其民族身份的讽刺闹剧。轰轰烈烈的“英格兰，英格兰”岛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身份，一个超真实的景观社会迎合了大众的欲望也形塑了消费社会话语下的“英格兰特性”。但是，作家在嬉戏怒骂之后仍然冷静地揭示，拉康想象界中的身份认同只是主体欲望的投射，景观社会在遮蔽了真实的同时也在奴役着人们的思想、毁灭着人们的历史，真实的“英格兰特性”并不存在于任何大众文化的构建与话语中，而是隐藏于想象界与象征界的断裂之处。巴恩斯的小说让读者在掩卷后陷入更深的思索。

注释 [Notes]

[1] 小说中这句引文来自德波：《景观社会》，第3页。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Ackroyd, Peter. *Albion: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Chatto and Windus, 2002.
- Barnes, Julian. *England, England*. Translated by Hongqi Ma. Yilin, 2015. [巴恩斯：《英格兰，英格兰》，马红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 Baudrillard, Jean. *Simulations*. Translated by Paul Foss, et al. Semiotexte, 1983.
- Debord, Guy.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Translated by Zhaofeng Wang. Nanjing UP, 2006. [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Freiburg, Rudolf, and Jan Schnitker, editors. “Do you Consider Yourself a Postmodern Author?” *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Novelists*. LIT Verlag Münster, 1999.
- Fulbrook, Mary.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 after the Holocaust*. Polity, 1999.
- Guignery, Vanessa, and Ryan Roberts, editors. *Conversations with Julian Barnes*. U of Mississippi P, 2009.
- Miracky, J. J. “Replicating a Dinosaur: Authenticity Run Amok in the ‘Theme Parking’ of Michael Crichton’s *Jurassic Park* and Julian Barnes’ *England, England*.” *Critique*, vol. 45, no. 2, 2004, pp. 163-71.
- Pateman, Matthew. *Julian Barnes*. Northcote, 2002.
- Zhang, Yibing. “The Philosophical Essence of Lacan’s Mirror Stage Theory.” *Fujian Tribune (The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Monthly)*, no. 10, 2004, pp. 36-38. [张一兵：《拉康镜像理论的哲学本相》，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0期，第36-38页。]
- . “The Impossible of Being: A Review on the Lat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Lacan.” *Academic Monthly*, no. 1, 2005, pp. 90-99. [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晚期拉康哲学思想述评》，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1期，第90-99页。]
- . Introduction.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by Guy Debord. Translated by Zhaofeng Wang. Nanjing UP, 2006, pp. 1-38. [张一兵：译序，载德波著、王昭风译《景观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38页。]

◇责任编辑：任海燕

从史诗《尼伯龙人之歌》看鹰隼在中世纪欧洲宫廷文化中的意涵

◎ 史敏岳

内容提要: 中世纪史诗《尼伯龙人之歌》成书于中世纪欧洲宫廷文化盛期, Falke(隼)和Adler(鹰)是史诗中重要的动物形象。这两种动物不仅在生物分类上有区别,更重要的是,在中世纪欧洲宫廷文化的背景下,其背后的文化学内涵也大异其趣。文学作品对不同动物形象的使用,涉及当时的文学传统,其本质是形象背后文化意涵理解的问题。在该中古德语英雄史诗的语境下,鹰隼之辨反映的是中世纪欧洲宫廷文化在这两种动物形象上不同的投射。

关键词: 鹰隼 《尼伯龙人之歌》 中世纪宫廷文化 文化意涵

中图分类号: I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8) 04-0035-09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Title: The Connotations of Eagle and Falcon in the Medieval European Court Culture in *Das Nibelungenlied*

Abstract: The Falcon and Eagle are important animal images in the medieval German epic *Das Nibelungenlied*. These two animals not only differ in taxonomy, but more importantly, in the context of medieval European court cultur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behind them are quite different. The use of different animal images in literary works involves the literary traditions of the time, and its essence is the problem of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meaning behind the image. In the context of this medieval German heroic epic, to differentiate falke from adler, reflects the different projections of the medieval European court culture on these two animal images.

Keywords: eagle, falcon, *Das Nibelungenlied*, medieval European court culture, cultural meaning

Author: Minyue Shi, Ph. D candidat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尼伯龙人之歌》(*Das Nibelungenlied*)是著名的中世纪英雄史诗,取材于欧洲古代传说,成书于13世纪前后。全书分上下两部分,共39歌,瑰伟奇丽,慷慨悲壮,在19世纪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高涨的历史背景下,几乎成了德意志的民族史诗。中国对《尼伯龙人之歌》的译始始于上世纪50年代,目前主要有三个汉译本:1959年钱春绮译《尼贝龙根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安书社译《尼伯龙人之歌》(译林出版社)、2005年曹乃云译《尼伯龙根之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时代的遥远、文化的差异、格律的不同,都使该作品的汉译成为一大挑战。三个译本均采用了诗节的形式,意图尽可能地保留作品的原貌,传达作品的神韵,但在具体的译名上有所不同。然而,有意思的是,在翻译德语Falke时,三个译本不约而同地用了“鹰”这个词。《尼伯龙人之歌》的第一歌叙述了克里姆希尔德的梦境,她在梦中见到自己所驯养的猎隼被两只鹰啄死,预示英雄齐格弗里德后来遭到谋害。原文如下:

In disen hôhen êren / troumte Kriemhilde,
 wie si zuge einen valken, / starc schoen und wilde,
 den ir zwêne aren erkrummen / daz si daz muoste sehen,
 ir enkunde in dirre werlde / leider nimmer geschehen. (qtd. in Heizle 12)

克里姆希尔德就在这座宫廷里长大。
 一天夜里,她梦见她驯养的那只野鹰,
 眼看着被两只大鹰啄死,自己无能为力。
 她平生从未经历过这样令她伤心的事情。(安书社4)

其中Falke一词,安书社译本和钱春绮相同,作“野鹰”(4),曹乃云译本作“雄鹰”(5),若单纯从语词的概念内涵上看,和德语Falke无法完全对应。准确地说,后者对应汉语中的“隼”。

在动物学的分类上,鹰和隼分别属于鹰科和隼科,共处于隼形目之下,而欧洲则习惯于将隼形目中隼和鸢之外的猛禽归入鹰形目,分类的依据在于两者形态特征上的区别:隼科鼻孔里有一根柱子向外突出,上喙尖端两侧分别有单个齿突,而鹰则不具备这些特点(彭奕欣325)。从整体形态上看,大部分隼不仅比鹰的体型稍小,喙更短,而且虹膜颜色更深,整个眼睛呈现黑色,显得眼睛大,长相比鹰可爱。当然,此处需要说明两点:第一、笔者并非要探讨鹰和隼在动物学分类上的细节,这与文化关系不大;第二,汉语常有将鹰和隼合为一词使用的现象,取这两种鸟都有迅疾勇猛的特点,说法比较笼统,已成一种语言习惯,因此笔者也无意借此辨析汉语译名的优劣问题,因为这同时涉及汉语的习惯和翻译学理论,并非概念内涵完全对应就能解决的问题,因而须另撰文详细探讨。笔者试图指出,在《尼伯龙人之歌》成书时代的欧洲,在13世纪欧洲宫廷文化的语境下,不能将这两种鸟类混为一谈,并阐释隼作为象征符号的文化学内涵,及其与鹰的区别。

在欧亚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之中，鹰和隼在“神圣象征与世俗权力的构筑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具有“多重的人文意蕴”（尚永琪 107）。这两种鸟类的形貌、习性和在人类文明中所扮演的角色方面具有相似性，所以在许多文化当中，其象征含义存在交叉和重合的现象。比如古代拜占庭帝国的国徽标记双头鹰就是以鹰象征皇权，而埃及的荷鲁斯神则以隼头的面貌出现，也同样有象征君权的作用。另外汉语中所谓的“海东青”，也即矛隼，不仅承担着有些王朝的仪仗功能，还是亚洲北方草原民族的敬畏对象，战国时期匈奴王的海东青王冠说明，这种鸟除了宗教意义之外，同样是王权的象征（115）。在这个意义上，鹰隼具有类似的文化学内涵，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互有交融。

不过，如果考虑史诗到成书的13世纪的历史文化背景就会发现，在欧洲中世纪宫廷文化中，鹰隼形象的文化内涵侧重点有所不同，不可等而视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鹰（Adler）为纹章图案，象征皇权和帝国，后来德意志皇帝和世俗贵族也普遍使用黑鹰为纹章图案，以示统治阶级的权威。可以说，鹰作为象征，赋予了“德意志君主和国家以合法性和神圣性”（林纯洁 19）。鹰在中世纪的欧洲类似于一种用于崇拜的图腾，是君权神圣和威严的化身。而隼则不同，在中世纪欧洲的宫廷文化中，它主要被驯养用于贵族的狩猎活动，德语中的Falkenjagd和Falkenbeize（用隼行猎）等词汇就说明了这个现象。可见隼在证明贵族的身份和地位的同时，更多和贵族具体的生活方式相关。而中世纪文学，尤其是宫廷骑士爱情诗，尤其惯用隼的意象，将其作为爱情的象征。

一、《尼伯龙人之歌》中隼的母题

宫廷骑士文学作为反映中世纪贵族生活和理想的意义载体，以隼为母题表达了一种典型的权力关系：隼和驯隼人的关系，在文学上往往对应骑士和女主人或爱情之间的关系。《尼伯龙人之歌》虽然表现的是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时期的传说，但成书于欧洲中世纪宫廷文化盛期，势必沿袭当时的文学传统。史诗对克里姆希尔德梦境的刻画，正是如此。齐格弗里德形象的各种要素均符合历史语境下隼的象征含义，而区别于鹰的符号内涵：年轻君主执政之前的猎印常描绘隼的形象，对应史诗英雄年轻王子的身份；隼是高贵大胆的象征，对应齐格弗里德勇敢尊贵的品质；隼在宫廷骑士爱情诗中是情人或爱情的符号，对应齐格弗里德是克里姆希尔德未来夫君的事实。

隼作为象征手法，是中世纪宫廷骑士文学中一个固定的母题。早在11世纪中期的史诗《鲁德利普》（*Rudlieb*）当中，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象征，而该史诗也成为宫廷骑士文学的先驱之一：

Und als der Tanz nun wunderbar
und lieblich im Erklngen war
Erhob sich gleich der junge Mann

und mit ihm trat auch das Fräulein an.
Sie drehten sich, wie der Falke jagt
und sie als Schwalbe ganz verzagt. (qtd. in Jansen 187-88)

当舞蹈美妙
乐音缭绕，
少年翩然起身
姑娘随后紧跟。
轻旋急转，恰似猎隼出狩，
娇燕低头。^[1]

诗中将年轻男子追求女士比喻为隼追逐燕子，隼成为在爱情追逐中积极主动的年轻骑士的象征。就这种类似的象征意义来看，这一时期各文学文本之间存在多重互文，《尼伯龙人之歌》也不例外。在该史诗成书的前二三十年间，诗人屈伦贝格（Der von Kürenberg）有一首著名的《隼之歌》（*The Falkenlied*）流传于世：

Ich zôch mir einen valken / mêre danne ein jâr.
Dô ich in gezamete, / als ich in wolte hân,
und ich im sîn gevidere / mit golde wol bewant,
er huop sich ûf vil hôhe / und vlouc in anderiu lant. (qtd. in Klinck 100)

我畜一隼，一年有余。
终致温驯，遂我心意。
亲持黄金，饰隼双翼。
振翅苍穹，飞往异地。

该诗与《尼伯龙人之歌》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文。四个长诗行构成一个诗节，诗句为抑扬格，每两行押尾韵，每一长行由起句和落句组成，中间（一般在三个或四个扬声之后）由休止符隔开^[2]。该诗与《尼伯龙人之歌》不仅格律一致，两者对隼的意象的运用，也出于同一语境，根植于相同的骑士宫廷文化。《隼之歌》以一位驯隼人的口吻，叙述了心爱的隼在双翼装饰了黄金之后，飞往异国他乡的故事。但这只是表层含义，以隼为象征，诗歌的第二层含义乃是抒发情人远去的惆怅之感，隼的意象在其中承载着情人或爱情的意义。以隼喻指爱情，则又揭示出诗歌的第三层含义，即骑士爱情与驯隼之间的呼应关系。在中世纪盛期的宫廷文化中，对贵族妇女表达爱慕和崇敬，是骑士所谓的“爱情义务”。按照当时的规矩，高尚的爱情应该

排除低俗的肉欲，不追求真正的结合，因此履行这种爱情的义务，乃是骑士的美德。宫廷骑士爱情诗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兴起的，文学寄托了骑士的人格理想。屈伦贝格的诗歌正是以这一思想为基础，将隼的驯化与爱情的约束性力量相类比：隼之于驯隼人，恰似骑士之于情人，隼之于驯养，恰似骑士之于爱情：野隼在训练之下变得驯良，骑士则在爱情的义务之中达到人格的完善。于是驯隼和修养自然而然地结合到了一起，出现了“爱情之隼”或者“骑士培育”这样的词（Friedrich 83-109）。

《尼伯龙人之歌》与《隼之歌》之间的互文说明以隼来象征爱人，表达骑士的人格理想，在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之中已经是一大传统。在这些诗歌当中，隼的意象已经从单纯的高贵身份的标志，转化为贵族男性的理想人格^[3]，被赋予了以宫廷教养为特征的内在价值。《尼伯龙人之歌》中隼的母题恰好承担了这一新的功能。克里姆希尔德完全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想象和心中的愿望来描绘梦中之隼的：强壮、美丽、狂野。梦境作为心灵的投射和未来的预示，在这里从一个女性的视角形塑了一个完美的情人形象。史诗中的这一节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在中世纪宫廷骑士文化的爱情当中，至少在文学的理想描绘之中，女性在作为权力等级关系的爱情里是处于优势地位的，克里姆希尔德从女性的角度出发主动构建情人的形象，象征着这种权力关系的本质；第二，爱情作为骑士人格完善的必要途径，必须赋予骑士宫廷文化价值观中的一切美好品质。而既能够体现这种权力关系，又可以承载这些理想价值的象征物的，正如上文所述，只能是隼。因为在驯隼狩猎的过程中，中世纪欧洲贵族既在它身上投射了自己要追求的这些高贵特质，又将其纳入了宫廷社会赖以维系的权力关系之中。而鹰作为权力的象征，在克里姆希尔德的梦境中代表龚特尔和哈根。龚特尔是勃艮第的国王，哈根比他年长，又是股肱之臣，因此以鹰为象征方能符合他们的身份地位。《尼伯龙人之歌》当中隼的母题，是中世纪宫廷文化严格区分鹰隼象征含义的一个例证，既是中世纪宫廷文化的反映，也是骑士文学的传统。

二、中世纪欧洲宫廷文化中的隼

如前所述，隼在中世纪欧洲文学传统当中是爱情的寄托，同时蕴含着等级观念；隼是高贵的标志，驯隼是等级秩序的外化。可见在中世纪宫廷文化中，隼作为文化象征，始终处于某种权力关系之内。《尼伯龙人之歌》当中隼的母题的展现，反映出13世纪欧洲宫廷文化在这种动物身上的投射。

驯隼起源于亚洲，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开始在欧洲传播开来，成为贵族身份的标志。到霍亨施陶芬家族的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皇帝统治时期，驯隼狩猎已经成为欧洲王室贵族专属的活动，欧洲几乎所有国王都拥有价值不菲的猎隼。可见隼这种鸟类和驯隼这门行业在欧洲中世纪宫廷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狩猎在宫廷文化中并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活动，而是具有仪式意义的贵族行为。驯隼狩猎也不例外，它在中世纪宫廷生活中的文化内涵是多方

面的，但和鹰的象征含义有着根本的区别。

毫无疑问，隼和驯隼活动象征着高贵和特权，在现实层面是中世纪贵族的世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神层面则是一种宫廷文化理想的投射。在中世纪，狩猎活动成为贵族特权，而驯隼行猎作为狩猎活动的重要部分，尤其能够表现贵族的奢华。猎隼购置的不易，训练的艰难，使驯隼成为贵族专属的昂贵活动。隼也因其珍贵而具备了物质财富和尊贵地位的象征意义，不仅在“外交上占有一席之地，甚至还可当作赎金”（Wolter-von dem Knesebeck 506）。在狩猎活动的语境下，欧洲贵族的纹章中出现了一种被称为“猎印”的纹章类型，其图案表现骑士骑马行猎的景象，意在强调纹章主人的贵族资质（Beck 349）。随着12世纪驯隼活动在贵族群体间的流行，刻画贵族携隼行猎场景的不同纹章广为流传。这类图案尤其多见于女性君主或年轻君主即位执政之前的时期，如1170年佛兰德女伯爵伊丽莎白所使用的猎印表现了女伯爵左手擎隼的形象；诸侯则一般在非正式事由之中才使用这类纹章（Wolter-von dem Knesebeck 507）。猎印图案作为贵族自我标志的载体，形象地揭示了隼在中世纪盛期贵族物质生活中的角色。

在宫廷文化的语境下，狩猎并非单纯的体育运动，同时也是一项富有仪式感的精神活动，因此，隼和驯隼行业作为狩猎的必要环节，就被赋予了精神意义。中世纪的狩猎是有等级、有组织、有仪式的贵族活动，也是贵族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认为“狩猎活动中世纪君主统治的本质和中世纪社会组织根本原则的外在体现”（Caiola 19）。在这场仪式当中，隼是猎人的工具和伙伴，这种既是驾驭又是合作的等级关系，完全可以比附君主和下级贵族之间的统治关系，因此宫廷文化中的等级秩序精神和贵族优越的思想自然而然就投射到了隼和驯隼活动之中。在中世纪早期，人们就根据隼的习性而赋予其贵族特质，隼的勇猛、迅捷、果敢成了贵族品质的高度概括。到了十二三世纪，对用隼狩猎这种行为的尊崇，过渡到了对驯隼贵族的尊崇上，驯隼的贵族成为拥有各种美德的骑士典范，猎隼成为贵族的一种徽记（Attribut）。这种典范性的美德当然不仅涉及世俗层面，也包括宗教生活。富伊瓦的雨果（Hugo von Fouillooy）在其成书于12世纪中叶的《论鸟类》（*De Avibus*）的序言插图中，分别用隼和鸽子作为骑士和僧侣（clericus et miles）的象征，对应行动和沉思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Clark 261）。miles一词原有“士兵”的含义，但在12世纪中叶，已经几乎专指骑士，也即贵族；而“行动的生活”（*vita activa*）在哲学和天主教神学中主要指一种强调社会活动的生活方式，包括政治上的义务或宗教上的行善。这样，中世纪宫廷文化的世俗伦理和宗教道德理想就投射到了隼的形象和驯隼狩猎活动之上。

另外，驯隼在中世纪盛期是一门艺术。正如上文所述，贵族与猎隼的关系可以对应封建统治关系。驯隼作为艺术，尽管也有将隼的训练和贵族的历练相对比的主题，但究其根本，隼在这门艺术中是被驾驭的对象，而非主体。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隼的象征含义与鹰略有不同，后者直接代表皇权和帝国，而前者是尊贵属性的标记，具有一定的从属性质。驯隼之所以成为一门艺术，与霍亨施陶芬家族的腓特烈二世有很大关系。实际上，欧洲在10世纪就形

成了以拉丁文写作论文论述用鸟行猎相关知识的传统，13世纪开始出现了用民族语言写作的文本。最初的文本记载了一些鸟的治疗方法，体裁包括药方、对话、论文、教谕诗，不一而足^[4]。但专门论述驯隼的著作，仍然非常稀少，因此腓特烈所著《论用鸟行猎的艺术》(*De Arte Venandi Cum Avibus*)可谓极具代表性。该书详实地论述了许多鸟类学知识，探讨了驯隼和用隼行猎的方法。在中世纪，所谓艺术，实际上类似科学，在古代教育体系中就有“七艺”之说。该书记载了900多个用鸟狩猎的具体场景，从一般鸟类的概论，过渡到非猛禽类的鸟类，再详细地论述驯隼的工具和技术，以及用矛隼、猎隼、游隼等鸟类狩猎的方法。与同时期的绘画相比，其中对鸟类的描绘极具写实色彩。不仅如此，他还将驯隼与贵族的修养和帝王的统治联系起来，从而升华了驯隼的内涵，将其提升到了艺术的地位。他认为驯隼由于难度极高，所以比其他一切狩猎形式都更加高贵，也就使从事这项活动的人高贵。隼类桀骜不驯，实际上永远无法完全驯化，因此驯隼行猎需要极大的毅力和技巧，这个过程对贵族本身而言并不是犬马之娱，而是“智识和伦理上的训练，人格教育和成熟的过程”(Rader 308)。

正因为驯隼成为了一门精妙的艺术，一种驾驭之道，所以它也是中世纪宫廷文化所固有的等级秩序的投射。在这个意义上，驯隼的贵族和隼构成了等级秩序下不可颠倒的主客体关系，驯隼艺术就是统治艺术，渗透了中世纪统治者对政治权力的理解。隼天生追求自由，放出去狩猎的隼能够回来纯属偶然事件，因此驯隼人一方面必须有自信赋予隼足够的自由，让隼感受不到束缚，另一方面又必须洞察时机，确保能够收回猎隼。《论用鸟行猎的艺术》强调只有“机敏”才是驯隼之道，放纵不顾或强力干涉都是失败的源头；而在统治艺术上，君主“最伟大的时刻就是臣仆感受不到束缚的时刻”，但又须掌控局面，“臣仆需要有力的手来统治，而且这只手只能是皇帝的手”(308)。《论用鸟行猎的艺术》书头的微型画中，端坐在皇位上的腓特烈皇帝位于正中，而隼位于画面右下方，画面构图所传达的权力关系一目了然，为将驯隼艺术类比为统治艺术的思想作了一个形象的注脚。在权力等级秩序当中地位的不同，再一次凸显了隼和鹰在象征含义上的差异。

另外一则关于鹰和隼的故事更能说明中世纪文学当中鹰隼之辨的重要性。13世纪下半叶的《古代小说百篇》(*Le ciento novelle antiche*)是意大利最古老的中篇小说集，其中记述了腓特烈二世皇帝的一则轶事：腓特烈二世皇帝有一矛隼，价值连城。皇帝在狩猎时放隼猎杀白鹭，但隼在飞行之中发现了一只羽翼尚不丰满的雄鹰，就放下白鹭，攫住了雄鹰。皇帝惊愕不已，遂命人将鹰隼分开，并立刻砍下了隼的脑袋。随从不解，皇帝解释道：“隼杀雄鹰，犹臣弑君！”(qtd. in Rader 309)且不论这则故事的历史真实性如何，它至少反映了自然界存在的真实现象：成年的矛隼确实可能捕杀尚在成长之中的雄鹰，这属于自然规律。然而，在世俗最高权力的代表皇帝看来，自然规律也不能逾越宫廷社会森严的等级秩序。雄鹰的象征在施陶芬家族统治时期出现在各类皇室物件之上，已然与帝国和权力融为一体，无法分割，施陶芬家族继承罗马皇帝的传统，也以雄鹰为其家族纹章，足以说明雄鹰就代表着帝国的理念，标志着最高的皇权。皇帝杀掉爱隼的举动，本质上是对封建秩序和权力等级关系的维护，即便是最心爱

的猎隼，也绝不允许越雷池半步。这则同样流传于13世纪的故事，不仅清楚地表明了隼和鹰作为象征物在地位上的高下之别，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这种等级意识在当时统治阶层的意识之中是何其深刻。

综上所述，鹰隼虽然形似，其文化内涵在欧亚大部分文化中也有一定程度的重合，但绝不能对两者等量齐观。尤其在史诗《尼伯龙人之歌》展开的欧洲中世纪宫廷文化之中，鹰和隼的象征含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两者的分辨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中世纪欧洲君主统治之下社会组织根本原则的反映，是宫廷贵族社会赖以维系的权力等级关系的缩影。

在中世纪宫廷文化的语境下，隼因其在贵族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被视为高贵的象征，驯隼也因其艰难而成为贵族人格修养不断完善的写照，其中融入了骑士等级对自身身份的认识和对自身人格构建的理想。以宫廷文化为土壤的宫廷骑士文学传统，又因为隼品格高贵、身形矫健、追求自由，而将其作为高贵爱情的象征，指代符合骑士理想的情人。《尼伯龙人之歌》以隼作为齐格弗里德的象征，正是古代英雄史诗对十二三世纪宫廷贵族文化元素的吸收。这种象征手法与同时期其他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则说明，隼与高贵爱情之间的意义映射具有深厚的文学传统。清晰地界定《尼伯龙人之歌》成书时期隼的象征含义，也就廓清了隼和鹰之间不容混淆的意义边界。鹰自从古罗马帝国以来就是权力和威严的象征，代表着皇权和帝国。如果说隼在中世纪等级社会的权力关系当中居于从属地位，接受驯隼人的规训，它所象征的高贵骑士也需要爱情的约束，它的高贵品质也只是显示贵族身份地位的附庸，那么鹰的标志就位于权力关系的主导地位，它本身就代表着最高权力，象征着帝国的思想。这种权力等级关系的规范是中世纪社会的根本和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混淆鹰和隼在文化内涵上的差异，就相当于颠覆了君主统治的权力关系，这在等级森严的宫廷社会是无法想象的。鹰和隼的象征内涵体现了当时的贵族社会投射在鹰和隼身上的不同特质和权力关系。

注释 [Notes]

- [1] 该诗与下文《隼之歌》为作者自译。
- [2] 《隼之歌》原文及其详细的格律分析，参见 Horst Brunne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Mittelalters und der Frühen Neuzeit*. Reclam, 2010, pp. 109-13.
- [3] 关于隼在中世纪文学中究竟代表男性还是女性，参见 K. Jansen. "De arte venandi cum avibus." *The German Quarterly*. 他在文中从驯隼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文学中的隼实际上应当象征爱情中的女性，而非男性。
- [4] 关于中世纪拉丁文写的驯隼论文流传情况，参见 B. van den Abeele, "Zum „Federspiel“. Die lateinischen Falknertraktate des Mittelalters zwischen Tradition und Praxis." *Zeitschrift für Jagdwissenschaft*.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Anonymous. *Das Nibelungenlied*. Translated by Shuzhi An. Yilin, 2000. [佚名:《尼伯龙人之歌》，安书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 Beck, F., and E. Henning. *The Archival Sources*. Böhlau, 2012. [Beck, F., and E. Henning. *Die archivalischen Quellen*. Böhlau, 2012.]
- Caiola, A. *An Exploration of Falconry and Hunting in the Middle Ages. Based on the Work of Emperor Frederick II "De Arte Venandi Cum Avibus" and its Links to Science, Natural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Diss. New York University, 2009.
- Clark, W. B. *The Medieval Book of Birds: Hugh of Fouilloys's Aviarium*. Binghamton UP, 1992.
- Friedrich, U. "The Metaphor as a Figure of Ambiguity in the Middle Ages." *Ambiguity in the Middle Ages: Forms of Contemporary Reflec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ception*, edited by Oliver Auge and Christiane Witthöft, De Gruyter, 2016, pp. 83-109. [Friedrich, U. "Die Metapher als Figur der Ambiguität im Mittelalter." *Ambiguität im Mittelalter: Formen zeitgenössischer Reflexion und interdisziplinärer Rezeption*, edited by Oliver Auge and Christiane Witthöft, De Gruyter, 2016, pp. 83-109.]
- Heinze, J., editor. *The Nibelungenlied and the Klage*. Deutsche Klassiker, 2013. [Heinze, J. (hrsg.). *Das Nibelungenlied und die Klage*. Deutsche Klassiker, 2013.]
- Jansen, R. K. "De Arte Venandi Cum Avibus." *The German Quarterly*, vol. 48, no. 2, 1975, pp. 187-89.
- Klinck, A. L. *Anthology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Woman's Song*.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 Lin, Chunjie. "The Changes of Black Eagle on the Coat of Arms and German State Building." *Tongji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 Section*, no. 4, 2016, pp. 19-25. [林纯洁:《黑鹰纹章的演变与德意志国家的构建》,载《同济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第19-25页。]
- Peng, Yixin. *Chinese Encyclopedia of Middle School Teaching: Biology*. Shenyang, 1990. [彭奕欣:《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生物卷》。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
- Rader, O. B. *Frederick II. The Sicilian on the Imperial Throne*. C. H. Beck, 2012. [Rader, O. B. *Friedrich II. Der Sizilianer auf dem Kaiserthron*. C. H. Beck, 2012.]
- Shang, Yongqi. "Hawk Culture in Eurasian Civilization and the Symbol of Ancient Power." *Historical Research*, no. 2, 2017, pp. 107-22. [尚永琪:《欧亚文明中的鹰隼文化与古代王权象征》,载《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107-22页。]
- van den Abeele, B. "To the 'Federspiel.' The Latin Falconry Treatises of the Middle Ages between Tradition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Hunting Science*, vol. 49, 2003, pp. 89-111. [van den Abeele, B. "Zum „Federspiel“. Die lateinischen Falknereitrate des Mittelalters zwischen Tradition und Praxis." *Zeitschrift für Jagdwissenschaft*, vol. 49, 2003, pp. 89-111.]
- Wolter-von dem Knesebeck, H. "Aspects of Courtly Hunting and its Criticism in High Middle Age Images." *Hunting and Courtly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published by W. Rösener,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7, pp. 493-572. [Wolter-von dem Knesebeck, H. "Aspekte der höfischen Jagd und ihrer Kritik in Bildzeugnissen des Hochmittelalters." *Jagd und höfische Kultur im Mittelalter*, published by W. Rösener,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7, pp. 493-572.]

◇责任编辑:吴晋先

《安德鲁的大脑》中的个体创伤与记忆伦理

◎ 朱云

内容提要:《安德鲁的大脑》为多克托罗生前最后一部虚构作品。小说以不知名的心理医生与创伤受害者、神经学家安德鲁之间的对话形式展开,其叙事模式类似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谈话疗法。虽未明确提及9·11事件的字眼,但小说直指这一触发创伤问题的事件及其对记忆问题的影响。本文认为,多克托罗借助创伤叙事者安德鲁的自我分析呈现他对自身、家庭与9·11事件的个体记忆,于黑色幽默中揭示政府的做秀举动与对集体记忆的操控,主张面向他者、以宽恕和遗忘为基础的记伦理。

关键词: E. L. 多克托罗 《安德鲁的大脑》 个体创伤 记忆伦理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8) 04-0044-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E. L. 多克托罗小说的叙事伦理研究”(17BWW047); 江苏省教育厅青年项目“E. L. 多克托罗的文类策略研究”(2014SJB769); “2017年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赴境外研修”项目

作者单位: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9

Title: Individual Trauma and Ethics of Memory in *Andrew's Brain*

Abstract: In the last of his fictional works *Andrew's Brain*, E. L. Doctorow employs the narrative form of dialogue one between an anonymous Doc and the trauma victim Andrew who is a cognitive scientist. The 9/11 event does not appear in the novel literally, but the story points directly to the great trauma-evoking event and its influences on how to memorize the traumatic even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Doctorow endows Andrew, the trauma victim, with the ability of self-analysis and the individual memory of history, family and self to expose the government's power over collective memory, and advocates the ethics of memory based on forgetfulness and forgiveness.

Keywords: E. L. Doctorow, *Andrew's Brain*, individual trauma, ethics of memory

Author: Yun Zhu,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China.

《安德鲁的大脑》(*Andrew's Brain*)是多克托罗(E. L. Doctorow)耗时五年创作,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虚构作品。这部以弗洛伊德谈话疗法为叙事模式的小说在不知名的心理医生与安德鲁之间展开。安德鲁在这个过程中融入了他作为认知学的专业知识,交织着他对9·11事件的个体创伤记忆。与其说是心理医生在引导安德鲁倾诉,不如说安德鲁想要借助一位倾诉对象整理他的记忆,寻找历经创伤后的救赎。与《大进军》(*The March*)所试图唤起的集体记忆不同,《安德鲁的大脑》是一部关于个人、家庭与历史的个体记忆作品。有书评称,“在这部紧张、令人焦躁且满是谜题的故事中,技艺非凡的多克托罗令人印象深刻地控制好了每一个方面。他在这部小说中处理了关于大脑的恒久谜题——创伤与记忆、拒绝接受与难辞其咎感,将我们带回因震惊与谎言、战争与罪责而给我们留下深重创伤的历史时刻”(Booklist web)。除去书评,当下为数不多的国内外几篇论文都在创伤话语框架下,从叙事策略入手,或探讨其元小说叙事,进而揭示集体创伤及后人文主义的剧烈转变对人的影响,凸显叙述者“对生存境遇的探寻”(Collado-Rodríguez 384);或与多克托罗所创作的关于9·11事件的另一则短篇故事进行对比,思考作者从“私人叙事与公共叙事的两极,对话其他9·11小说中的政治与政治话语问题”(Naydan 282);或考察小说中的叙事治疗机制,强调小说的“去9·11化”与治愈的终极目的(袁源 29),以及借安德鲁作为创伤叙事的受害者与施害者的双重身份喻指9·11事件中的美国,对恐怖事件的本源问题进行反思(赵娜 46)。

9·11事件翌年,多克托罗出版了一部题为《哀悼9·11》(*Lamentation 9/11*)的图文集,以满怀沉痛的配文表达对事件中数以千计的失踪者的缅怀、对真相的渴望,以及前行的决心。然而,他十多年后创作的《安德鲁的大脑》则明显表明,多克托罗在《哀悼9·11》中坚信的“荒谬、腐败的政治体制会争取揭示真相、寻求公正”(103)只是官方的作态,如安德鲁一般在灾难中失去亲人的受害者仍沉浸于失去的痛苦中无法自拔。考夫曼(Linda Kauffman)不无道理地指责政客与媒体将这场事件从“悲剧转化为景观,使之成为官方叙事”(353-54)。利科(Paul Ricoeur)在《记忆、历史与遗忘》(*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一书中明确提出,“混淆记忆与想象的常在威胁源于这样会将记忆变成形象,从而影响对应于声称记忆真实性的忠实性目标”(7)。因此,与官方叙事不同,美国众多作家以见证者的身份进行回归人性、重新寻找“记忆、温情与意义”的“反叙事”(DeLillo 39)。由是,本文提出,多克托罗借助创伤受害者安德鲁的自我分析呈现他对自身、家庭与9·11事件的个体记忆,于黑色幽默中揭示政府的做秀举动与对集体记忆的操控,主张面向他者、以宽恕与遗忘为基础的记忆伦理。

一、被困的安德鲁与个体创伤记忆

《安德鲁的大脑》是一部没有具体时间的作品。除了“那天”(Doctorow, *Andrew's Brain* 28)直指2001年9月11日,书中没有任何其他时间指示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9·11事件中丧妻的安德鲁将自己尘封在了时间、记忆和认知学中。心理医生曾建议安德鲁记日记,因

为“如此就好像是在与自己交谈”(Doctorow, *Andrew's Brain* 51)。然而,安德鲁的日记却缺少了日记中重要的时间信息,转而在用“另一天”(52)或者“又一个早上”(53)等字眼代替。埃里克松(Kai Erikson)说:“如果把描述为受过创伤,就等于说他们躲进了某种具有保护性质的信封,一个沉默的、痛苦的、孤独的场所。”(185)对于安德鲁而言,他将自己禁锢在了自己的创伤记忆里,在对自己及家庭的过往回忆与讲述中不断进行着自我否定。

从小说叙事表层看来,安德鲁在接受创伤之后的心理治疗,不知名的心理医生始终处于鼓励安德鲁讲述的位置,希望其走出创伤。然而,安德鲁却完全占据了谈话疗法的主导地位,始终控制着讲述的进程。他既将自己置于旁观者的位置,用第三人称叙事方式聚焦自己的记忆,也会直接从“我”出发反思过往。作为认知学家,安德鲁的讲述中不乏对与记忆相关的大脑问题的分析,还会略带调侃地就专业知识指导心理医生。在心理疏导中,安德鲁经常沉浸于自己的讲述与思考,对心理医生的问题置之不理。前一刻他讲述了自己喜欢的小狗在中央广场被一只鹰叼走啄瞎了双眼,下一刻则讲到他与妻子布莱欧妮前往加利福尼亚的路上收留了一条狗。心理医生两次问为什么去加利福尼亚,他都置若罔闻。其间,他不间断地讲述布莱欧妮与小狗的相处、命名,以及不得已将之送人。安德鲁的讲述迫使心理医生不得不按照他的大脑思维流动,不断调整问题。安德鲁此处之所以避而不谈他们去加利福尼亚,是因为童年时没有保护好小狗这件事加深了他对自己是个不祥之人的印象。他自责,或许不与妻子前往加利福尼亚,不与她在关系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她便不会与他去纽约并丧生于那个事件中。安德鲁的讲述似乎没有中心内容,但实际上,小说约有三分之二的篇幅都在讲述他与布莱欧妮的相遇,在纽约的生活,并最终失去她。

丧妻事件触发了安德鲁记忆深处的其他创伤经历,令他从对幼时丧狗、初为人父时劳累粗心造成孩子丧生、再到失去布莱欧妮的讲述中不断强化自我否定。就创伤与叙述创伤事件而言,讲述的目的在于帮助经受过创伤者走出创伤事件,获得对自己和创伤事件新的认知。在《身份与叙述》(“Identity and Narration”)一文中,班伯格(Michael Bamberg)说:“反思的过程发生在现在,但是却指向过去或虚构的时间与空间,使得过去的(或想象的)的事件与讲述行为有关,进而指向有意义的关系和有价值的生活。”(133)对于安德鲁来说,他在讲述、在反思,他的叙事过程中时常出现“自我憎恨”(Doctorow, *Andrew's Brain* 86)、“自我指责”(89)的情绪,认为自己是不祥之人。他觉得是自己的出现将布莱欧妮带离了她原本的生活。经历了第一次婚姻失败和与第一任妻子的丧子之痛后,安德鲁所遇到的布莱欧妮充满活力,更懂他、照顾他的感受。对于安德鲁来说,布莱欧妮是一种救赎,是他的“柏拉图洞穴之光”(29),将他变成了正常的能够发挥作用的公民。他曾说,与布莱欧妮在一起,他变得不再是安德鲁(un-Andrew)了,做了许多安德鲁不曾做过的事情,例如会“在公共场所手牵手,会幸福”(81)。安德鲁对个体与家庭的记忆并未如班伯格所说,指向有意义的关系和有价值的生活,而是更深层的自我指责,对自我存在价值的否定。

创伤叙事不仅没有令安德鲁走出创伤经历,反而使他陷入了身份困惑。有论者提出:“人

类对自身存在和身份的感知是以记忆的延续为前提的。一旦丧失了记忆或中断了记忆的连续性，身份就无法得到确认，自我就没了灵魂，存在就成了虚无。”（张德明 139）安德鲁的讲述始于他用第三人称称呼安德鲁为自己的“朋友”（Doctorow, *Andrew's Brain* 5），是一位认知学家，讲述这位安德鲁如何将六个月大的女儿送与前妻照料，被前妻的现任丈夫嘲笑。他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描述和审视自己的经历，只在心理医生问他安德鲁是否是他本人时，才道出安德鲁即“我”。不过，安德鲁在引入故事内容时几乎都用第三人称，之后便在“安德鲁”与“我”之间轮换。一定程度上说，叙述者安德鲁试图以旁观者的姿态分析自己，只是这种与本体脱离的认知科学尝试并不能消除他本人所饱受折磨。讲述中的安德鲁，因工作变动而引起的身份变化呈现下降趋势，从认知学家到布莱欧妮求学学校的大学教授再到失去布莱欧妮后的华盛顿某所中学的理科代课教师，最后甚至名字也从“安德鲁”变成了“安卓”（Android），一种电脑系统，陷入某种身份及存在的混沌状态。如他自己所问：“我是一台计算机吗？……我是第一台被赋予意识的计算机吗？被输入了可怕的梦、情感、苦痛和热望？”（197）

饱受折磨的安德鲁虽然受到鼓励讲述创伤经历，但他的讲述过程却是他陷入个体记忆的过程。利科曾强调，“正是通过叙述的功能才使记忆融入了身份的形成”（84-85）。安德鲁所整理的记忆中身份几经变化，却也如利科所说，记忆所提供的身份极为“脆弱”（82）。小说结尾处心理医生的一声“安德鲁——”（Doctorow, *Andrew's Brain* 200）既有无奈，更说明他的谈话疗法的失败，至少安德鲁并没有因为讲述而走出创伤记忆。他就像自己所读到的马克·吐温那样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对着镜中的自己，看到的只是孤寂的灵魂。

二、被影子化的安德鲁与被操控的集体记忆

安德鲁之所以产生身份困惑，除了心理创伤使然，外界权力关系的作用还将他进一步推向影子化的存在。美国 9·11 事件发生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George W. Bush）发表演说，突出强调民族的集体情感，在言语中强化灾难遗留下的创伤记忆：“飞机撞上两栋大楼，漫天大火、巨大的建筑结构坍塌，这些画面让我们难以置信、满怀悲伤，激起我们克制却坚定的怒火。”（web）布什政府继而以民族情感为基础打出反恐旗号，并以防卫与正义为名加强对民众的监管，9·11 事件俨然为布什及其政府积攒政治资本提供了资源。美国将如何记忆这次灾难性事件？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谈及记忆的责任时曾说：“历史学家的工作，像许多以过去为对象的工作一样，从来都不仅仅只是确立事实，还要在事实中选择那些更重要、更值得注意的部分，随之再确立各事实之间的关联。选择与确立联系的工作必然不是以搜寻真相为指导，而是以有什么样的好处为指导。”（50）以此为基础，利科讨论记忆的滥用与操控时突出了意识形态在其中的作用。多克托罗在《安德鲁的大脑》中赋予安德鲁总统大学室友的身份，使其近距离接触作为国家头脑的政治核心，并借助安德鲁神经学家的身份对之进行分析，以黑色幽默突出权力范式运作下的集体记忆的危害，表现出作家对个体的关怀。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借助媒体向公众反复提及创伤事件，强化集体创伤感，并以此引导个体对该事件的记忆模式，为政府的决策与行为提供借口。多克托罗在小说中通过总统的现身做秀与政府有意转移公众注意力，揭示了当权者谋取政治利益的丑态。因为布莱欧妮之死而出走纽约的安德鲁来到华盛顿，成为白宫附近一所同样在袭击中校舍有损的中学的理科教师。某日，不速之客闯入他的课堂，他们此来是进行常规性的吹捧活动，让总统来此做秀。总统表示，学生们能在受破坏的环境中坚持学习，不因创伤事件而沮丧，他们为他们感到自豪。他赞扬学生们坚强如钢铁，坚信困难有利于他们的成长。然而，他的做秀姿态与鼓动性话语并未赢得共鸣，孩子们表现出“震惊”，教室也陷入前所未有的“死寂”（Doctorow, *Andrew's Brain* 149）。做秀活动持续不过五分钟，教室从被带着耳麦的黑人瞬间填满又瞬间变得空荡。做秀行为之外，政府还不断强化美国的受害者身份，且反复宣称其他国家与个人都会对美国形成威胁。由是，政府成立认知学家委员会，以规划大脑研究政策，其终极目标在于预测人们尤其是外国人对各种刺激的反应情况，想象产生幻觉的大脑，控制大脑的适应性，预测对政府有用的其他百种大脑问题。安德鲁被任职为神经学研究办公室主任，其工作主要是跟踪全世界神经学的发展。然而，安德鲁发现，上至总统下至其智囊团，从未有人真正对他的工作或认知科学的新近发展动态有任何兴趣。虽然被擢升为白宫神经学研究办公室的负责人，但他的日常工作只是一言不发地坐在总统办公桌旁边。总统智囊团的人要求他“不要抬头看，不要给予任何关注。坐在这里读读这本杂志，就好像[你]坐在牙医办公室”，他变得匿名，就像是总统“投射的阴影”（173）。被影子化的安德鲁只是当权者吸引公众注意的手段，当不利于总统的猜测性言论出现之时，安德鲁更是被弃之如敝履。

不难发现，美国政府想要主导集体记忆以服务于自身的政治需求和利益。集体记忆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个体记忆及其记忆的方法。法国哲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集体记忆这一概念时指出，“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中获得他们的记忆。也正是在社会中，人们回忆、辨认出他们自身的记忆，并将其个性化”，而个体“所在的那个群体在任何时候都会给”个体“重新塑造记忆的方法”（38）。但他也指出，“集体记忆的框架”会“限定并约束”个体最私密的记忆，因为集体记忆赋予个体记忆意义，且个体在记忆方面依赖于社会（92-93）。正因如此，与政府和媒体不遗余力地渲染并强化对9·11事件的集体记忆不同，《安德鲁的大脑》表明，始终与集体记忆并存的是那些与之相似却又极具个体生命印记的个体记忆。安德鲁家的录音电话里留下了布莱欧妮前男友灾难中的亲身经历，飞机、被爆炸燃烧烤热的钢板、选择从高处跳下的逃生者或者赴死者。安德鲁如此描述了他的听觉留下的那段记忆：

第95层楼上与他在一起的人的声音，他们正被烧死，他们的叫声成了他们燃烧着的骨头中的器官的最后踪迹。那是一段奇怪又可怕的合声，最终融于石油大火的咆哮声、火中钢铁燃烧变形过程中发出的吱嘎声、石油大火中翻卷的浓烟因为不断有可燃物的加入而不时发出的爆裂声，再也分辨不出来。然后我听到下落的身体在

空气中的摩擦声，那个声音就像是喷气发动机，越往高处声音越大，这仅持续了几秒钟便再也没有声音了。之后我什么也听不见……（Doctorow, *Andrew's Brain* 131）

这些深埋于安德鲁大脑中的声响成为他创伤记忆的根源，也形成了他对9·11的个体记忆。该记忆将那些长远镜头聚焦下、融入了集体记忆的画面通过声音具象化，那些因肉体燃烧而发出的叫声、混杂于其中的建筑物的燃爆声及身体坠落时“空气中的摩擦声”犹如炼狱传递而来的景象，全然不同于总统做秀的场面，是个体在那场灾难事件中受难的画面。当各种录音片段反复出现于媒体、网络，向公众传递着集体的创伤记忆并以“爱国日”（Patriot Day）强化集体记忆之时，那些如安德鲁般在该事件中失去亲人的人，甚至亲历者们只会在这样独属于个体的创伤记忆中承受痛苦。

安德鲁曾从认知学出发对集体性大脑有一分析。他提出蚁群所拥有的集体性大脑外在于每一个个体，那种无实体存在的合成身份控制着每一个个体的行为，很有可能蚁群的集体大脑赋予了个体其不具有的智慧。安德鲁对此的兴趣令他在总统智囊团身上看到了相似之处。他指出他们与总统之间相互制衡以实现微妙的平衡，从而操控整个国家机制的运作。即便总统因为发现发动了错误的战争而倍感焦虑，外在的集体智囊也会维系战争的进行。安德鲁之所以接受总统办公室的工作，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场灾难本可以避免，他要踏足历史，成为“圣愚”——看似愚蠢、疯癫，但却是大智之人。不过，他的梦想终敌不过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力，他的工作只是成为总统不为人知的影子，他所能做的只是在总统办公室以甚为滑稽的倒立表达他的不满，终以危害总统安全罪被捕。安德鲁曾被前妻的丈夫称为“冒牌者”（The Pretender）^[1]，因为他认为安德鲁只是假装好人，实际上危险且生性虚伪。冒牌者安德鲁认为，因为有布莱欧妮的存在，他已经不再是冒牌者，而是经过变形成为了圣愚。或许布莱欧妮的离世最终促成了安德鲁的变身。他在白宫被逮捕，被总统身边的人称作蠢人时，他强烈要求自己被当作圣愚。他解释，因为总统就是个冒牌者，他只能成为圣愚。他指责总统是“迄今最糟糕的总统”，正将美国人引入“阴暗的森林”。而他强调圣愚之所以为圣愚，因为他“为他的国家哀悼”（191）。虽然敌不过政权的力量，但不可否认，正是安德鲁这样心酸却带有黑色幽默的举动，试图挤入集体记忆，为个体记忆争取更多存在的空间。

多克托罗在《哀悼9·11》中曾说，“我们所有人将一起坚强地生活下去”（37），“虽然我们彼此从未谋面，但我们却很容易地理解彼此”（42）。显然，他在此处所强调的是集体所共享的记忆和共同的情感体验。然而，《安德鲁的大脑》却隐含了作者对集体记忆被权力机构操控的担忧。多克托罗用安德鲁个体行为的滑稽性和黑色幽默性来揭示政权的虚伪与不作为。总统去白宫附近遭创的中学鼓励学生只是一场政治秀；白宫邀请安德鲁去工作只是在转移公众视线，为下一届总统竞选造势；其对集体记忆的强调只是服务于他们的政治需要，对于如安德鲁般受个体记忆折磨的普通个体，他们鲜有关心。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美国当权者注重宣扬集体创伤、忽视个体情感的官方叙事行为。

三、遗忘与宽恕：面向他者的记忆

安德鲁的困扰源于时常如梦境般出现的无声的求救声，那些蜷缩的躯体的无声哭喊。这是他作为认知学家无法用科学解释的。亚里士多德曾言，当人们记忆不在场的事物时，所出现的只是影像，人们必须在灵魂中有这样的影像，再由感觉刺激形成图像，进而想象成一种画面，这便成了记忆的最佳状态（113）。安德鲁大脑中那些消磨不去的影像与无声的声音，正是他对未曾身临其境的场景的记忆，是印在他的灵魂深处不得纾解的创伤。利科强调，“记忆的责任是通过各种回忆承担正义的责任，是对他者的责任”，“真正符合伦理的记忆应该是指向他者，即从他者的视角去进行回忆”（89）。他主张应学会“从另一方面重述”那些生活的故事，从而实现对自己作为愧疚者与受害者的宽恕（477）。多克托罗通过安德鲁片段式的记忆揭示个体创伤受害者的境遇，主张经受过阵痛的民族与个体重述创伤，在宽恕中遗忘与记忆。

深陷片段式记忆中的安德鲁总是会在做着某件事时，眼前看到布莱欧妮，却听不到她的声音。他向心理医生的讲述只要涉及布莱欧妮，便会陷入回忆。安德鲁的讲述所占篇幅不足170页，但“回忆”出现了25次，可见创伤事件对这位认知学家的影响。安德鲁将电话机中的死亡留言接入大脑：

我的大脑就像在拍摄，那些幻影、梦，还有我不认识的人的所做所言。我听到那些无声的声音，那些幻影隐隐约约出现在我的睡眠里，投射到墙上，逗留在那里，因痛苦而畏缩着，因身体疼痛而扭曲、蜷缩，在那里无言地哭喊着向我求助。你们在做什么！我大喊着，倒在床上，盯着漆黑的天花板。我的房间就像是黑着灯的影院，另一场无声的恐怖电影即将上映。（Doctorow, *Andrew's Brain* 196-97）

在叙述中时常陷入回忆的安德鲁清楚，他脑中摄入的他者的痛苦与认知科学无关，那些“无声的”（soundless）声音、“无言的”（wordless）哭喊是他所不曾亲身经历的灾难事件的内化。他无法宽恕自己，便承受着那些融入他集体与个体记忆深处的他者的苦痛。多克托罗在此描写的虽是安德鲁的个体痛苦与他对布莱欧妮的愧疚，实际却是借助他的叙述建构起他作为存活者与无数他所不认识的受害者之间的联系，从而揭示了这一国殇对所有见证过这一创伤事件并对该事件持有记忆的人的影响。

劳布（Dori Laub）研究创伤受害者时称：“幸存者们不仅需要活下来去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也需要讲述来理解他们的故事……为了能够活下去，幸存者们不得不去理解在自己内心的真相。”（63）安德鲁曾对心理医生解释，“如果不跟你讲讲这些，我肯定会比现在更糟”（Doctorow, *Andrew's Brain* 196）。安德鲁的讲述时时透露出他从认知学方向对真相的思考其实是一种折磨，包含了他的愧疚与自责。认知学或许可以提供给他理性地排解创伤的方法，但在情感上他始终无法释怀。提及丧妻后照顾女儿的经历，安德鲁解释，“想想布莱欧妮就会让我获得所有知觉

方面的有利条件。那就好像她的头脑仍然活跃于我的身体里” (Doctorow, *Andrew's Brain* 182)。于安德鲁而言, 他的讲述是在不断经受真相带给他的痛苦。片段式的记忆再现遵循了记忆的分散性, 但回忆将之带入了自我记忆的中心, 那里充斥着自咎的情感。愧疚感与归罪感紧密联系, 也决定了袒露记忆的方式。满怀自责感的安德鲁告诉心理医生, 他所听到的只是他说给心理医生听的。

虽然直至小说结束, 安德鲁仍然走不出他的创伤记忆。但不可否认, 讲述对他而言极为重要, 也对拥有更为丰富、真实的历史记录极为重要。心理医生在其中承担着启发与鼓励的作用, 借助布迪厄与华康德 (Pierre Bourdieu and L. D. Wacquant) 的说法, 有助于

使那种未被阐述、倍受压抑的话语昭然若揭……协助被他们发现和表述他们生活中所存在的惨痛的悲剧或日常的不幸背后所潜藏规律, 帮助他们摆脱这些外在现实的禁锢和袭扰, 驱散外在现实对他们的内在占有, 克服以“异己”的怪兽面目出现的外在现实对人自身存在之中的创造力的剥夺。(263-78)

可以说, 多克托罗是在以安德鲁的遭遇为依托表达一种期待, 那就是拥有个体创伤记忆的受害者能够区分记忆与现实, 能够叙述记忆以实现“宽恕与遗忘” (玛格丽特 195), 宽恕并遗忘他所不应承受的愧疚。同样, 多克托罗也是借助这部小说以“反叙事”的形式“描摹普通人的灾难体验” (杨金才 4), 展现灾难后的记忆、温情与意义。

虽然《安德鲁的大脑》没有像多克托罗之前大部分作品那样将故事置入十九、二十世纪美国历史中的某段时期, 但仍有评论者在其中发现了多克托罗一以贯之的主题: “个体的历史总是一场记忆与自我争斗之间的战斗, 其目的在于维持某种道德或当下状态的想象。” (*Library Journal web*) 十多年过去了, 美国似乎并未走出 9·11 阴影, 多克托罗同许多作家一样, 思考了这属于集体共有却也独属于个体的体验, 思考了因为创伤、自责和愧疚性情感的存在而无法分享的问题。众多作家都在不断重述创伤、重启回忆, 然而正如多克托罗借助认知学家安德鲁对自己的大脑与记忆所做的不断分析一样, 那些片段式的记忆方式怎么都写不尽、也忆不尽创伤事件给个体留下的伤痕。但作家们却仍继续探索着创伤救赎, 将自己对历史的质疑和思考书写出来, 表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多克托罗以《安德鲁的大脑》为题创作的这部小说, 将安德鲁的创伤记忆与他的大脑的科学分析相结合, 以他个体记忆的微光补充集体记忆, 同时也是希望像安德鲁一样自我封闭的创伤经历者能在叙事中得到慰藉。这既是在彰显个体自由, 也是在彰显历史正义。

注释 [Notes]

[1] “冒牌者”源于沙俄宫廷故事。故事中, 戈都诺夫 (Boris Godunov) 杀害皇太子德米特里 (Dmitry), 后被投机分子, 即僧侣格里高利 (Grigoriy) 逼迫退位。格里高利因与太子年龄相仿, 便纠集一支军队, 打着自己是真正王位继

承人的旗号，举起“正义”大旗。因为戈都诺夫对杀害太子一事深为悔恨，且他极为迷信，无法说服自己冒牌者是冒充的，之后便死了。即便格里高利登位，沙俄仍有许多“圣愚”（Holy Fool）为国家的命运哀悼。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Anonymous. Review of *Andrew's Brain*. *Booklist*, E. L. Doctorow, eldoctorow.com.
- Anonymous. Review of *Andrew's Brain*. *Library Journal*, E. L. Doctorow, eldoctorow.com.
- Aristotle.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vol. 3. Translated by Litan Miao. China Renmin UP, 1992.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三卷)》,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 Bamberg, Michael. "Identity and Narration." *Handbook of Narratology*, edited by Peter Hühn, et al., Walter de Gruyter, 2009, pp. 132-43.
- Bourdieu, Pierre, and L.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Translated by Meng Li and Kang Li.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1998.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 Bush, George W. "9/11 Address to the Nation." *Famous Speeches and Speech Topics*, www.famous-speeches-and-speech-topics.info/presidential-speeches/george-w-bush-speech-9-11-address-to-the-nation.htm.
- Collado-Rodríguez, Francisco. "The Holy Fool's Revelation: Metafiction, Trauma, and Posthumanity in E. L. Doctorow's *Andrew's Brain*." *Papers on Language & Literature*, no. 4, 2017, pp. 383-414.
- DeLillo, Don. "In the Ruins of the Future: Reflections on Terror and Loss in the Shadow of September." *Harper's*, no. 12, 2001, pp. 33-40.
- Doctorow, E. L. *Lamentation 9/11*. Ruder-Finn, 2002.
- . *Andrew's Brain*. Random House, 2014.
- Erikson, Kai. "Notes on Trauma and Community."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edited by Cathy Caruth, Johns Hopkins UP, 1995, pp. 183-202.
- Halbwachs, Maurice. *On Collective Memory*. U of Chicago P, 1992.
- Kauffman, Linda F. "The Wake of Terror: Don DeLillo's 'In the Ruins of the Future,' 'Baader-Meinhof,' and *Falling Man*." *Modern Fiction Studies*, no. 2, 2008, pp. 353-77.
- Laub, Dori. "Truth and Testimony: The Process and the Struggle."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edited by Cathy Caruth, Johns Hopkins UP, 1995, pp. 61-75.
- Margalit, Avishai. *The Ethics of Memory*. Translated by Hairen He. Tsinghua UP, 2015. [玛格丽特:《记忆的伦理》,贺海仁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 Naydan, Liliana M. "E. L. Doctorow and 9/11: Negotiating Personal and National Narratives in 'Child, Dead, in the Rose Garden' and *Andrew's Brain*." *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 no. 2, 2017, pp. 281-94.
- Ricoeur, Paul. *Memory, History and Forgetting*. Translated by C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 U of Chicago P, 2004.
- Todorov, Tzvetan. *The Abuse of Memory*. Arléa, 1995. [Todorov, Tzvetan. *Les Abus de la mémoire*. Arléa, 1995.]
- Yang, Jincai. "Reflections on Studies of Post-9/11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Recent Developments*, no. 3, 2013, pp. 4-5. [杨金才:《关于后9·11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载《外国文学动态》2013年第3期,第4-5页。]
- Yuan, Yuan. "On the Mechanism of Narrative Therapy in *Andrew's Brain*."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 2, 2017, pp. 29-35. [袁源:《论〈安德鲁的大脑〉中的叙事治疗机制》,载《外国语文》2017年第2期,第29-35页。]
- Zhang, Deming. *The Western Literature and the Unfolding of the Narrative of Modernity*. China Social Sciences, 2009. [张德明:《西方文学与现代性的展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Zhao, Na. "On the Trauma Narration in *Andrew's Brain*."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no. 1, 2016, pp. 46-51. [赵娜:《多克托罗〈安德鲁的大脑〉的创伤叙事解读》,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46-51页。]

民族性格范式下的美国革命 ——霍桑革命题材短篇小说的新历史主义研究

◎ 胡杰

内容提要: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历史学家构建了理想化和神圣化的美国革命话语体系,体现了历史的文本性。但霍桑在民族性格范式下重塑了美国革命的意义:既歌颂了果敢、坚强、抗争等古老清教徒品格的复苏,又哀叹了革命时期优雅传统的丢失和人性的扭曲;既为革命带来的新时代和新秩序感到欣慰,又为抛弃历史、激进盲目的新一代深感忧虑。霍桑革命题材的短篇小说对话了主流历史话语,补充了人们对革命的多维认知,参与了历史话语的构建,体现了文本的历史性。

关键词: 历史的文本性 文本的历史性 纳撒尼尔·霍桑 美国革命 新历史主义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编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2018)04-0053-09

基金项目: 外教社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从历史短篇小说到罗曼司的选择——霍桑时代的文学场研究”(2017SC0006B);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项目“美国罗曼司传统的新历史主义修正”(SCWY17-08)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Title: American Revolution under the Paradigm of National Character: A New Historical Research on Hawthorne's Tales of Revolution

Abstract: By the 1830's,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ans tried to make a grand political state rhetoric about American Revolution, representing 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 Different from the main-stream historical discourse to idealize and sanctify revolution, Hawthorne reconstructed the process of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character. His tales unveiled the rebirth of old puritan character in revolution, wept over the loss of traditional grace after revolution and predicted the radical self-blindness of new race under the new order. Therefore, Hawthorne's short tales about American revolution not only engaged a dialogue with the contemporary dominant ideology but also supplemented people's multi-dimensional cognitive of revolution and partook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discourse, which represented the historicity of text.

Keywords: textuality of history, historicity of text, Nathaniel Hawthorn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Historicism

Author: Jie Hu, Ph.D candidate,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创作了大量以美国革命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如《祖父的椅子》(*Grandfather's Chair*)、《总督府的传说》(*Legends of Province House*)系列、《旧闻》(*Old News*)系列,以及《我的亲戚莫利纳上校》(*My Kinsman, Major Molineux*)等。这些历史短篇小说因为散见于某些故事集中^[1],或因不太符合评论家贴在霍桑作品上的“心理罗曼司”的标签,长期为评论界所忽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出现,霍桑的历史短篇小说进入评论者的视野。考拉科瑞欧(Michael J. Colacurico)的《虔诚的疆域——霍桑早期小说中的道德历史》(*Province of Piety: Moral History in Hawthorne's Early Tales*)、纽伯里(Frederick Newberry)的《分裂的忠诚——霍桑作品中的英国与美国》(*Hawthorne's Divided Loyalties: England and America in His Works*)以及贝尔(Michael Davitt Bell)的《霍桑与新英格兰历史罗曼司》(*Hawthorne and Historical Romance of New England*)等都通过对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性阐释,分析了霍桑历史名篇与时代主流历史话语之间复杂的对话关系。本文运用新历史主义的批评策略对霍桑革命题材的短篇小说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其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宏大的革命修辞之间的商讨、交流、对话的过程,探究霍桑以民族性格范式补充人们对革命的多维认知和参与历史话语构建的努力。

一、霍桑时代的美国革命神话

新历史主义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历史不仅是一种文本,更是一种话语;历史编撰(historiography)不可能对“过去事件”纯粹客观的真实再现,相反,它是历史学家在一些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的一种编码式的叙述,因此它具有虚构性和叙事性的文本特征,即所谓“历史的文本性”。

到19世纪30年代,在美国建国后半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历史学家共同构建了美国革命是整个民族的辉煌和荣耀的神话。在19世纪读者最熟知的两本历史书《华盛顿传》(*Life of Washington*)和《美利坚合众国历史》(*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中,两位史学家威姆斯(Mason Weems)和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通过不同的文本化模式,共同证明了美国革命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在神圣天意的庇佑下,美国人民为争取民主和自由权利取得的胜利是美利坚民族走向繁荣的基石。威姆斯忽略了前革命时期(Prerevolutionary era)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问题^[2],有选择地对历史事件进行情节化处理,将美国独立战争塑造成类似荷马史诗般的豪迈战斗,对自由民主、共和政治和华盛顿的高尚品格不吝歌颂之词。班克罗夫特则采用编年史的叙事模式,认为18世纪美国革命与17世纪清教传统一脉相承,指出前者的胜利是追求自由、民主的清教主义传统的胜利,是一个具有光明前景的新世界战胜专制腐朽的旧世界的胜利,是一个始终贯彻自然法原则的民族逐步走向独立、统一的胜利。

此外,戈登(William Gordon)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兴起、发展和形成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Rise, Progres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拉姆齐 (David Ramsay) 的《美国革命史》(*The History of American Revolution*) 以及沃伦 (Mercy Otis Warren) 的《美国革命的兴起、发展与结束》(*History of Rise, 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American Revolution*) 等也都将美国革命描绘成殖民地人民团结一致反抗英国专制统治, 追求民主、自由和天赋人权的光辉战争。

19 世纪上半叶, 美国经济高速发展, 疆域不断扩大, 国力持续增强, 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空前高涨。独立战争所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统一、稳定的共和国凝聚了美国人民所有的爱国热忱。而以班克罗夫特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对自由、民主精神的赞颂, 对美利坚共和国光辉前景的坚定信念, 正好契合了那个时期美国主流意识和时代精神。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莫罗 (Joseph Moreau) 所言: “为了满足所有目的, 历史学家们创造了国家的神话和象征。” (31)

但是, 这种历史话语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 宏大的历史叙事掩盖了一部分真实的历史, 也忽视了边缘人群的感受。比如, 它忽略了革命中群众的不端行为, 弱化了民意领袖的欺诈和煽动行为, 无视了“亲英派” (American Loyalist) 的困境。另外, 这是一种以目的论为导向的线性历史观, 是以现在的胜利确证过去行为的合理性。在其指导下, 历史上的不名誉事件都被恢弘、进步的政治修辞所湮没。说到革命期间激愤的民众烧毁马萨诸塞州总督哈钦森 (Thomas Hutchinson) 的房子, 无理扣押英国货物, 以及“波士顿大屠杀” (Boston Massacre) 等暴力、血腥事件时, 班克罗夫特将其视为历史大趋势中的必要手段, 没有进行客观评价。

根据新历史主义史观, 单数而正统的“大历史”通常会压抑复数而边缘的“小历史”, 而正是在传统正史所掩盖的历史碎片和边缘题材中我们才能寻觅某种历史的踪迹, 触摸到历史的真实。尚晓敬说: “霍桑从来都不是一位单纯的民族主义者, 在对民族历史的发掘性书写中, 他不仅致力于发掘被主流话语压制或敷衍的一部分历史, 揭示历史黑暗、断裂和无序的一面, 更在顺从主流话语的同时, 暗中挑战并消解时代的宏大历史叙事。” (92) 面对整个时代将美国历史进步化、革命神圣化的趋势, 霍桑创作的历史小说不仅提供了对于美国革命的另一种认知, 展现了多维度的历史真实, 还超越了对个人主义英雄的歌功颂德, 从美国民族性格范式出发, 构建和重塑了美国革命的历史。霍桑重新审视了美国从殖民地到共和国、从独立战争前夕到战后的历史, 重点关注美国革命爆发的原因和革命中出现的矛盾, 与班克罗夫特等历史学家撰写的主流历史话语对革命成果和革命理念的颂扬拉开了距离。

以班克罗夫特为代表的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历史学家对美国革命的记录和撰述体现了新历史主义所谓的“历史的文本性”, 而霍桑创作的一系列以美国革命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则诠释了“文本的历史性”特征。一方面, “文学文本不可能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 (Brook 7), 它是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之间商讨、交易和流通的结果。另一方面, 文学文本在与历史语境的互动中也参与了社会历史的构建。霍桑创作的文学文本以民族性格发展的脉络参与了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主流革命历史话语的构建, 重塑了美国国家道德文化变迁的新历史。

二、清教品格的复苏

《祖父的椅子》是霍桑 1840 年左右写给孩子们的历史故事集。为了给孩子们勾勒出清晰而连贯的历史脉络，他首先构建了美国民族性格的发展谱系。霍桑认为，革命前美国民族性格不是在进步而是在倒退，“1690 年到 1763 年的历史发展显示：钢铁般坚毅的清教徒让位给了完全不同的一类人”，而“新的世纪被一群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军人和投机分子所把持，人们恰恰忘记了那些早期给我们带来最真实、最光荣传奇的性格”（71-72）。但独立革命的爆发和胜利标志着古老清教徒性格的复苏，在霍桑看来，这也是独立革命的最大功绩：

古老清教徒是如何的果断、倔强、不屈服，你们是知道的，但过了许多年，这种特质似乎已经消减。不料（此时的一笔者注）英格兰刚要把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加到殖民地头上，这些早期移民者的后代们就在自己身上证明了与祖辈相同的秉性。而在这一刻之前，新英格兰还像一个恭顺而谦卑的仆人，在下一刻，她又马上变得和当年那些曾抵制过国王的清教徒一样严厉和坚决。（151）

从清教徒性格复苏的角度定义美国独立革命在霍桑的时代并不多见，也不为同时代的革命叙事所接受。班克洛夫特等人认为美国革命宪政自由和民主共和的实现，是历史的进步。但对霍桑而言，古老清教徒性格中果敢、刚毅和抵抗暴政的独立意识的复苏才是独立革命的最大成就。就像祖父对革命领袖亚当斯（Samuel Adams）的赞颂：“好像古老的清教徒重新复活了一般，他内心藏着和早期清教移民同样的反对暴政的伟大力量。他像他们一样虔诚、严肃和不屈不挠。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资格作为新英格兰人民和独立革命精神的代表。”（173）

霍桑借祖父之口对亚当斯的描述，既体现了他与当时主流意识某种程度的吻合，即对国父们的功业和个人美德的颂扬，又不同于他所处时代主流话语对美国革命的认知。霍桑认为，美国独立革命同 17 世纪清教徒与英国国教分庭抗礼、在新世界创建“山巅之城”的抗争一样，是另一场清教徒革命。因此与同时代史学家对美国革命和革命领袖的描述不同，霍桑笔下的亚当斯忠于信仰，反对暴政，坚守原则，意志坚定，集中体现了古老清教徒最闪光的美德，而不是当时最流行的“直觉良知”“天赋人权”“自然法则”的代表。也正因为霍桑眼中的美国革命只是另一场抵抗暴政的清教徒革命，与美国主流历史话语体系不一样，所以在《祖父的椅子》中，霍桑并没有对群众运动一味赞赏，而是从民族性格范式的角度揭露了失序的群众骚乱中体现的血腥和残忍的清教徒本性。书中多处描写了美国革命时期激愤的民众将杀人、纵火当作儿戏的失控场面：“一个狰狞的暴动者叫嚣着要把叛国者扔到火堆里；狂躁的群众为了把国王的朋友赶出房子不惜烧毁整个城市，伤害和毁灭好像是一场游戏。”（152）

可见，美国革命期间复苏的清教徒品格具有双面性。勇敢、抗争等性格复苏的同时，清教徒固有的残忍和冷酷也暴露无遗。因此，当面对孩子们质问革命是否带来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时，祖父无法给出像班克洛夫特等历史学家那样肯定而坚决的答复，他只得生硬地总结说：“这个

世界从开始到现在还没有一场运动比我们的革命更加伟大。我们民族的每个人都是充满伟大和崇高情感的。他们表达情感的方式可能有误，但是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能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必须原谅他们行为上的偏颇，看到他们的内心，去理解那些驱动他们行为的崇高原则。”（Hawthorne 171）从这些煞费苦心的安抚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祖父其实是想引导孩子们相信：这场革命崇高的动机远超出那些可耻的行为，最终有价值的结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消曾经暴力的手段。这是既要忠于历史又要兼顾激越、宏大的主流革命修辞的霍桑能为革命做出的最好辩护，也是他以文学文本的方式与主流历史意识之间协商革命意义的最好途径。

三、优雅传统的丢失

针对《祖父的椅子》一书读者群体的特殊性（儿童），霍桑一直在努力而谨慎地为美国革命进行辩护。但在1835年发表的历史短篇小说《旧闻》中，由于目标读者是成年人，霍桑果断采取了与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叙述视角^[3]，以一个老托利派（即亲英派）的口吻表达了对前革命时代的怀念。小说包括“旧闻”“老法国革命”和“老托利派”三个篇章。叙述者回顾了美国历史的变迁：从清教徒在荒野中建立殖民地，到英王对殖民地的统治，再到美国独立战争，字里行间透露出对秩序井然、优雅文明的殖民地时期的喜爱。

霍桑在描述1763年殖民地时期的马萨诸塞州时写到：“既没有非常严格的宗教，不存在对英帝国高人一等的愤懑不满，也没有对华丽盛世的民主偏见……社会呈现出丰裕而富足的樣子。”（皮尔斯287）^[4]当谈到殖民地时期的服装时，叙述者对当时服饰的质地和丰富颜色充满赞许，相对于自己所属时代阴郁暗沉的服饰风格，他认为现在的时尚和品味完全失去了祖辈的“绚烂、富丽、光彩夺目”（294）。

相对于前革命时代的稳定与优雅，最后一章“老托利派”则描述了革命时期的混乱和社会动荡。一开始，叙述者就称革命前后的变化不啻于一场“地震”，前一个时代对所谓王权、贵族的情感还处在最高潮，而在下一个时代一切与此相关的情绪都立即被认为是一种耻辱，甚至是罪恶。当然，在这场地震般的动荡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对英国王室恋恋不舍的老托利派，他们在汹涌的群众运动中被推搡，被泼脏水、溅泥浆，即使白发苍苍者也无法免于涂柏油、贴羽毛的命运。全国上下也处于一种混乱和失控的状态：私有财产被充公或拍卖；抢劫、杀人案件频出；海上盗匪横行，贸易停摆；国内货币贬值；散兵四处流窜；还有满口自由民主的政客不停地煽动着民族矛盾。就在这种动荡和无序的无政府状态下，恰恰是这些老托利派而不是革命军，表现出了早期清教徒才拥有的风骨与气节。他们像17世纪的清教徒一样，在仇敌环伺中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我们在秘密和沉默中崇拜着乔治国王，即使周围布满了敌视的目光……我们以微弱的希望祈祷这一刻最终降临：即所有骚乱最终平息，亵渎神灵的新奇玩意赶快让位给幸福宁静的王权统治。”（297）他们还保持着对宗教最基本的敬意。当看到爱国派的报纸用仿圣经体的文字嘲笑国王时，他们惊呼：“我们伟大的清教祖先见了会说些什么

呀？要知道他们是绝不会耻笑上帝的语言，即使他们砍了国王的头颅。”（皮尔斯 301）

正因为这些老托利派坚守长久以来所认定的秩序和优雅，所以他们除了要忍受社会动荡之苦外，还要饱受审美情趣失落之痛。故事中的老托利派谴责革命军画卷质地低劣，颜色灰暗；抱怨曾经的英式咖啡馆被硬生生地镶上一只纯金的美国之鹰后格调尽毁。

但是对霍桑来说，美国革命对民族性格的伤害不仅是丢掉了“欢乐”和“时尚”（280），更重要的是它撕裂了原本亲密的英美关系。就像老托利派所哀叹的：“那天夜里，我们看到血流成河——英国人的血和美国人的——不！——都是英国人的血，都是自己弟兄的血。”（300）因此，在《旧闻》结尾处，霍桑跳出老托利派的叙述视角，用讽刺的笔调谴责“战争的绝妙之处”在于“两个手足兄弟像敌人一般泰然自如、心情愉快地互相残杀”（303）。霍桑最后的反讽表明，革命对民族性格最大的伤害是在动荡的社会秩序中，人类情感的纽带被撕裂，暴力和残忍的行为被合理化。正是在合理化的过程中，整个民族的性格从文明优雅走向阴暗粗鄙。

四、抛弃历史的“新人类”

霍桑于 1838 年创作的《总督府传说》系列故事直接以美国独立革命为题材。第一个故事《豪厄的化妆舞会》主要叙述在末代总督豪厄被华盛顿军队围困的关键时刻，一队乔装打扮的葬礼队伍出现在豪尔府邸讥讽“新英格兰君主统治权”（734）正式终结的故事。在第二个故事《爱德华·伦道夫的肖像》中，面对风起云涌的抗英斗争，代理总督哈钦森与 1684 年废除殖民地第一个宪章的伦道夫一样，一意孤行出动皇家军队武力镇压人民运动，导致殖民地人民与母国矛盾激化，引发了著名的波士顿惨案。第三个故事《埃莉诺小姐的斗篷》借用 1721 年发生在殖民地的天花传染病的史事，暗指殖民统治者的狂傲自大与殖民地人民的谦卑逢迎走向各自的极端，最后像瘟疫一样无法控制，演变成你死我活的革命。第四个故事《老埃丝特·达德利》描述革命后总督府从一个执拗疯狂的保皇派老小姐老埃丝特手中移交到马萨诸塞州新选州长汉考克手里的过程。

这四个传说看似松散，其实内在结构紧密。它们既再现了革命期间英国殖民统治崩溃的历史时刻（第一和第四个故事），又描绘了革命一步步被催生的过程（第二和第三个故事），更重要的是它们共同揭示了民族性格在美国革命中的发展轨迹。如果把这四个故事按时间顺序重新排列，我们能清楚看到 18 世纪民族性格所经历的变化：从 18 世纪初匍匐下身躯站在埃莉诺小姐的马车前、甘愿充当踏脚板的秘书赫尔怀斯，到 1770 年如“古老清教徒开拓者”一样，在性格上打上“沉毅坚强”（743）烙印的市政委员们站在哈钦森面前，再到革命时期在豪厄的化妆舞会上，那些乔装打扮的、对英国殖民者进行嘲讽的勇敢的革命者，美国民族的性格确实经历了如上文所说的从谦卑恭顺到古老清教徒品格的复苏。但在《老埃丝特·达德利》中，我们看到了民族性格发展的新特点。这个新特点在前来接管总督府的汉考克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奉命保管总督府钥匙的老埃丝特在绝望中没等来乔治国王的新总督，却等来

了新任州长汉考克，后者以胜利者的姿态向老埃丝特宣布：

你珍藏着已被时光变得一钱不值的東西——原则、情感、习俗、生活方式和行爲模式，那些早已经被下一代人抛弃了的東西——你成了往昔的象征。而我和我身边的人代表新的人类，我们不再生活在过去，也几乎不生活在现在，我们的生活伸进了未来。我们不再按照祖先迷信的模式塑造自己，我们的信仰和原则是奋力前进，前进！……我们再也不当往昔的孩子。（皮尔斯 783）

汉考克的“新人类”观点呼应了霍桑所处时代的超验主义思想，体现了美利坚民族在新时代和新秩序下要求斩断与英帝国的联系、挣脱历史束缚的乐观进步观念。正如考拉科瑞欧所说：“汉考克的激进修辞听起来更像 1838 年的《民主评论》而不是 1770 年革命者的言论。”（472）《民主评论》全称《美国杂志民主评论》（*Democratic Review*），是民主党人奥沙利文（John L. O'Sullivan）于 1837 年创立的一个政论性的官方杂志。19 世纪 30 年代，人们在这个杂志上曾热烈讨论了革命的意义、革命与传统、革命与民主等议题，积极推行民主进步的主流观念。1837 年奥沙利文曾在《民主评论》的创刊词中表达了其进步主义历史观：“我们无意于古老的景象，广阔的未来才是我们舞台，才是我们的历史。古老的罪恶总是努力通过我们对父辈智慧的敬意而妄图使自己不朽，……（但）人类的眼睛应该向前看，因为历史的进程就是向前，如果他向后看，目光还盯着那些过去的思想和事情，他就很有可能跌倒和迷路。”（8-9）。奥沙利文以《民主评论》为阵地，宣传进步主义的历史观；而以爱默生（Ralph Emerson）为代表的超验主义者也号召整个民族放下历史的包袱，抛弃传统的束缚，勇敢向前。爱默生在他的《论自然》（“Nature”）一文中不仅明确表明了对历史的抛弃，而且提出了新人类的概念，“我们为何要在历史的枯骨堆里胡乱摸索，或者偏要把活人推进满是褪色长袍的假面舞会呢？……我们有了新领地、新人类、新思想”（3）。

但在霍桑看来，不管是完全剔除旧时代影响的民主政治，还是一切向前看的新人类思想，其实都代表一种纯粹的未来主义哲学，暗示了历史的断裂和文化的隔绝。对他而言，绝对的历史割裂和完全的文化遗忘都是错误的。革命结束并不意味着过去的死亡，“过去永远存在于现在，它的重量与密度压缩进稍纵即逝的当前时刻”（Metthiessen 7）。就像兴高采烈登上总督府台阶的汉考克，他以为自己终于摆脱了旧时代，因为他的脚现在正“踩在了屈辱的王权身上”（皮尔斯 783），殊不知正是“踩踏”这个动作使得汉考克正在不知不觉地重复以前英国殖民统治者的行为：艾诺莉小姐曾把脚轻盈地踏在赫尔怀斯“匍匐的身躯上”（759）；伦道夫为了自己的统治，叫嚣着要把“人民的权利踏在脚下”（751）；哈钦森气急败坏地说：“（我要）把那些暴徒踩在脚下，公开表示对他们的藐视。”（750）

通过对汉考克为代表的新人类的塑造，霍桑表达了对偏激革命、盲目乐观的民族性格的批判，表现了他与民主进步的主流意识的协商。在他看来，新时代美国人只有在充分理解过去、敬畏历史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超越过去，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完全抛弃历史，一味向前

的新人类只会是偏激和冲动的新一代。

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班克罗夫特为代表的历史学家顺应时代需要,创造了宏大而进步的美国革命神话,同时代的霍桑则以新的视角和范式对话主流意识形态,补充了人们对革命的认识,参与了对历史话语的构建。在民族性格范式的坐标里,美国革命复苏了古老的清教徒品格,也造成了优雅传统的丢失;革命预示着新秩序和新制度的开始,也诞生了抛弃历史、偏激冲动的新一代。在一个众口一词颂扬美国革命的时代,霍桑通过其革命短篇小说,一方面在尽量不失实的情况下为革命辩护,同时又无畏地揭示出革命对民族性格的伤害,表现了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担当和为自己的时代和民族做出的巨大贡献。

注释 [Notes]

- [1]《总统府的传说》系列收录于《重写的故事集》(*Twice-Told Tales*);《我的亲戚莫利纳上校》和《旧闻》收录于《雪影及其他故事集》(*The Snow-Image and Other Twice-Told Tales*)。
- [2]施莱辛格(Arthur Meier Schlesinger)曾专门撰文记录美国独立革命前殖民地主要政治骚乱事件并分析了印花税法案、波士顿倾茶事件背后的经济纠葛。参见Arthur Meier Schlesinger. "Political Mob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5-1776."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99, no. 30, 1955, pp. 244-50.
- [3]同时代的历史文本大多采用殖民地爱国者(Patriots)的叙述视角。参见孙洁琼:《社会对抗与美国革命的激进性——以革命时期纽约的“效忠派”问题为中心的考察》。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09。
- [4]文中有关《旧闻》、《我的亲戚莫利纳上校》、《总督府的传说》的中文引文均来自皮尔斯编、姚乃强等翻译的《霍桑集》(上)一书,略有改动。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Bancroft, G.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 Boston: Little Brown, 1861.
- Brook, T. *The New Historicism and Other Old-fashioned Topics*. Princeton UP, 1991.
- Colacurcio, J. Michael. *Province of Piety: Moral History in Hawthorne's Early Tales*. Harvard UP, 1984.
- Emerson, W. Ralph. *Selected Essays from Nature to the American Scholar*. Translated by Yifan Zhao. SDX Joint Publishing, 2015. [爱默生:《论自然·美国学者》,赵一凡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
- Hawthorne, N. *The Centenary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Nathaniel Hawthorne*, volume VI. Edited by R. H. Pearce. Ohio State UP, 1972.
- Metthiessen, F. O. *American Renaissance: Art and Express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Whitman*. Oxford UP, 1941.
- Moreau, J. *Schoolbook Nation: Conflicts over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s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Present*. U of Michigan P, 2003.
- O'Sullivan, L. John. "The Democratic Principle: the Importance of its Assertion and Application to Our Political System and Literature." *Democratic Review*, no. 1, 1837, pp. 8-9.
- Pearce, H. Roy, editor. *Hawthorne: Tales and Sketches*, vol. 1. Translated by Naiqiang Yao, et al. SDX Joint Publishing, 1997. [皮尔斯编:《霍桑集——故事与小品》(上),姚乃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 Shang, Xiaojing. "Hawthorne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Nationalism: A Study on Hawthorne's Historical Tales."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vol. 35, no. 5, 2012, pp. 90-95. [尚晓敬:《霍桑与民族主义历史叙事——霍桑历史题材短篇小说研究》,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年第35卷第5期,第90-95页。]

论女侦探为主角的早期英国小说的文化功能

◎ 李琼

内容提要: 19世纪英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催生了以女侦探为主角的侦探小说,但由于社会对女性进步持有双重态度,导致小说在文化功能上也呈现出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一方面,通过塑造正面女侦探形象以及重新评价家庭生活经验和女性特质,小说表达了张扬女性潜能的先进观点,在质疑传统性别观的过程中拓展了侦探小说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为了调和女侦探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小说又采用各种手段对她们进行贬损,通过叙事、故事人物和情节不断传递性别不平等信息,或明或暗地表露出对原有性别秩序的怀旧情愫和保卫姿态。

关键词: 侦探小说 女侦探 文化立场 两面性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8) 04-0061-09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Title: On the Cultural Function of Early British Detective Fiction Featuring Women Detectives

Abstract: The profound social change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triggered the emergence of detective fiction featuring women detectives. In the meantime, its two-sidedness of cultural function was also shaped by the contradictory attitudes prevalent in British society towards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On the one hand, it highlights female potential for public activities through re-evaluating domestic knowledge and female attributes, and creating women detectives who are wise, strong-minded and self-confident. These strategies not only question the prescriptive notions of gender in the Victoria era, but expan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genre. On the other hand, it adopts various devices to undercut female characters so as to reconcile their conflicts with dominant ideologies. As a result, ideas and images with patriarchal meaning resonate through narrative, character and plot, which implicitly represent a sense of nostalgia for and a protective stance on the existing gender order.

Keywords: detective fiction, woman detective, cultural stance, duality

Author: Qiong Li,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Xiamen, China.

早期英国侦探小说具有很强的政治保守性。主题上，它围绕罪与罚诠释资产阶级价值观和道德观；情节发展上，它步步指向还原社会秩序，无处不体现着“法则的力量”（Roberts 3）。作为这种力量的人物象征，侦探自然也肩负巩固权力统治的文化任务。侦探通过破案缓释人们对财产损害和人性失控的普遍焦虑，同时也为菲勒斯中心主义提供有力的文学支持，从出现伊始，就完美演绎着男人的理性、智慧、勇气和强健。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侦探被看成“明确指派给男性的行当”（Kungl 2），侦探小说也被贴上性别标签，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由男人主宰的单性文类。

在这种情形下，女侦探的出现似乎是一个悖论，一个闯入异域的伪仿品。其伪仿性在现实中得到确认。故事里的男侦探有其现实参照物，如《弓街警官生活记事》（*Scenes in the Life of a Bow Street Officer*），是成立于1742年的伦敦弓街警察组（the Bow Street Runners）的工作记录。类似的警察回忆录在当时非常流行，吸引不少作家在其基础上进行侦探小说创作。柯林斯（William W. Collins）、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等人在塑造卡夫、福尔摩斯之类的男侦探时，也着墨于1829年成立的苏格兰场，以及担任侦探职责的便衣警察。然而，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女侦探并没有现实依托，因为要到1915年，才有两名女性加入英格兰的格兰瑟姆镇警局；到1918年，伦敦警察厅才正式接纳110名女巡警。可见，英国小说女侦探的出现明显早于真人女警探，她们不是历史人物的摹仿，而是纯文学想象的产物。

在侦探小说这个保守的文类里，女性要成为权力代表，就意味着动荡的性别较量；角色置换要得到读者的认可，也需要历史条件的帮衬。那么，一战前登场的英国女侦探，是否代表着颠覆传统性别观的进步姿态？作者是否真的会让她们保持这种姿态？此类小说的出现与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又有着怎样的呼应？

一、女侦探作为主角的早期小说及其进步性

从文学市场的角度看，英国女侦探登场有其天时之便。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剥夺了文化精英对文学出版的控制，客观上为当时颇具争议，且常被精英文化回避的话题开辟了文学表达空间，比如跨传统领域的女性就业。同时，出版业从50年代起开始发行各种故事报、廉价小说，推动通俗文学繁荣，保证出版渠道畅通。不少侦探小说投稿后，即可在《路德门月刊》（*Ludgate Monthly*）、《海滨杂志》（*Strand Magazine*）、《良篇佳作》（*Golden Stories*）、《便士画报》（*Penny Pictorial*）等报刊上迅速登载。女侦探虽然不属于侦探范式中的正统因子，但在当时风行英国文坛的各类小说中，哥特小说、感伤小说和浪漫传奇多以女性为主角。女侦探的女性身份能将侦探小说与这些流行小说结合起来，凭新奇之意帮助作者抢占市场份额。1891-1900年，英国出版了12部侦探小说，其中5部以女侦探为主角，足见它能成为作品热销的有力卖点（Klein 56）。

1863年，英国作家艾里斯（Edward Ellis）发表《女密探》（*Ruth the Betrayer*），女主角露丝·特

瑞尔成为侦探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女侦探。1864年,海沃德(W. S. Hayward)和弗雷斯特(Andrew Forrester)分别发表《女侦探的经历》(*The Experiences of A Lady Detective*)和《女侦探》(*The Female Detective*),其中的帕斯夏和格拉登也属于最早的女侦探。此外,早期较有代表性的还包括:皮尔基斯(Catherine L. Pirkis)在《拉芙戴·布鲁克的经历》(*The Experiences of Loveday Brooke*)中塑造了第一位职业女侦探拉芙戴;柏德金(M. M. Bodkin)在《女侦探朵拉·迈尔》(*Dora Myrl, the Lady Detective*)中塑造了第一位新女性侦探朵拉;莱顿(Marie C. Leighton)在《侦探琼玛》(*Joan Mar, Detective*)中塑造了第一位黑人女侦探琼玛;奥希兹男爵夫人(Baroness E. Orczy)在《苏格兰场的莫莉小姐》(*Lady Molly of Scotland Yard*)中塑造了第一位女警探莫莉,她与女佣组成“福尔摩斯/华生”二人组,是该组合移植到此类小说的最早范例。

早期女侦探类型性重于个性,参照罗伯茨(Joan W. Roberts)的划分,大致可分为女冒险者、名誉男人、不得已的淑女侦探和新女性侦探四大类型(4)。其中,冒险者类型结合幻想小说、冒险故事和奇情小说的若干元素,以夸张、惊悚、煽情吸引读者,女性历险成为主要看点。如《海滨杂志》1899年推出的由爱伦(Grant Allen)塑造的希尔达·韦德,她的足迹遍及南非、津巴布韦、印度和中国西藏,回国路上还遭遇沉船事件,在海上漂了三天三夜,这些经历无疑能打动海外奇谈的热衷者。

名誉男人型女侦探在福尔摩斯版的小说中最为常见,她们几乎没有弱点,表征的不是优秀女性,而是无所不能的男英雄,故被罗伯茨称为“名誉男人”(4)。弗雷斯特塑造的格拉登,以及《哈姆斯沃思杂志》(*Harmsworth Magazine*)1899年推出的由米德(L. T. Meade)等人塑造的佛罗伦斯·库萨克,就属于这一类型。

不得已的淑女侦探是感伤小说和侦探小说的结合体,在1875-1919年间出版的作品中最为常见。其写作程式也基本固定:中上层女性突遇变故,为了养家,或替亲人洗冤,被迫当上侦探,但只接受“不会弄脏天使翅膀”的案子(Sims 6)。柯林斯在《法律与淑女》(*The Law and the Lady*)中塑造的瓦莱里娅,西姆斯(George R. Sims)在《侦探多克丝·狄恩历险记》(*Dorcas Dene, Detective: Her Adventures*)中塑造的多克丝就属于这一类型。

新女性侦探在世纪之交的小说中较为常见。她们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生气勃勃的运动神韵,明显比70年代的女侦探更拥有经验和体能上的优势。如柏德金塑造的朵拉:毕业于医学专业,当过报务员和记者,喜欢自行车、高尔夫球、短裙和运动鞋,在外形、教育、职业和休闲方面,她都吻合1890-1915年报刊上经常讨论的新女性形象。

从文化意义的角度看,早期女侦探大都具有相当的进步性,这首先反映在她们的角色定位上。虽然作者的本意是通过角色翻新获取市场占有率,但在女性较少参与公共活动的历史时期,作者让她们在男性垄断行业里扮演权力代表,证明与男人有着同等的能力,这在客观上已经赋予了女性社会话语权,拓展了性别空间划分,吻合了以性别平等为目标的女性主义思想。

其次,早期女侦探大都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明显的二元性质。一方面,她们坚强、自信、

敢于冒险，既有高度的良知和社会正义感，又能灵活机智地使用各种方法破案；另一方面，她们穿着雅致长裙，言行谨慎，热衷下午茶和女性私聊，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淑女风范，故在许多小说中被称为“侦探小姐”（lady detective），而不是“女侦探”（woman detective）。这种二元性使她们只能有限挑战传统角色，暂时还不算是全新的女性形象，但同时她们也不再是“强制性美学”定义下的单纯、纤弱、被动的“标准”女人（魏天真、梅兰 162）。虽然作者出于侦探行业要求，不得不赋予她们体能、智力和品德上的优势，并常在小说里强调她们是女人中的例外，但众多的例外加在一起，客观上已经形成辩诬女性气质规定的文学声音。

再者，在侦破手段上，早期女侦探主要靠家庭生活经验和直觉破案，这一点不少评论者都有提及，但鲜有人指出它的进步意义，即可以使历来被贬低的女性特质得到重新评估。所谓家庭生活经验，是指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常识，以及对不同阶层女性行为规范的了解。在这一领域里，女侦探是理所当然的专家，再加上女人“过于关注细节”的“天生缺陷”（Kungl 56），她们就可以从礼仪、服饰、生活习惯等方面，对其他人物作出权威判断，这是男人不可比拟的。如皮尔基斯的《匕首出鞘》（“Drawn Daggers”）中，继承人梦露在回国船上与一位女客交换身份，好瞒过监护人霍克与恋人秘密结婚。拉芙戴看过“梦露”自己整理的卧室后，立刻注意到它异常整洁，椅子被端正地摆在梳妆台前，发卡盒子也被打开，以方便随时使用。这些细节在霍克眼里微不足道，拉芙戴却从中发现，上层女性的行为能指被劳动阶级的能指替换，由此断定“梦露”是女佣出身的冒名顶替者（162）。在这个案子中，正是不受重视的女性经验，帮助女侦探破了案。

至于直觉，这种几乎先于思维的个人感受，因其表现出非理性力量，常与弗洛伊德潜意识中的本能并列，在传统二元结构中处于受打压的地位。早期女侦探大都拥有直觉力，但很难说清它是女性特有的天生禀赋，还是后天的文化习得。有时它被作者夸大，在毫无铺垫的情况下，女侦探仅凭直觉就能破案。1928年英国侦探俱乐部成立后，认为这种超自然能力有悖唯理主义认识论，故而限制作者将其掺用在侦探小说中。但更多时候，直觉发生于女侦探的敏锐观察之后，这种能力来自女性自幼开始的自保训练。在父权制家庭中，女性成员被迫处于依赖地位，父亲等权威男性的会左右她们的生活乃至命运。久而久之，不少女性学会察言观色地判断男性及身边人，感觉是否出现异常。这种敏感就是后天习得，是建立在生活经验、人性了解和观察分析基础上的感悟。由于这一过程可能瞬间完成，很容易被误读为直觉。在皮尔基斯的《红山姐妹会》（“The Redhill Sisterhood”）中，警方认定一个姐妹会为盗窃团伙踩点，因为施舍过食物的家庭后来都被盗了。拉芙戴看到其中一个成员照顾孩子后，立刻凭“直觉”相信她们不是罪犯：“她从手推车里抱起那个小瘸子，让他瘦小的手绕着自己的脖子，然后抱着他进屋了。她的动作有一种说不出的美，美极了。”（94）拉芙戴认为对弃婴如此温柔的人不可能犯罪，于是她另寻目标，终于发现她们的邻居才是罪犯。在这个案子中，被神秘化的直觉正来自女侦探的细致观察和对人性的了解，这也是富勒（Margaret Fuller）等人讴歌的“能洞察人与人之间以及一切生命形式之间微妙联系”的女性直觉（转引自多诺万 50）。

作者让女侦探靠家庭生活经验和直觉破案的做法，其初衷是通过女性符号增加人物可信度。这两者都因与第二性和私人领域关联而受到轻视，其对立面是启蒙时期以来被奉为主臬的科学和理性。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教育使它们继续成为男人专有，家庭经验和直觉只是反衬出女人在这两方面的匮乏。可是在侦探小说中，这两种性别能指屡屡找到用武之地，说明它们不是狭隘和非理性的代名词，反而能帮助女性为社会做出贡献。由此，作者的写作策略在客观上起到修正本质主义的作用。它套用主导性别话语，将缺乏男性经验定义为女侦探的特质，但又通过她们的成功肯定了女性经验的独特意义。在构建女性自己权威的过程中，它同时也召唤社会重新认识、评价并尊重女性特质。

二、常见的贬损手段及其保守性

早期女侦探虽然可以凭新奇和进步形象吸引读者，但父权文化的惯性思维又会让他们觉得，甜美女人与冷峻的追凶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混合这两种禀性很不自然。在以男性为尊的侦探小说里，如何疏导角色替换引发的性别焦虑，如何使女侦探“自然化”，这是作者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毕竟小说从一开始就定位于大众娱乐和消费，这种商品性使它不会旗帜鲜明地对抗主流话语。为了迎合读者的喜好，早期作者不约而同地采用若干手段贬损、限制女侦探。

常见手段包括五种，其一是弱化女性特征，使女侦探男性化或中性化。如弗雷斯特让格拉登以第一人称叙述故事，并在开头说明自己不会泄露身份信息。这种安排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性别提示，使格拉登的女性身份变得晦暗，侦探身份得到凸显。而她的做派又与福尔摩斯类的男侦探极其相似，很容易让读者在心中将她男性化。再如皮尔基斯用一连串否定句描绘拉芙戴：“她不高不矮，皮肤不黑不白，长相不美也不丑，她的总体特征就是没有特征。”⁽⁶⁾换句话说，她的外形缺乏女人味，加上她没有女性嗜好，从不沾手女人活儿，这也很容易让读者将她中性化。从象征的角度看，这两位女侦探的“变形”是自我权威化的一种努力，即通过削减女性符号、添加男性元素，在男人行业内谋一席之地；但同时，它也象征着英国社会对女性僭越生存领域的警告和惩罚，暗示女人进入男性空间十分危险，她会被同质化，丧失女性意识和优雅的气质。

其二，作者会降低女侦探的独立性或重要性，把她的成果分割给男侦探。如拉芙戴解决的七个案子中，只有三个是她独立侦办的，而且都与婚姻有关；一旦涉及凶杀或暴力，在关键时刻，她总需要男同事来逮捕罪犯，甚至解救她，或者干脆消失，把最后的胜利拱手让人。可见作者认为，婚姻是高度女性化的空间，拉芙戴的女性身份可以使她在其中有所作为，但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只有比她更强健的男人才能解决问题。这种安排显然吻合当时工作领域内的性别分工，也可以安抚担心饭碗被女人抢走的男读者。

其三，作者会利用女性的“自然特征”贬抑或病态化女侦探。如米德等人塑造的弗洛伦斯，她拥有当时女性少有的知识面，但像19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的不少妇女一样，她也患有精神方

面的疾病；莱顿塑造的露西儿，“作为一名侦探，已经学会隐藏、压抑自己所有的情感”（41），但发现单恋对象另有所爱后，她妒火中烧，几乎错将好人送上绞刑架。她们都拥有传统观念中特属女性的某种弱点，用来说明女人难以控制情感，或者不能承受过度压力，因此并不真正适合男性化的职业。这种强调男女不同心理能力的文化想象，一直都是男性维护自身霸权的有力武器。

其四，安排女侦探服从、依赖男性权威，在早期小说中也非常普遍。如海沃德塑造的帕斯夏要服从沃伦上校，在受到男同事蔑视和排挤的情况下，她“急于好好表现，以赢得上司的友谊和赞赏”（3）。西姆斯塑造的多克丝要服从瞎眼丈夫保罗，遇到问题时听取他的建议，被禁止外出时谦卑地回答，“当然可以，亲爱的，如果你希望如此”（69）。她们背后都隐藏着男权操控的眼睛，无论自己多么出色，离开男性的认可和支持，她们依然难以作为。她们的屈从向读者证明，性别秩序并未遭到破坏，依赖、听命于男人仍是女人应有的姿态，也是职场谋生的必要途径。

最后，安排适婚女侦探放弃事业重归家庭，这是早期作者最常用的手段，在报刊登载的侦探故事中尤其普遍。作者似乎与读者达成共识：女性和侦探这两种身份的混合，只会小说前半部分出现，此后爱情故事会让它们分裂并各自回归传统角色。男侦探如福尔摩斯，可以应读者呼吁在莱辛巴赫瀑布里死了又复活，而在“几乎所有社会组织都反对已婚妇女工作”的背景下（Perkin 198），没有读者会呼吁女侦探婚后继续当侦探。而且，在维多利亚时期，侦探并不属于体面的工作，他们要与罪犯或下层人士打交道，导致社会地位被拉低，中上层家庭都不愿与他们交往（Nickerson 31）。就女侦探而言，不良交际会侵害中产阶级女性的纯洁和体面，她们或者瞒着家人，或者被迫“与从前的朋友和社会地位一刀两断”（Pirkis 2）。要修正这些年轻女性对阶级和性别的双重背叛，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她们放弃工作去结婚。于是，看似很有抱负的莫莉在破了几个案子后，就仓促地结了婚。她的故事集在出版第一年刊印三次，说明读者还是很满意这样的结局。在《抓捕保罗·贝克》（*The Capture of Paul Beck*）中，朵拉含泪承认无法战胜保罗，之后也接受了他的求婚。这个结局同样让男读者欣慰地看到，他们的同性成功驯服了富有反叛精神的新女性，恢复了男女在性别角色中的定位。

从叙事的角度看，上述五种手段的使用使大部分早期小说具有了双重叙事结构。第一层结构为侦探小说固有，它讲述案件调查过程，在谜题与解谜之间形成张力，代表正义和邪恶的较量；第二层结构为女侦探主角小说独有，它隐匿于人物刻画、情节设置和叙事策略中，在肯定与否定女侦探之间形成张力，代表新旧性别观的冲突。这两层结构都围绕权力更迭展开，由罪犯对受害者的权力优势，转向侦探对罪犯的权力控制；由女侦探最初拥有权力，转向男性权威代表，或爱情故事中的男主角重新获得控制权。从父权统治的角度看，这两层结构的目标和功能是一致的，即维护现有体制，俯就两性陈规。但从女性进步的角度看，它们又互相矛盾：前者树立了女侦探的正面形象，说明作者接受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变；后者将霸权所导致、固化的性别讹误散布于叙事话语中，在文本与作者姿态之间形成分裂，或明或暗地破坏了女侦探形象，削弱了表面上的开明思想，与前者形成了互为解构、自我消解的悖论局面。

对读者而言,这种双重结构又具有双重宣泄功能。侦探小说的审美目的在于唤起读者恐惧和怜悯的内心体验,而后通过罚罪抚慰读者,这是它原有的情感宣泄功能。但若侦探是女人,她的存在就挑战了男性/女性、公共/私人、理性/情感等二元等级秩序,她“像罪犯一样没有顺从社会制度”(Klein 5),因此兼具罪人形象,在公众眼里甚至比赌徒、诈骗犯更为不堪。为了抚慰读者的反感情绪,作者通过贬损她来实现小说的第二重宣泄功能,或者让她放弃事业,以归顺姿态谋求读者的谅解。

可见,早期女侦探小说仍是“以性别为基础的权力结构编码”(Klein 92),它通过叙事、故事人物和情节不断强化性别不平等信息,并将这种信息传递给读者。如果说打造男侦探是权力用来处理、应对社会现实矛盾的一个文化象征行为,那么女侦探作为“重写”文本也具有类似的功能。权力话语通过她们投射、巩固父权体制的政治文化想象,而在维护男性神话的合法性上,她们甚至比男性同类更具有说服力。

三、小说的两面性与历史文化语境的契合

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中指出,文学作品是不同意识形态和符号系统共存互动、斗争较量的平台,现实矛盾能在其中得到假设性的解决(76)。女侦探作为主角的小说产生于英国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时期,社会现代化推动了女性就业和教育的改善,促使女权思想进一步抬头。同时,资本主义变革也造成公私领域截然分离,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和家庭理想被资产阶级推崇为普世价值。在两种意识形态的交锋下,女侦探作为女性进步符号,超越了传统纲常规约的空间位置和角色功能;小说贬损策略作为男性中心主义符号,交织着父权制傲慢对她们不断进行打压。这两种符号的对抗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对女性持有双重态度,婚姻结局则是小说对性别冲突所作的假设性解决。

早期女侦探主要来自中产阶级,从19世纪中期起,英国政府和企业规模扩张为中产阶级妇女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受雇人数从1851年的2000人增加到1911年的160,000人(潘迎华 105)。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在男性主导的行业内扮演新角色,女侦探的出现具备了合理想象空间。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前瞻性,不仅能写出女性真实,还能写出女性应有但还没有的状态。中产阶级妇女的就业趋势和社会角色提升,使跨越传统领域的女侦探不再显得突兀,作者因此可以将她们写入小说,通过扩展女性的可能性来激励现实中的妇女。但同时,英国社会又认为妇女涌入职场不是一件幸事,不仅会降低男人的报酬标准,还会干扰女性承担家庭责任。为了继续把她们限制在狭小的私人领域内,社会分配给妇女低报酬、辅助性的低级工种,以减弱她们的就业兴致。当这种现象投射到小说中,就出现了降低女侦探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安排她们办理小案子,或者让她们依赖男性权威扶助的贬损手段。它们向读者暗示,女性走出家门并非意味着解放,公共空间不过是更大范围的男权运作地点,妇女在其中依然要处于类似家庭里的次要附庸角色。

在教育方面，英国经济和科技进步导致社会急需各种人才，女子高等教育得到了发展。许多新成立的女子高教机构不仅开设人文新科目，还推行田径、自行车运动等体育项目。不少中产阶级妇女借此增强了社会竞争力和参与意识，以自身新形象帮助社会改变对女性柔弱无知的刻板印象。随着这种新型女性增多，女性意指的固定性被突破，作者就可以塑造，读者也有可能接受有知识、有责任感，且灵活敏捷、精力旺盛的女侦探形象。但同时，英国教育毕竟建立在男性文化基础上，女子教育目的是培养“熟悉家政艺术、渴望结婚的淑女”（喬昭印 330），其首要任务仍是传授家务技能，其次才是文化知识。当这种性别教育反映在小说中，就出现让女侦探靠家庭生活经验破案的策略。虽然变换侦破手法如前文所述，客观上有重新定义女性特质的积极意义，但主观上它体现的仍是关于女性角色的传统偏见。

此外，随着英国妇女受教育和就业人数的增加，女性平等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中产阶级妇女主导的女权运动在19世纪后期也得到蓬勃发展。英国议会和各大报刊随之劲头十足地讨论新女性和妇女权益问题，无形中为挑战传统的女侦探出场营造了政治文化氛围，也使作者可以塑造有闯劲、有自由思想和平等意识的女侦探形象。但同时，社会对激进女性的反感情绪也非常强劲，认为女人参政会打破男女不同场合的必要分界，侵害女性娇嫩文雅的自然气质。反对者通过集会、演讲等方式攻击进步女性，将她们妖魔化为“野蛮女性”“作为社会暴动分子的野女人”（Heilmann xxix）。当这种现象蔓延到小说中，就出现削弱女侦探性别特征，或质疑其纯洁体面的贬损手段，尤其是去性化处理，与社会上用暴力语言讨伐进步女性不像女人的做法，可谓异曲同工。

可见，早期小说对女侦探的褒贬两面性与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双重态度是相互呼应的。英国现代化发展需要更多妇女参与公共生活，但又担心父权统治会遭到强烈冲击，于是借助性别陈规在就业、教育、宣传等方面限制女性进步。这种矛盾反映到创作活动中，就出现作家一方面热情歌颂女侦探，通过她们的选择和行动，使女性一词在含义上成为可以增值的开放场所，在实践上意味着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公义内涵。另一方面，作家又“身不由己地受到社会习俗和文本常规的推动，不断复制出他们本欲加以改造重构的结构”（兰瑟 7）。这种结构就是贬损、限制女性的叙事结构，作者遵循性别秩序对情节进行种种干预，使女侦探无法完全地从男性中心的象征秩序和控制结构中突围，其中最为彰明的莫过于婚姻结局。

早期女侦探很少不婚，大多数人会在征服与被征服的爱情游戏中放弃自我以获得求婚。少数的不婚者，有些如拉芙戴，因为缺乏女人味而无法结婚；有些如弗洛伦斯和琼玛，因为单恋对象与更遵守妇行的女人结婚，只能“错失生命中最快乐的事”（Leighton 289）。但她们都转而充当了婚姻卫士，为他人的体面婚姻保驾护航。这种几乎千篇一律的情节干预，可以视为作者为躲避男性中心主义审查而做出的妥协，在符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婚姻结局中，性别秩序和家庭理想得到重建，性别冲突也得到假设性解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掩盖、弱化小说颠覆倾向的类似干预，又使小说中那些赞美女侦探而富有挑战性的成分有机会得到释放和表达，并借助侦探小说的流行得以散播，这对于中产阶级女性读者而言，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示范意义。

概而言之,以女侦探为主角的早期英国小说是冲突与依赖的矛盾共同体,在文化功能上具有进步和保守的两面性。一方面,通过塑造坚强勇敢、自信机智的女侦探人物,重新评价家庭生活经验和女性直觉,小说表达了张扬女性潜能的先进观点,在挑战男权价值观的过程中拓展了侦探小说的文化内涵,响应了英国经济发展需要女性扮演新角色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侦探和女性在维多利亚时期仍是互不相容的两个概念,为了调和女侦探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作者对她们进行各种贬损,不仅弱化了小说对男权思想的挑战,也反映出作者对原有性别秩序持有怀旧情愫和保卫姿态。小说的这种两面性是社会转型时期新旧性别观冲突在通俗文学中的体现,它与女性进步形成双向互动,在相反相成的张力中参与了英国性别文化的修正和重构。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Donovan, Josephine. *Feminist Theory: 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Translated by Yuchun Zhao.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2003. [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 Hayward, W. S. *The Experiences of a Lady Detective*. London: Charles Henry Clarke, 1864.
- Heilmann, Ann. *New Woman Fiction: Women Writing First-Wave Feminism*. St. Martin's, 2000.
- Jameson, Fredric.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 Symbolic Act*. Methuen, 1981.
- Klein, Kathleen Gregory. *The Woman Detective: Gender and Genre*. U of Illinois P, 1995.
- Kungl, Carla T. *Creating the Fictional Female Detective: The Sleuth Heroines of British Women Writers, 1890-1940*. McFarland, 2006.
- Lanser, Susan S. *Fictions of Authority: 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 Translated by Bikang Huang. Peking UP, 2002. [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Leighton, Marie Connor. *Lucille Dare, Detective*. Ward Lock, 1919.
- Nickerson, Catherine Ross. *The Web of Iniquity: Early Detective Fiction by American Women*. Duke UP, 1998.
- Pan, Yinghua. *Britain's Modernization and British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2005. [潘迎华:《19世纪英国现代化与女性》。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 Perkin, Joan. *Victorian Women*. New York UP, 1995.
- Pirkis, C. L. *The Experience of Loveday Brooke, Lady Detective*. London: Hutchinson, 1894.
- Roberts, Joan Warthling. "Amelia Butterworth: The Spinster Detective." *Feminism in Women's Detective Fiction*, edited by Glenwood Irons, U of Toronto P, 1995, pp. 3-11.
- Sims, George R. *Dorcas Dene, Detective: Her Adventures*. London: F. V. White, 1898.
- Wei, Tianzhen, and Lan Mei.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riticism of Feminism*. Central China Normal UP, 2011. [魏天真、梅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Yi, Zhaoy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Women*.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裔昭印:《西方妇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责任编辑:马妮妮

FLC

翻 译 研 究

创榛劈莽，前驱先路

——论《海国图志》中的地理术语译名

◎ 张景华

内容提要:《海国图志》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其地理术语译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中西学术差异极大的语境下，《海国图志》注重地理术语译名的专业性、系统性和能产性，体现了一定的术语意识，对中国地理学的近代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其译名在标准化等方面存在诸多缺点，在思想观念上也没有走出华夏中心主义的格局，但其学术创新精神仍然值得当今译者学习。

关键词:《海国图志》 地理术语 译名 学术转型 魏源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8) 04-0070-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末民初西学术语译介与接受研究”(15BYY021);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海国图志》地理术语汉译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7YBA173)

作者单位: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Title: A Pioneer in Introducing Western Knowledge: On Translated Geographic Terms in *Haiguotuzhi*

Abstract: Being regarded as the first book which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the world geography into China, *Haiguotuzhi* still has significant research values in terms of its translation of geographic terms. Despite of academic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t manifests termin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professionalism, productivity and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ed geographic terms, henc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modern transformation in geography. Although its terms are featured with non-standardization and Sino-centric ideology, it is worthy of being followed in terms of its pioneering academic spirit.

Keywords: *Haiguotuzhi*, geographic term, translated term,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Wei Yuan

Author: Jinghua Zhang,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China.

《海国图志》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撰、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的巨著。它由湖南邵阳人魏源主持编译,其出版被学术界视为知西洋之强、察西洋之症、济国强国之举,打破了夷夏两分的传统价值观,开辟了近代西学东渐的新风气。魏源也因此而跻身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之列。《海国图志》以林则徐主持翻译的《四洲志》为框架。九万余字的《四洲志》直接译自英国人慕瑞(H. Murray)的*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今译《世界地理大全》)。此外,魏源还辑录了《外国史略》(马礼逊译)、《地理备考》(马吉士译)等20部译著和编著。由此可见,《海国图志》具有重要的翻译史料价值。

在国外,除荒川清秀、谷口知子等日本学者对《海国图志》的翻译有所涉及之外,翻译专题研究很少^[1]。在国内,从1991年《中国科技翻译》发表《魏源辑译〈海国图志〉》一文起,陆续出现一些学术论著。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海国图志》中个别术语译名的厘定,比如,冯天瑜研究发现《海国图志》中的术语汉译继承和发展了明清耶稣会士和《四洲志》的译名。其次是探讨《海国图志》中的术语翻译对当时学术思潮的影响。比如,沈国威以《海国图志》中“五带”的翻译说明该著作对译介西方近代地理学的贡献。再次是运用现代词汇学研究《海国图志》中术语译名的构词特点。比如,赵爱运用术语学和词汇学分析了其译名的定义、构词理据和构词方式等^[2]。总的来说,国内外对《海国图志》所涉及的翻译问题研究非常有限,而《海国图志》作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开山之作,其地理学术语汉译的研究价值恰恰不可低估。

一、《海国图志》的地理术语汉译之难

对于《海国图志》编译之难,魏源在《海国图志》序言里说:“《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代以来之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穿,创榛劈莽,前驱先路。”(1)要理解《海国图志》地理术语“创榛劈莽”之难,就必须对当时的地理学共同体有所了解。邹振环认为:“《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是晚清地理学共同体之间产生联系、发生影响最大的两本书。”(317)在清末半个世纪中,《海国图志》有14种刊刻本,徐继畲《瀛寰志略》有18种刊刻本。与此相对的是,当时的术语译名非常混乱,甚至连地名也无法辨识。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提到:

外国地名,最难辨识。十人译之而十异,一人译之而前后或异。盖外国同音字者无两字,而中国同音者或数十。外国两字合音,三字合音,而中国无此,故以汉字书番语,其不能吻合者居十之七八,而泰西人学汉文者皆居粤东。粤东土语本非汉文正音,辗转淆讹,遂至不可辨识。(转引自马祖毅 655)

从徐继畲的评论来看,影响西学术语汉译准确性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外国语言文字与汉语在构词和语音上的差异悬殊;另一方面是西学术语汉译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语言来翻

译，译者各行其是，导致译名辗转淆讹、不可辨识。

从中国地理学的近代转型来看，语言障碍并非影响《海国图志》地理术语汉译的主要障碍，晚清社会世界地理知识的缺乏才是最大的难题。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官员对世界地理知识几乎一无所知，林则徐发现沿海文武官员“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125）。直到鸦片战争，中国社会的地理知识仍然停留在“天圆地方”“中国者，天下之中”的认识水平上。利玛窦、李之藻早在明末就创译了“地球”这一术语，但是其“地圆说”一直难以被接受。康熙年间，杨光先曾讥讽“地圆说”，认为“所以球上国土之人脚心相对”，“竟不思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有识者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转引自顾长声 11）。19世纪70年代中期李圭在《环游地球新录》里还说：“地形如球，环日而行。我中华明此理者固不乏人，而不信是说者十常八九。”（315）故无论是《海国图志》，还是《瀛寰志略》，在序言中皆重点阐述“地球”这一术语及其概念系统，说明“地形如球”，从而论证“地圆说”，并促进中国地理学近代转型。

二、《海国图志》地理术语译名的术语意识

作为人类科学知识在语言中的结晶，术语既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延续和传承的载体，也是学术和学科发展的标志，成熟的学科必须要建立一套成熟和规范的术语系统。对于翻译来说，译者的术语意识是决定术语翻译质量的关键因素，决定着术语翻译的专业水准。就术语翻译质量而言，《海国图志》的译名在专业性、系统性、能产性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术语意识。

术语是用来表达特定专业概念的，术语是专门用途语言的组成部分，“专业性是术语的最根本、最重要特征”（冯志伟 54）。如果一个词语失去了专业性，也就不能成为术语了。就术语的专业性程度而言，《海国图志》的地理术语译名远远超过同时期的《瀛寰志略》。据现有资料研究，沈国威认为《海国图志》最早系统和准确使用了“热带”（tropic zone）、“温带”（temperate zone）、“冷带”（frigid zone）等气温带术语译名（262-63），试比较《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对相关概念的表述：

赤道为日驭正照之地，环绕地球之正中，中国在赤道之北，即最南滨海之闽、广，尚在北黄道限内外，**较之北地寒暖顿殊，遂以为愈南愈热，抵南极而石烁金流矣。**（徐继畲 1）

[南北] 二极之中为**赤道**，近二极皆为**冷带**，稍离极为**温带**，正当赤道下为**热带**。……西洋**温带**之地，则为地中海所占；而欧罗巴亦偏于**冷带**，利未亚亦偏于**热带**。（魏源 1850）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海国图志》已经能明确划分地球的五大自然带，不仅对热带、温带、

冷带做出明确的分类,而且能对地中海、欧洲、利比亚等地区的气温分布有正确的把握。但是,《瀛寰志略》对气温与世界地理的认知还非常有限,甚至片面地认为“愈南愈热,抵南极而石烁金流”,由此可见,对气温带的描述《海国图志》中译名的专业性程度明显高于《瀛寰志略》。除了注意概念的准确性之外,《海国图志》也比较重视术语的定义,比如“火山”和“潮”等译名的定义:

Volcanoes, as is well known, are openings in the rust of the earth, whence there issue from time to time jets burning substances and currents of melted matters which bear the name of lavas. (Murray 204)

火山者,乃地中之火,由此发窍而出之路也。其穴所吐者,并有浮石、温石等,随火发出。(魏源 2205)

The tides form a remarkable phenomenon, consisting in the alternate rise and fall of the surface of the sea twice in the course of a lunar day, or at a mean rate every 12h. 25m. and 14s. (Murray 187)

潮者,乃海水之动,而不失其常也。每日十二时三刻四分,必有二次之消长。(魏源 2203)

将 *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中的定义与《海国图志》中的定义进行比照,可以发现二者能基本对应。定义的作用就是对术语所代表的概念作简明的描述,使术语的定名与所指一致,言简意赅,能描述事物的本质特征。《海国图志》对“火山”和“潮”等地球科学术语的定义基本做到了科学准确,运用汉语“……者……也”式句法结构进行定义,已经体现了一定的术语意识。

其次,从现代术语学来看,《海国图志》也顾及了专业术语翻译命名的系统性。特定领域的专业术语必须“处于一个层次结构明确的系统之中,术语应该尽量保持系统性”,同一系列的概念术语,其命名应该体现出逻辑相关性(冯志伟 54)。基础性术语确定之后,其派生术语的命名应该与之对应,比如说从“火山”这一术语可以派生出“死火山”和“活火山”。那么我们来看《海国图志》对日蚀、月蚀的翻译命名:

In **eclipse** there are various degrees of immersion, when this is entire, it is said to be **total**; when only a part of the moon is immersed, the eclipse is said to be **partial**; and when centre of the moon passes through the centre of the shadow, the eclipse is said to be **central and total**. (Murray 126)

日月之蚀,所蚀多寡不同,故有三等之分:一曰**满蚀**,一曰**半蚀**,一曰**环蚀**。
(魏源 2190)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对于日蚀、月蚀的描述原文使用了描述性语句，在《海国图志》中由日蚀、月蚀这一基础术语派生出“满蚀”“半蚀”“环蚀”等三个对应的术语译名。另外，《海国图志》运用词缀将译名系统化，使地理术语更为规范，比如，以“海”作为词缀的有默生丁海（Mediterranean Sea）、加斯比约海（Caspian Sea）、卑西溢海（Pacific Ocean）、太海（Black Sea）等；以“山”作为词缀的有白山（Alpes）、曼斯非尔山（Mansfred）、阿尔台山（Altai）等；以“湖”作为词缀的有苏比厘阿湖（Superior）、美苏里河（Missouri）、德斯古各湖（Tezcuco）等。术语学认为一个学科的术语集就是一个系统，人类的各种知识领域都可以用概念系统将其模式化，术语系统越先进学科越成熟。《海国图志》在西方地理术语翻译的命名上呈现出一定的系统性，这表明编译者的术语意识和近代地理学的学术意识。

另外，《海国图志》还充分考虑了术语译名的能产性。所谓的能产性“反映了术语构成新术语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周遍运用。术语的能产性还反映了术语形成的经济性，使得术语系统中的词组型术语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单词性术语的数量”（冯志伟 38）。《海国图志》在地理术语的翻译命名上比较注重术语的能产性，从而可以派生出大量术语，比如有关《潮论》的术语：

And we here perceive the cause of what are called **spring tides** and **neap tides**.(Murray 117)

夫潮每月朔望，定有两次消长，较平日为尤甚，名曰**大潮**。……又每月之内定有两次消长，较平日为尤小，名曰**小潮**。（魏源 2203）

英文中的 spring tide 可以翻译成汉语的“春潮”或“大潮”，但是为了与“小潮”（neap tide）形成对应关系，《海国图志》翻译成“大潮”，并由此产生了“上潮”（high water）、“下潮”（low water）；“长潮”（rise tide）、“落潮”（fall tide）；“早潮”（morning tide）、“夜潮”（night tide）等一系列对应的术语。这些地理术语构成了一定的框架背景，而这些框架就像造术语的模型一样，能批量生产很多的近代地理术语。由此可见，《海国图志》中的编译者对于地理术语的翻译命名不仅具有一定的专业意识，而且体现了现代术语学的理念，即术语命名应该尽量遵守系统经济律。

三、《海国图志》地理术语译名与学术转型

中国传统地理学即舆地学对域外知识极为轻视，清代学者姚莹曾痛批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弊端：“自言地理者，皆详中国而略外夷。《史记》、前后《汉书》，凡诸正史外夷列传，多不置外观，况外夷书乎？”（转引自冯天瑜 241）关于《海国图志》对近代地理学转型的贡献，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此两书在今日诚为刍狗，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467）。邹振环则认为《海国图志》和《瀛寰

志略》开创了一条世界地理的“崭新知识线”，“为晚清世界地理研究建立了一整套规范”，这种两部巨著是晚清地理学共同体中影响最大的两本书，标志着“晚清非体制化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312）。在近代地理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中，术语翻译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术语翻译与普通词语的翻译不同，术语翻译的命名表面上来看是词语概念的问题，其实更重要的是学术观点的选择，而其背后又会涉及到学术话语的立场选择，因而新术语一般都代表着新的学术观点和学术立场。新译名是《海国图志》的典型特征，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精辟地指出：“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语言之之输入是也。”（117）

为了输入西方近代地理学，《海国图志》必须用新译名来传播新的学术思想，对照慕瑞的 *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海国图志》创制或率先运用了许多近代地理术语译名：地理用具类译名有察天筒（barometer）、千里镜（telescope）、量天尺（quadrant）、定时钟（alarm clock）等；地图类译名有赤道（equator）、北极（north pole）、南极（south pole）、极圈（polar circle）、地轴（the earth's axis）、经度（longitude）、纬度（latitude）、五大洲（five continents）等；气象地理类译名有恒吹风（trade wind）、当令风（local wind）、热带（tropic zone）、温带（temperate zone）、冷带（frigid zone）等；天文地理类译名有海王星（Neptune）、地球循环（the rotation of the earth）、天体（the heaven bodies）、日蚀（solar eclipse）、半蚀（partial eclipse）、满蚀（full eclipse）、环蚀（central and total eclipse）等。对照《瀛寰志略》、《海国四说》等同时代地理学著作，笔者发现这些著作都缺乏《海国图志》这样的新译名。传统地理学多集中于人文地理，对地理现象缺乏严格的学术分析，而《海国图志》的译名不仅涉及风雨、气温、日月食、火山、地震等自然现象，而且在术语的界定和分析时深入联系气候之变迁、潮汐之涨退、波浪之大小、江河之形成等近代地理科学原理。察天筒、千里镜、量天尺等译名承载着近代军事地理学概念；恒吹风、当令风、热带承载着近代气象地理学概念；地球循环、天体、日蚀等术语承载近代天文地理学概念。与传统地理学比较，《海国图志》中的一系列地理术语译名已经初步形塑近代地理学分支学科及其知识体系。

毫无疑问，在这些译名及其概念和相关学术思想的影响下，传统地理学“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话语体系逐渐解体，近代中国社会“不被海图海志，不知宇宙之大，南北极上下之浑圆”的落后状况发生了改变（魏源 7）。以“地圆说”为核心的话语体系也在此基础上形成。《海国图志》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学术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是一代中国人了解域外知识最详尽、最系统的读本。而这种影响与这些新译名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这也印证了近代思想史研究向概念史转向的意义，黄兴涛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部由各种新名词为网络编制起来的立体多维的观念之网。几乎没有哪种新思想和新思潮，不是由新名词新概念作为网结构造而成”（78）。为了使这些译名及其所承载的学术思想为近代社会所接受，魏源还对中外历史上各种典籍旁征博引，通过“释五大洲”“日月蚀论”“维经度论”“时刻论”“四季寒暑论”等论说文章，推进传统地理学向近代转型。

四、《海国图志》地理术语译名的局限性

尽管《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第一部“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巨著，但是，与慕瑞的 *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比较，其编译的学术水平仍然落后西方百年以上。尽管《海国图志》打破了传统地理学的夷夏观念，但是斥洋尊中、夷夏之防、夷夏之别的传统观念在《海国图志》的地理术语译名中仍然不少。比如 Gulf of Oman（今译阿曼湾）被翻译成“疍曼海湾”，Pacific Ocean（今译太平洋）被翻译成“卑西溢海”，Cuba（今译古巴）被翻译成“苦伯岛”，Nubia（今译努比亚）被翻译成“奴比亚”，Angola（今译安哥拉）被翻译成“曷疆刺”。由“卑”“疍”“苦”“奴”“疆”等贬义词和不吉利的词语反映了当时“贬低和排斥异域国家的社会心理”（赵爱 18）。称英国为“红毛国”，荷兰为“红毛番”，日本为“倭奴国”，Russia 被翻译成“俄罗斯”和“罗刹”。五大洲中的 Africa 除了“阿利未加洲”这一译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译名就是“乌鬼国”；African countries 译成“利未亚乌鬼各国”，用“卷毛乌鬼国”指毛里求斯以西的非洲国家，并由此创造了术语“顺毛乌鬼”；将 black man、the Blacks 译为“黑番”“乌鬼”“黑夷”或“土番”，将南非的 Cape of Good Hope 翻译成“乌鬼甲”。这些译名的种族歧视心理非常明显，比如：

- (1) 乌鬼国东北，山与阿黎米相联，向西南生出坤申方大洋，……，皆顺毛乌鬼地。（魏源 1074）
- (2) 卷毛乌鬼国在妙里士正西，……。民人愚蠢，色黑如漆，发皆卷生。（1075-1076）
- (3) 《明史》谓之乌鬼，今沿其称呼，西洋为鬼子。然白夷与黑夷各产各地，相去数万里，……。今谓黑奴为乌鬼可也，并谓白夷为白鬼则大不可。（1851）
- (4) 自亚齐大山绕过东南，为万古屢尽处，与葛刺巴隔洋对峙。红毛回大西洋者，必从此洋出，然后向西南过乌鬼甲，绕西至大西洋。（572）
- (5) 土番面黑，颇工技艺。（1050）
- (6) 土番有数种，……。女番差卑小，略似欧罗巴，惟眼黑而光，较有神。（1072）
- (7) 土番面黑厚唇，扑鲁好斗，……。番妇容貌在黑人中为最端好。（1107）

“夷”和“夏”在历史上是对立的表述，这种表述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心，体现了一种民族优越感。但是，这种态度到晚清变成了一种种族偏见，并演变为对外族的恐惧和防范心理。以“夷”字作为语素可以生成大量对应的词汇，比如英夷、米利坚夷、夷务、西夷等，这样“夷”就蕴含着一种价值判断，作为一个具有否定价值色彩的词汇，可以用来刻画叙述对象的野蛮性，所以说《海国图志》仍然没有完全脱离华夏中心主义的窠臼。

《海国图志》在地理术语译名的规范方面仍存在许多“一名多译”的现象。“一名多译”违反了术语的单义性原则，因为在一个学科领域内，“一个术语只表述一个概念，同一个概念

只用一个术语来表达”, 以免产生歧义, 因此在审定术语时, 为了保证术语的单义性, “一个概念应确定一个与之对应的规范的中文术语”(冯志伟 54-55)。由于《海国图志》编译的资料来源庞杂, 且译者众多, 所以“一名多译”现象比比皆是, 比如国名的译名:

表 1

英文	《海国图志》译名	今译名
Sweden	瑞国、倭沙兰、瑞西国、苏益萨国、瑞子、束色楞、苏益萨、瑞西亚	瑞典
Turkey	土鲁机、都鲁机、土耳其、都律机、土耳其、土耳其亚、土耳其、土尔几	土耳其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英吉利国、英吉利、英伦、兰顿、英圭黎、鹰吃黎、英伦的、谏厄利、及列的、英机黎、兰顿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国)
Prussia	普鲁社国、破路斯国、陂鲁斯国、布鲁西国、波路西亚国、波路斯、单鹰	普鲁士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理哥合众省国、弥利坚、亚墨利加、美理哥、美理格、美理驾、花旗国、育乃士跌国	美利坚合众国(美国)

这些国名的翻译可以说是《海国图志》编译水平的一个缩影, 以现代学术眼光来看, 《海国图志》的编译显得非常粗浅, 其学术水准与西方近代地理学仍相距甚远。但是, 任何作品都无法超越其历史语境, 正因为其历史局限性, 我们才能理解当时中西学术交流之艰难, 以及魏源在中国近代地理学转型中“创榛劈莽, 前驱先路”的艰难。

近代中国创古今未有之变局, 西学东渐改变了人们的知识结构, 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这种改变是通过概念的变迁来实现的, 而在概念变迁过程中翻译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概念的载体, 译名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思想观念, 其演进也反映了思想观念的演进和发展。《海国图志》的编撰是为了“以夷攻夷, 以夷款夷”而作(魏源 2), 这种“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湖湘学术精神在其地理术语译名中也有所体现。《海国图志》的地理术语译名注重术语翻译的专业性、系统性和能产性, 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术语翻译的系统经济律, 从而通过译介西方近代地理学推动中国传统地理学向近代转型, 为非体制化的近代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尽管《海国图志》的地理术语译名仍然没有完全脱离“华夷之别”“华夷之防”的历史局限性, 但是魏源这种“创榛劈莽, 前驱先路”的学术精神仍值得我们当今的译者学习, 通过翻译推进学科发展和学术进步。

注释 [Notes]

- [1] 参见荒川清秀:《近代日中学术用语的形成与传播:以地理学用语为核心》。东京:白帝社出版社,1997年;谷口知子:《〈海国图志·四洲志〉翻译新概念:基于与原文比较》,载《或问》2008年第14期,第81-97页。
- [2] 参见冯天瑜:《新语探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沈国威:《前后期汉译西书译词的传承与发展》,载《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2期;赵爱:《近代科技名词内部演变的“五性”》,载《中国科技术语》2013年第1期。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Feng, Tianyu.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rigin of New Terms*.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4. [冯天瑜:《新语探源》。北京:中华书局, 2004。]
- Feng, Zhiwei. "Terminology."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of Terminology*, edited by Xiangqing Wei, et al., Nanking UP, 2012, pp. 51-63. [冯志伟:《术语》, 载魏向清等编《术语翻译研究导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第51-63页。]
- Gu, Changsheng. *Christian Missionaries and Modern China*.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1981.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 Huang, Xingtao. "The Significance of Researches on New Terms in Modern China." *Opening Times*, no. 2, 1992, pp. 70-82. [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 载《开放时代》1999年第2期, 第70-82页。]
- Li, Gui. *A New Account of Traveling Around the Earth (4)*. Yuelu Publishing, 1985.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第4卷)。长沙:岳麓书社, 1985。]
- Liang, Qichao. "A History of China's Academics During the Latest Three Hundred Years." *Liangqichao's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Academics in the Qing Dynasty*, edited by Weizheng Zhu, Fudan UP, 1985, pp. 91-52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载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第91-522页。]
- Lin, Zexu. "A Report of Punishments on Foreign Ships' Invasion into Bordering Oceans." *Lin Zexu's Political Essays*, 1885. [林则徐:《附奏东西各洋越窜夷船严行惩办片》, 载《林文忠公政书》, 1885。]
- Ma, Zuyi. *A Seri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Hubei Education, 1999. [马祖毅:《中国翻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 Murray, Hugh. *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London: Longman, 1834.
- Shen, Guowei.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ng Western Terms into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no. 2, 2009, pp. 247-76. [沈国威:《前后期汉译西书译词的传承与发展》, 载《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2期, 第247-76页。]
- Wang, Guowei. "On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Terms."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of Terminology*, edited by Xiangqing Wei, et al., Nanking UP, 2012, pp. 51-63.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 载魏向清等编《术语翻译研究导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第51-63页。]
- Wei, Yuan. *Haiguotuzhi*. Yuelu Publishing, 2011. [魏源:《海国图志》。长沙:岳麓书社, 2011。]
- Xu, Jiyu. *An Account of the World*. Shanghai Bookstore, 2001. [徐继畲:《瀛寰志略》, 上海:上海书店, 2001。]
- Zhao, Ai. "On Five Features of Internal Evolution in Modern Technical Terms." *China Terminology*, no. 1, 2013, pp. 16-20. [赵爰:《近代科技名词内部演变的“五性”》, 载《中国科技术语》2013年第1期, 第16-20页。]
- Zou, Zhenhuan. *Western Geography in Late Qing China*. Shanghai Ancient Books, 2000.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马纳克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观照下的翻译现象剖析 ——以徐光启、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为例

◎ 辛红娟 费周瑛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细读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关于“场域”“惯习”和“资本”的阐述, 依托《几何原本》译介个案, 展开对翻译过程中译者与其他参与者(参与集团)之间相互关系与作用的深度分析。文章立足描述翻译学, 深入剖析明末清初这一典型中外译者合作模式, 试图从更接近于翻译本质属性的角度揭示翻译与社会、翻译与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关键词: 皮埃尔·布迪厄 场域 惯习 资本 《几何原本》

基金项目: 浙江省高等学校“钱江学者”特聘教授资助项目(浙教高科[2018]51号)

作者单位: 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Title: Rethinking Translation from a Bourdieusia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Euclid's Elements of Geometry* Translated by Xu Guangqi and Matteo Ricci

Abstract: Taking “field”, “habitus” and “capital” in Bourdieusian theory as its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 this paper offers a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review of the translation of *Euclid's Elements of Geometry* by Xu Guangqi and Matteo Ricci. On analyzing the translators in the framework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of sociological context, this paper makes efforts to throw some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light on revealing the connection of translation, subjectivity, society as well as culture.

Keywords: Pierre Bourdieu, field, habitus, capital, *Euclid's Elements of Geometry*

Author: Hongjuan Xin, Professor,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China; Zhouying Fei,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China.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不远万里来华传教，揭开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在17世纪这场以西学东渐为中心的学术运动中，欧洲传教士与中国儒士合作对西方数学、伦理学、哲学、农学、物理学、逻辑学等著述和中国儒学经典进行互译互释，推动中西方文化的相互借鉴与彼此交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与中国学者徐光启合作翻译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所著之《几何原本》是为典型译事，对中国近代科技史乃至思想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翻译活动不是孤立的，它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许钧、穆雷 17）。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也曾指出：“研究翻译的卓有成效的方法究其本质只能是从社会、历史角度去研究。研究的重中之重不是在纸上字词的对应，而是为何字词以这种方式对应，是由于何种社会、文学、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使得译者如此去译？译者如此去译是想达到何种目的？如何判断他们已经达到或没有达到目的？”（*Translation / History / Culture* 47）因此，本文拟借助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关于“场域”“惯习”和“资本”的阐述，结合《几何原本》译介个案，展开对这一典型翻译事件的深度剖析，试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

一、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20世纪6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打破诸多领域的学科界限，从跨学科的角度对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政治学等展开深入研究，构建一系列独到的思想范畴，“在法国和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掀起一阵阵争论浪潮，推动着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变革，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李红满 6）。

20世纪70年代，霍姆斯（James Holmes）分析指出，可以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关注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哪些文本被翻译过来了（往往同样重要的是：哪些没被翻译过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72）。当时，语言学派翻译学研究仍大行其道，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社会学研究直到90年代才得到较为广泛的接受，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通过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来分析与探讨翻译现象。勒菲弗尔撰写了《翻译实践和文化资本的流通》（“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援用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探讨维吉尔叙事诗《埃涅伊德》（“Aeneid”）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41-56）；多伦多约克大学翻译学院教授斯密奥尼（Daniel Simeoni）借鉴布迪厄的“惯习”概念，探讨译者的独特“习性”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1-39）；加拿大蒙特利尔协和大学法语系教授古安维克（Jean-Marc Gouanvic）1999年出版《翻译的社会学——20世纪50年代法国文化空间的美国科幻小说》（*Sociologie de la Traduction: La Science-Fiction Américaine dans l'espace Culturel Français des Années 1950*），选取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尝试用全新的翻译社会观阐释美国科幻小说在法国文化空间的流行与传播，进而倡导建立一种翻译的“全球地缘政治学”（俞佳乐 226-33）。

中国翻译学界敏锐地捕捉到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意识到翻译研究与社会学研究的契合，开始从社会文化视角开展译事检讨，重读翻译历史。台湾社会学研究学者王志弘首先从社会学角度开展翻译的文化政治与品管问题探讨（《翻译的文化政治与品管问题》128-36）；次年，王志弘基于1949-2000年间台湾社会学类译作，展开翻译的社会学分析，明确指出，“翻译是文化政治的场域”（《学术翻译的文化政治》1-50）；依循这一“翻译社会学”取向，他将翻译纳入社会关系网络进行考察，分析其中的社会权力运作关系（《翻译的自我与他者问题》1-25）。之后，大陆翻译学人也开始关注布迪厄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或从布迪厄文化资本的视角展开对话语权力的分析，或借鉴布迪厄“科学场”概念对翻译学科前景进行展望。一些有着高度前瞻性和文化意识的学者，则结合中国文学、文化特质，展开中国学术语境中的翻译社会学理论建构。如许钧在论述翻译的本质特征时明确肯定翻译的社会性（《翻译论》169），也有学者立足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框架，分析其理论核心概念，积极回应国际翻译学界构建翻译社会学/社会翻译学、实现翻译研究的社会转向的努力（李红满 6-9；邢杰 10-15；武光军 77-84；王洪涛，《翻译学的学科建构与文化转向》250-57，273-81；《建构“社会翻译学”》14-18；王悦晨 5-13）。

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翻译社会学研究成果，本文重新解读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这一典型的中西学者合作翻译事件。文章阐释《几何原本》翻译过程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术语——场域、资本和惯习，以期揭示当时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翻译活动参与者在特定环境影响下形成的特定行为范式，进而分析参与者的行为中体现出来的规律和倾向，“这种规律和倾向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塑造历史的途径”（王悦晨 8）。本文力图还原《几何原本》翻译活动的历史全貌，借鉴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阐发发明末清初的“翻译场域”、《几何原本》翻译作为“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在中国的流通，以及科技翻译的“符号权力”等问题。

二、《几何原本》构建翻译场域

“场域”不仅是布迪厄实践社会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布迪厄从事社会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为系统阐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布迪厄采用同时考虑社会客观结构和个人的方法，提出“场域”（“场”）的概念，认为“从场的角度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思考。从场的角度思考，就意味着要对有关社会世界的整个日常见解进行转换，这种见解总是只注意有形的事物”（包亚明 141）。“一个场也许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社会的和谐统一体（*comos*）是由一些相对自主的社会的微观世界（*microcosm*）组成的，社会的微观世界就是客观关系的空间，是逻辑和必然性的场所，这一逻辑和必然性对于那些控制其他场的东西来说是特殊的、不可简约的（142-43）。在布迪厄看来，这些“社会的微观世界”就是各种不同的“场域”，如经济场域、政治场域、

艺术场域、学术场域等；社会作为一个“大场域”继而又由众多互相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子场域”（sub-field）构成。布迪厄对“子场域”和社会“大场域”进行分析，强调指出，“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不是个体，尽管如果不通过个体人们就无法构筑场，而且统计分析所必须的信息一般也都是与个体或制度联系在一起。然而，场才是最重要的，它必须是研究活动的中心”（包亚明 152）。

借助“场域”这一社会学概念能够为翻译研究者提供一个社会学的视角与方法，解读翻译活动中的关系与规则。翻译学可以借助有关“场域”的研究成果，展开对一度被学术界忽略的翻译社会文化语境的再解读，分析翻译活动背后的种种关系与规则。将“场域”概念放之明末清初的时代大背景下，《几何原本》翻译于是可以视为明末清初之际科技翻译“大场域”中的一个“子场域”，既受科技翻译“大场域”的影响，也能够反过来影响并丰富科技翻译“大场域”。

明末清初的翻译实践主要集中于对自然科学成果的引入，特殊的时代背景在宏观上为《几何原本》翻译子场域的形成提供了外部条件。此时的西方在科技领域取得了极大进步，而中国由于长期闭关锁国，科技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西方先进的科技思想和精密的科学仪器引起国人极大的兴趣。这一时期的翻译主体，包括了对科学感兴趣的中国士大夫和众多西方来华传教士，其中尤以徐光启与利玛窦的合作为典型。当时，欧洲国家不断扩张海上霸权，天主教会传教活动日频，中西文明产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接触、碰撞。作为西方文化部分代表的天主教会在中国上层知识分子中产生重大影响，通过这次文化接触，不少知识分子皈依天主教。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早期来华传教士采取“援儒释耶”的传教方式，即后世熟知的“利玛窦规矩”，为传教士及西方科学在中国赢得了生存的空间和条件。当时的中国皇帝对欧洲传教士大多比较宽容友好，使得传教士能够在中国立足并做出成绩，堪称接纳西方科技著作的“权力场域”。

早期传教士投士大夫阶层所好，利用优越的西方科学技术作为进入上层社会的敲门砖，用知识与科技为传教开道，使得传教活动呈现出“学术传教”的鲜明特征。与之相应的是，在社会政治与学术思想领域，传教士所带来的不是宗教神学的影响，而是以科学技术为主的西学影响（王玉松 90）。不少中国士大夫为传教士热情提供汉语学习上的帮助。徐宗泽在《中国天主教史概论》中指出：“徐阁老（光启）对于教士学习语言问题帮助甚多，为教士聘请有名教授。其中一人，谢绝事务，专业神业，竟习辣丁（拉丁语）以便能有助于教士。”（转引自马祖毅 340）中国各领域开明知识分子的帮助构成的良好“周边场域”，与“权力场域”携手，推动了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的科学传教活动。

传教活动的深入，极大推动了科技文献的翻译，构建成了科技翻译的大场域，培养出国人的科学惯习，完成各类原初资本的积累。科技文献传入中国后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调适与重新建构，形成了更加宏大的科技场域、更加复杂的惯习和更加丰富的资本。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场域中，*Euclid's Elements of Geometry* 的中文译本《几何原本》适时而出。

Euclid's Elements of Geometry 是希腊古典时期数学成就的总结性著作，其价值远远超出了几何学本身，被视为人类历史上古典科学理论的教科书。其近代意义不单单是数学方面的，更主要是思想方法方面的。徐光启盛赞此书，认为：“此书为益，能令学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几何原本杂议》76）徐光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贯通和对西方科学知识的热望，为翻译 *Euclid's Elements of Geometry* 提供了充足的条件。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文化责任与中国开明士大夫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热望共同促成了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 *Euclid's Elements of Geometry*，形成文本翻译的子场域。两位不同国籍的译者翻译的动因不同，拥有的文化资本迥异，遂成为《几何原本》翻译子场域的一个显著特点，形成该子场域“独特的规则”。

三、《几何原本》彰显译者“惯习”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强调分析参与者的惯习，因为惯习是对场域规则的内化，翻译场域规则必定会对译者行为有所影响乃至钳制。布迪厄指出，惯习这个概念首先指明了一种姿态，即一种以特殊的逻辑建构和理解实践的明确态度，惯习的建构原则存在于社会性构成的、被构造了的和构造中的性情体系之中，这些性情是在实践中获得的，并不断地发挥实践性的作用（包亚明 168）。为了避免使用“习惯”概念，布迪厄选择性地使用“惯习”一词进行替代，他想要说明的不仅仅是“习惯”一词所指涉的重复性、机械性、被动性，以及某种再生产性，而是希望也能够表达某种被大多数社会学家所忽略并存在于性情倾向体系中的作为一种技艺（art）的生成能力。在布迪厄看来，“惯习”具有生成性的能力，“这种能力是被作为一种艺术铭写在性情系统之中的，铭写在最强有力的对实践的掌握之中的”（169）。

朱伟珏指出，

对于布迪厄而言惯习就如同历史的年轮一样深深印刻在行动者的身上。它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年轮内侧的惯习又对此后惯习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惯习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而且，惯习本身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历史感成为对主观主义强调“实践的持续性”、而对客观主义则强调惯习的“无限能力”的一个依据。（177）

邢杰通过语汇溯源，分析指出，在布迪厄看来，惯习“构成了人的实践行为的核心，它处于客观环境、历史、人的心理倾向三者互动关系的中央，从而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使我们能够全面地看待人类行为”（11）。

具体到翻译领域，译者惯习是其在翻译和其他各种场域之中养成的思维习惯和行为倾向。

对于《几何原本》翻译子场域而言,其译文之美,用词之精确,无不彰显着中国语言文化的惯习。梁启超曾评价:“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的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8)利玛窦的西学译著极少有对原文逐句逐段不增不减的全译,更主要采用节译、编译或译写等方法,试图通过删减、增补和改写等手段让译文尽可能呼应儒家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使他们在两种文化具有共通性和互补性的认识基础上接受西方科学文化。利氏译著大受中国知识阶层欢迎,开创了西方科学知识与中国传统文化接触交融的新局面,并相应地促进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在中国翻译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梅晓娟、周晓光 28-29)。

“译者的惯习不仅影响其翻译策略、措辞等微观层面,还在宏观方面影响其对文本的选择”(王悦晨 12)。1897年,梁启超指出:“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论译书》74)“梁氏所言‘择当译之本’,指的便是译者的选材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作品加以介绍和翻译,是翻译过程中最原初、最根本的选择。在历史大变革时期,较之‘怎么译’,‘译什么’更成为译事的头等要义”(许钧,《论翻译之选择》63)。《几何原本》之所以成为明清之际急需翻译的文本,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冲击等因素密切相关。

徐光启凭借深厚的科学素养,选择翻译*Euclid's Elements of Geometry*绝非偶然,该书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形式,由公理、公设、定义出发,把古代的几何学知识整理为一个完备的体系,被诸多学者看成是世界近代科学产生、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Euclid's Elements of Geometry*的重要意义不仅在数学、逻辑学等方面,这一学术思想的引进甚至可以兴国强种。对西方传教士而言,

科学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他们的目的自然是利用西方科学的成功,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这种新科学可能是正确的,但对于传教士们来说,重要的是它发源于基督教国家。这里有个暗含的逻辑,就是只有基督教才能发展出这样的科学。因此,每一次正确的交食预报都被用来间接证明基督教神学是唯一的真理。(李约瑟 673)

这种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出于截然不同的目的达成的翻译合作,蕴含着中西文明惯习的博弈与协商。

待译文本确定后,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译者翻译惯习的影响。“作为沟通两种文化的媒介,译者同时面临着出发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译者至少可以采取三种文化立场:一是站在出发语文化的立场上,二是站在目的语文化的立场上,三是站在沟通出发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立场上”(许钧,《论翻译之选择》66)。沈定平指出,最能反映徐光启会通思想灿烂光辉的就是其汇合中西文化的气魄和雄心(617-18)。徐光启在《历书总目表》中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374)徐光启

极其重视翻译的“会通”属性，在他看来“会通”中西是文明交流的第一步，是实现民族升腾的必要手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超胜”西学的目的。这种“会通以求超胜”的翻译观，反映在现代翻译策略上，实质就是以目的语文化为中心的归化法。“会通”的真正目的是“超胜”，充分展示出一种不仅远超中国古代，而且必将超越西方的愿望和信心。

邢杰认为，作为社会个体的参与者，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选择，而促成这种外在行为的那种内在的力量，即布迪厄所言“惯习”，体现了“认知”与“社会”视角的二维融合，同时也具备适应环境、反复构建的能力，即与环境发生互动（11-12）。随着外部条件、社会结构和个人在某种特定文化空间中地位的升降，“惯习”会不断对自身进行调适，以促成行为为主体的实践行为与其既定目标相契合。在同一翻译场域中，利玛窦为适应中国国情，通过学术传教译介西学，充分考虑译语读者的语言文化接受能力，顺应译语读者的内在需求和文化传统。利玛窦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顺应，体现在宏观翻译策略的制定上。利玛窦在《几何原本》翻译场域中对自身惯习不断调适，最终构建成其独有的翻译惯习。为达到向中国民众宣传教义的目的，利玛窦有意识地调整其作为外来者的语言惯习，诚如他在《译几何原本引》文中所言：“反覆展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反复订政，凡三易稿。”（302）

《几何原本》等一系列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不仅为推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也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梁启超评价说：“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论译书》8）两位译者的语言惯习、文化惯习等，以及他们作为参与者在翻译场域中所拥有的象征资本，对 *Euclid's Elements of Geometry* 汉译本在中国的接受和中国科学翻译场域的构建有着积极作用。

四、《几何原本》承载中西“文化资本”

王悦晨认为，为研究作为整体的翻译场域所具有的规则，需要联系翻译场域中的资本来进行探讨，也就是探讨参与者的资本问题，因为资本与参与者在场域之中的地位有着密切的联系（10）。在布迪厄看来：“社会世界是一部积累的历史，如果我们不把它简化成行动者之间瞬间机械平衡的不连续系列，如果我们不把行动者仅仅看成可以互换的粒子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把资本的概念和伴随这一概念的积累物及其全部效应重新引入社会世界。”因为，“资本是一种铭写在客体或主体结构中的力量，它也是一条强调社会世界的内在规律性的原则”（包亚明 189）。资本之为资本，使得一切事物并不都具有同样的可能性或者同样的不可能性。唯有引入“资本”的概念，才能够更加清楚地透视历史上千变万化的翻译实践活动，揭示每一次翻译高潮所含蕴的不同规律与特质。

“文化资本”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尽管无法像对待经济资本那样对其进行量化操作，但在日常生活中，它却发挥着与金钱和经济资本相同的作用。“文

化资本”并非实体性概念，而是一个表示文化及文化产物究竟能够发挥哪些作用的功能性概念。鉴于“文化资本”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功能性分析概念，为研究之便，布迪厄将其划分成身体化形态、客观形态及制度形态三种基本形式（包亚明 244）。本文借助“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探讨徐光启与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时的译者个人文化资本（身体化形态）和社会文化资本（客观形态及制度形态）。

“在利氏来华前不久，……启蒙思潮对旧伦理的批判，对新道德的渴望，为中国知识界接受西方伦理哲学和基督教伦理作了有利的铺垫”（郭熹微 28）。当时关心国运、倡导“实学”救国的人不在少数，徐光启堪称进步知识分子的中坚力量，他“少尝感愤倭奴蹂践，梓里丘墟，因而诵读之暇，稍习兵家言，时时窃念国势衰弱，寸倍宋季，每为人言富强之术……二十年来，逢人开说”（《几何原本杂议》454）。1596年，徐光启遇到传教士郭居静（L'fizaro Catfino），第一次见到世界地图，听说麦哲伦，知道天文望远镜可以观测天上星体的运行，自此决意广泛接触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徐光启所积累的文化资本转化为与利玛窦结识的前提条件，也为其之后学习西方科技提供了条件。

进入中国前，出身贵族家庭的利玛窦学识已遍及神学、哲学、数学、历史、天文学，以及钟表、机械、印刷等实用手工艺领域。广博的知识使他具有了其他传教士无可企及的优势。1582年，利玛窦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初到中国，他效仿佛家僧侣削发剃须，穿僧服，将教堂题名为“仙花寺”，中堂题“西来净土”。但利玛窦渐渐发现，僧侣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中国社会最受人尊敬的是儒士。儒士不但有学问，而且可以通过科举成为朝廷命官，成为社会上层。利玛窦于是脱掉僧袍改着儒服，积极与中国儒士交往，向儒士讲解其在罗马初修院所学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以及语言、逻辑等知识，展示带来的各种天文仪器、机械物品，这些“奇谈”和“奇物”使儒士们大开眼界。

利玛窦的文化资本积累与文化策略调适为其进入《几何原本》翻译场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1598年，利玛窦到南京后交友中最重要一人就是后来的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徐光启对其所讲“格物穷理之学”极为赞赏。作为有识见的士大夫，徐光启深刻认识到理学“清谈心性”之流弊，明王朝的强盛必须“经世致用”之实则。他向利玛窦请教天文历法、数学、测量等西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与其合作翻译数学巨著*Euclid's Elements of Geometry*前6卷，1607年译完并印刷，对中国后世的数学、科学发展影响深远。疏仁华、周晓光说，利玛窦来华经历了两次“易服”：教士服易僧服；僧服易儒服。其形象经历了从修道士到西僧、从西僧到西儒的两次转换（134）。两次“易服”从适错到适应，反映出利氏结合目标语文化现实对自身文化资本的调适，其文化策略的不断调整也从侧面折射出异质文化交融的过程。

徐光启曾言：

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已与此异。因

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于人。”若此书者，又非止金针度与而已，直是教人开矿冶铁，抽线造针，又是叫人植桑饲蚕，练丝染缕，直是等闲细事。然则何故不与绣出鸳鸯？……其要欲使人人真能自绣鸳鸯也。（《几何原本杂议》77）

由此可知，徐氏选择《几何原本》是其肩负的文化责任感的外化，站在社会学的高度对这一中西文明交流盛事的文化再审视，有助于全面揭示该书对中国近代学术的重大影响。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为考察翻译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借助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场域”“惯习”“资本”等关键词，深入分析《几何原本》翻译活动中译者和其他参与者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显示，翻译从来就不是孤立进行的活动，翻译的各种属性中必然包含社会属性，不论是翻译场域、译者拥有的各种文化资本，抑或是译者惯习，都与各种相关或相邻场域有着密切联系，这种社会学上的联系决定了翻译的社会学属性。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Bao, Yaming. *Cultural Capital and Social Alchemy: An Interview with Bourdieu*.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1997. [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Bourdieu, Pierre. "The Forms of Capital."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J. G. Richardson, Greenwood, 1986, pp. 241-58.
- Guo, Xiwei. "A Discussion about the Missionary Method of Matteo Ricci."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no. 1, 1995, pp. 24-35. [郭熹微:《试论利玛窦的传教方式》,载《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第24-35页。]
- Holmes, James 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dited by James S. Holmes, Rodopi, 1988 / 1972, pp. 67-80.
- Lefevre, André. *Translation / History / Culture: A Source Book*. Routledge, 1992.
- .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edited by Susan Bassnett and André Lefevre,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8, pp. 41-56.
- Li, Hongman. "Bourdieu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al Sociology."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5, 2007, pp. 6-9. [李红满:《布迪厄与翻译社会学的理论建构》,载《中国翻译》2007年第5期,第6-9页。]
- Liang, Qichao. *Academical History of China of the Last Three Hundred Years*. Chung Hwa Book, 1958.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湾:台湾中华书局,1958。]
- . *On the Translation of Books (The Collected Works from the Ice-Drinker's Studio Volume 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9. [梁启超:《论译书(饮冰室文集之一)》。上海:中华书局,1989。]
- Ma, Zuyi.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Hubei Education, 2006. [马祖毅:《中国翻译通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 Mei, Xiaojuan, and Xiaoguang Zhou. "Matteo Ricci's Selection of Source Texts and Strategies in His Transl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A Perspective from the 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2, 2008, pp. 26-29. [梅晓娟、周晓光:《选择、顺应、翻译——从语言顺应论角度看利玛窦西学译著的选材与翻译策略》,载《中国翻译》2008年第2期,第26-29页。]
- Needham, Joseph.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4)*. Translated by the Translation Team of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Science, 1975.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组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
- Ricci, Matteo. "Preface of *Euclid's Elements*." *Collection of Chinese Works by Matteo Ricci*, edited by Weizheng Zhu, Fudan UP, 2001, pp. 298-302. [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载朱维铮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298-302页。]

- Simeoni, Daniel. "The Pivotal Status of the Translator's Habitus." *Target*, vol. 10, no. 1, 1998, pp. 1-39.
- Shen, Dingping.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ing Dynasty: Adjustment and Communication (revised edition)*.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7. [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Shu, Renhua, and Xiaoguang Zhou. "On Matteo Ricci's Cultural Accommodation Strategy." *Academic*, no. 5, 2010, pp. 134-40. [疏仁华、周晓光:《论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策略》,载《学术界》2010年第5期,第134-40页。]
- Wang, Hongtao.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Tur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Translation, 2008. [王洪涛:《翻译学的学科建构与文化转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 .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a Discipline under Constructio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1, 2011, pp. 14-18. [王洪涛:《建构“社会翻译学”:名与实的辨析》,载《中国翻译》2011年第1期,第14-18页。]
- Wang, Yusong. "Causal Analysis of Some Chinese People's Convert to Catholicism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Journal of Qiqihar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1, 2011, pp. 90-92. [王玉松:《明末清初部分华人皈依天主教原因分析》,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90-92页。]
- Wang, Yuechen. "English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Translation through a Bourdieusian Sociological Len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1, 2011, pp. 5-13. [王悦晨:《从社会学角度看翻译现象: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关键词解读》,载《中国翻译》2011年第1期,第5-13页。]
- Wang, Chih-hung. "Cultural Politics and Quality Control Issues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Studies in Taiwan*, edited by Guangxing Chen, Ju Liu Publishing of Tai Pei, 2000, pp.128-36. [王志弘:《翻译的文化政治与品管问题》,载陈光兴编《文化研究在台湾》(台北:巨流出版公司,2000),第128-36页。]
- . "The Problematic of Self-other Relationships in Translation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ollec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o. 6, 2001, pp. 1-25. [王志弘:《翻译的自我与他者问题》,载《翻译学研究集刊》2001年第6辑,第1-25页。]
- . "Cultural Politics of Academic Translation: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aiwanese Sociology Translation from 1949 to 2000." *Journal of Shih Hsin University*, no. 11, 2001, pp. 1-50. [王志弘:《学术翻译的文化政治:1949—2000台湾社会学类译作初探》,载《世新大学学报》2001年第11期,第1-50页。]
- Wu, Guangjun. "The Status Quo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1, 2008, pp. 75-82. [武光军:《翻译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载《外国语》2008年第1期,第75-82页。]
- Xing, Jie. "Translators' 'Habitus': A New Perspective 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5, 2007, pp. 10-15. [邢杰:《译者“思维习惯”——描述翻译学研究新视角》,载《中国翻译》2007年第5期,第10-15页。]
- Xu, Guangqi. "Governance Draft 2-Almanac." *Collected Works of Xu Guangqi (Vol. 2)*, annotated and proofread by Chongmin Wa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3, pp. 371-431. [徐光启:《治历疏稿二·历书总目表》,载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第371-431页。]
- . "Discussion on Euclid's Elements." *Collected Works of Xu Guangqi*, annotated and proofread by Chongmin Wang. Shanghai Classics, 1984, p. 76. [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载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76页。]
- Xu, Jun. "The Choice in Translation."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1, 2002, pp. 62-69. [许钧:《论翻译之选择》,载《外国语》2002年第1期,第62-69页。]
- . *On Translation*. Hubei Education, 2003. [许钧:《翻译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 Xu, Jun, and Lei Mu.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1949-2009)*,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9. [许钧、穆雷:《中国翻译研究(1949—2009)》,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 Yu, Jiale. *Social Studies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Translation, 2006. [俞佳乐:《翻译的社会性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Zhu, Weiyu. "Transcending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Bourdieu's Sociological Epistemology and His Concept of 'Habitus'."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no. 3, 2005, pp. 174-78. [朱伟珏:《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布迪厄的社会学认识论与他的“惯习”概念》,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3期,第174-78页。]

寻根小说文化特色词英译过程研究

——以蓝诗玲版《马桥词典》英译本为例

◎ 卢晓娟 岳霞

内容提要: 本文以长篇寻根小说《马桥词典》及其英译本为例,探讨生态、物质、社会、宗教和语言五种类别文化特色词英译之过程,验证乔治·斯坦纳阐释学翻译过程理论对寻根小说文化特色词翻译的指导价值。研究发现:斯坦纳提出的翻译四步骤对寻根文学《马桥词典》中五类文化特色词的英译过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对寻根文学的文化特色词英译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通过直译加注、直译加音译、直译加意译、意译加音译等“补偿”方式,可以最大限度还原源语的语言和文化信息,甚至是得到源语所没有表现出来的价值。

关键词: 阐释学 翻译四步骤 寻根小说 《马桥词典》 文化特色词 蓝诗玲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8) 04-0089-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国汉学家蓝诗玲翻译风格研究”(16BY028)

作者单位: 大连外国语学院高级翻译学院,辽宁 大连,116044;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116044

Title: Studies on the Translating Procedures of Culture-Specific Words in Root-Seeking Novels: Exemplified by Julia Lovell's Translation of *A Dictionary of Maqiao*

Abstract: Exemplified by the root-seeking novel *A Dictionary of Maqiao* and its English vers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translating procedures of five types of culture-specific words, namely ecological, material, social,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culture-specific words. It tries to prove that George Steiner's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motion theory plays a guiding role in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specific words in root-seeking novel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procedure of translation of five types of culture-specific words in *A Dictionary of Maqiao* as a root-seeking novel can be well explained by Steiner's fourfold translation motion, which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specific words in root-seeking novels; additional explanations such as literal translation with notes, literal translation with transliteration, literal translation with free translation, free translation with transliteration can preserve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of source language to the greatest extent and even show more than it.

Keywords: Hermeneutics, fourfold translation motion, root-seeking novels, *A Dictionary of Maqiao*, culture-specific words

Author: Xiaojuan Lu, School of Advanced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Liaoning, China; Xia Yue,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Liaoning, China.

1985年4月,韩少功先生发表《文学的“根”》一文,首次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被认为是寻根主张的“首发式”,反响巨大。他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韩少功作品精选》368)。他用实践来呼应自己的主张,《马桥词典》就是一部根植于巫楚文化的寻根文学代表作,作品中包含大量具有马桥地方特色的文化特色词(culture-specific word)。翻译理论家奈达(E. A. Nida)曾将翻译中涉及到的文化系统分为五个范畴,分别为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91)。笔者基于奈达的分类,将这些文化特色词划分为生态文化特色词、物质文化特色词、社会文化特色词、宗教文化特色词和语言文化特色词五类。

1975年,阐释学的代表人物斯坦纳(George Steiner)基于哲学阐释学,提出了翻译四步骤,即信任(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mport)和补偿(compensation)(《文学翻译理论研究》312)。阐释学是解释的艺术,“虽然阐释不一定非经过翻译,不过翻译却不可避免地会借助阐释。翻译者是原著的读者、阐释者,而且还是至关重要的阐释者”(袁洪庚36),将阐释学理论运用于翻译具有不容小觑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翻译不仅是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而且还是文化的推介。文化特色词是文化在词汇层面的一种反映形式,只有深入理解源语文化才能翻译。可见,将阐释学理论和文化特色词的翻译研究相结合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因此,笔者以寻根文学文本《马桥词典》中的五类文化特色词为研究对象,尝试验证寻根文学英译过程是否符合斯坦纳提出的四个翻译步骤,以期证明阐释学理论在寻根文学作品英译过程中的指导价值。

一、斯坦纳阐释学翻译四步骤理论研究现状

阐释学又称为释义学、解释学或诠释学。其英文表达Hermeneutics在词源学上来自希腊语Hermeneutick,意思是“了解”和“阐明”。这是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如冯友兰先生所言,翻译就是一种解释和评注,同“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的说法不谋而合(228)。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语词所进行的解释过程”(伽达默尔12)。翻译是一个动态的阐释过程。

1975年,斯坦纳在《通天塔之后——语言和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一书中将阐释的运作划分为四个步骤:信任—侵入—吸收—补偿。“信任”表示相信所要翻译的作品言之有物,是值得翻译的;“侵入”(或“进攻”)表示译者把意思俘虏过来,满载而归;“吸收”(或“吸纳”)表示把“俘虏”的东西不同程度的加以吸收;译者由于“信任”而倾向于原作,导致失去平衡,接着包围、进攻,直至满载而归时,再一次失去平衡,因此翻译最后需要提供“补偿”,恢复平衡(斯坦纳69-70)。四个步骤环环相扣,层层递进。

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斯坦纳阐释学翻译四步骤的热度大幅下降,具有影响力的相关研究寥寥无几且都集中在国内,如黄海瑛、刘畅、卢晓娟和郭黎阳等。黄海瑛在其博士论文中不仅详细论述阐释运作的四个步骤,还基于该理论解读斯坦纳的小说《希特勒的圣克里斯托巴之旅》;刘畅以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理论分析小说《喜福会》的程乃珊版中译本,认为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是选择译本、确定翻译策略,还是阐释原作等都彰显出了译者的主体性;卢晓娟和郭黎阳基于阐释翻译四步骤理论推陈出新,提出了“阐释学视角下汉语叠词英译模型”,并以《呐喊》蓝诗玲版英译本中汉语叠词翻译为语料,阐释汉语叠词的英译过程及策略^[1]。

阐释学对于解开翻译过程之迷、揭示翻译过程本质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对于翻译研究的影响是全面且深刻的。在斯坦纳阐释学翻译四步骤理论研究热度逐年下降的背景下,笔者希望将其与寻根文学英译的结合,深挖该理论在当今寻根文学走出国门潮流中的现实价值。

二、《马桥词典》的寻根性

“寻根”大体包括两种意思,“一是指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精神;二是指中华民族延续至今而又可能断裂的生命根基”(陈晓明 136),或为肯定性价值,或为民族劣根性。寻根文学旨在以文学创作探寻文学乃至中国社会已经久久失去的文化之根(鲁枢元 20)。寻根文学的创作主体们试图寻找一个存在于社会生活深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外的纯粹世界,揭露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萎缩了的中华文化,探索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东西。他们强调区域性特色文化,对富有神话和民间传说的奇异古远地区和文化有着浓厚兴趣(李欧梵 466-67)。正如刘思谦所言,“寻找民族之根实乃寻找民族文化的个性,使当代文学成为文明古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延续和发展更新,并以其鲜明的民族性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49)。在《马桥词典》中,韩少功“大谈人类生存中科学主义与信仰主义的悖论,直言不讳地呼吁技术时代中的人类为信仰主义留下一块地盘,为人类枯燥的生命留下一点朦胧的梦想与温润的诗情”(龚敏律 101)。透过这部寻根小说的扛鼎之作,他“希望中国的写作者做好自己,用好本土资源,形成‘中国风’的美学气质和精神风范,不能满足于‘移植外国样板戏’式的模仿,不能满足于做‘中国的卡夫卡’或‘中国的海明威’”(高方、韩少功 71)。不难看出,韩少功期望寻根的主张能够上升到文学、文化、历史与民族的高度。

《马桥词典》以作者当知青时生活过的湖南省汨罗县天井公社为取材地,以其风土人情为素材,收集了“马桥”当地人的日常用词。书中共计 115 个词条,作者以这些词条为叙述对象,讲述了一个个发生在乡村“马桥”的故事。小说引人入胜,令读者回味无穷。小说通过描绘马桥的真实生活,透视了我们的民族在那个年代为生存而挣扎的真实情状,挖掘了民族苦难的历史根源,同时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不为人知的一面,为人们了解农村提供了又一窗口。

其译者蓝诗玲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毕业于剑桥大学中文系,获现当代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她对汉语语言文化的运用和拿捏堪称大师,她说“她喜欢中国作家的作品,每个

作家的作品都能满足她对文学的不同需求……她愿意通过努力，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和文学的丰富性介绍给英语读者，通过文字背后的故事体验另外一个民族普通人民的生活和情趣”（孙敬鑫 61）。她第一次给韩少功写信，希望能够取得《马桥词典》的翻译权时，韩“既高兴，又担心翻译会十分艰难，或许他认为把这部用汉语写的关于中国南方的一个小地方的语言翻译成英语，简直不可思议”（Han Shaogong, *A Dictionary of Maqiao* 4）。但是作品一经出版，旋即受到国外好评，并于 2011 年获得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译者蓝诗玲功不可没。就读者接受度来衡量，这无疑是一部成功的译作。因此，无论是原著还是译著都具有研究的代表性，是管窥阐释学视角下文化特色词翻译的范本。

三、斯坦纳翻译四步骤与《马桥词典》文化特色词英译之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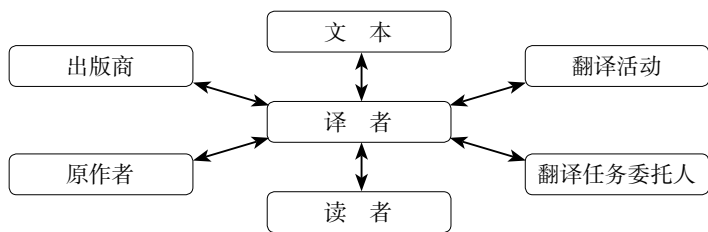
作为翻译理论学家的斯坦纳将阐释学哲学与翻译相结合，提出“理解即翻译”，“翻译的过程就是读者和译者的理解和诠释过程”的观点（Steiner 412）。“翻译者是原著的读者、阐释者，而且还是至关重要的阐释者”（袁洪庚 36）。斯坦纳翻译四步骤，即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在寻根文学《马桥词典》五类文化特色词英译过程中的体现如下图：



▲图 1 《马桥词典》中文化特色词英译过程示意图

（一）信任：相信《马桥词典》文化特色词具有翻译价值

“一切翻译活动，都要从‘信任’开始”（Steiner 312）。因为要翻译一部作品，明了作者的思想还不够，领会到原作艺术上的美妙还不够，要自己走入原作中，和书中人物一同哭一同笑才算彻底咀嚼了原作（茅盾 349）。正如许钧所言：“斯坦纳认为翻译活动的根本任务在于意义的再生。任何一位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中，都有一种先验的信任，相信文本的存在价值，阐释活动始于信任，这在实践上有人类的理解经验为基础，在理论上也为翻译的可行性打开了一条通道。”（38）当然，这里的“信任”不仅是狭义上译者对文本的信任，也包括翻译中其他人对译者的信任。对所进行的翻译活动的意义的信任是多维交织的，“译者需要认可作品和翻译活动的价值，同原作者、出版商、翻译任务委托人和读者各方相互信任”（Chesterman 180），如图 2 所示：



▲图2 翻译活动的多维双向“信任”关系图

2000年，在充分认识到《马桥词典》的文学独特性、语言的特殊性、叙事模式的非传统性后（魏家海、李正林 52），蓝诗玲去信韩少功，表达了想要翻译《马桥词典》的愿望。这正体现了译者蓝诗玲深思熟虑、综合考量的过程，她相信自己将要翻译的文本言之有物，具有文学和翻译的价值。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以‘信任’开始的阐释活动必须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向前走”（许钧 38）。韩少功在同意之余也提醒她，原文中有很多湖南方言，可能会增加翻译的难度，但是蓝诗玲凭借自己扎实的中文水平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克服了方言的障碍，圆满完成了作品。韩少功在采访中谈到，翻译期间，谨慎仔细的蓝诗玲曾跟着他到马桥现场考察了好几天，上山下乡，吃了不少苦头（高方、韩少功 71）。一些中国农具在国外从未有过，他就把这些器物画给蓝诗玲看。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于当代译者翻译古典文学作品，译者和当代作家有许多便捷的条件去合作与交流。韩少功作为原作者兼翻译任务委托人，为译者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参考信息，而这也是建立相互信任的前提。

2003年，《马桥词典》的英译本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译作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不少读者在亚马逊网站上留言，给予蓝诗玲的译本很高的评价，同时也提高了韩少功在西方文学界的知名度。由此可见，翻译始于信任，各方互相信任方可事半功倍。

（二）侵入：挖掘《马桥词典》文化特色词的内涵

译者在分析了原著的可译性后，就进入到翻译四步骤中的第二步，即“侵入”。斯坦纳认为，“从词源学上讲，理解不单涉及认知，而且还有包围、侵吞的意思。在语际翻译中，理解的运作显然是彻底而又富侵略性的。在翻译时，我们破解代码，理解就如解剖——割开外壳，让内核显露”（斯坦纳 313）。“侵入”起因于不同语言文化产生的冲突，因此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特色词最易引起译者的积极入侵，利于目的语读者更好地接受译文。

生态文化是由特定的民族或地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因素构成的具有独立特征的结构和功能的文化体系，它包括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地名等。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和生存地域的不同，造就了各自独特的文化。生态文化特色词则是指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下形成和发展的文化表达形式。《马桥词典》中的生态文化特色词如“马桥弓”，是马桥的全称，“弓”指村寨，“据说原来也叫‘妈桥弓’”（韩少功，《马桥词典》13）。又如

“公地和母田”，“按照马桥人的看法，地与田不同，地是‘公地’，田是‘母田’。在地上下种，必须由女人动手；在田里下种，当然必须由男人动手。这都是保证丰收的重要措施”（韩少功，《马桥词典》116-17）。

物质文化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物质文化特色词包括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生产工具等方面词汇。物质文化特色词如“满天红”，是一种大灯壶，“有两只长长的壶嘴，吐出小指头粗细的灯芯，燃着棉油或柴油，冒出滚滚的黑烟。用一根长长的竹杆挑一盏这样的灯，照亮沉重的黑暗，上岭开民下田收禾，聚众开会，列队游行，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年代常有的事情”（74）。又如“样板戏”，是文革时期被树立为“革命样板戏”的以戏剧为主的二十几个舞台艺术作品的俗称。

大到民族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社会活动，小到对个人、社会和阶层的习惯称谓都属于社会文化。社会文化具有地域、民族或群体特征。《马桥词典》中还包含了大量具有地域特色的制度、礼仪、称谓等社会文化特色词，如称谓语“本义公”，是对马桥的书记马本义的尊称，其中“公”这一敬语在英语文化中并没有相对应的表达，是翻译的一处难点。又如社会活动用语“𦉳”，发音nia，“𦉳”字在马桥有多种用法：（1）声发阳平，表示粘连的意思。（2）声发阴平，表示亲近、亲热、纠缠、肌肤粘贴鬓发厮磨的状态。（3）发上声，意指戏弄、逗耍、理睬、干预等等，与普通话中的“惹”字意义相近。（4）发去声，意指两性行为。可谓一字多义”（36）。

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宗教文化特色词涵盖宗教信仰、宗教组织、宗教组织内的活动、宗教建筑、宗教绘画、宗教音乐等方面的内容。宗教文化特色词如“梦婆”，指代精神病或神明。又如“官鬼”，即“官祸”，由于“官”谐音“棺”，暗指亡人阴魂不散。

语言特别是方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会增加翻译难度。不同语言有着不同的语言系统，翻译时就需要顾及各自不同的语言特点。语言文化特色词的特殊性可能会反映在语音、词素、词汇和句法上。在《马桥词典》中，语言文化特色词主要体现在方言的使用上，如“肯”字，是情愿动词，表示意愿、许可，“马桥的人把‘肯’字用得广泛得多，不但可用来描述人，描述动物，也可以用来描述其它的天下万物，如：这块田肯、长禾”（95）。在马桥人看来，万物都是有意志、有生命的。又如“打起发”，有两层含义：一是小偷小摸；二是占便宜。

（三）吸收：寻找《马桥词典》文化特色词对应的英语表达

“侵入”是为了“吸收”。“‘吸收’即是把新接纳的东西以各种不同的程度加以吸收，有的完全归化”（Steiner 314），“吸收”的过程就是贴上译者的标签的过程，可以将源文本所要表达的内容或形式吸收成目的语读者易于接受的文本。值得注意的是，“吸收”不应只关注语言因素，看译本的语言表达是否能融入译入语，还需要将其他诸多因素考虑在内，如直接的文学环境以及间接的政治、经济等其他诸多社会因素，因为很多时候还有政府、媒体与市场等中介机制会干预译语文化（译语读者）对译本的接受的（夏天 85）。

在探析了以上《马桥词典》文化特色词的含义之后，下一步便是为其寻找最恰当的英文

表达。生态文化特色词中，译者将“马桥弓”这一地名译为 Maqiao Bow，在形式上易于目的语读者接受，“吸收”程度较高。而“公地和母田”直译为 He-Ground and She-Field，译者虽然做到了形式上忠实地再现源语，但由于“吸收”程度低，没有反映出词语背后的深刻含义。

物质文化特色词“满天红”译者翻译为 Light the sky red，采用了直译的策略。虽不能完全达意，但译出了“满天红”的特点，表现出灯壶照亮天空的黑暗的样子，此处说明译者很好地吸收了该词的内涵，“吸收”程度较高。“样板戏”译为 Model Operas，既做到了达意，又兼顾了形式上的统一，“吸收”程度高，可见译者对其文化内涵理解的深入。

社会文化特色词一类中“本义公”译为 Public Benyi，“𦉳”意译为 Stick (y)。Public Benyi 既做到了形合，又最大程度地贴近了原意，“吸收”程度较高。而“𦉳”字的翻译无疑是一大挑战，因为这个字包含了至少四个不同词性的意义，译者对该字的“吸收”程度也比较高，sticky 虽然不能传达出源语诸多个引申意义，但对本义的传达比较准确。

译者将宗教文化特色词“梦婆”直译为 Dream-Woman，此处直译得较生硬，既没有传达出“孟婆”一词的宗教内涵，又会因过度直译让读者心生疑惑。而“官鬼”译为 Guan Ghosts，“吸收”程度较高，忠实达意。

语言文化特色词“肯”译为 Will/Willing，传达了一种主观意志，切合源语内涵，“吸收”程度较高。而“打起发”意译为 On the Take，完全归化，涵盖小偷小摸和占便宜两层含义，是极其成功的一处翻译。

（四）补偿：寻求并达到原语与译语之间新的平衡

斯坦纳认为“第三步吸收会产生两种情况：一是叫转化吸收，二是感染”（斯坦纳 316）。译者难免会被所吸收的文本所控制，令原作语言失色，使其原创力受损，为保持原有平衡，补偿就显得尤为重要。“补偿”是斯坦纳阐释学翻译步骤的最后一步，重在补偿翻译过程中丢失的意义以达到新的平衡。正如斯坦纳所说，由于信任，译者倾向于面前的原作，便因此失去了平衡；接着包围、进攻；当满载而归时，再一次失去平衡，所以真正的翻译必须有来有往，必须恢复平衡(69)。这说明恢复最终的平衡是对一位译者的道德要求。在寻根文学《马桥词典》文化特色词英译过程中，有时需要采用增加多种形式的补偿方法，让读者对原词有更贴切的理解。

生态文化特色词中，“马桥弓”若不添加任何补偿，会为下文谐音词“妈桥弓”一词的翻译增加难度，所以译者在直译的前提下添加注释，直译加注为 Maqiao (literally Horsebridge) Bow”，同“妈桥弓”的翻译“Motherbridge Bow”区分开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

物质文化特色词中，鉴于“样板戏”一词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可能会对外国读者造成理解困难，译者在直译的基础上添加注释，译为 Model Operas (the eight revolutionary operas deemed politically correc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利于保留源语文化，补偿失衡状态。

社会文化特色词称谓语“本义公”的翻译 Public Benyi 如果严格来讲，并非百分之百贴合

原意，因为“中国最初的‘公’字是指部落首领或国家帝王，是‘君’的同义词。同西方人 public 的‘公有制’意义不符”（韩少功，《马桥词典》170），因此译者直译的基础上作音译补偿处理，译为 Public Benyi (Benyi Gong)，实现了文本意义平衡，兼顾了内容与形式上的忠实。

《马桥词典》中宗教文化特色词“官鬼”，译者若仅仅音译为 Guan Ghosts，虽然兼顾到了“官”同“棺”谐音这一文化内涵，实现了“满载而归”，但是容易给目的语读者增加理解难度。因此，Guan (Government) Ghosts 通过在直译基础上补充意译达到了平衡，有力地补偿了源语意义在翻译过程中造成的缺失。

《马桥词典》语言文化特色词“肯”，由于“吸收”程度高，完全传达出了源语的文化内涵，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但是如果仅仅译为 Will / Willing，就丢掉了推介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这一机会。因此，蓝诗玲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采用了意译加音译的策略译成 Will / Willing (Ken)，实现了平衡，也体现了译者传递汉语文化的意愿。

因此，阐释活动必须“补偿”，这是翻译中不可或缺的一步，而这一步也使阐释翻译理论“为译者在不完全开放的语言中找到了开放的理由与自由”（金敬红 386）。直译加注、直译加音译、直译加意译、意译加音译等方式不失为极佳的补偿策略。“翻译除了能体现原语的潜力，更能得到原语所没有表现出来的价值”（夏宁 59）。由此可见，译者给出的远比原作者要多，最终形成一个带有译者痕迹的完整译本。

寻根类文学翻译不只是语言转换，更是两种文化的融合和交流，不同地域文化的复杂性和文化特色词的特殊文化内涵，决定了寻根文学作品英译中文化特色词翻译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综上所述，斯坦纳提出的翻译四步骤对寻根文学《马桥词典》中五类文化特色词的英译过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对寻根文学的文化特色词英译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通过直译加注、直译加音译、直译加意译、意译加音译等“补偿”方式，可以最大限度还原源语的语言和文化信息，甚至是得到源语所没有表现出来的价值。这就要求译者不仅要清楚原作者的文化背景，还要考虑目的语读者，在“得”与“失”之间把握平衡。

注释 [Notes]

- [1] 参见黄海瑛：《斯坦纳阐释翻译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15；刘畅：《阐释学理论视野下译者主体性的彰显》，载《上海翻译》2016年第4期，第15-20页；卢晓娟、郭黎阳：《阐释学视角下〈呐喊〉蓝诗玲译本中叠词的翻译过程及策略研究》，载《语言教育》2017年第4期，第63-68页。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Chen, Xiaoming. "On *The King of Chess*: 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 or Ambiguity of Seeking Roo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erialism." *Literary and Artistic Contention*, no. 4, 2007, pp. 128-42. [陈晓明：《论〈棋王〉——唯物论意义的阐释或寻根的歧义》，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第128-42页。]
- Chesterman, A. *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John Benjamins, 1997.
- Fung, Yu-lan. "The Preface of *Chuang-tzu's* English Version."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 11, edited by Yu-

- lan Fung. Henan People's Publishing, 2000, pp. 228-29. [冯友兰:《英译〈庄子〉自序》,载冯友兰编《三松堂全集》第11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228-29页。]
- Gadamer, Hans-Georg. *Truth and Method*. Translated by Handing Hong. Shanghai Translation, 1999.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 Gao, Fang, and Shaogong Han. "Only Differences, Diversity, Competition and even Confrontation are the Source of Vitality: An Interview with the Writer Han Shaogong."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2, 2016, pp. 70-73. [高方、韩少功:《“只有差异、多样、竞争乃至对抗才是生命力之源”——作家韩少功访谈录》,载《中国翻译》2016年第2期,第70-73页。]
- Gong, Minlv. "Han Shaogong's Novels of Root-Seeking and the Magical Culture in Chu." *Research of Chinese Literature*, no. 2, 2005, pp. 96-101. [龚敏律:《韩少功的寻根小说与巫楚文化》,载《中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96-101页。]
- Han, Shaogong. *A Dictionary of Maqiao*. Translated by J. Lovell. Columbia UP, 2003.
- . *Selected Works of Han Shaogong*.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2006. [韩少功:《韩少功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 . *A Dictionary of Maqiao*.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2013. [韩少功:《马桥词典》。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
- Jin, Jinghong. "On the Hermeneutic Theory and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Procedure." *Journal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no. 5, 2005, pp. 384-86. [金敬红:《阐释翻译理论与阐释过程》,载《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384-86页。]
- Li, Ou-fan. *Pursuit of Modernity: A Collection of Li Ou-fan's Cultural Reviews*. Rye Field, 1996.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
- Liu, Siqian. "Views on Root-Seeking Literature." *Literary and Artistic Contention*, no. 1, 1986, pp. 49-52. [刘思谦:《文学寻“根”之我见》,载《文艺争鸣》1986年第1期,第49-52页。]
- Lu, Shuyuan. "From 'Root-Seeking Literature' to 'Seeking Roots in Literature': On the Root of Culture and Nature in Literature." *Literary and Artistic Contention*, no. 11, 2014, pp. 20-23. [鲁枢元:《从“寻根文学”到“文学寻根”——略谈文学的文化之根与自然之根》,载《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第20-23页。]
- Mao, Dun. "'Matchmaker' and 'Virgin'." *Collected Works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edited by Xinzhang Luo and Yingnian Chen,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4, pp. 349-51. [茅盾:《“媒婆”与“处女”》,载罗新璋、陈应年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349-51页。]
- Nida, 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4.
- Steiner, G.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Yichuan Zhuang. 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1987. [斯坦纳:《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庄绎传编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
- .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1.
- Sun, Jingxin. "Julia Lovell: A New Generation of British Sinologis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no. 6, 2011, p. 61. [孙敬鑫:《蓝诗玲:英国新生代汉学家》,载《对外传播》2011年第6期,第61页。]
- Wei, Jiahai, and Zhenglin Li. "The Translation Style of Julia Lovell's English Version of *A Dictionary of Maqiao*." *East Journal of Translation*, no. 4, 2013, pp. 51-55. [魏家海、李正林:《蓝诗玲英译〈马桥词典〉的翻译风格》,载《东方翻译》2013年第4期,第51-55页。]
- Xia, Ning. "Translation View under the Modern Hermeneutics Context."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no. 3, 2007, pp. 57-60. [夏宁:《论阐释学的翻译观》,载《语言与翻译》2007年第3期,第57-60页。]
- Xia, Tian. "Application of G. Steiner's Theory of Hermeneutic Motion: Adaptation and Extension."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no. 3, 2009, pp. 81-87, 112. [夏天:《斯坦纳阐释运作理论的应用:问题与方法》,载《外语研究》2009年第3期,第81-87,112页。]
- Xu, Jun. "On Translation Process: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Probe."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no. 4, 2003, pp. 33-39, 51. [许钧:《简论翻译过程的实际体验与理论探索》,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4期,第33-39,51页。]
- Yuan, Honggeng. "Hermeneutics and Translation."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5, 1991, pp. 37-40. [袁洪庚:《阐释学与翻译》,载《外国语》1991年第5期,第37-40页。]

◇责任编辑:蒋莉华

中国网络文学外译与文化走出去战略 ——以“武侠世界”为例

◎ 彭石玉 张慧英

内容提要: 2016年末,面向外国读者,主要翻译中国网络仙侠、玄幻小说作品的“武侠世界”(wuxiaworld.com)翻译平台吸引了众多国内主流媒体关注。目前中国网络文学外译发展势头良好,一定程度上对促进中外关系、传播中国文化,促进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能发挥积极作用。本文以“武侠世界”为实例,介绍其目前发展情况,分析其契合文化“走出去”战略意涵以及符合大众文化涵养的特点,重点结合传播模式五要素和乔治·斯坦纳阐释运作理论,联系“武侠世界”外译作品翻译实例,分析总结网络文学在具体文化传播中的优势作用。

关键词: 中国网络文学 “武侠世界” 外译传播模式 阐释运作理论 文化走出去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件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8) 04-0098-10

作者单位: 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MTI中心,湖北 武汉 430205

Title: O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and Chinese Strategies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Abstract: In the late 2016, there comes a translation platform named “Wuxiaworld” (wuxiaworld.com) mainly in responsible for translating Chinese online *Xianxia* and *Xuanhuan novels* into English for foreign readers, which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by numerous domestic mainstream media. At present, translating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enjoys a sound development momentum, which to some extent will exert positive influence on facilitating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disseminating Chinese culture and promoting a better implementation of “going global” strategies of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 cites “Wuxiaworld” as an example, introducing its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focusing on applying the five elements of communication model and the theory of Hermeneutic Motion of George Steiner, citing reasonable translating examples from “Wuxiaworld”, and tries to figure out and summarize the advantages of online literature under certa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nditions.

Keywords: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Wuxiaworld”,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model, theory of Hermeneutic Motion, “Going Global” Strategy of Chinese Culture

Author: Shiyu Peng, Professor, MTI Cent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China; Huiying Zhang, postgraduate student,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China.

文化走出去是我国“走出去”战略框架下的重要一环，其意涵包括二种：

一种是直观意义上或常识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这种意义上看，“中国文化走出去”就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使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了解和熟悉中国文化。我们在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讲授中国语言文化，把中国的各种文化产品翻译为他国文字，派遣各类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士出国访问和交流，等等，就是在推动这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第二种为价值观念上的“走出去”。文化交往实质上是不同价值观念的交往。理解和接纳一种文化，关键就在于理解和接纳它的价值观念。这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让其他国家的人们理解和接纳中国的价值观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 web）

中国网络文学外译活动其实就在践行第二种意涵的文化走出去战略。

多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偏重译入外国文学研究，本国文学作品译出研究明显不足。2016年，“武侠世界”^[1]（wuxiaworld.com）翻译平台成立并成功吸引了众多国内主流媒体关注，可以作为研究我国网络文学作品译出的典型范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稳步提升，“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我国文化、文学吸引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兴趣，中国网络文学外译也可以在文化建设“走出去”过程中发挥文化的多元互补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的思想文化汇入到世界文明的洪流中。

一、“武侠世界”发展良好

中国网络文学从2001年发展至今已约莫二十年。2009年手机无线阅读端兴起后，手机网络文学用户逐年攀升，发展至今。2017年6月CNNIC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手机网络文学用户规模为3.27亿，占手机网民的45.1%”（中国网信网 web）。2014年IP（知识产权）热潮全面来临，网络文学作品成为影视、游戏圈采购原创IP的富矿，大量热钱涌入。如今，网络文学作家成为一种职业；《步步惊心》、《甄嬛传》、《琅琊榜》、《花千骨》、《青云志》、《余罪》等由人气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在荧幕上连番上演，收视率不断刷新；行走就餐时处处可见人们用手机翻看网络文学作品。中国网络文学以其根植大众文化的亲和力迅速拥有了广大的读者群体。

2014年12月，看到中国网络文学的生机，真心喜爱网络文学的赖静平^[2]甘心辞去了美国外交官的工作，全心投入中国网络文学翻译事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以翻译仙侠和玄幻网络文学作品为主的网站“武侠世界”。建站至今不过四年，“武侠世界”已经发展成为全球Alexa排名1271，全北美排名1045的大型网站。“其读者来自全球110多个国家地区，其中40%的读者来自北美，25%左右来自于东南亚，20%来自于西欧”（王晶晶 94），日均页面访问量达

362 万次（央广网 web）。至 2018 年 11 月，“武侠世界”上已有 13 部完整的中文武侠、网络文学作品翻译完成（“武侠世界”上总共有 16 部中国网络文学类完整作品，另外 2 部是丹麦作者 Tinalynge 创作作品 *Blue Phoenix*（《蓝凤凰》）和 *Overthrowing Fate*（《颠覆命运》），还有 1 部是美国作者兼译者 Deathblade 的作品 *Legends of Ogre Gate*（《魔界传奇》），分别是古龙先生作品《七杀手》17.63 万字、《英雄无泪》15.59 万字、《天涯·明月·刀》17.45 万字，漆怡花《七星龙王》6.42 万字，唐家三少《光之子》76.54 万字，我吃西红柿《盘龙》334.1 万字，耳根《我欲封天》494.77 万字，我吃西红柿《星辰变》280.38 万字，文抄公《巫界术士》357.64 万字，天蚕土豆《斗破苍穹》528.96 万字，我吃西红柿《莽荒纪》417.93 万字，唐家三少《天火大道》258.97 万字，天蚕土豆《武动乾坤》393.13 万字^[3]，以及其他 33 部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4]，网站活跃读者保守估计为 250 万人（葛亮亮等 2017 年 5 月 9 日）。“武侠世界”不仅开设专栏为外国读者普及中国的“道”“阴阳”“乾坤八卦”等，并且有自学中文成功的国外译者向各国其他读者积极细致地介绍学习中文的方法。有译者相互学习，查阅资料，研讨有关中文“一盏茶”“一炷香”“三更半夜”“饕餮”等词的译法，更有帖子总结详尽的中文俗语用法，等等。这些帖子为平台上译者和读者的翻译、阅读清扫障碍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培养中国网络文学读者对中国文化发生兴趣，一定程度上为传播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二、“武侠世界”契合战略

“武侠世界”将可供翻译的书目直接挂在专门栏目中，引发了众多外国网友留言，表示渴望学习中文，翻译中文。与拥有大量投资和炒作力度的好莱坞大片、韩剧和日本动漫相比，中国网络文学从其本身的兴起，到读者自发的以“武侠世界”为代表的外译活动的出现，都是凭借文字作品本身的魅力。这些网络文学作品及其译文本身蕴含的可挖掘性不言而喻。

“武侠世界”网站影响力日趋扩大，整个网站营造出国外追书迷们与译者之间良性交流互通的氛围。网站在扩大中国网络文学读者群，传播中国文化，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等方面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帮助建设国家“软实力”作出了切实贡献。这一切首先离不开赖静平最初对于中国网络文化的真心喜爱，深入理解与接纳。这与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意涵的第二点真心契合。第二重要的原因是他拥有足够强大的翻译技能。赖静平坦言，“翻译，除非你自己有语言天赋，别人写的越好，你会越有压力”（邵燕君等 111）。翻译绝非易事，一路走来，赖静平与他筛选出的译者一道，在“武侠世界”这个平台上坚持译文质量，挑选出优秀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将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中国情怀译出国门，译往世界。

诚然，不能否认，不论是网络文学本身在中国的发展还是翻译行业在中国的状况都存在着诸多问题。譬如网络文学的行业盗版问题，抄袭问题，版权问题，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等问题，翻译行业译者准入门槛问题，薪资问题，质量问题，等等。但是，以“武侠世界”为代表的

中国网络文学外译已然契合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意涵，拥有一支译技精湛的先驱队伍，以及支持其前进的赤子之心。中国网络文学外译的发展路虽远，但前景可期。

三、“武侠世界”符合大众文化涵养

“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意义还体现在，它对权力（尤其是语言和文化上的霸权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消除一系列人为的二元对立和等级界限：消除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界限”（王宁 13）。土生土长于中国大众文化之中的中国网络文学外译不妨化身文化全球化广阔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中具有现实意义的一个环节，由“武侠世界”接轨大众文化，成为实现中西平等交流的桥梁之一。

仲伟合认为“考虑到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外译活动的复杂性、外译的社会价值，外译的社会营销机制应该提上研究议事日程”（仲伟合、冯曼 60-61）。强调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和文化输出的接受问题以期实行外译社会营销机制，意在点明外译活动中不可忽视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应。推行中国网络文学外译不得不重视文化的消费价值和大众性。“‘武侠世界’不仅止于一个全世界中国网络小说爱好者的聚集地，也逐渐成为了读者学习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的重要基地”（李敬泽等 9）。赖静平认为“在产生了阅读快感的基础上，外国读者才会进一步对小说中的中国文化产生好感和亲近感……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不应该仅限于网络文学……怎么去促进国外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很重要的一块正是要考虑所谓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央视网 web）。“武侠世界”在力推中国网络文学外译过程中一直牢牢把握目标观众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性、发展性和开放性应是我们在推进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过程中必须坚持的立场与态度”（刘云虹 5）。

“一切交际都是翻译”（斯坦纳，《文学翻译理论研究》36），真正的交流必为双向的、平等的，继而翻译空间的开放、多元成为刚需。应该认识到的是，以“武侠世界”为代表的中国网络文学外译活动属于中国文学译介和传播的一个发展阶段，虽然目前发展出了一定影响力，但是离实现中西文化双向的、平等的交流仍然任重道远。应用历史的、发展的、开放的眼光看待这一过程，同时肯定中国网络文学在流行文化大众文化中的地位，秉承翻译空间须开放多元的原则开展外译活动。

“武侠世界”网站翻译平台作为中国网络文学外译的阵地之一，乘中国流行文化、大众文化之东风，以其精心营造的平等、开放、双向的自身优势迎合了文化全球化的实际需要。在不同时间，学者对于大众文化的推广的理念与“武侠世界”建立者赖建平不谋而合。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大背景下，从促进中外关系的文化传播出发点看，中国网络文学外译应能发挥属于自己的能量。

四、传播模式和阐释运作理论指导下的“武侠世界”外译实例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中国文化传播问题。在十九大报告中他重点提出，要“推进（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网络文学外译无疑是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活动，运用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对翻译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能够直击本质，得出能反映翻译真实面貌、对翻译实践产生重要指导的结论，对翻译研究是一种极大的丰富和深化，能推动翻译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谢柯、廖雪汝 18）。后文将尝试结合传播学相关理论和斯坦纳（G. Steiner）阐释运作理论，以“武侠世界”平台上的翻译现象为例，分析总结网络文学在具体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美国传播学者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中指出，“描绘传播行为的便利方式必须回答以下 5 个问题，即谁（Who）？、说什么（Says What）？、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35）。“谁”即传播主体，“说什么”即传播内容，“什么渠道”即传播渠道，“对谁”即传播对象，“取得了什么效果”即传播的效果，因此传播是具有影响传播对象的、带有一定目的的行为（张永中 78）。

1975 年斯坦纳在《通天塔》（*After Babel*）一书中提出的“翻译之过程”，或“阐释的运作”（Hermeneutic Motion）备受瞩目。“斯坦纳阐释运作理论不仅涵盖了翻译全过程，也体现了各个步骤之间的延续性”（夏天 81）。“斯坦纳将翻译之过程划分为四个步骤即“信任”（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和“补偿”（enactment of reciprocity）（《语言与翻译面面观》312-14）。“信任”表示相信面前这篇作品是言之有物的，是值得翻译的；“侵入”（或“进攻”）既是侵占与发掘又是包围与吞噬，译者的理解带有进攻性将意思俘虏过来，满载而归；“吸收”就是把新接纳的东西以各种不同的程度加以吸收；“补偿”使得整个翻译过程完整并且恢复平衡（斯坦纳，《文学翻译理论研究》69-70）。

（一）“武侠世界”外译作品的传播主体在文化传播中的优势

“武侠世界”外译作品多为中国网络文学作品，而中国网络文学是网络兴起、自媒体时代到来的产物，因此“武侠世界”外译作品现在的传播主体已经较传统媒体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传统媒体时代，传播主体是指传统的新闻机构，或者管理机构个人，受众则是指接受大众传媒的个体；而自媒体时代的传播主体是指网络上有独立的传播主体的个体，它可以是网络上的任何一个人。加之，翻译活动的本身涉及的传播主体就包括原文作者（创作主体）、译者（翻译主体）和读者（阅读主体），那么诸如“武侠世界”外译作品的网络文学在传播开始时已经拥有了比普通翻译活动更大范围的传播主体作为支撑。

位于翻译活动中心枢纽位置的译者对于文化传播的效力起关键作用。斯坦纳提出的阐释

过程，第一步就是信任。“一切理解活动，换言之，一切翻译活动，都要从信任开始”（《语言与翻译面面观》312）。网络文学外译活动在这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武侠世界”创建者赖静平告诉记者道，网站上的译者都是自主选择自己喜爱的网络文学作品投入翻译，并且“武侠世界”目前所有译者均为英语母语者或海外汉语爱好者（央视网 web）。他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还表示：“我们不挑选小说，我们挑选译者。让译者去选择他们喜欢的书。因为一旦开始翻译，就相当于一两年的时间都定在这了，中途突然断了或者换翻译，是件很不好的事情。所以如果让一个译者去翻译一部他自己并不喜欢，看不上小说，不光他会难受，作品的水平也会下降不少。”（嵇石 2017年5月30日）。笔者搜索“武侠世界”网站，网站上公布的译者为28名，涉及11个不同国家地区背景，但大多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而从事翻译的。有的是因为受早年电影《卧虎藏龙》，小说电视《西游记》、《射雕英雄传》，中国功夫等的影响，也有许多人是因阅读过第一部网络文学外译作品《盘龙》（Coiling Dragon）之后喜欢上了网络小说继而从事翻译^[5]。这些网络文学的译者对所翻译的中文网络文学作品已经超越了信任，是怀着热忱在进行翻译，因此网络文学外译作品不仅在那些拥有多国背景的译者中有很高的接受度和认同度，同时从传播主体要素看也拥有很高的传播效率。

（二）“武侠世界”外译作品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渠道在文化传播中的优势

随着人类文明不断发展，全球范围内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娱乐至死”的预言似乎已经一语成谶。各类娱乐形式层出不穷，人们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获取大量资讯。

就传播内容而言，网络文学外译作品比传统精英文学译作内容更加精炼、更具文化兼容性。打两个不算恰当的比方，林语堂先生创作的《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其实可谓是《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的简化版，该作品在西方普通读者中获得的传播效果比《红楼梦》全译本却好得多；《论语》、《道德经》、《天工开物》此类古典作品译介到西方，但因用于生活的实例太少或太多冗长大道理，西方读者视为天书，望而却步。客观而言，大众群体的数量是绝对大于精英人群数的，因此多数读者读文学作品是为了消遣，那些与大众群体产生共鸣的内容才能够最快吸引他们眼球。现今的网络文学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为快感文化（邵燕君等 111）。例如“武侠世界”平台上的作品《仙逆》（*Renegade Immortal*）、《天涯·明月·刀》（*Horizon, Bright Moon, Sabre*）、《星辰变》（*Stellar Transformations*）里面包含许多“以杀止杀”（stop killing with killing），“杀人夺宝”（killing and stealing），“实力可以决定一切”（in the world of cultivation, power is everything），“气量狭小，睚眦必报”（have very unkind temperaments and are very stingy）等等观念。“表面上看（特别是从‘圈外人’的审查角度上看），网络文学中充斥着不少负载‘负能量’的内容，但如果深入内里，就会发现‘正能量’才是网络文学的‘正常态’，这不是法规所限，而是人心使然。并且，网络空间本身是欲望空间，消解‘负能量’本身就是营造‘正能量’的一部分”（邵燕君 190）。中国深层优秀文化“天才的意思就是苦练，不停地苦练”（the real meaning of ‘natural talent’ is bitter training. Bitter training without pause），

“放下屠刀”(put down his butcher's knife),“一诺千金,死而无悔”(a promise is as good as a thousand taels, he would die for it without any regret),“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where there is life, there is hope),以及坚持正义、追求爱情、不懈奋斗的精神也贯穿网络文学的始终。因此,不论是对外国读者还是中国数亿网络小说读者,网络文学的内容特质都有利于深入大众传播。

网络文学发展的“核动力”在于传播渠道的拓展。读者能通过电脑、平板、智能手机、智能手表以及“喜马拉雅FM”“荔枝网”“夜读”手机软件、有声读物工具和公众号等多种渠道随时随地收看或收听。特别还有近年推出的专门供网络文学阅读的移动端“微信读书”“QQ阅读”“百度书城”等,以及微信、微博、抖音、快手、Youtube、Twitter、Facebook、Whatsapp等国内外广大传播平台,这些平台依赖背后强大的算法能够根据读者喜好精准推介,并不时更新讯息维护平台互动交流,留住并吸引更多客户。传播渠道多元又通畅,覆盖读者面广大,大大提高了中国文化的传播效率。

斯坦纳提出的阐释过程,第二步就是侵入。“译者侵入、提取,然后满载而归;其相似点就在于将露天矿区比作给地表留下一个大伤疤”(《语言与翻译面面观》314)。侵入的过程包含了相互沟通理解交流以及沟通渠道的相互交叉。“武侠世界”平台上例如《仙逆》、《武动乾坤》(*Wu Dong Qian Kun*)、《一念永恒》(*A Will Eternal*)、《我欲封天》(*I Shall Seal the Heavens*)等作品大都属于中国修真类小说(Chinese Cultivation Novels)。关于此类小说中有关修真(Cultivation),丹田(Dantian),内力(Internal Energy),行气(Qi Circulation),吐纳(Breathing Exercise),走火入魔(Qi Deviation)这类存在翻译空缺的词,有的译者直接采用了拼音作为其翻译或简略的翻译。此时,译者就进入侵占阶段,把意义的诠释变成了一种类似入侵的,具有蛮横特征的掠夺暴行。这个过程译者虽暴力地侵入到原本,剥去其外壳,让核心袒露,使原本意义受损、甚至伤痕累累,但是也实属是积极的理解,翻译也渐渐形成了武侠、仙侠、玄幻小说外译的风格,能够有效传播。

(三) “武侠世界”外译作品的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在文化传播中的优势

以“武侠世界”外译作品为代表的网络文学传播受众就是译入语文化语境中的读者。关于重视译入语读者的阅读需求的重要性,呼吁采用外国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传播中国文化的声音在国内学界已不鲜见。“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异化翻译地位逐步上升,有些学者提出汉译英应转向异化为主策略,以彰显传播中国文化”(刘进 158)。归根结底,我们的目的都是将我们译作的文化信息有效地传达给目标受众,使得文化传播落到实处,既不至于因一味归化削减源语语言文化含量,也不至于一味异化致使译文过于晦涩无法赢得受众青睐。“武侠世界”网络文学的传播方式刚好可以有效规避这类问题:“武侠世界”平台译者本身既是传播的主体,又是除自身以外译作的译入语文化传播受众。例如,平台译者将“摧枯拉朽”直译为crushing dry weeds and smashing rotten wood,“斩钉截铁”直译为chop nails and sever iron;“生米做成熟饭”直译为the rice is cooked,“行云流水”直译为floating clouds and flowing water,“呼

风唤雨”直译为 call the wind and summon the rain, 等等。这类明显含有文化负载含义的词语, 在英文中也有相对合适的归化成语, 但平台上外国译者选择将其异化翻译得如此直白, 看似不达意, 但同时却也是最为合情合理的。因为这一版本的翻译是他们一边阅读欣赏网络文学作品学习中国文化, 一边逐渐涵养出对中国文化认同感的结果。译文不至于佶屈聱牙也没有难以卒读, 不仅不会妨碍文化传播, 在译者积极交流互动的平台氛围下, 还很可能起到吸引带动其他受众的作用。

“传播效果是传播活动成败与否的重要体现。传播者发出的信息经媒介传至受众, 引起受众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的变化。受众对信息接受的效果与传者的初始动机吻合度高的则效果好, 反之则效果不好”(刘进 158)。在“武侠世界”网站的论坛里, 一位外国网友说:“我最喜欢仙侠的地方就是, 虽然它蛮浅薄的, 但也很积极。我以前是看日本动画漫画还有轻小说的, 现在能看到仙侠里这种持续前进的故事还有强大的主角, 简直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终于能够呼吸一口气了一样。”(中国新闻网 web); 还有外国网友表示中国网络小说帮他戒除了毒瘾迎来了新生; 还有关注《莽荒纪》(Desolate Era) 连载的国外网民在论坛上评论, “我认为长青剑仙比其他老师好。他不会去帮助纪宁, 纪宁要靠自己成长”^[6]等。这类探讨互动同时也反映了网络文学的传播效度高的特点。

译者经过自身积极理解“侵入”将意义满载而归, 但此时这部分意义还要经过第三步“吸收”才能成为译语文化的一部分继而形成译本, 而接纳新的东西会影响译语的整个结构; “补偿”表示在“信任”之后, 翻译倾向原作, 失去平衡, 而在“侵入、吸纳”之后, 又倾向于译作, 再一次失去了平衡, 因此翻译最后需要提供补偿, 恢复平衡(斯坦纳, 《文学翻译理论研究》69-70)。之所以将“吸收”和“补偿”放一起写, 是因为笔者有感翻译的这两个步骤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在第二步“侵入”中列举的一些例子——修真(Cultivation), 丹田(Dantian), 内力(Internal Energy), 行气(Qi Circulation), 吐纳(Breathing Exercise), 走火入魔(Qi Deviation)——在英文中, 这些词虽然都存在, 但是这些意思几乎是国外读者闻所未闻的, 贸然用于译文行文必然造成理解障碍, 因此“吸收”可以说既是译文的吸收也是译者的学习过程。“补偿”则是随之而来用于克服文化差异, 疏通文化传播及展示译者主体性的反应, 通常都会采用加注方式体现, 在“武侠世界”中这些词也都有进行补偿^[7]。翻译为我们开辟了新的途径, 使我们能表达新的力量与感情(70), 这亦为网络文学传播插上了翅膀。

正视中国网络文学外译的力量与优势, 绝对不等同于只关注中国文学是否被接受的片面的“走出去”, 而不理睬“走出去”的是否是真正的中国文学文化。中华五千年文化渊源流传、博大精深、辉煌灿烂, 中国文化外译的根本目的是将中国文化中最本质、最精华的部分介绍给世界, 以外译为沟通桥梁, 促进多元文化之间深层次交流, 担负起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使命。这是绝不能动摇的。我国的文化有多么的奇绝壮美, 传播就有多么的千难万难。“无论如何, 中国文学在异域的接受前景值得期待。但从今天的遥远、陌生到明天的青睐甚至迷恋

需要时间和等待”（刘云虹 3）。笔者以为既已明晰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可以无须徒手等待。何妨借中国网络文学外译这招目前颇为小众却又反响奇好的妙棋打开局面，充分利用网络文学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鼓励支持和正确引导中国网络文学健康长远发展，勇于走出象牙塔拥抱大众文化，携手共促中国文化闪耀世界。量变必然引起质变，相信种种努力终将有助于实现我国文化真正“走出去”。

注释 [Notes]

- [1] “武侠世界” (wuxiaworld.com): 2014年12月由赖静平创建, 以翻译中国原创仙侠和玄幻等网络小说为主的翻译平台。2018年11月Alexa最新数据显示, “武侠世界”位居世界排名第1271位 (较2016年底排名上升约230位), 目前年可凭广告赚取收益17,440,920美元, 市值约为96,750,000美元, 参见 www.worthofweb.com/website-value/wuxiaworld.co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 [2] 赖静平: RWX (任我行, 据金庸武侠小说人物“任我行”所取), 1986年生, 美籍华人。3岁时随父母离开成都, 定居美国加州, 后加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进入美国国务院成为全职外交官, 2010年起先后在马来西亚、加拿大、越南轮岗。2014年5月开始翻译《盘龙》(Coiling Dragon), 2014年12月创建“武侠世界”, 2015年12月19日, 赖静平辞职, 回国全职运营中国网络小说翻译网站“武侠世界”。
- [3] 小说字数统计来自起点中文网。
- [4] 见“武侠世界”2018年11月30日数据, www.wuxiaworld.com/updates。
- [5] 见“武侠世界”: www.wuxiaworld.com/page/about。
- [6] 见“武侠世界”: forum.wuxiaworld.com/categories/desolate-era-spoilers。
- [7] 补偿: 见 www.wuxiaworld.com/page/general-glossary-of-terms; 还有如《天涯·明月·刀》译文第14章中提供了杀手屠青攻击傅红雪的暗器“铁莲子”的加注解 (An iron lotus flower is an ancient Chinese weapon which looks like a flying claw; a flexible metal chain attached to an iron claw) 等。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Ge, Liangliang, et al. “Why the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Become Popular.” *People Daily*, 9 May 2017. [葛亮亮等:《中国网文, 为何走红》, 载《人民日报》2017年5月9日。]
- Lasswell, Harold D.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Translated by Daokuan He, Communication U of China P, 2012. [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何道宽译。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2。]
- Ji, Shi. “Lai Jingping: I Translate ‘Wuxia for Laowai’.”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30 May 2017. [嵇石:《赖静平: 我为老外译“武侠”》, 载《南方都市报》2017年5月30日。]
- Li, Jingze, et al. “Literature in the Network Era.”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no. 8, 2016, pp. 1-15. [李敬泽等:《网络时代的文学》, 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8期, 第1-15页。]
- Liu, Jin. “Study 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ademics*, no. 12, 2010, pp. 156-64. [刘进:《对外文化传播翻译策略研究》, 载《学术界》2010年第12期, 第156-64页。]
- Liu, Yunhong.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no. 4, 2015, pp. 1-8. [刘云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翻译历史观》, 载《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4期, 第1-8页。]
- Shao, Yanjun. “‘The Incubator’ in the Era of ‘Media Convergence’: The New Position and Mission of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under Multiple Games.”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no. 6, 2015, pp. 181-91. [邵燕君:《“媒体融合”时代的“孵化器”——多重博弈下中国网络文学的新位置和新使命》, 载《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6期, 第181-91页。]
- Shao, Yanjun, et al. “Chinese Online Novel ‘Translation Team’ in America and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Going Global’ of China: Interview on RWX, the Founder of Wuxiaworld.” *Theory and Criticism of Literature and Art*, no. 4, 2016, pp.

- 105-11. [邵燕君等:《美国网络小说“翻译组”与中国网络文学“走出去”——专访Wuxiaworld创始人RWX》,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4期,第105-11页。]
- Steiner, G.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Yichuan Zhuang. 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1987. [斯坦纳:《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庄绎传编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
- .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1. [斯坦纳:《通天塔——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 Wang, Jingjing. “Lai Jingping, the RWX of Wuxiaworld.” *Global People*, no. 3, 2017, pp. 92-94. [王晶晶:《赖静平, 武侠世界任我行》,载《环球人物》2017年第3期,第92-94页。]
- Wang, Ning. “Culture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1, 2000, pp. 10-14. [王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载《中国翻译》2000年第1期,第10-14页。]
- Web of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Lai Jingping: Making Foreigners Become Enchanted with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27 Apr. 2017, news.cctv.com/2017/04/27/ARTIAIrDC4qvWo04dG6ESLlc170427.shtml. [央视网:《赖静平:让老外迷上中国网文》,2017年4月27日,news.cctv.com/2017/04/27/ARTIAIrDC4qvWo04dG6ESLlc170427.shtml。]
- Web of China National Radio.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Enjoys a Popularity Boom: ‘Wai Guo Ren’ Got Hooked On ‘Wuxiaworld’.” 8 Jan. 2017, finance.cnr.cn/txcj/20170108/t20170108_523452067.shtml. [央广网:《中国网络小说受追捧“歪果仁”迷上“武侠世界”》,2017年1月8日,finance.cnr.cn/txcj/20170108/t20170108_523452067.shtml。]
- Web of China News.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is Flying Out of the Country into the World to Create a Chinese ‘Hollywood’.” 15 Dec. 2016, www.chinanews.com/cul/2016/12-15/8094627.shtml. [中国新闻网:《中国网络文学冲出国门闯世界打造中国式“好莱坞”》,2016年12月15日,www.chinanews.com/cul/2016/12-15/8094627.shtml。]
- Web of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and Office of the Central Cyberspace Affairs Commission. “The 40th Statistical Report on China’s Internet Development.” 4 Aug. 2017, www.cac.gov.cn/2017-08/04/c_1121427728.htm. [中国网信网:《CNNIC发布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7年8月4日,www.cac.gov.cn/2017-08/04/c_1121427728.htm。]
- Web of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wo Connotations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10 Oct. 2016, www.scio.gov.cn/zhzc/10/Document/1493276/1493276.htm.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两种意涵》,2016年10月10日,www.scio.gov.cn/zhzc/10/Document/1493276/1493276.htm。]
- Xia, Tian. “Application of G. Steiner’s Theory of Hermeneutic Motion: Adaptation and Extension.”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no. 3, 2009, pp. 81-88. [夏天:《斯坦纳阐释运作理论的应用:问题与方法》,载《外语研究》2009年第3期,第81-88页。]
- Xie, Ke, and Xueru Liao. “The Names and Natures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 no. 1, 2016, pp. 14-18. [谢柯、廖雪汝:《“翻译传播学”的名与实》,载《上海翻译》2016年第1期,第14-18页。]
- Zhang, Yongzhong. “Remarks on Shortened Translation vs. Full Translation.”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 no. 4, 2018, pp. 78-83. [张永中:《变译和全译在文化对外传播中的不同效度》,载《上海翻译》2018年第4期,第78-83页。]
- Zhong,Weihe, and Man Feng. “The Research System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ransl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Sociology.”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no. 3, 2014, pp. 57-62. [仲伟合、冯曼:《翻译社会学视角下文化外译研究体系的建构》,载《外语研究》2014年第3期,第57-62页。]

◇责任编辑:蒋莉华

中央文献中的副文本翻译研究 ——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例

◎ 陈双双

内容提要: 副文本是翻译文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本文借鉴杰拉德·热奈特提出的副文本概念, 对比《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和第二卷英译本与中文本的副文本内容, 重点关注原文和译文的差异, 解读英译本中所体现出的译者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从副文本理论视角阐释原文副文本与译文副文本存在差异的原因。本文发现译者在副文本的翻译过程中并非孤立地看待副文本的翻译, 而是时刻考虑正文本的内容以及目标语读者, 进行必要的增加、删除或调整, 因而翻译方法更加灵活。

关键词: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副文本 翻译研究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8) 04-0108-08

作者单位: 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 天津 300204

Title: Th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Paratexts in CPC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Xi Jinping: Governance of China*

Abstract: Paratext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text, 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regarding the study on translation works. By employing the theory of paratext put forward by Gerard Genett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fferences of paratexts between the Chinese version and English version of two volumes of *Xi Jinping: Governance of China*.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translation of paratexts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content of the main text and the target readership i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us, flexibility is reflected due to the addition or reduction or adjustment dur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Keywords: *Xi Jinping: Governance of China*, paratexts, translation studies

Author: Shuangshuang Chen, Lecturer, Translation Studies Center for CPC Literature,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副文本理论最早是由法国叙事学理论家热奈特(Gerard Genette)提出,主要用于文学作品的研究。根据热奈特的定义:“副文本如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他许多附属标志,包括作者亲笔留下的或他人留下的标志,……副文本性尤其是种种没有答案的问题的矿井。”(《热奈特论文集》71-72)热奈特根据副文本所存在的不同位置,将其划分为内副文本(peritext)与外副文本(epitext),其中内副文本指的是文本内部所呈现的信息;外副文本指的是出版书籍外部的相关信息。内副文本包括:书籍封面、标题、序言、注释、后记、出版信息、插画、题词等(Paratexts 7)。外副文本包括:译者访谈、翻译笔记、评论等。本文借鉴热奈特的副文本概念,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和第二卷的英译本为例,聚焦注释和图片说明文字这两个方面的副文本翻译,发现有些副文本被删除,有些副文本被增加。通过归类和描述这些副文本的翻译现象,解释其出现的原因,以期对今后中央文献的副文本翻译提供借鉴。

一、副文本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对于文本的解读而言,副文本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副文本是正文本的互文本,它们与正文本之间形成浓缩(如标题)、图解(如图像)、引文(如扉页引语)、阐释(如序跋、广告)等复杂关系”(金宏宇 363)。对于文本的接受而言,副文本也起到重要作用。“副文本可以影响甚至控制文本的接受与传播”(耿强 109)。尽管副文本最初只是用于文学领域的研究,但是翻译领域的学者把这个概念引入翻译研究,并发现以副文本为切入视角,能够挖掘出很多以前被忽视的信息,从而丰富翻译研究。“翻译研究渐渐成为国内近五年副文本研究的新兴热点,是值得关注的重要研究动向”(殷燕、刘军平 22)。副文本是翻译文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能提供很多译本隐含的信息,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译本。副文本对于翻译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副文本因素能为文本提供一种氛围,为读者阅读正文本提供一种导引,参与正文本意义的生成和确立。同样的,一个完整的译本不仅仅包括正文本,也包括了各种副文本因素。对于一个译本来说,副文本因素参与了、丰富了、甚至阐释了该译文正文本的意义。”(肖丽 17)

副文本理论起源于文学的叙事学,因此主要应用于文学翻译研究之中。比如:贺显斌以《三国演义》的两个英文版为例,分析不同的副文本信息如何将它们建构成为不同的读物形象。另外,个别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中央文献英译本中的副文本因素。比如:侯萍萍(Hou Pingping)借助于鲍姆加腾(Baumgarten)对“副文本”(paratexts)的研究视角,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副文本在《毛泽东选集》英译本中的重要作用:封面、扉页和毛主席头像页、出版前言、注释等。巫和雄搜集到关于《毛泽东选集》英译的大量外副文本:第一类是与英译活动相关的各种工作计划、简报,第二类是单篇毛泽东著作的各版本英译稿,第三类是整卷毛选的英译本清样稿和再版稿^[1]。上述研究都从宏观层面进行副文本研究,而对于中央文献里的注释以及图片说明文字的副文本翻译研究,目前鲜有人关注。

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副文本翻译研究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和第二卷分别于2014年10月和2017年11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王丽丽对中央文献所下的定义为：“中央文献是政治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它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领导人著作，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全会、全国两会等党和国家重要会议文件，党章党规党史以及五年规划等党和国家其他文献。”(17) 据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属于典型的中央文献，在中国话语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其英译本在对外传播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和中国话语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正文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英译本中的副文本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关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和第二卷英译本中的图片说明文字和注释（包括脚注和尾注）这两类内副文本，通过与中文版对比，找出5种类型的差异，并解释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

（一）原文有注释，译文保留注释，但翻译内容有所增加

“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副文本在翻译过程中不仅参与建构异国和异域文化形象，也可以再译语文化中建构原作的作品形象、人物形象、语言形象等”（贺显斌 47）。下面两个增添信息的副文本译例，都是突出对原作中人物形象（习主席）的建构。

例（1）：图片说明文字“2013年2月4日，习近平来到甘肃省兰州市五泉菜市场了解节日供应情况，在一经营户的摊位前了解蔬菜价格、供应、销售情况”（习近平，《治国理政》152）。Talking with a salesperson about the price and supply of vegetables at Wuquan Vegetable Market, Lanzhou in Gansu Province, February 4, 2013, shortly before the Spring Festival. (Xi,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169) 增添的信息“这是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有助于读者了解一些背景知识，营造一种语境化的氛围。它旨在解释习主席为何选在2月初视察菜市场：春节将至，物价通常会上涨，为了保障民生，习主席深入市民生活。如果仅仅翻译出“2月4日”，英语读者是难以理解这个时间段的隐含意义的。副文本和正文本相互关联，成为正文本的重要补充部分。“副文本基本的美学意图不是要让文本周围显得美观，而是要保证文本命运和作者的宗旨一致”（金宏宇 355）。原作编者排版的图片，目的在于构建习主席关心民生、亲民的形象。而说明文字翻译中增添的信息与此是相吻合的，即让读者根据提示最大限度地接近文本意义和艺术意图。

例（2）：尾注原文：“三严三实”，指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二卷）》46）。尾注英译：These were set by Xi Jinping. They call upon officials to be strict with themselves in self-cultivation, in the exercise of power, and in self-discipline, and act in good faith when performing official duties, taking initiatives, and interacting with others (Xi,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I* 48). 译文中增添的信息是“这些是由习近平提出的”。译文明确指出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副文本是作品版本和文本的有机构成，是

译本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副文本都被精心地编织，它们参与到了整个文本结构和意义的建构之中”（金宏宇 361）。从两卷本的书名和封面，可以看出它们都旨在传播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突出他对中国发展的贡献和领导作用，此处副文本的增译也参与到了对习主席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形象（管党治党的方略和智慧）的构建之中。耿强认为副文本“补充甚至强化正文本”（105）。此处译例，也是对正文本内容和宗旨的一种强化，着重彰显习主席治党理念的智慧。从中可以看出译者为传播习主席治党思想而做出的一次积极尝试。

（二）原文有注释，译文保留注释，但是翻译内容有所删减

杨大亮和赵祥云指出：“政治文本的翻译要求较高的忠实度、政治意识形态的敏感性、措辞的准确性和一定的可读性。”（39）译者必须高度忠实于原文，这一点极为重要。但这种忠实，在副文本的翻译中，并非意味着字与字、句与句的完全对应，而是译者在既考虑原文作者，又要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最佳方案。在保留原作者意图同时，译者还要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感受或反应。作为副文本的一种形式，译注的一个重要功能即“服务读者”（姚望、姚君伟 73）。副文本翻译中的删减就是这种“服务读者”功能的体现。译者要考虑读者是否需要某个方面的信息，如果他们并不需要或对他们来说无重要意义，那么副文本的翻译中则可以考虑删减。

例（3）：尾注原文：“八八战略，指2003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提出的利用浙江省发展的八个优势、面向未来发展的八项举措。主要内容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习近平，《治国理政》448）。英文尾注的翻译：“In July 2003 the fourth plenary (enlarged) session of the 11th CPC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proposed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province's eight advantages for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 eight measures for its future growth.”（Xi,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497）尾注原文中详细罗列了八个优势和八项举措的所有具体内容，共417个汉字；但是译文尾注仅指出存在八个优势和八项举措，但删除了具体内容，仅35个单词。浙江省的发展优势和举措，只是中国治理中的个案，具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但对目标语读者而言，这些特色和优势并不是他们所熟悉的，也不是能够直接照搬模仿的，因而与读者的认知并不关联。即使翻译成英文，由于读者不了解浙江省的具体情况，也会带来阅读和理解上的障碍。因此，本着译注“服务读者”的功能，译者仅仅翻译了具有概括性的第一句。

（三）原文有注释，但是译文中删除了注释

在中央文献的翻译中，译者要格外谨慎，不得随意改动或偏离原文。“中央编译局负责的党代会、‘两会’文件的翻译，还有外文局翻译的白皮书，要求都很严格，需要逐字逐句翻译，译者的余地非常小”（陈明明 9）。这一点在正文本的翻译中，非常明显。但是，相对而言，副文本的翻译中，译者并非总是要完全与原文在形式和内容上一模一样，译者不仅只是关注副

文本本身，而是必须要关照正文本的内容，“副文本在‘文本之中’是说许多副文本在结构、释义等方面其实都内在于正文本”（金宏宇 361）。因此，在副文本的翻译中，译者可以审时度势，做出一些调整，而不是亦步亦趋紧跟原文的副文本，译者删除了原文中的某些注释，并非擅自背离原文，而是出于具体的需要，进行的适当和必要的调整，可以说是在充分考虑语境的情况下而实现的“创造性忠实”。通过比较分析，本文总结译者删除注释主要是由于以下4类情况：

1. 原文通常是带有数字的一种表达概念，附带尾注，而英文在正文中给出明确内涵，因而删除了尾注。带数字的表达概念在原文有很多，比如：“五位一体”、“三股势力”、“四个全面”等等，这也是中国政治文献中的一大特色表达。例如，原文正文：“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治国理政》10）。原文给出了尾注，解释“五位一体”的具体内容。而英文版则删除了该尾注，因为译文在正文中直接说明：Its overall plan is to seek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progress, and that its main objective is to achiev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Xi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11)。

2. 原文尾注提供的是书名（即某个引语的出处）或人名的解释，英文则在正文中直接给出书名或人名的相关信息，因此删除尾注。比如：“法国作家雨果说：‘最大的决心会产生最高的智慧’。”（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二卷）》527-28）尾注解释道：“见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英文版删除尾注，在正文给出书名，不仅提供英文译文，还提供了法语的原文，这增强了译文的严谨性和可信度。The French writer Victor Hugo observed in *Les Misérables* that ‘Supreme resources spring from extreme resolutions.’ (Les ressources suprêmes sortent des résolutions extrêmes.) (Xi,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I* 576)。

3. 中文的古语或古诗句，在目标语中难以保留，假如直译保留，读者难以理解，所以只传递其语境中的意义，而且把尾注罗列的古文出处删除。例如：“决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二卷）》200），中文版尾注：“见东汉班固‘汉书·食货志’。”（200）英文版删除了注释。英文正文中意译为：eradicate the hug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Xi,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I* 220)，完全不谈这是一个中国的古语。

4. 原文谈到目标语文化中的名人，并且给出了注释。但是在英文中，无需注释，因为目标语读者了解这个人物。例如：“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二卷）》223）。中文版尾注“斯科比，英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任英国派驻希腊的英军司令……”（226）。而英文版删除了该注释。英文正文翻译为：(7) we have our own ‘Ronald Scobie’ who is trying to turn China into Greece (Xi,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I* 245)。

（四）原文无注释，译文增加了注释（脚注或尾注），并标明译者注

副文本服务于正文本。“副文本是进入正文本的阐释门槛，具有阐释学的价值”（金宏宇

364)。读者要明白正文的意义，那么需要借助于副文本，只有通过副文本的“门槛”，读者才能抵达正文。在涉及一些文化负载词（culture-bound words）的时候，译者往往需要增添相应的解释。在积极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和“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这种翻译方法更应该提倡，从而让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的特定文化信息。在两卷本的英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译者的解释都是通过副文本（脚注和尾注）形式存在的。副文本具有解释说明的功能，译者可以通过注释这种副文本形式让目标语读者理解某些需要语境化的信息。“副文本阐释了原文中独特的文化现象，补偿了因文化缺省在翻译中失去意义，变不可译为可译、可理解、可接受”（黄培希 77）。

“加脚注是一种比较有侵略性的补偿方法，译者在英译本的后记中也提到，力图将解释文化背景和历史典故的解释性脚注的数量控制到最低数目”（张生祥、秦君 62）。第一卷英译本仅有两处增加的注释，全部为脚注形式。这两个脚注所涉及的信息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例如：“世界上热点问题不少，按下葫芦起了瓢”（习近平 251）。虽然这是中国的一个俗语，但是原文没有用引号。而译文正文却用了引号：“Just when you press the gourd into the water, there floats the gourd ladle.”（Xi 275）增加的英文脚注为：A traditional Chinese saying that means “tackling one problem only to find another emerging”-Tr. 译文添加了引号，表明这是一个独特的表达，另外通过脚注，指明这是一个中国俗语，并解释其意思。

第二卷英译本有 11 个增加的注释，全部为尾注形式。这远远超过第一卷中的数量。通过对比，这种变化反映出译者的历时性的认知变化——译者保留中国特色表达的意识增强，且读者意识也在增强。在第二卷中，增加的注释主要包含三个功能：阐释中国特色词汇、解释隐喻和提供背景知识。例如：“统一战线有自己的优势”（习近平 24）“The United Front has its own strength”（Xi,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I* 24），针对“统一战线”这个中国特色词汇，英文版增加了尾注：“This refers to the political union formed by var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forces, including social classes and strata, political parties and groups, and even ethnic groups and nations, based on their common interests, to achieve a common goal under certain historical conditions. - Tr.”（28）

（五）原文有注释，译文保留注释，但内容与前人译本相通

《毛泽东选集》等一些重要著作被引用时，引语的译文和尾注的译文，都直接用《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本，而不再是字字对应翻译，比如页码，就不再是中文版页码，而是英文版的页码。著作出版年代也不一样。这种因需要而进行的变通，是为了保持与前人翻译成果的一致性，有利于对老一辈翻译家翻译成果的继承。例如：尾注：见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7 页》）（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二卷）》375）。英文尾注改为：Mao Zedong: “Be Concerned with the Well-being of the Masses, Pay Attention to Methods of Work”,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Vol. I. Eng. Ed.,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Beijing, 1965, pp. 147-148. (Xi,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I* 405)

三、副文本理论与中央文献翻译研究

副文本理论与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存在着密切关系。首先，副文本是中央文献翻译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国家领导人的著作译本中。例如，《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都包含有大量的副文本：封面、出版前言、脚注或尾注、图片或插图等等。这些副文本与正文本一起构筑了原作者在英语世界的形象。副文本具有多重建构性，可以建构文化形象、作品形象、人物形象等，国家领导人著作的外译，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构建领导人的国际形象，而副文本是达到这一目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此从副文本理论切入中央文献翻译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具有适切性和研究意义。

其次，副文本理论为从事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以前许多学者都是从政治性角度来论证中央文献翻译的“忠实”问题（程镇球 18-22；陈明明 9-10），还有一些学者论证中央文献翻译的“灵活、变通”原则（赵祥云 89-93），这些多是从政治角度或翻译学的视角来看待中央文献的翻译行为。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副文本理论可以让我们窥探中央文献翻译中译者的“翻译规范”（translation norms）、赞助人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译本的接受与传播，等等。

再次，副文本理论扩大了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领域和范畴。传统的学者多是从正文本的角度来开展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鲜有学者关注其中的副文本因素，而实际上，中央文献中存在的副文本也是翻译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和研究对象。译作的副文本与翻译活动、译作面貌以及翻译质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可以说互为因果。副文本与正文本一同构筑了完整的文本，通过副文本理论的研究，可以丰富中央文献翻译研究的体系。

副文本与正文本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文本，因此译者不能孤立地看待副文本的翻译。大多数情况下副文本翻译做出的调整，都是考虑到正文本译文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副文本的翻译受制于正文本的翻译；副文本具有构建性，它的构建作用与正文是相一致的。另外，副文本的翻译应当考虑目标语读者，依据读者的认知水平而做出相应的翻译调整。本文归纳了翻译副文本与原文副文本存在的5种差异——注释的增和删、注释内容的增和删以及对前人译本的继承，并从副文本理论视角分析了相应的原因，以期给今后中央文献副文本的翻译提供一些启示。

注释 [Notes]

- [1] 参见贺显斌：《从〈三国演义〉英译本看副文本对作品形象的建构》；Hou Pingping. *A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Shandong UP, 2013；巫和雄：《〈毛泽东选集〉英译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Chen, Mingm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ncepts, New Categories and New Expressions in the Translation of Party and State Document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3, 2014, pp. 9-10. [陈明明：《在党政文件翻译中构建融通中外的

- 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载《中国翻译》2014年第3期，第9-10页。]
- Cheng, Zhenqiu. "Political Factors being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of Political Text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3, 2003, pp. 18-22. [程镇球:《政治文章的翻译要讲政治》，载《中国翻译》2003年第3期，第18-22页]
- Genette, Gerard.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lated by Jane E. Lewin. Cambridge UP, 1997.
- . *Collections of Papers by Gerard*. Translated by Zhongyi Shi. Baihua Wenyi, 2001. [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 Geng, Qiang. "Paratext in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Perspectives, Methods, Issues and Criticism."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5, 2016, pp. 104-12. [耿强:《翻译中的副文本及研究:理论、方法、议题与批评》，载《外国语》2016年第5期，第104-12页。]
- He, Xianb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atext: A Cas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no. 6, 2017, pp. 43-48. [贺显斌:《〈三国演义〉英译本看副文本对作品形象的建构》，载《上海翻译》2017年第6期，第43-48页。]
- Huang, Peixi. "Paratext and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HUANG TI NEI CHING SU WEN: 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 by Ilza Veith."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no. 3, 2018, pp. 73-79. [黄培希:《副文本与翻译文化建构——以艾丽莎·威斯〈黄帝内经·素问〉英译为例》，载《上海翻译》2018年第3期，第73-79页。]
- Jin, Hongyu. *Surrounding the Text: the Study of Paratexts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Wuhan UP, 2014. [金宏宇:《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 Wang, Lili. "The Stance, Ways and Strategies of the Translation of CPC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Report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no. 2, 2018, pp. 17-25. [王丽丽:《中央文献翻译的立场、路径与策略——以党的十九大报告英文翻译为例》，载《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第17-25页。]
- Xi, Jinping.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Foreign Languages, 2014.
- .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Foreign Languages, 201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 .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I*. Foreign Languages, 2017.
- .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I*. Foreign Languages, 201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
- Xiao, Li. "The Significance of Paratext to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no. 4, 2011, pp. 17-21. [肖丽:《副文本之于翻译研究的意义》，载《上海翻译》2011年第4期，第17-21页。]
- Yang, Daliang, and Xiangyun Zhao. "Th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Texts."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no. 1, 2012, pp. 39-41. [杨大亮、赵祥云:《政治文本翻译探析》，载《上海翻译》2012年第1期，第39-41页。]
- Yao, Wang, and Junwei Yao. "What are Translator's Notes for: the Multi-functions of Translator's Notes."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no. 3, 2013, pp. 73-76. [姚望、姚君伟:《译注何为——论译注的多元功能》，载《外语研究》2013年第3期，第73-76页。]
- Yin, Yan, and Junping Liu. "A Review of Paratext Studies in China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no. 4, 2017, pp. 22-26. [殷燕、刘军平:《国内副文本研究三十年》，载《上海翻译》2017年第4期，第22-26页。]
- Zhang, Shengxiang, and Jun Q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Science Fi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A Case Study of the *Three Body Problem*."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no. 3, 2018, pp. 57-63. [张生祥、秦君:《阐释学视域下的类型文学英译过程——以〈三体〉为例》，载《当代外语研究》2018年第3期，第57-63页。]
- Zhao Xiangyun.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CPC Literature in the New Era: A Case Study of the English Version of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Journal of Xi'an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no. 3, 2017, pp. 89-93. [赵祥云:《新形势下的中央文献翻译策略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为例》，载《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第89-93页。]

执拗消解与多元建构 ——《语言之会》评介

◎ 刘宏

内容提要: 赫曼斯所著《语言之会》以跨学科方式从社会学、文学、国际法乃至宗教的不同理论视角对一些翻译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反思。其目的在于将研究注意力聚焦到翻译内在的自我指涉、自我反思性以及译者的自我定位等问题,以此来推动建立一种更具自我反思性的翻译研究。

关键词: 消解 建构 跨学科翻译研究 自我反思 西奥·赫曼斯 《语言之会》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8) 04-0116-10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Title: De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A Review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Tongues*

Abstract: As a series of startling reflections on fundamental issues of translation, the book *The Conference of tongues* adopts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that brings concepts and ideas from social system theory, literary theo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even theology to explore translation. It throws new light on familiar problems and draws attention to themes of self-reference and self-reflection of translation as well as translator's self-positioning with the purpose of provoking a more self-reflexive kin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Keywords: destruction, construction,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 self-reflection, Theo Hermans, *The Conference of the Tongues*

Author: Hong Liu, Ph. D Candidate,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 (James S. Holmes) 撰于 1972 年的《翻译研究的名与实》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已被奉为翻译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他曾在文中指出, 对整个翻译研究学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翻译理论史和元理论研究仍然罕有, 并就此发出了明确的学术召唤 (71)。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UCL) 荷兰语和比较文学教授赫曼斯 (Theo Hermans) 作为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和“翻译研究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 一直专注于翻译元理论与翻译史探索。他在翻译规范理论和翻译社会系统理论建构方面所做的重要贡献得到了学界高度评价 (Schäffner 1; Tyulenev 47)。其于 1999 年付梓出版的《系统中的翻译——描写与系统理论解说》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一书全面耙梳和详细解说了描述翻译研究学派的描写及系统理论思想, 并前瞻性地展望了其未来发展方向。该书一经发表便得到了翻译研究界的高度关注和一致好评, 现已成为从事翻译研究的必备参考书之一。赫曼斯还撰写了百余篇翻译理论研究成果, 编撰了多部重要的理论文集。其专著《语言之会》 (*The Conference of Tongues*) 由圣·哲罗姆出版公司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7 年首发, 2014 年由路特利支出版公司 (Routledge) 再版。该书在国外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 却因未被引进刊印, 而在国内知者甚少, 更缺乏对此书的系统评介。但几位境外学者评介此书时都不约而同使用了“鼓动性” (provocative) 一词, 可见它是赫曼斯的又一部不俗之作 (Chesterman 361; Lauth 302; Murdoch 155)。笔者认为, 此书无论是理论视角、研究方法还是研究深度都不负作者之名。尽管该书从首发迄今已十年有余, 但其学术价值仍应得到重视和发掘, 也值得在此详细评介。

一、内容评介

正如该书前言所述, 这部翻译理论研究著作力图实现两个诉求: 一是试图通过异于寻常的理论视角剖析翻译以获得新洞见, 二是尝试从翻译的自我指涉角度出发发掘、呈现译者在译本中的自我定位方式。

全书共六章, 开篇一章题为“终结”。这个非同寻常的标题一下就激起了读者的一系列疑问: 为何刚开篇就谈终结? 什么的终结? 为什么终结? 既然终结了那后面洋洋洒洒的若干章又将讨论什么呢? 赫曼斯采用了通常只在文学叙事中使用的倒叙法, 一开题就紧紧抓住了读者。开篇一反理论著作常见的枯燥论述, 转而引述了两个西方历史上的通灵故事。首先提到的是摩门教及其教义经典《摩门经》 (*Book of Mormon*) 产生的离奇故事。据载, 1823 年某天, 摩门教创始人美国农夫史密斯 (Joseph Smith) 在家接待了一位从天而降的神秘天使。在天使指引下, 他找到了藏匿于附近山林中的一本载有上帝福音的金叶古书和一套能将其译为世俗语言的工具。此后, 史密斯开始秘密口译该书并由近徒笔录成文。近徒们被特许见证了金叶原本和天使的存在, 还聆听了来自天堂的上帝之声, 确证原本真实, 译文精准。此后, 天使收走了金叶原本并从此销声匿迹。不久译本冠名《摩门经》刊印发行, 摩门教由此创立并广

纳信徒，迄今已成为在全球拥有约一千两百余万信众的重要宗教派别。赫曼斯指出了故事中耐人寻味的两个细节：一是在1830年出版的《摩门经》扉页上注明了史密斯为该书的“作者和所有人”，后来才改为“译者”；二是史密斯在口译原文时，如行云流水毫无梗阻，似得上帝之助。无独有偶，公元前2世纪中叶七十二名犹太学者共同翻译《圣经·旧约》所成《七十子希腊文本》(Septuagint)的故事里也发生了同样神奇之事。这些译者虽身处异处，可历经72天后分别提交的希腊文译本居然如出一辙。据传是上帝之灵附身，将正确译文口口相授于每个译者才产生了这些既与原作贴合又高度一致的译文。奥古斯丁(St. Augustine)认为《七十子希腊文本》具有超自然的神圣性，并祈求哲罗姆(St. Jerome)在翻译拉丁译本时要以之为原本，而非参照希伯来语的《旧约》。赫曼斯认为上述故事中都强调了译者和原作者在以同样的声音、意图和权威说话，原作和译本并无不谐之声和意思差异，译者在其中既不表达思想也不占据主体位置。其结果是最终原本消失，译本取而代之成为“第二原本”(谭载喜15)。他认为这与历久不衰的“等值”观念密切相关。上述故事中的替代效应只能解释为，因两个文本被认定为价值一致从而使译本获得与原本的同等地位，借助外部话语的权威性，即通过以言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speech act)人为提升了译本地位。赫曼斯认为，如从价值和地位相等的意义上来界定等值，那它是从文本中推断、萃取而来，并非译文的固有本质，其形成源于某种特定制度语境从外部强加的干预。那些被认定为完全等值的译本虽从发生学意义上仍是翻译，但从其功能而言已经完全成了原本，因而也面临着自我消解(self-destruct)。因此，正是翻译被认为应孜孜以求的“等值”招致了翻译自身的终结。他还讨论了多语版联合国《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s)条文解释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虽然该条约的多数不同语言文本肯定是由一两个主要起草语言翻译商榷而成，因而必定存在某些细微差异，但为了确保它们有同等法律和解释效力，条约各方均授权确认各版本具有完全等值地位。上述授权行为通过一种制度性举动(institutional act)制造了一种各语文本的等值幻象(fiction)。赫曼斯因而认为原本译本间等值关系的建立依赖于外部制度化的以言取效行为，是“宣称的”(declared)，而非文本固有特质；授权下的等值会使翻译罹患失忆症——既忘了原本又忘了自身作为翻译的存在，因而将面临自我消解。所以，一个要成其为翻译的译本，就不会与其原作等值。

循着以上思路，第二章“终结之前”开篇就指出既然凭借外力达成的等值幻象将使译本自身消亡，那它也将宣告译者的“死亡”。真正的翻译必定是暂时性的，可不断复译的，它们彼此间保持差异，也将译者的在场或明或暗地烙印在译文字里行间。赫曼斯首先给出了一个明显的例子予以佐证。女作家努斯鲍姆(Laureen Nussbaum)在撰写《荷兰的女性书写》(Women Writing in Dutch)一书时，引用了一段《安妮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的英译片段。虽然该段文字出自被公认为标准译本的译者道布尔迪(B. M. Mooyaart-Doubleday)之手，但努斯鲍姆仍认为其译文过于字当句对且错误频出。她试图在引用时改译，但终遭译本版权方道布尔迪出版公司(Doubleday)拒绝。由于书中无法舍弃引用该段译文，无奈且恼怒的努斯鲍姆于是采取了异于寻常的手段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她既完全采用道布尔迪的译文，只字未改，

又巧妙的利用加括号的方式在所有她持不同意见之处插入了自己的改译。虽然努斯鲍姆觉得这段引文由于括号的侵入变得冗长，但还以了安妮原作公正。显然，这些冗余的突兀处是英译原本中肯定不存在的，它既体现了两个译者间的批评与交锋，也是一个新译者与版权持有公司之间的争夺和保卫战。努斯鲍姆的干预性举动不但回指安妮的德语原作，同时更目的明确地指向被其视为不足的前译本。这些抗争和辩论不但盘旋于原作者头顶，而且将回响在译文读者耳畔。翻译不再只是如履薄冰地死盯原作的活动，而是一种既自我指涉又自我反思的文本实践。从这个层面来看，翻译关注的并非是如何回指和解读原作，而是如何彰显某种独特的翻译模式。赫曼斯做了个大胆设想，假如努斯鲍姆被许可按自己措辞重译存有异议处，那么所有的括号将消失殆尽，那些迥异于道布尔迪版的文字将悄无声息地悉数替换它的前任，好像什么都未曾发生。对于一个无法对照原本的普通译文读者来说这段文字与惯常的翻译一样流畅通顺，毫无异常。但这样处理过的译文其批判力和对抗性丝毫未减，只是成为了一种更不易被察觉的潜行，有待那些能充分意识到不同译文间存在互文性关联的读者去探索发现。这个例子展现了翻译所具有的双重动态性，一方面它反映出了某个译者反驳其他译者译文和译法时发出的不同声音，另一面它互文性地召唤经由历史沉淀和社会认可留存下来的关于什么是翻译的观念。这种动态性本身回避绕开了原本，而发生在元话语（metadiscursive）领域。译者在这里面观察自己和他人的译文，通过选择不同译法和副文本陈述等方式展开相互评论，形成各种互文性联系。这也就是每个翻译内在的元翻译（metatranslation）维度。赫曼斯指出，在这个维度里无论各个译者间是相互抵牾还是相互援引，其产生的这种互文性都为翻译提供了一个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和自我反思（self-reflexive）的层次。它促使翻译就如何翻译、什么样的文本才能或者应该被认可为翻译等基本问题展开自我观察和描述并同时上升为自我反思。这种伴随翻译一路潜行的自指方式不但揭示了作为观察者的译者在文本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展现出每个译本针对不同社会历史语境加诸于翻译的不同期待所做出的不同回应。

第三章“反讽的回声”运用了“引语”和“反讽”两个模型进一步来探查译者的在场并由此导向翻译所涉的译者伦理问题。作者首先通过对比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荷兰语译本和英语译本在副文本上的差异，以及在《古兰经》（*Qur'an*）和《十日谈》（*Decameron*）英译本中译者通过副文本和变换译文语言的手段来表达立场的几个例子说明了在翻译中译者几乎不可能悬置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甚至常常借助译本刻意阐述自己的观点。虽然很多译本正文单从字面上来看与原作亦步亦趋，但其副文本展现出的译者立场如同一个语境框架确定了翻译的意图和基调。从这点看翻译就像某种形式的报告性话语（reported speech）。它引用原文本并把内容报告给读者，可被看作是混合了间接引语要素的直接引语行为。赫曼斯探讨了各种形式报告话语与被报告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借此考察了翻译中译者对于译文不同程度的掌控情况。而这一系列从由译者“完全控制”式的译文删削到基本不体现译者干预的“自由直接话语”（free direct discourse）构成了一个连续统（continuum），充分展现了译文中存在的多声部共存的复杂性。他由此将翻译描述为以下结构：*I say that x said in language y:“zzz”*

(*The Conference of Tongues* 76)。译文就像结构中的直接引语部分，虽然从句法结构上是个独立体，但仍免不了或多或少受到其嵌入的更大句子结构中陈述主体立场的影响。而这些包裹和影响译文的上级结构可以是译本的前言、后记和注释也可以是各种副文本信息，甚至连译者隐晦的选本动机也成为了一种具有影响力的潜藏框架。这些外部框架与译文间的接合处为译者表达不谐之音或认同立场提供了空间，也使翻译成为反讽话语变得可能。在译者需要表达与原作中相左立场时，译文可以象反讽修辞那样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信号提醒读者，它虽然在不动声色地再现原文，但其立场相悖，目的是审视、戏谑和批判原文的观点和立场。就像前面提到的《我的奋斗》英译本一样，虽然整个译文与原作高度贴合，但其目的不是为了给希特勒歌功颂德、传经布道，而是为了淋漓尽致地展现其野心，以达成对其立场的批判和瓦解。赫曼斯认为将这种模型解释范围扩大，即便是在译者表达赞同的态度下，我们也能通过蛛丝马迹定位译者的立场。这样解读翻译是为了阐明一个观点：所有翻译行为都秉持一定立场，因此不同价值观一定会烙入译文，这也意味着译者必定对译文负有道德和社会的责任。

“真在论”(Real Presence)一章又转换了一种理论视角。问题缘于即便二者语言完全不同，翻译仍被视为原作代表的惯常观点。到底从本体论、认识论的角度该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赫曼斯一改沿用传统论述翻译时的转换观(transformation)，转而向天主教“真在论”来获取新灵感。在传统拉丁弥撒中牧师效仿耶稣在最后晚餐中的话，指着桌上的面包说，“这是我的身体”，仪式后信徒将视为基督之躯的面包食尽，以表虔诚之心。由此赫曼斯想到与此相似的一个场景，原文作者指着语言迥异的外语文本说“这是我的作品”，而译文读者则往往在阅读时产生一种他就在阅读原作的心理认同。弥撒中的面包凭借基督之语的权威效力发生了变体(transubstantiation)，而一个以外语写作的独立文本可被看作凭借原作者认可的言外之力才成为与原作密切相关的译本。这样的视角颠倒了惯常由原本通过语言转换生成译本的派生论。整章花了大量篇幅引用宗教文献和事例来剖析展现“真在论”理念。通过一系列的援引比较，赫曼斯最终认为“真在论”对于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将考察视角由原作转移到了成为一个自足文本的译作；抛弃了将翻译视为一种将原作不变要素和本质特征进行跨语言挪移的转换观；同时强调了翻译的接受成立需要特定信念群体的加持认可，就如同“真在论”的效力仅存在于特定的教众和仪式中一样。

第五章“连接系统”回到了一个赫曼斯一直关注的理论话题，即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立场出发将翻译视为一个自足自为(autopoiesis)的社会系统。该内容开始变得高度抽象，写作话语也变得更为“稠密”(dense)(Chesterman, “Theo Hermans” 360)，似乎与职业译者所面临的现实生活中的翻译问题有光年之遥(Chesterman, “Description, Explanation, Prediction” 90)。一方面如赫曼斯曾指出的，翻译研究的目的并非直接为翻译实践提供指导，而是通过描述翻译现象，探寻翻译本身内在的各种规律。另一方面，基于本身以复杂甚至晦涩而著称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论来进行二次理论建构，也注定了该章

内容的复杂和抽象性。赫曼斯从构成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沟通 (communication) 出发, 将整个翻译活动中展现自身特征自我指涉性操作及对其的识别和回应视为翻译社会系统区别于其外部环境的基本沟通。他认为由此不断展开的沟通使得翻译与其他社会系统产生自我区分, 逐渐形成一个以其他社会系统为外部环境的自我生产、自我复制的独立翻译社会子系统。同时, 翻译系统通过结构耦合 (structural coupling) 将外部环境带来的干扰刺激 (irritation) 有选择性地反映到内部沟通上, 由此实现系统内部进一步区隔化, 借由这种形式的外部指涉 (external reference) 增加系统的动态和复杂性以适应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在现实中不难发现, 翻译系统内部随着社会活动门类的扩充, 逐渐针对其服务对象的不同不断形成如法律、商贸、科技和影视等诸多新的翻译门类, 这些类别的翻译间既具共性又自成一体。他还从社会系统论中的“形式” (form) 和“二阶观察” (second-order observation) 概念出发详细探讨了翻译系统在自我描述、观察和反思过程中维持系统生存发展的连贯性问题, 并以西方社会译者培训和西方历史中翻译系统的演进情况为例进行了分析论说。

终章“翻译研究之厚”探究了翻译研究的元理论问题。如果按前章中系统理论的概念, 这章的主题和功能显然是“二阶观察”式的。它回到了对翻译研究本身的拷问与反思。其理论灵感来源与阐释人类学家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和阿皮亚 (Kwame Anthony Appiah) 提出的“丰厚描写” (thick description) 和“丰厚翻译” (thick translation) 概念。正文开篇讨论了中外学者英译严复“信、达、雅”翻译三原则时不同译名选择的问题。案例目的不像通常应用翻译研究一样试图引出对各种译名孰优孰劣的研判, 而在展现作为跨语际学术活动的翻译研究存在的复杂性和超定性 (over-determination)。赫曼斯指出, 作为对跨语际文本和翻译观念探索的翻译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翻译阐释行为: 翻译研究就是翻译翻译 (Translation Studies as translating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nd Normativity” 69)。但他并未取向传统的解释学理论来探讨如何达成对研究对象的最佳理解, 而是从理解阐释中必然存在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着手探讨翻译研究方法的问题。他转向阐释人类学家格尔茨、阿皮亚提出的在解释异域文化活动和概念时通过厚重注释的方式, 尽可能摆脱自身固有概念束缚, 充分展现多样理解可能性的“厚翻译”和“厚描写”方法, 并将其转化为一种自我批判式的 (a self-critical form) 翻译研究模式 (*The Conference of Tongues* 148)。赫曼斯持一种建构主义立场, 认为任何形式的对比和理解必然以一定概念为工具和出发点寻找异同, 因而发现什么样的异同与采用什么样的概念工具密切相关, 不存在一种能凌驾于观察解释者和其对象之上的元语言, 因而跨文化的翻译研究无论就其格义方法、使用的概念工具和对比出发点的选择都存在历史偶然性 (contingency), 也就不应以达成对异域翻译概念的精确和完满描述为目的。翻译研究应该致力于既创建能将研究对象映射 (map) 入研究者所处特定制度语境 (particular institutional contexts) 的新语汇来获得新洞见, 同时, 又要检视促成映射达成的概念工具本身和特定工具使用者的初衷和动机。

二、评价与思考

赫曼斯曾在1999年撰写的《系统中的翻译》(*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终章中指出:当时翻译研究明显的不足存在于理论层面,应当持一种跨学科融合的态度,吸取来自于女性主义研究、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以及文化研究等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新成果(159)。这种理论更新的目的不只是必须为了支持各种案例研究,而应该盘桓于对翻译研究本身模式和认识条件的反思。依此原则进行的理论建构应是自我反思和暂时性的,既要甘于试验又要接受可能带来的尴尬,同时要对毗邻学科的思想保持关注。由此可见时隔八年后推出的本书恰是上述意识的开花结果。正如其内容简介所言,该书从根本不同的若干思维路径对翻译一些基本问题展开了惊人反思,是一部高度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它意识到了理论范式的重要意义,因而从社会学、文学、国际法和神学的概念里汲取灵感用于翻译研究,围绕自我指涉这一主题,将对译文的解读更多的聚焦到翻译本身和译者对自身角色的洞察方面。全书贯穿始终的意图是旨在建构一种更为自我反思型的翻译研究模式,因此也展现出了以下特点。

首先,该书体现了作者强烈的消解意识和强劲的颠覆力。学者皮姆(Anthony Pym)(108)、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 (“Description, Explanation, Prediction” 92)和朱志瑜(xi)等曾在不同场合指出赫曼斯的理论路数体现了明显的后现代观念,虽然赫曼斯曾坦言自己并不在乎他人将其理论研究归于“后现代的、前现代的还是超现代的”(“Concluding Comments” 137)。但从其学术生涯发轫时提出翻译操纵观到一以贯之对“等值”概念的执拗消解,从翻译规范理论建构中对权力、意识形态、社会建制因素和历史偶然性的突出强调,到以卢曼充满建构主义色彩的社会系统论为源创建翻译社会系统论都无不彰显了其理论思维的后现代主义倾向。本书首章就以终结为题又一次对翻译研究中惯常的等值概念展开了执拗的拷问与追击。赫曼斯采用解构的方法从等值概念中隐藏的嫌隙与裂缝入手,通过案例说明在地位和功能上被视为与原作完全等值的翻译往往驱逐、替代了原本,由此也导致了其自我身份的解构和译者声音的压制。他由此得出颠覆传统理念的结论,一个文本只要作为翻译存在就不可能等值,不可能与原作声音一致,译者也无法置身事外,传统观念中的等值概念本身就包含特定意图和立场,具有倾向性而非均质。因而发掘翻译中译者与译者、译者与制度和机构之间的话语交锋和权力斗争成为翻译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系统”一章中赫曼斯也阐明了其后现代性的视角主义理论观,认为理论是视角转换的工具,而非对世界实在的终极精确描述,理论转换带来新的洞见,也必有自身盲点。他支持卢曼所持的对世界实在存而不论,通过理论模型来探察、解释社会的观点,坦言翻译社会系统论的建构并不是本体论性质的,而更多展现的是一种认识和方法上的新可能。此外,本书从言外之力的介入,译文中隐藏的反讽,以意义推测和建构为沟通基础的翻译社会系统论到谈及翻译研究本身涉及的翻译和阐释困境与悖论,这一系列观点都强力颠覆了经久不衰的翻译就是语言转换中的意义传递

和复制观，因而也为翻译和翻译研究展现出了更为复杂的多样性、动态性和更为棘手但又的确存在的反悖性。

其次，本书体现了作者充满探索精神和丰富想象思维的建构力。如果一本理论著作仅偏执于一味消解那么将只能成为一次失衡的盲目挑战，但加入了大胆的探索性建构就成为一种平衡的对话。赫曼斯的本次理论探索既体现了解构时的锋芒毕露，又不失建构时的缜密细致。拆解的目的在于为建构开辟路径，在竭力消解把翻译视为传声筒、代言人的传统认知的同时，他大胆引入了“引语”模型，将翻译视为一种混杂着直接和间接引语形式的多声部对话体。这样的建构打破了传统话语对翻译的化约性想象与规定，将本来潜藏和被压制在译文内里的多元性、对话性释放出来，既有利于展示翻译的社会生动性，彰显译者的在场，又有利于帮助研究者开拓理论视野，摆脱传统应用性翻译研究思维的桎梏，丰富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认识。这样的类比性思维的建构方式同样在其翻译社会系统论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把翻译建构为一种自我创生的社会系统的最大贡献在于将涉及整个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纳入了一个有机而复杂的体系之中。共时上将零散区隔的翻译活动各环节、翻译研究话语和各种翻译应用行为聚拢起来；历时上串联起翻译的历史轨迹、当下状态与未来方向，使其展现为一个独立、复杂且不断演进的有机自为系统。这样的构建不但有利于以宏观、抽象的方式来统一研究对象的诸方面，使翻译摆脱人们心目中的附属和屈从地位，而且有利于从研究对象层面为翻译研究争取独立学科地位提供理据。

再次，本书也体现了作者明确的自我反思意识。全书内容安排就体现了赫曼斯对翻译内在的自我指涉、自我反思性的关注。开篇消解等值概念为后文凸显翻译中普遍存在的自我指涉现象铺平了道路，直至将翻译抽象为以自我指涉和异他指涉为沟通方式的自为社会系统。在其中他特别强调了翻译系统中自我指涉通过二阶观察方式上升为自我反思的重要意义。以翻译研究为例，一方面二阶观察方式通过探查其他研究者是如何观察翻译的方式来挖掘对方视角上的盲点，另一方面二阶观察的意识又不断告诫观察者自己身后也存在盲区，因而时刻保持自我反思。这样的认识显然有利于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简单还原论倾向。这也正是赫曼斯倡导在翻译研究中引入厚翻译方法的原因，将其作为一种既能应用于研究对象又能反向加诸于自身的理论工具。这种理论诉求和方法虽然不能杜绝自身盲点，但肯定会使研究者和整个学科变得更为包容与平衡。

当然，整部书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在“反讽的回声”一章的“回声式翻译”一节中，赫曼斯曾认为回声式话语（echoic utterance）作为一种阐释性表达一定会体现与其再现话语相悖的信念和立场（*The Conference of Tongues* 77）。这一观点存在概念理解上的偏差。有学者就指出，回声式话语的内涵在于借助被再现话语来表达立场，正反均可。值得称道的是赫曼斯欣然接受了批评，还在公开发表论文的注释中澄清了谬误并向该学者致谢（“Evaluator” 69）。同时，弗米尔（Hans Vermeer）也指出，文中基于报告性话语的某些特点来看待和研究翻译是基于与英语有相似结构的语言基础上，带有独特性，是否能适用于其他语言还有待观察（qtd.

in Hermans, "Evaluator" 67)。

此外,《摩门经》从历史考证来看应属于伪译(pseudotranslation),切斯特曼认为将其视为驱逐了原本而独善其身的等值译本存在误用,因为它本来就是原创的宗教文本。但如果按某些学者观点应将那些改编、拟作甚至匿名的跨语际剽窃都视为包含事实上的翻译因素的话,《摩门经》无论从教义和信仰来说都与基督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也绝非无中生有的创造,那么是否值得于此纠缠只是个仁智各见的问题。不过从这一点看,选取宗教文献和概念来探索翻译问题并不容易,至少本书“真在论”一章的尝试让人觉得说服力不够。这不但由于笔者作为一个身居不同文化的无神论读者来理解异域宗教概念的门槛过高,或许即便是对于普通西方读者而言,本章要弄清“真在论”的诸多内涵并引起共鸣也颇为困难。此外,每门宗教都涉及到独特的文化和悠长的历史,要想在短短一章里将其中一个概念及其衍生阐述清楚就并非易事,更何况还要对其进行跨学科的关联和阐发。

当然,本书某些内容和观点中最招致其他学者不同意见甚至是批评的还是赫曼斯一贯的理论立场和研究方法。首当其冲的就是其颇具后现代性的建构主义立场和从差异出发探索翻译的研究方法。这种后现代性和对差异的关注必然包涵拆解性和相对主义的成分,其理论建构中也不免存在某些反悖之处,但是否真如某些学者所批评的是“反理论的”和“没有根基,也不产生实质”的虚无主义(蔡新乐,《反理论和非理论倾向简论》12;《翻译如何厚重》100)且留待后论。其实,早在1998年在英国埃斯顿大学(Aston University)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赫曼斯就指出他“关于理论的陈述就是要大胆地面对我们言说翻译中存在的复杂性和反讽”(“Concluding Comments”139)。还需指出的就是,即便赫曼斯所持的理论立场是后现代的,也是一种拆建并举的建设性后现代立场,但其目的在于“将我们从对翻译的传统假设和理论中解放出来,拷问我们固有的概念并促使我们原有语汇(vocabularies)的脱位(dislocate)”,同时“通过充满想象力的多种探索来挑战和丰富我们的概念工具”(Chesterman, “Theo Hermans”361)。

新工具多多益善,即便有一些经过实践淘洗终将被弃而不用,但大浪淘沙中必有闪光之物得以留存。因而,赫曼斯关于翻译理论的各种探索也从未裹足不前,就像他的自励之词一样“纵有光年之遥,但光始终在前行”(“Concluding Comments”140)。而当下我们应做的或许就是:拿起书,去汲取,去被鼓动。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Cai, Xinle. "Translation How to be Thick?: the Criticism of Theo Hermans' Thick Translatio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vol. 34, no. 3, 2013, pp. 97-100. [蔡新乐:《翻译如何“厚重”——西奥·赫曼斯“厚重翻译”批判》,载《外语教学》2013年第34卷第3期,第97-100页。]
- . "Torn between a Postmodern Drive and a Premodern Inclination: Crisis in the Theorization of Translatio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4, 2017, pp. 11-17. [蔡新乐:《在后现代和前现代之间吗?——翻译研究领域的反理论和非

理论倾向简论》，载《中国翻译》2017年第4期，第11-17页。]

- Chesterman, A. "Description, Explanation, Prediction: A Response to Gideon Toury and Theo Hermans." *Translation and Norms*, edited by C. Schäffner,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9, pp. 90-97.
- . "Theo Hermans. *The Conference of the Tongues*." *Target*, vol. 22, no. 2, 2010, pp. 356-62.
- Hermans, T. "Translation and Normativity." *Translation and Norms*, edited by C. Schäffner,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9, pp. 50-71.
- .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St. Jerome, 1999.
- . "Some Concluding Comments on the Debates and the Responses." *Translation and Norms*, edited by C. Schäffner,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9, pp. 133-40.
- . *The Conference of Tongues*. St. Jerome, 2007.
- . "The Translator as Evaluator." *Text and Context: Essays on Translation & Interpreting in Honor of Ian Mason*, edited by M. Baker, et al., St. Jerome Publishing, 2010, pp. 63-76.
- Holmes, James 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dited by R. van den Broeck, Rodopi B.V., 1988, pp. 67-80.
- Lauth, Laura E. "The Conference of the Tongue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vol. 32, no. 3, 2011, pp. 302-303.
- Murdoch, B. "The Conference of Tongues."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vol. 18, no. 1, 2009, pp. 151-55.
- Pym, A. "Okay, So How Are Translation Norms Negotiated? A Question for Gideon Toury and Theo Hermans." *Translation and Norms*, edited by C. Schäffner,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9, pp. 106-12.
- Schäffner, C. "The Concept of Norm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and Norms*, edited by C. Schäffner,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9, p. 1.
- Tan, Zaixi. *A Short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the West*.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4.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Tyulenev, Sergey. *Applying Luhman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in Society*. Routledge, 2012, p. 47.
- Zhu, Zhiyu. "Covergent Thinking and Reserving Differences." *Translation and Norms*, edited by C. Schäffne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2007, pp. viii-xiii. [朱志瑜:《求同和存异》,载谢美娜编《翻译与规范》(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第viii-xiii页。]

◇责任编辑:马纳克

FLC

语 言 学 研 究

创造力及英语水平对外语学习者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的影响研究

◎ 蔡晨

内容提要: 本研究以 124 名非英语专业大二学生为研究对象, 利用测试和问卷等工具探究创造力及英语水平对他们多模态隐喻广告识读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 1) 创造力和英语水平与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2) 创造力和英语水平高低在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上存在交互作用。在英语水平高的组别中, 高创造力学习者的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要优于低创造力学习者。研究结果表明, 外语学习者的创造力及英语水平能显著预测他们的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 而创造力的优势效应需要以一定的英语水平为前提。

关键词: 创造力 英语水平 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

中图分类号: H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8) 04-0126-11

作者单位: 浙江树人大学基础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5

Title: The Effects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Creativity and English Proficiency on Their Multi-modal Metaphorical Interpretation Ability

Abstracts: By taking 124 second-year non-English majors as participant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rough a test and a questionnaire the effects of creativity and English proficiency on their ability to interpret multimodal metaphors in English advertisement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Creativity and English proficiency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multi-modal metaphorical interpretation ability; 2) Learners' creativity and English proficienc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on multi-modal metaphorical interpretation ability. Among the groups with good English proficiency, the multi-modal metaphorical interpretation ability of the high creativity learner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low creativity learn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arners' creativity and English proficiency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their multi-modal metaphorical interpretation ability, and the dominant effect of creativity is based on English proficiency.

Keywords: creativity, English proficiency, multi-modal metaphorical interpretation ability

Author: Chen Cai, Lecturer, Essential School, 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一、问题提出

隐喻是人类认知活动的工具和结果,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英语教学中的隐喻能力及其应用研究,提出隐喻能力是二语习得的关键,强调要注重培养学习者的“隐喻能力”(Littlemore and Low 268)。但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隐喻的语言体现,并且完全基于语言现象,忽视了语言只是概念隐喻的表现形式之一(赵秀凤1)。随着互联网和新兴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学习者接受知识的方式已从以语言为中心的识读转变为涉及更多符号系统的多元识读,有关英语学习中的多模态隐喻成为了新的研究焦点。同单模态隐喻能力一样,多模态隐喻也是认知主体基于自身体验在两个不同范畴的认知对象之间构建一定语义关联的能力(袁凤识等4)。但不同于单模态隐喻,多模态隐喻的两个范畴(源域与目标域)分别或主要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模态来表征(Forceville 24)。具体到外语学习而言,学习者的多模态隐喻能力可细分成两方面内容,一是接受性能力,即对多模态隐喻的识读,包含识别和理解两个方面;二是产出性能力,包含对多模态隐喻的创建等方面(王寅、李弘141)。本文所讨论的多模态隐喻能力主要关注前者,即外语学习者对多模态隐喻的识读能力。人类日常的信息交流并不是仅仅通过单一的模态进行传递,而是语言、声音和视觉图像等多种模态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英语教育领域,有研究者指出,学习者外语综合应用能力的提高是在多模态的教学过程中实现的(韦琴红20),但已有研究大多利用广告或漫画等语料讨论多模态隐喻的意义建构或关注教学过程中多模态隐喻的可教性问题,对于学习者多模态隐喻能力的培养和影响因素则缺乏足够的关注。在多模态隐喻研究从描写性向阐释性的转变过程中,对影响外语学习者多模态隐喻能力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有利于进一步明晰多模态隐喻的工作机制和认知理据,从外语学习角度为多模态隐喻的动态识读提供可行的解释依据(戴理敏等32;赵秀凤1)。

隐喻能力与语言能力的关系是外语教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议题。隐喻能力强调认知主体在不同范畴事物之间建立语义联系。当主体遇到语言中的隐喻用法时,不管是母语形式还是外语形式,首先要理解的是语言的字面含义,此时反映出来的是语言能力(许保芳等49)。从单模态隐喻的相关研究结果来看,学习者的外语水平是影响他们隐喻识读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石进芳63;袁凤识、张新彬12)。多模态隐喻综合使用语言、图像和声音等多种符号来行使意义的补充功能或强化功能,学习者的英语水平与他们的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之间也应该存在某种关系。但从已有文献来看,两者的关系尚存在争议。塔拉什娃(E. Tarasheva)的调查表明,外语水平对隐喻意义的选择作用是明显的,具备较好英语能力的学习者更能理解英语新闻的多模态含义(179-90)。此外,黄媛媛有关中国外语学习者的调查也证实了上述结论,表明学习者的英语水平与他们的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128-32)。但是,威尔克(P. Wilk)认为外语水平对隐喻理解的作用不大或根本不起作用,真正影响学习者隐喻识读能力的是概念处理等其他认知因素(169-87)。蔡晨的调查也表明,影响外语学习者对多模态隐喻识读的关键因素并非他们的英语能力,而是基于目标语的百科文化知识(98-102)。

但已有研究在讨论外语水平的影响效度时，其模态的话语语境并不相同，例如塔拉什娃的研究是以英语新闻报为切入点（179-90），而蔡晨的讨论则是以英语广告为切入点（98-102）。这表明，多模态隐喻的规约性结构和语篇交际目标会影响学习者的识读能力，对于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的讨论需要融合语域和体裁框架（Deignan et al. 113）。同时，已有研究在讨论外语水平的影响效度时往往未考虑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属于单变量因果性研究，这对于多模态隐喻识读这一复杂过程显然过于简单。

隐喻能力是主体根据自身的认知体验认识事物之间语义联系的认知能力，学习者的隐喻能力与他们的认知能力之间必然也存在关联（袁凤识等 4）。创造力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能力，是个人认知思考的杰出表现，其过程是反映一连串由简单到复杂的心智活动（蔡崇建、高翠霞 75）。从单模态隐喻的相关研究结果来看，学界对学习者的创造力与隐喻能力关系的看法比较一致，即创造性思维和隐喻性思维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创造力强的人总是使用隐喻方式思考并表达自己的思想（Fine and Lockwood 139-52; Glicksohn et al. 67-70）。多模态隐喻作为单模态隐喻的延伸和发展，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各模态符号的非常规运用或异质模态符号的相互混搭，不断产生新的跨域映射和意义表征（刘靖 65）。它与单模态隐喻在概念的解读上表现出相似性，但在符号的展示上则存在差异。相比较而言，多模态隐喻中的意义创造是多种模态协同和共生的过程，因而模态成分的有意义组合、隐喻含义的逻辑性表达和符号与情景的适切性互动都需要更高的创造性思维（Koller 46）。但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第一语言习得领域，对于创造力与多模态隐喻能力的关系也鲜有实证研究。罗晓路和俞国良的调查结果表明，创造力作为一种高级的认知能力是中国外语学习者所缺乏的（15-19）。因此，中国外语学习者的创造力水平是否制约他们多模态隐喻能力的发展，他们的创造力与外语水平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明确多模态隐喻的媒介语境，将其定位为英语图文隐喻广告，探究英语水平和创造力对中国外语学习者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的影响，旨在回答在EFL课堂环境下：（1）英语水平和创造力对中国外语学习者的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存在何种影响？（2）英语水平和创造力在中国外语学习者的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上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之所以以英语图文隐喻广告作为切入点主要出于如下考虑：（1）隐喻广告强调以新颖奇特的视觉感官冲击来实现劝说的效果，是现代社会产品行销的主要媒体方式，更受当代年轻人喜爱，也与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密切相关；（2）英语图文隐喻广告涉及到语言符号和图像符号两种模态，能更好地揭示英语水平和创造力对他们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的影响。在全球化和新媒介两大时代潮流面前，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不仅符合新时期中国英语教育新的改革要求，也有助于更好揭示新媒介语境下中国外语学习者多模态隐喻能力的影响因素，厘清英语水平和创造力对多模态隐喻能力的影响机制，为更好建构中国语境下的多模态隐喻教学模式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二、研究方法

(一) 受试

本研究受试为东部沿海某高校4个班级的124名非英语专业大二学生,其中男生73人,女生51人。他们都已经经过至少10年的英语学习,英语能力整体上表现为中等水平且内部存在较大差异。

(二) 研究工具

1. 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测试

本研究对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的评估主要以波特(W. J. Potter)的框架为依据,测试的材料为英语图文隐喻广告,测试的形式为主观问答题。波特从认知、情感、美学和道德四个层面对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提出了一个整合的评估框架(156-64)。在认知层面,学习者需要了解多模态隐喻的最基础单位,可以是一个词汇或是一个图像符号。在情感层面,学习者需要感受多模态隐喻所带来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在美学层面,学习者需要运用自我的能力和经验对所接收的信息进行诠释和解读。在道德层面,学习者需要道德的良知,批判性地看待所接收的信息。研究者先根据福塞维尔(C. J. Forceville)对隐喻广告的分类,确定本研究隐喻广告的类型为VPMS,即文字和图片共现模式(108-48)。此后,研究者基于前人相关研究和日常教学素材积累,在10则广告中挑选出5则学生认为比较有创意的广告作为施测内容。广告内容与学生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涉及汽车、啤酒、手表、香水和家具等五种物品。图片中涉及的英文广告语皆为四级常见词汇,没有生僻词。受试在鉴赏完每则广告后,需要在答卷纸上回答4个问题:(1)该广告所要销售的产品是什么?(认知)(2)该广告传递出何种情感?(情感)(3)该广告中的哪些信息使你了解该广告的内容?(美学)(4)该广告要告诉我们什么言外之意?(道德)此次测试共包含20道题目,每题1分。8名学习者(不参加正式测试)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该测试能区分不同学习者的多模态隐喻能力。正式施测时,教师会在电脑屏幕上播放每张广告的海报,并给受试4分钟时间完成每则广告的识读。由于该测试的主要形式为问答题,相关问题的答案会由两位教师预先商讨确定。同时,为避免教师给分的主观性,两位老师将对受试的答题表现分别给分。事后检验表明,两位教师的评分标准存在高度相关($r=0.863, p<0.01$)。研究者取其平均值作为受试最终的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得分。

2. 创造力问卷

从以往文献来看,学者多主张从多维度的观点来讨论创造力的表现,并将其定义为能够创造出新奇有价值产品的能力(Mayer 451)。一般认为双语学习中的创造力主要包括形成新观点的能力、为现有问题提供启示的能力、运用多种方法解决同一问题的能力和在不同概念域之间发现新联系的能力(Maddux et al. 733)。张世慧认为,个体的发散性思维能反映创造力的

强弱,因而通过测量受试在发散性思维中的表现,可以有效衡量他们的创造力表现(35-42)。在综合比较创造力的主要测量工具并结合本研究的实际情况后,研究者选择了“威廉斯创造性倾向量表”(Williams Creative Tendency Scale)作为衡量受试创造力表现的工具。该量表共包含50个题目,包括冒险性、好奇心、想像力和挑战性四项,满分250分。趋于冒险、好奇心强、想象力丰富、勇于挑战未知的人就是创造性倾向强的人。受试的得分越高,表示其创造力越强。在正式测试前,研究者另对10名学习者进行预测,并根据预测的反馈结果对某些表述过长的句子进行了缩写。

3. 英语能力测试

本研究有关受试英语能力的评估主要采用CET-4成绩。该考试是中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持的全国性外语考试,满分为710分,能对大学生的英语能力进行客观、准确的测量,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所有受试都至少参与了一次CET-4考试,研究者以最近的一次四级成绩作为他们英语水平的评判依据。

(三)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的相关数据在语音实验室收集。研究者和任课教师对受试进行集体施测,以无记名方式要求受试据实作答,随即收回调查问卷。研究者先向所有受试者详细讲解研究的目的和答题要求,在所有受试都掌握答题要求并没有疑问后再实施测试。首先进行的是多模态隐喻广告识读能力的测试(25分钟),休息5分钟后再进行创造力测试(10分钟)。由于本研究受试者较多,整个测试分两次进行,在一周内完成。

研究采用SPSS Statistics 19对数据进行分析:(1)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中国外语学习者的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创造力和英语水平现状;(2)使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检测创造力和英语能力对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的影响程度;(3)使用析因分析探究创造力和外语能力在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上的交互作用。前期数据统计表明,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测试的Cronbach α 值为0.782,创造力测试问卷的Cronbach α 值为0.875,表明这两项评估的信度系数较好。

三、研究结果

所有受试均有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英语水平和创造力的得分。表1呈现了他们在上述三种能力上的平均分及标准差。从均值来看,受试的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和创造力均值分别为13.95和183.88,分别超过了临界值12和150,但英语水平则略低于临界值425。从标准差来看,受试在三项能力上的差异比较明显。这表明本研究受试在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创造力和英语水平上的整体能力尚可,但也存在内部差异大、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各组数据基本呈正态分布,说明本研究受试选取合理,能较好代表国内中等外语水平的学习者。

表1 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创造力和英语水平的描述性统计

主要统计量	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	创造力	英语水平
平均值	13.95	183.88	418.84
标准差	2.415	21.413	68.757

N=124

(一) 英语水平和创造力对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的影响

皮尔逊双尾检验显示, 受试的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与创造力之间的 r 系数为0.423, 显著性为 $p < 0.001$, 由此可见两者之间存在着中度相关。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与英语水平之间则存在着轻度相关($r = 0.318, p < 0.001$)。相关系数见表2。

表2 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创造力和英语水平的相关分析

主要统计量		创造力	英语水平
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	r	0.423*	0.318*
	p	0.000	0.000

* $p < 0.01$

为进一步确认创造力、英语水平与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之间的关系, 研究者以创造力和英语水平为因变量, 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为自变量, 进行进入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 两者的模型决定系数为 $R^2 = 0.205$, 方差检验值 $F = 15.603, sig. < 0.001$, 因而该模型具有统计意义, 即创造力和英语水平对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可以解释20.5%的变异。其中, 创造力的影响最大($Beta = 0.353$), 英语水平次之($Beta = 0.175$)。相关数值见表3。

表3 创造力和英语水平对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的回归预测分析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常量)	11.038	1.783		6.191	0.000
创造力	0.040	0.010	0.353	3.979	0.000*
英语水平	0.006	0.003	0.175	1.981	0.048*

* $p < 0.001$

两种统计方法都得出相同结果: 受试的英语水平和创造力与他们的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表明受试的创造力越好, 他们的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也越好, 受试的英语水平越好; 他们的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也越好, 反之亦然; 但创造力对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的影响效度要优于英语水平。

(二) 英语水平和创造力对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的交互作用

以上讨论只局限于创造力、英语水平与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的单一作用，并未考虑两者的交互作用，因而研究者以创造力与英语水平的平均值为参照点，将他们分为创造力高和创造力低、英语水平高和英语水平低四组。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以创造力组别和英语水平组别为自变量，以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为因变量，进行析因方差分析。相关主效应检定如表4所示。

表4 创造力和英语水平在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上的主效应检定

源	III 型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校正模型	99.795a	3	33.265	6.464	.000
截距	46938.337	1	46938.337	9120.969	.000
创造力组别	52.026	1	52.026	10.110	.002*
英语水平组别	.324	1	.324	.063	.802
创造力组别 * 英语水平组别	38.176	1	38.176	7.418	.007*
误差	617.544	120	5.146		
总计	55037.944	124			
校正的总计	717.339	123			

* $p < 0.05$

上表表明，创造力组别在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上存在主效应 ($F_{创造力}(3, 120) = 10.110$, $p < 0.05$)，英语水平组别则主效应不显著 ($F_{英语水平}(3, 120) = 0.063$, $p > 0.05$)。同时，创造力组别与英语水平组别之间存在交互作用 ($F(3, 120) = 7.418$, $p < 0.05$)。事后检验表明，就英语水平高的学习者而言，他们的创造力组别在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别 ($F_{创造力}(1, 63) = 15.078$, $p < 0.05$)，创造力高的学习者在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上的表现要优于创造力低的学习者 ($M_{高} = 21.96$, $M_{低} = 19.41$)。但是，创造力组别在英语水平低的组别中则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F_{创造力}(1, 57) = 0.123$, $p > 0.05$)。上述统计结果表明，创造力对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的促进作用需要以英语水平为前提，只有当受试的英语水平达到一定的临界值之后，他们的创造力优势在多模态隐喻识读上才会体现出来。

四、研究讨论

研究结果发现，创造力和英语水平与学习者的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不同创造力组别和外语水平组别的学习者在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上存在交互作用。本部分拟从以上两个方面分别展开讨论。

(一) 创造力和英语水平对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的影响

研究发现，学习者的创造力能显著影响他们的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具体结果见表2和

表3)。这拓展了有关创造力和隐喻能力的研究,表明学习者的创造力与他们的多模态隐喻能力之间同样存在密切关联。克韦切什(Z. Kövecses)认为,隐喻创造力的理据源于其体验基础和语境差异(689)。体验基础决定了隐喻思维的普遍性,而语境的差异则决定了隐喻创新的无限可能。就多模态隐喻广告而言,其根本目的在于改变思考的方向和颠覆既有的法则,使得作品能够表达更为深邃和强烈的内涵,其实质就是广告创作者创意的体现。在此背景下,无论对于多模态隐喻的构建者还是解读者来说,隐喻广告的识读过程都是对其创造性思维的有益历练,因而创造力越强的学习者往往具有更好的思维能力和洞察能力,更容易将显性的语言和符号知识内化为隐性知识,进而想象和鉴赏高度创意的隐喻广告。这表明,多模态隐喻和单模态隐喻虽然在模态的表现上存在差异,但在隐喻思维的表现上则存在相似性,创造力作为一个重要的认知因素在多模态隐喻的识读中同样起到重要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学习者的英语水平也与他们的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之间存在积极的正向关系(具体数值见表2),这呼应了塔拉什娃和张义君^[1]等人的发现,表明学习者的英语水平是影响他们多模态隐喻能力的另一重要因素。在多模态隐喻的识读过程中,学习者需要对多模态隐喻所包含的不同类型信息进行分析才能形成基本的认识,而语言符号作为学习者最熟悉的一种模态表达方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必然会凸显。埃文斯(V. Evans)认为,隐喻的理解首先是语言驱动的,隐喻中词语的基本意义会为学习者隐喻意义的激活提供指向(654),徐(X. Xu)也认为学习者对语言形式承载意义的了解程度会影响他们对隐喻的理解(1630)。本研究使用的多模态隐喻广告涉及的语言形式比较简单,往往只有一个简短的句子,但包含的词汇意义则十分丰富。例如在一则家具广告中,虽然只有一个短语start a fresh life,但相关词汇会帮助学习者将思考焦点转向日常生活语境。研究者在访谈中也发现,学习者对于多模态隐喻的识读往往是从语言符号开始,在此基础上才会将形象、色彩和空间分布等纳入考量。另外,对于多模态隐喻的识读同样涉及到概念隐喻和符号隐喻两个层面。英语水平好的学习者除了具备丰富的语法词汇知识外,对于英语文化和概念体系必然也十分熟悉,因为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从这个角度来说,英语水平好的学习者在语言文化知识的丰富性上也会更好,也会更容易理解多模态隐喻英语广告中所使用的形象、色彩和前景背景等隐喻含义。

但是,本研究中学习者的英语水平对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的预测作用不如创造力显著(具体数值见表3)。这可能与本研究所选取的多模态媒介有关。就多模态隐喻而言,语言模态起到了重要的识读作用,但对于整体隐喻意义的识读还是要综合考量所有的模态要素。蔡晨认为,相比较单模态隐喻而言,学习者在多模态隐喻的识读过程中会更依赖图像符号而非语言水平,因而他认为视觉语法水平要比语言符号水平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更明显(101)。就本研究的多模态隐喻广告而言,语言符号在广告中所占的模态比重相对较轻,受试的英语水平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自然不如其在单模态隐喻中所起的作用明显。至于在多模态隐喻识读中,语言水平和视觉水平何者起到更大的作用则还需要在未来进一步探究。

（二）创造力和英语水平对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的交互分析

通过对创造力和英语水平在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上的主效应进行检定,研究发现两者存在交互作用(相关数据见表4)。在英语能力好的组别中,高创造力学习者的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要优于低创造力学习者。这表明,在学习者对多模态隐喻广告的识读过程中,创造力的优势效应需要以一定英语水平为前提。这与魁肯和维德(F. Kuiken and I. Vedder)的研究相一致,即当学习者的外语水平达到能处理抽象复杂任务的水平时,解决任务的关键在于认知能力(48-60)。只有在学习者理解多模态隐喻中语言符号字面含义的基础上,他们才会在大脑中运用意向或概念进行思维活动,寻找不同范畴中事物在语义上的相似性。就本研究而言,英语能力较好的学习者在多模态符号基本信息的理解上往往不存在问题,他们在识读过程中碰到的最大问题往往是如何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对接收的信息进行组织和整合。整体上而言,具备较强创造力的学习者往往更能发挥其创造思维,充分调动语义认知网络进行高级的认知推理活动,而创造力不足的学习者往往会停留在符号基本意义的解读上,不能激活广泛的认知体验使得隐喻意义的识读顺利进行。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在英语能力差的组别中,不同创造力水平的学习者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卡明斯(J. Cummins)的临界点假说认为,双语学习能帮助学习者在脑中形成两套语言系统,进而形成特殊的认知机制,这种特殊认知控制能力又可转移到一般认知控制能力中,促使外语学习者认知能力的提高(121-29)。但双语认知优势的实现要以两种语言的协同发展为前提,如果两种语言能力之间相差太多,学习者的认知能力不仅不能提高,相反会有负面效应。就本研究的受试而言,他们的汉语能力表现优秀,但英语能力属于中等偏下,整体上属于单语优势群体。在英语能力差的组别中,他们的创造力虽然也存在差异,但整体上表现也差,其整体均值只有175.65,低于平均值183.88,与英语高水平组的学习者相比,他们的英语水平限制了创造力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他们的英语水平没有达到一定的临界值,较弱的创造力还不足以使他们对多模态隐喻做出正确合理的识读。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目的在于考察新媒介语境下中国外语学习者的英语水平、创造力对他们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的影响,进而检验两者是否存在交互作用。研究发现,学习者的创造力、英语水平与他们的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两者能积极预测学习者的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以上发现为隐喻研究领域有关外语能力有效性的争论提供了新的实证材料,表明学习者对英语多模态隐喻的识读同样需要语言能力的驱动。同时,创造力作为一种主要的认知能力,在多模态隐喻的识读上同样存在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还发现,创造力和英语水平在多模态隐喻能力上存在交互作用,在英语水平好的组别中,高创造力学习者的识读能力要优于低创造力学习者。这表明,创造力在多模态隐喻中的识读效应需要以一定的英语

能力为前提。以上结论进一步厘清了英语水平和创造力在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上的影响机制,表明两者存在协同效应。

本研究结果对于英语多模态隐喻教学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基于以上结论,研究者建议,考虑到多模态隐喻的特殊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首先要加强文字模态的讲解,要将词义的讲解与文化信息相结合,着重讲解词语在广告语境中如何通过延伸和拓展发展出隐喻义。其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创造力的培养,要通过多模态符号的选取和组合,引导学习者了解英语隐喻广告所展现的符号面貌和意义传递机制,进而引领他们去探索意义、主题、价值和需求等意识形态内容,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就英语多模态隐喻广告而言,隐喻意义的表达趋于整合性和多重性,教师只有充分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英语能力和认知能力的协同发展才能更好地培养他们的多模态隐喻能力。

注释 [Notes]

[1] 参见张义君:《英语专业学生多元识读能力实证研究》,载《外语界》2011年第1期,第45-52。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Cai, Chen. "An Investiga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Media Literacy of Commercial Advertisements." *Journal of 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no. 4, 2017, pp. 98-102. [蔡晨:《新媒体语境下大学生对商业广告的媒体识读表现》,载《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98-102页。]
- Cai, Chongjian, and Cuixia Gao. "Intelligence and Creativity: Analysis and Enhancement of Human Mind." *Educational Materials Quarterly*, no. 3, 2005, pp. 75-96. [蔡崇建、高翠霞:《智力与创造力:人类心智析论与强化》,载《教育资料集刊》2005年第3期,第75-96页。]
- Cummins, J. "Cognitive /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 Linguistic Interdependence, the Optimum Age Question and Some Other Matters." *Working Papers on Bilingualism*, vol. 19, 1979, pp. 121-29.
- Dai, Limin, et al. "An Analysis of the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of Multimodal Metaphor Interpretation." *Computer-assiste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no. 1, 2013, pp. 32-36. [戴理敏等:《多模态隐喻识解的理想化认知模型分析》,载《外语电化教学》2013年第1期,第32-36页。]
- Deignan, A., et al. *Figurative Language, Genre and Register*. Cambridge UP, 2013.
- Evans, V. "Figurative Language Understanding in LCCM Theory." *Cognitive Linguistics*, vol. 21, no. 4, 2010, pp. 601-62.
- Fine, H. J., and B. R. Lockwood. "Figurative Language Production as a Function of Cognitive Style."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vol. 1, no. 2, 1986, pp. 139-52.
- Forceville, C. *Pictorial Metaphor in Advertising*. Routledge, 1996.
- Glicksohn, J., et al. "A Note on Metaphoric Thinking and Ideational Fluency." *Metaphor and Symbol*, vol. 8, no.1, 1993, pp. 67-70.
- Huang, Yuanyuan. "Investigation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Multiple Literacy." *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2, 2013, pp. 128-32. [黄媛媛:《大学生多元识读能力影响因素调查》,载《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128-32页。]
- Koller, Veronika. "Brand Images: Multimodal Metaphor in Corporate Branding Messages." *Multimodal Metaphor*, edited by C. J. Forceville and U. A. Eduardo, Mouton de Gruyter, 2009, pp. 45-71.
- Kövecses, Z. "A New Look at the Metaphorical Creativit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gnitive Linguistics*, vol. 21, no. 4, 2010, pp. 663-97.

- Kuiken, F., and I. Vedder. "Cognitive Task Complexity and Written Output in Italian and French as a Foreign Language."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vol. 17, no. 1, 2008, pp. 48-60.
- Littlemore, J., and G. Low. "Metaphoric Competence and Communicative Language Ability." *Applied Linguistics*, vol. 27, no. 2, 2006, pp. 268-94.
- Liu, Jing. "Construction of Creativity Training M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modal Metaphor." *Journ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no. 2, 2017, pp. 63-67. [刘靖:《多模态隐喻视域下的创造力培养模式构建》,载《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第63-67页。]
- Luo, Xiaolu, and Guoliang Yu. "A Correlation Study on Adolescents' Creativity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Chinese Journal of Education*, no. 6, 2010, pp. 15-19. [罗晓路、俞国良:《青少年创造力、心理健康发展特点及相互关系》,载《中国教育学刊》2010年第6期,第15-19页。]
- Maddux, W. W., et al. "When in Rome... Learn Why the Romans do What They do: How Multicultural Learning Experiences Facilitate Creativ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6, no. 6, 2010, pp. 731-41.
- Mayer, R. E. "Fifty Years of Creativity Research." *Handbook of Creativity*, edited by R. J. Sternberg, Cambridge UP, 1999, pp. 449-60.
- Potter, W. J. *Media Literacy*. Sage Publication, 2005.
- Shi, Jinfa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 Tongue Conceptual Transfer Ability, Metaphorical Competence and Language Proficienc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no. 3, 2012, pp. 57-63. [石进芳:《母语概念迁移能力、隐喻能力与语言水平的发展关系研究》,载《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3期,第57-63页。]
- Tarasheva, E. "Media as Content for Language Learning at University: Impact on Language Proficiency." *Realizing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edited by W. Robert and V. Zegers, Maastricht UP, 2008, pp. 179-90.
- Wang, Yin, and Hong Li. "The 'Three in One' Teaching Concept of Language Competence,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nd Metaphorical Competence: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Conceptual Theory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Journal of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no. 6, 2004, pp. 140-43. [王寅、李弘:《语言能力、交际能力、隐喻能力“三合一”教学观——当代隐喻认知理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第140-43页。]
- Wei, Qinho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verall Meaning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Discourse Analysis Based on a Multimodal Media Discourse." *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no. 6, 2008, pp. 16-21. [韦琴红:《论多模态话语的整体意义构建——基于一个多模态媒体语篇的话语分析》,载《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16-21页。]
- Wilk, P. *Some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Learners' Figurative Language Competence across Modalities: Metaphor, Metonymy and Blending in the Picture Modality*.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5.
- Xu, Baofang, et al. "Motivation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aphorical Competence and Language Competence."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no. 1, 2014, pp. 47-50. [许保芳等:《隐喻能力与语言能力关系的理据分析》,载《外语研究》2014年第1期,第47-50页。]
- Xu, X. "Interpreting Metaphorical Statements."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 42, no. 6, 2010, pp. 1622-36.
- Yuan, Fengshi, et al. "On the Definition of Metaphorical Competenc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no. 5, 2012, pp. 1-7. [袁凤识等:《再论隐喻能力的定义》,载《外语教学》2012年第5期,第1-7页。]
- Yuan, Fengshi, and Xinbin Zhang. "A Contrastive Study of Cognitive Ability of Conceptual Metaphor in Different Levels of Languag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no. 2, 2015, pp. 7-12. [袁凤识、张新彬:《不同语言水平的认知主体概念隐喻归纳能力对比研究》,载《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2期,第7-12页。]
- Zhang, Shihui. *Creativity: Theory, Technology and Cultivation*. Wunan, 2010. [张世慧:《创造力:理论、技术技法与培育》。台湾:五南出版社,2010。]
- Zhao, Xiufeng.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onceptual Metaphor: Multimodal Metaphor Research." *Foreign Language Study*, no. 1, 2011, pp. 1-10. [赵秀凤:《概念隐喻研究的新发展——多模态隐喻研究》,载《外语研究》2011年第1期,第1-10页。]

国家安全视角下新疆高校外语规划研究

◎ 贾春燕

内容提要: 语言规划的安全维度是新时期语言政策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 加强对边疆地外语规划的安全属性的研究, 才能更好的体现语言规划服务社会的实际作用和价值。文章基于国家安全视角, 从新疆高校目前的外语教育能力和适应新疆地方经济发展所需的外语需求两个维度, 梳理区域发展中潜在的语言能力缺失问题, 并据此对新疆高校的外语规划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国家安全 新疆 外语规划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8) 04-0137-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语言学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周边国家语言政策对新疆语言规划的影响和对策研究”(17BY076); 新疆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语言安全视角下新疆周边国家语言战略研究”(17BY08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等职业院校英语教学改革项目重点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高职院校英语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XJZYJG2017k01)

作者单位: 新疆教育学院外国语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Title: A Study of Xinjiang Higher Education Language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ecurity

Abstract: The security dimension of language planning is one of the major topics in the contemporary study of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effects and values for language planning, i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study on language planning in the Xinjiang. The paper draws on two dimensions that are the current foreign languages capacities of Xinjiang higher education and an extensive survey of foreign languages demand of Xinjiang. The research finds the issues of deficiency of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on how to develop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based on the geographic 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in Xinjiang.

Keywords: national security, Xinjiang, foreign language planning

Author: Chunyan Jia, Lecturer,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Xinjiang Teacher's College, Urumqi, Xinjiang, China.

“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后,国家安全中的语言问题就受到语言文字、国家安全、国家关系、国防军事等多个学科的广泛关注,迅速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张日培15)。在影响国家安全的诸多社会因素中,语言作为人类文化、思想和交际的载体,起着特别的作用。

国外学者近五十年来从不同角度对语言安全进行了定义。美国语言学家豪根(Einar Haugen)最先提出语言安全的概念,他认为语言安全是指个人语言形式和用法不准确而产生的心理不安(63-69)。英国学者阿格(Dennis Ager)将“语言安全确定为语言规划的重要目标和价值取向”(80)。我国学者近年来以语言安全为视角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基于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国别研究。戴曼纯在研究苏联的语言政策后指出,“语言被分裂型民族主义者利用,成为民族分裂工具,危害国家安全”(《语言与国家安全》1)。赵蓉晖在分析了四个与语言高度相关的分裂主义活动案列后,认为“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民族认同标志之一,与国家主权、领土完成、民族和谐息息相关”(31)。第二,基于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语言和语言规划研究。戴曼纯指出,“语言规划以国家为目标”(《国家语言能力》127);沈骑指出,“语言规划的安全维度是新时期我国语言政策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非传统安全领域》103)。第三,论述少数民族地区语言生活和国家安全的研究。尹小荣在讨论新疆的语言战略问题中提出要“明晰区域战略目标,树立语言安全理念”(158);戴庆厦在分析中缅边境的跨境语言景观之后指出“跨境语言是一种资源,处理得好,有利于两侧民族的和谐发展和稳定安全;处理不好,对民族发展、国家安全会产生负面影响”(47)。第四,建构母语规划体系,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语言认同的角度论述语言安全和国家安全关系的研究。例如方小兵指出,“通过建设一个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社会和谐、交际网络稳定、凝聚力强的社区,来维持语言生活和语言生态,以达到保障母语安全的目的”(17)。

在这些已有的研究中,涉及到新疆外语规划和安全问题的研究还不丰富。尹小荣的研究主要关注了新疆本地区的多民族、多语言的语言生态状况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涉及到新疆的外语教育规划问题(158-74)。李海英和李现乐的研究以新疆地区为例,探讨了边疆地区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关系之间的研究模式,从宏观角度提出了基于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边疆地区语言规划的路径(61-69)。

这些研究以理论探讨居多,微观层面的具体实证研究较少,尤其是围绕新疆地区外语规划和国家安全进行的实证研究还鲜有涉及。本文基于国家安全视角,以提升新疆区域外语能力为目的,通过探讨新疆高校外语建设能力、区域发展语言需求等问题,力图对新疆高校的外语规划提出合理建议,为语言规划和安全部门提供政策参考,使新疆的高校外语发展服务于“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面临的新目标和任务,满足本地区语言安全需求,维护国家利益,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铺设语言之路,开启语言相通、民心相通之门。

一、语言与安全的关系

2004年,我国著名学者刘跃进首次提出“语言文字问题”是文化安全的第一要素的观点。他指出,“文化安全虽然包括了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念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四个基本方面”(89)。随后语言问题“安全化”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余潇枫基于非传统安全理论,“将一国所面对的非传统安全风险和威胁类型,根据其发生源和问题属性,分为内源性、外源性、双源性和多源性四类”(16)。沈骑又根据余潇枫的理论,从语言安全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双源型语言问题主要发生在我国边疆区域(特别是民族自治区)与周边国家,双源性语言安全问题的主题往往是双重的,甚至是内外联动的”(《语言安全战略》21-23)。张日培则更加全面地提出了语言影响国家安全中涉及到的九大语言问题,即“语言殖民问题、英语全球化带来的问题、语言污染问题、分裂主义与语言问题、跨境语言问题、语言濒危问题、外语能力不足问题、语言技术研发问题、语言使用和话语体系建设问题”;还提出了基于国家安全层面的五种不同的语言规划治理范式(16-17)。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语言与安全的关系,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研究范式。本文基于张日培先生提出的外语能力不足会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的观点进行实证研究,希望通过区域语言的规划治理来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将区域外语能力建设纳入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战略之中;通过分析边疆地区外语规划的安全属性,来更好的体现语言规划服务社会的实际作用和价值。

二、新疆高校外语发展现状

新疆位于祖国的西北边陲,是我国边界线最长、邻国最多的一个省级行政区。新疆地区多民族聚居,分布着大量的跨境民族和跨境语言。近年来,周边国家的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都积极利用宗教、民族等因素向我国境内渗透,这些都使得新疆的语言问题与国际关系和民族问题相互交织,语言安全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新疆面临着来自于中亚、南亚和西亚等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安全等诸多方面复杂风险。语言在维护国家安全、促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因此摸清新疆目前各高校的外语发展现状,为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语言保障,合理规避由于外语能力不足而带来的潜在安全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事业统计公报》,全疆共有48所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其中有普通本科院校13所,独立学院5所(不单独计较数),高职(专科)院校29所,成人公办高等学校6所^[1]。本研究通过查阅各个学校官方网站的招生信息、电话访谈和邮件等形式,对全疆的48所高校进行了调研。

结果显示:1)疆内所有的高校均开设有英语课程,其中的3所院校设有英语硕士点;2)

开设俄语课程的高校共 14 所,俄语硕士点 2 个;3) 开设三种或三种以上语种的学校共 4 所(见表 1);4) 全疆高校有能力开设的外语语种共 7 种,分别为英语、俄语、阿拉伯语、乌尔都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印地语。除英语、俄语和阿拉伯语为通用语外,其它均为非通用语言^[2],即新疆师范大学的乌尔都语专业,石河子大学的波斯语专业以及新疆教育学院开设的土耳其语、波斯语、印地语专业;5) 全疆的非通用语专业均为 2016 年以后首次设立。新疆教育学院 2016 年首次招收土耳其语专科(26 人);2017 年首次开设波斯语专科(17 人);2018 年开设印地语专科(10 人)。新疆师范大学 2017 年 9 月首次开设乌尔都语本科(24 人);石河子大学 2017 年开设波斯语本科(18 人);6) 全疆开设语种最多的院校是新疆教育学院,共开设有 6 个语种。

在调研新疆地区各高校培养方案的过程中,也不难发现他们受到传统外语学科培养思路的限制和师资、教材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新疆地区高校的外语教学仍然侧重于传统的语言学、翻译以及教学法方向。例如,新疆大学在研究生培养层面主要涉及六个方向,即英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笔译、俄语笔译和俄语口译。在本科层次上,俄语专业侧重于经贸和翻译方向,阿拉伯语专业侧重于翻译方向。新疆师范大学英语研究生层面主要开设六个方向的课程,即语言与语言教学、跨文化交际、语言与翻译、中学英语教学、大学英语教学、学科教学(英语);俄语研究生方向则主要培养翻译硕士;英语本科主要开设英语教学法、英美文学等课程,侧重于对学生英语教学法的培养;而俄语本科主要侧重于经贸人才的培养;乌尔都语也侧重于培养经贸方向的人才。石河子大学的英语硕士主要培养的是学科教学(英语)方向的人才;阿拉伯语本科主要开设有阿拉伯语经贸应用文写作、阿拉伯语经贸谈判等课程,侧重培养学生的国际贸易能力;俄语本科也开设有经贸类课程。新疆教育学院除了英语专业侧重英语教育方向,剩下的俄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印地语和土耳其语则依托阿里巴巴的“百城千校”项目,培养跨境电商方向的人才。

表 1 新疆地区开设三种及以上外语种类的高校

		新疆大学	新疆师范大学	石河子大学	新疆教育学院
1	英语	硕士 本科	硕士 本科	硕士 本科	专科
2	俄语	硕士 本科	硕士 本科	本科	专科
3	阿拉伯语	本科	/	本科	专科
4	波斯语	/	/	本科	专科
5	土耳其语	/	/	/	专科
6	印地语	/	/	/	专科
7	乌尔都语	/	本科	/	/

三、国家安全视角下的新疆区域外语语种需求分析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的语言接触变得越来越频繁。因此,我国在进行外语教育规划时需考虑以下因素:1)他国的语言政策;2)外语语种的语言等级;3)国际(区域)语言秩序;4)我国的国家战略;5)我国不同地区所处的地缘环境对外语语种的实际需求。

笔者试图从经贸安全、国家安全、区域性组织和地缘安全四个维度梳理适应新疆区域发展的外语需求。

从经贸安全角度而言,根据新疆统计局发布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新疆对哈萨克斯坦进出口额为57.48亿美元;吉尔吉斯斯坦32.37亿美元;塔吉克斯坦13.93亿美元;俄罗斯9.38亿美元^[3]。上述四个国家是新疆主要的进出口贸易伙伴。而随着2016年12月瓜达尔港的正式启用,中巴经济走廊的合作将开启新的篇章,巴基斯坦势必成为新疆重要经贸伙伴之一。

以国家安全角度而言,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上海合作组织黄皮书: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7)》显示,中亚国家土生土长的恐怖组织主要有:“中亚圣战者联盟”(主要活动于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哈里发战士”恐怖组织(主要活动于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汇处)、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安拉战友会”、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公正统治军”;遍布整个中亚地区、顺利在各国之间潜入潜出、对区域安全有重大威胁的恐怖组织,如“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乌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成立于巴基斯坦);还有一些恐怖组织在域外创立并极力向中亚国家渗透,地区影响力快速增强,如创建于巴勒斯坦的“伊斯兰解放党”、创立于印度梅瓦特的“达瓦宣教团”、在埃及成立的“赎罪与迁徙组织”等。这些恐怖组织对我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新疆的社会稳定影响巨大^[4]。

与新疆相关的区域性组织只有上海合作组织。其成员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观察员国为阿富汗、白俄罗斯、伊朗和蒙古国。自从2017年6月巴基斯坦和印度正式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上合组织成员国人口占世界比重从25%提升到44%;安全合作从维护中亚及其周边稳定扩大到欧亚大陆区域安全稳定。该组织对我国特别是对新疆的边境安全和边境贸易意义重大。

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熟悉邻居的语言自然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新疆是我国邻国最多的省级行政区,分别与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国和阿富汗八个国家接壤。通过上述因素梳理,共涉及中亚、西亚、南亚、欧洲等11个国家,分别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阿富汗、蒙古国、伊朗以及白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国家语言或者官方语言如表2所示:

表2 新疆周边国家语言情况列表

序号	国家	国家语言	官方语言
1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语	俄语
2	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语	俄语
3	塔吉克斯坦	波斯语	俄语
4	巴基斯坦	乌尔都语	英语
5	印度	印地语	英语
6	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语	俄语
7	俄罗斯	俄语	/
8	阿富汗	达里语 普什图语	/
9	蒙古国	蒙古语	/
10	伊朗	波斯语	/
11	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语	俄语

根据语言出现的频次进行统计。俄语在所有语言中出现频率最高,为21次;其次为英语,出现8次;哈萨克语,5次;吉尔吉斯语,5次;塔吉克斯坦语,4次;巴基斯坦的国家语言乌尔都语,4次;印度的国家语言印地语,4次;阿富汗和伊朗的国家语言波斯语(达里语),4次;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语言乌兹别克语,为3次;阿富汗的国家语言普什图语,为3次;蒙古国的国家语言蒙古语,为2次;白俄罗斯的国家语言白俄罗斯语,为1次。

表3 新疆社会经济发展急需的语言统计

序号	语言	频次
1	俄语	21
2	英语	8
3	哈萨克语	5
4	吉尔吉斯语	5
5	乌尔都语	4
6	印地语	4
7	波斯语	4
8	普什图语	3
9	蒙古语	2
10	白俄罗斯语	1

表3发现:1)现阶段新疆社会经济发展急需的关键语种为俄语和英语,其次为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塔吉克语、乌尔都语、印地语和波斯语,最后为普什图语、蒙古语和白俄罗斯语。2)急需语言共涉及11个国家的10种语言,除俄语和英语以外,其他8种语言为非通用语。3)俄语在地区经贸中显得最为重要,出现频次为21次。4)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蒙古语和俄语这5种语言都属于跨境语言。

四、研究结论与新疆高校外语规划发展的建议

通过梳理新疆高校外语发展现状,并从地缘环境角度对比外语的实际需求,我们发现:1)新疆高校对外语教育功能的规划单一,不能有效服务于国家安全;2)外语种类不全,跨境语言人才的培养基本属于空白;3)语言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开发,服务区域经济能力欠缺。因而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 细化外语教育功能规划,维护边境安全

目前,新疆高校仅有能力培养6个语种的外语人才,且在人才的质量和外语人才的复合化程度上都比较薄弱,外语教育的功能规划尚不完备,很多与边疆安全相关的语种建设有待加强。与此相伴的是,新疆近年来受制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等因素,人才引进相对困难。而中亚国家的一些跨境语言,南亚和西亚国家的一些小语种,例如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语、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阿富汗的普什图语等,对于我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和保障“丝路”安全,恰恰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2017年,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小语种人才。由于非通用语人才在全国范围内的紧缺和新疆发展的相对落后,招聘结果不尽如人意。其中,土耳其语和普什图语人才缺口严重,均未招到合适人选。因此新疆的外语教育发展,应依托自身的区位特点,充分考虑地缘因素,不仅要培养能使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从事对外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复合型外语人才,还要培养精通中亚、南亚国家的国家语言,特别是培养能够承担网络舆情监控、网络语言生态、日常情报收集、边境检查等任务的国安人才和相关语种的语言技术人才。同时对涉及反恐维稳等方面的关键语言,要研发多语种的关键词文字识别和语音识别技术,以有效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维护我国边疆地区的安全。

(二) 重视跨境语言安全,维护国家主权

新疆本土语言资源丰富,仅世居的13个民族就有11种语言: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蒙古语、达斡尔语、锡伯语、塔吉克语和俄罗斯语。这些语言在自治区的族际之间被广泛使用。其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蒙古语、塔吉克语和俄罗斯语这7种语言都属于跨境语言。跨境语言问题实际上是民族关系和语言关系处理中与国家安全最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黄行的研究表明,在跨境语言方面,“多数境外的语言地位高于中国的语言,或者语言地位基本持平”(7)。同时,在新疆的某些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不高,存在着只能用本民族语言进行交流的现象。这些语言现象都容易弱化国家认同,出现跨境族群的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情况,形成安全隐患。因此有学者指出,“边境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与民族认同,模糊了彼此的国家界限,如果没有合理地加以引导而被别有用心势力所误导,则会导致国家的安全问题”(袁善来、康忠德156)。

跨境语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促进边境贸易文化的交流,另一方面如果不重视跨

境语言安全,则容易被境外的民族分裂分子利用,沦为分裂国家的工具。因此新疆要对语言社区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一方面要大力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语言之力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另一方面要合理利用跨境语言的区位优势,建立动态人才资源库,储备通晓跨境语言的高端语言人才,在边境的经贸文化往来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三) 开发语言资源,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语言作为一种无成本的经济资源,可以反复利用。新疆地区的外语教育要积极利用自身的优质资源,结合当代信息技术,开发各类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新型的语言学习资源,如跨境语言的电子词典、在线翻译平台、多语云智库平台等。此外,还可以借助大数据发展需要,提供语言应用服务,如利用多语优势,搭建中亚医疗服务网站,利用亚欧博览会的契机拓宽中亚、西亚和南亚的招商情报服务平台和会展业务平台等移动网络在线平台等。利用“语言+”能力,结合新疆的农产品优势和地缘优势,大力培养跨境电商人才,拓宽新疆农村青壮年特别是南疆地区青壮年的就业技能和脱贫致富能力,为边疆的安全稳定奠定经济基础;同时推动新疆与中亚、西亚和南亚的经济发展,真正使外语专业的人才培养、语言资源的开发成为助力我区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成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将推动新疆与沿线国家经济的深度合作,促进与周边国家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从而推动新疆经济的发展。新疆外语界要抓住机遇,及时调整外语发展规划。新疆高校的外语发展应注重提升办学层次、细化专业方向、增加语种数量、改善语种结构,加快语言人才的培养要切实利用好新疆丰富的语言资源,做好语言的服务工作。

在当前我国加强国家安全的国情下,地缘政治、边境贸易以及安全形势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加强边疆地区语言规划安全属性研究,使语言规划更好的服务于国家安全,才能凸显其服务社会的实际作用和价值。研究新疆高校外语发展能力,理清外语在国家安全中的实际作用,有助于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事实依据;在实践中有利于新疆各大高校捋顺外语学科发展思路,及时将外语能力建设对接自治区的战略发展,以适应新形势下的语言安全问题。

注释 [Notes]

- [1] 参见《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5月7日, www.xjban.com/xjjyt/sytj/2018/105865.htm
- [2] 教育部2000年初《关于申报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的通知》中将非通用语种定义为除法、德、俄、日、西班牙、阿拉伯语等7种外语以外的语种。
- [3]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4月11日, news.163.com/16/0411/09/BKC4JP3500014AED.html。
- [4] 参见李进峰:《上海合作组织黄皮书: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Ager, Dennis. *Motivation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1.
- Dai, Manchun. "National Language Capabilities, Language Planning and National Security." *Applied Linguistics*, no. 6, 2011, pp. 123-31. [戴曼纯:《国家语言能力、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载《语言文字应用》2011年第6期,第123-31页。]
- . "Language and National Security: A Perspective From Language Policies in the Soviet Union."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no. 6, 2015, pp. 1-14. [戴曼纯:《语言与国家安全:以苏联语言政策为例》,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15年第6期,第1-14页。]
- Dai, Qingxia. "A Study on the Harmonious and Conflicting Relation between Pluricentric Languages: Taking the Case Study of Sino-Burma Jinghpo Language as an Example." *Chinese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no. 2, 2016, pp. 47-52. [戴庆厦:《论跨境语言的和谐与冲突——以中缅景颇族个案为例》,载《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2期,第47-52页。]
- Fang, Xiaobing. "Speech Community Planning and Mother Language Security."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no. 6, 2015, pp. 17-29. [方小兵:《语言社区规划与母语安全》,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15年第6期,第17-29页。]
- Haugen, Einar. "Schizoglossia and the Linguistic Norm." *Monograph Series o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no. 15, 1962, pp. 63-69.
- Huang, Xing. "Cross-border Language Situations in China and in the Core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no. 9, 2015, pp. 1-8. [黄行:《我国与“一带一路”核心区国家跨境语言文字状况》,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9期,第1-8页。]
- Li, Haiying, and Xianle Li. "The Research on Language Planning and National Security about Border Areas: A Case Study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Jiangan Academic*, no. 3, 2014, pp. 61-69. [李海英、李现乐:《边疆地区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构想——以新疆地区为例》,载《江汉学术》2014年第3期,第61-69页。]
- Liu, Yuejin. "The Content of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ies." *The Northern Forum*, no. 5, 2004, pp. 88-91. [刘跃进:《解析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内容》,载《北方论丛》2004年第5期,第88-91页。]
- Shen, Qi. "A Study of Language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an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no. 5, 2014, pp. 103-12. [沈骑:《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语言规划研究:问题与框架》,载《语言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5期,第103-12页。]
- . "Strategy for Linguistic Security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Chinese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no. 3, 2016, pp. 20-25. [沈骑:《“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安全战略》,载《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3期,第20-25页。]
- Yu, Xiaofeng. "'Peaceful China': Value Conversion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Governance Studies*, no. 4, 2012, pp. 12-17. [余潇枫:《“平安中国”:价值转换与体系建构》,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4期,第12-17页。]
- Yuan, Shanlai, and Zhongde Kang. "Research on Pluricentric Languages between Vietnam and China and Border Security." *Heilongjiang National Series*, no. 4, 2014, pp. 152-56. [袁善来、康忠德:《中越跨境语言与边疆安全研究》,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第4期,第152-56页。]
- Yin, Xiaorong. "Research on Linguistic Strategy of Xinjiang in the View of Language Security." *Social Sciences in Xinjiang*, no. 6, 2015, pp. 158-63. [尹小荣:《语言安全视角下的新疆语言战略研究》,载《新疆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第158-63页。]
- Zhao, Ronghui. "Secessionism and Language Problems."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Education*, no. 1, 2015, pp. 31-38. [赵蓉晖:《分裂主义与语言问题》,载《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2015年第1期,第31-38页。]
- Zhang, Ripei. "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Planning: Paradigm Construction in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 6, 2018, pp. 15-26. [张日培:《国家安全语言规划: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范式建构》,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5-26页。]

◇责任编辑:陈忠平

近代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英语口语教科书 ——《英华学生口语手册》研究

◎ 卞浩宇

内容提要: 1826年一本名为《英华学生口语手册》的英语口语教科书在马六甲出版发行。该书作者系马六甲英华书院中国学生袁德辉。就现有史料而言,该书可以说是近代由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英语教科书。《英华学生口语手册》以其编纂的“专业性”、内容的实用性和教学的针对性,不仅对当时英华书院的英语教学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而且对当前英语教科书的编写亦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关键词: 英语口语教科书 袁德辉 英华书院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8) 04-0146-09

基金项目: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马六甲英华书院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1818-1843)”(2017SJB1413)

作者单位: 苏州市职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12

Title: The First Oral English Textbook Compiled by a Chines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 Study o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Students Assistant, or Colloquial Phrases, Letters & c,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bstract: In 1826,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Students Assistant, or Colloquial Phrases, Letters & c, in English and Chinese* was published in Malacca. The author was a student from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whose name was SHAOU TĪH. As far as the current data is concerned, the book was the first English textbook compiled by a Chines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professionalism, practicability and pertinency reflected in the textbook, not only exerted positive influence on English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at that time, but also is of gre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o present compilation of English textbooks.

Keywords: Oral English textbook, SHAOU TĪH, Anglo-Chinese Colleg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uthor: Haoyu Bia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zhou Vocational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China.

马六甲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是英国伦敦会来华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与米怜(William Milne)共同创办的近代新教第一所教会学校。据《马六甲英华书院计划书》所述,书院的最终目标为“促进中国和欧洲文学的相互交流、传播基督教”。为此,书院“一方面令欧籍学生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另一方面,使恒河以东国家的学生学习英文和欧洲的文学及科学”(qtd. in Morrison 513)。也正因为如此,英华书院的英语教学“开中国近代英语教学之先河”(丁伟 191),也成为中国近代外语教育兴起的重要源头之一(张正东 6)。

关于马六甲英华书院英语教学的整体状况及其历史影响,学界早有论述;然而有关书院在英语教学中所用教科书之内容、特色等相关情况,却很少有研究涉及。事实上,除一些直接来自西方的教科书之外,1826年英华书院印刷所还曾出版过一本由书院中国学生自行编写的英语教科书——《英华学生口语手册》(*The English and Chinese Students Assistant, or Colloquial Phrases, Letters & c, in English and Chinese*)。该书无论是对当时英华书院的英语教学还是对近代中国英语教学史,均有十分重要的实用价值和历史意义。

一、作者简介

《英华学生口语手册》一书作者名叫袁德辉(SHAOU T'IH),祖籍四川,1823年到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之前曾在槟榔屿一所天主教学校学习拉丁文三年(Harrison 126)。与袁德辉同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就读的美国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在其著作《旧中国杂记》一书中有过一段介绍:

很快就看的出来,他不是等闲之辈。他熟识拉丁文,而我们的中文老师人人都对他在中文方面的高深造诣感到惊异。他的名字叫小德,是四川省人,年纪在25岁左右。他讲一口很浓的中国官话。……我跟穆尔和小德一起在书院里的16个月间,小德专攻英语,不是浅尝辄止,而是深入研究。当我离开那里回广州的时候,他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书院里每个人提到他的时候都称他为“读书人”,那是因为他学习专心致志的缘故。(286)

正如亨特在书中所言,由于袁德辉学习英语十分刻苦,其英语水平也突飞猛进。据1826年英华书院年度报告(*The 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记载,“在书院学习英语12个多月之后,袁德辉的英语水平已经能够使他较为轻松、准确地进行英汉互译。他已经将基恩关于地球仪的论文翻译成中文,按照他的汉语水平,他很快就能够将任何一个英语作家的作品准确地翻译出来”(13)。

然而,1827年袁德辉却突然离开了英华书院,至于他离开的原因,据书院1829年年度报告(*Report of the Eleventh Year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称,“是害怕中国三合会的迫害”。

回国后“袁德辉受聘成为理藩院的一名通事”(6)。1839年,当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时,袁德辉因熟谙英文而“成为林则徐翻译班子的重要成员”,并先后翻译了瑞士国际法学者瓦泰尔(Emerich de Vattel)所著的《国际法》若干章节、林则徐致英国女王信,以及官府公告等多个文本,在近代中西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谭树林 66-68)。

二、近代第一部由中国人编写的英语教科书

据周振鹤先生考证,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英语教科书为《华英通语》。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该书在中国已经绝迹,唯有通过日本人福泽谕吉所著的《增订华英通语》才得知该书原貌。据福泽谕吉自己介绍,此书是他在旧金山时从一位来自香港的中国商人手中购得,后带回日本进行增订。所谓增订,“指的就是用日语的假名标音与释义,其他则原封不动地保持原著的模样”(周振鹤 193-94)。

该书序言称,“吾友子卿从学于英人书塾者,历年有所。凡英邦文字,久深切究,恒虑华言、英语不异北辙南辕,爰将日用应酬事款,别类分门,辑成一帙,名曰《华英通语》”(转引自季压西、陈伟民 281)。从序言中可知,该书作者名叫子卿。另据周振鹤介绍,该序“作于咸丰乙卯(一八五五),大概出版时间与此相去不远”(193-94)。

然而,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出现和研究的逐渐深入,日本学者内田庆市认为,袁德辉编写的这本《英华学生口语手册》才是“最早的为中国人所编写的英语教科书”(2)。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马礼逊曾于1823年出版过一部专为中国人而著的英语语法著作《英国文语凡例传》,因此“从目前所收集到史料来看,我们可以认为,《英国文语凡例传》是中国第一部英语教科书”(孙广平 48-49)。

的确,从出版时间来看,《英国文语凡例传》要比《英华学生口语手册》早3年出版,但《英国文语凡例传》的作者马礼逊并非中国人,而袁德辉则是中国本土人士,因此,就现有史料来看,《英华学生口语手册》可以说是近代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英语教科书。

三、内容简介

《英华学生口语手册》全书共102页,由正文和附录两部分组成。正文每页又分为三栏,左边一栏为词条,英文在上,中文翻译在下;中间一栏为英文例句;右边一栏则为对应的中文例句。例如:

- | | | |
|-----------|--|----------------|
| (1) Books | 1a. Where is my book? | 我的书在何处 |
| 书 | 1b. That book is badly printed | 那书印得不好 |
| | 1c. The doctrines of that book are excellent | 那本书的理深奥 |
| | 1d. My books are upstairs | 我的书在楼上 |
| | | (SHAOU T'ŪH 1) |

据笔者统计, 全书共收入词条 94 个, 例句 854 句, 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英华学生口语手册》词表

序号	英文词条	例句	序号	英文词条	例句	序号	英文词条	例句
1	Books / 书	25	33	Master / 主人	6	65	Metal / 金	8
2	Letters / 书信	15	34	Cruelty / 暴虐	5	66	Send / 打发	7
3	Paper. Ink. & Pens. Writing 纸墨笔字	16	35	Hatred / 厌恶恨	3	67	Sickness / 病	12
4	Schools / 学堂	26	36	Sharpness / 磨利	3	68	Health / 爽快	8
5	Time / 时光光阴	16	37	Clever / 伶俐、巧	5	69	Shave / 剃	3
6	Man / 人、人类	12	38	Peaceable / 温和	3	70	Run / 跑	3
7	Houses / Mansion / 家 房 屋、排场的房屋	26	39	Troublesome / 啰嗦	3	71	Walk / 行走	3
8	Clothes / 衣服	13	40	Neighbor / 邻人	3	72	Stand / 站	3
9	Food / 饮食	22	41	An army / 军	8	73	Receive / 领受	4
10	Horses / 马	8	42	Meet / 遇会	3	74	Give / 赐我	4
11	Chaise / 马车	6	43	Inform / 告知	6	75	Carry / 扛拿	3
12	Clean / 洁净	10	44	Cut / 割、切、削	5	76	News / 新闻	6
13	Dirty / 腌臢	6	45	Garden / 园圃	5	77	Laws / 法度	7
14	Goods / 货物	21	46	To steal / 盗偷	6	78	Command / 命	2
15	Ships / 船	11	47	Cold / 寒冷	3	79	Soldiers / 兵	5
16	Hunger & thirst / 饿渴	7	48	Heat / 暑热	3	80	Dreams / 梦	4
17	Speak / 讲话	7	49	Expense / 费用	3	81	Forgery / 作假、私造	5
18	Wages / 工钱	6	50	Profit / 有益	4	82	Swear / 发誓	5
19	Bathe / 沐浴	9	51	Anger / 怒	5	83	Home / 家	5
20	Paddy / 秧	3	52	Lawsuits / 官讼	10	84	Weather / 天气	6
21	Unjust / 不公道	5	53	Medicine / 药	8	85	Celebrated men / 名人	16
22	Faithful / 忠实	5	54	Carpenter / 木匠	5	86	Geography / 地理	71
23	Agreement / 合同	8	55	Taylor / 裁缝匠	5	87	Astronomy / 天文	47
24	Bills / 银单	5	56	Blacksmith / 铁匠	5	88	Chronology / 史年纪	30
25	Taxes / 纳税	4	57	Silversmith / 银匠	5	89	Theology / 神道、神天之道 理	28
26	Exports / 出口的货物	3	58	Wager / 赌胜	3	90	Divine Revelation / 神天所启 示之道	5
27	Imports / 入口的货物	3	59	Gambling / 赌博	5	91	Evidence / 凭据	13
28	To do / 行事	8	60	History / 史记	5	92	Prophecy / 预言	5
29	Rain / 雨	6	61	Road / 路	9	93	Miracle / 神迹	15
30	Thunder & Lighting / 电雷	8	62	Hill / 山	6	94	Testimony / 证	3
31	Age / 年纪	10	63	River / 河	10			
32	Complimentary language 礼貌话、温柔的话	22	64	Wood / 木材	8			

此外, 在正文后袁德辉还附上英文书信、请帖、告示、账单、发货清单、汇票、收据、提货单、借据等文本十余篇, 以及数篇中文书信、支银单、收银单和取货物单。值得注意的是, 袁德辉并没有像正文那样, 对所附文档提供相应的中、英文译文, 而是保留其原来的面貌。之所以这样做, 据刊载在本书正文前的一则介绍本书内容的广告称, 原因是“由于中、英文在书信以及正式文件的文体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 因此, 将书后这些文本翻译出来意义不大。而且, 无论是对英语学习者还是汉语学习者而言, 只要他们认真学习本书正文的内容, 他们自己就能够很轻松地将上述文本翻译出来”(SHAOU T'IH 1)。

四、特色剖析

首先，就编写体例而言，《英华学生口语手册》体现出一定的“专业性”。晚清时期中国人编写的英语教科书，绝大部分都采用中文标注英文发音的方式，以便学习者模仿和掌握英文发音。上文所提及的《华英通语》，即采用粤语标注英文发音，例如用“心孖”标注 summer 读音、用“科”标注 four、用“孖毡”标注 merchant（周振鹤 197）。而之后出现的较有影响力的《英话注解》（冯泽夫，1860）、《英语集全》（唐廷枢，1862）、《英字入门》（曹襄，1870）、《英字指南》（杨勋，1879）等英语读本均采用各地方言标注英文发音。然而，和上述这些英语教科书与读本不同的是，袁德辉在《英华学生口语手册》中采用了英、汉对照模式，并未对英文发音做任何标注。尽管目前没有任何材料能够明确指出袁德辉此举之动因，但结合当时学生背景、学校条件来看，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袁德辉在编写此书时，并无先例可考，因此也就无需遵循中文标读英文的“惯例”，只需根据实际情况编写即可；其二，就当时背景而言，虽然马六甲英华书院的中国学生自认为华人，但据相关史料记载，“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却早已习惯使用当地的马来方言”（Milne 266），汉语功底相对较差，甚至“有一些学生是为了学好官话而入学的”（刘绍麟 23），因此，用汉语标读英语发音只会给这些学生带来更多的困扰；其三，马六甲英华书院系西方传教士所办之教会学校，负责教授英文的教师均为西方人，学生在这里能够接受正规、专业的英语培训，这也正是绝大多数民间英语学习者所无法获得的有利资源。

其次，就整体内容而言，《英华学生口语手册》突显了教科书的实用性。袁德辉编写《英华学生口语手册》的目的之一在于帮助英华书院的中国学生掌握一些英语日常用语，因此，简单实用自然成为该书的一大特征。从书中所选词条来看，绝大部分词条均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例如衣（衣服、裁缝匠）、食（饮食、饿渴）、住（家）、行（马车、船、跑、行走）、自然现象（雨、电雷、寒冷、暑热）、商业买卖（货物、工钱、合同、银单、餉税、出口的货物、入口的货物、费用）、日用百货（书、书信、笔墨纸字、药、木匠、铁匠、银匠）、情感（恨、温和）、行动（讲话、行事、遇会、告知、割、偷盗、打发、剃、领受、赐我、扛拿），等等，几乎涵盖了当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此外，每个词条下的例句大都以简单句为主。以词条“书”（Books）为例，书中共收录相关例句 25 句，其中只有两句内容较长，分别是：

(2) a. To read many books is of little use, unless you make yourself well acquainted with the doctrines which they contain (书虽读得多，若不明其书中之理，没有益于人)

b. The book which teaches men how to obtain the pardon of sin, the favor of God, and ever lasting happiness, is the best book in the world (凡书教人如何得罪赦，并如何得神恩及永福，是天下之至好的书也)(SHAOU T'IH 2)

其他均为诸如 Where is my book? (我的书在何处)、Give me the book (把那本书给予我)、Open your book (翻开你的书) 等之类的简单句型 (SHAOU TĪH 1-2)。不仅如此, 在编写每个词条例句的过程中, 袁德辉还有意识地模拟一些日常生活场景, 以“情景对话”的模式将相关例句巧妙地穿插进来。例如, 在礼貌话、温柔的言语 (Complimentary language) 词条下, 袁德辉模拟了两个人初次见面寒暄时的一段对话:

- (3) 3a. May I beg to know your name and Surname, Sir. 不敢问尊驾大名实姓
 3b. My name is Tsǎng and my Surname Kwae 贱姓喻名曾
 3c. I hope Mrs. Kwae and the children are all well 我愿娘子及令郎皆好
 3d. Mrs. Kwae is quite well, I thank you, Sir, but 拙荆实好但小儿出痘
 the children have the small pox.
 3e. How many children have you Sir? 尊驾你有多少令郎?
 3f. I have two sons and one daughter 我有两个儿一个女
 3g. Is your daughter married? 令媛出了姓么?
 3h. No, but I expect she will be married to a rich Merchant next month. 未有, 但我想他来月许配与富贵的商客
 (SHAOU TĪH 26)

这种“情景对话”模式, 由于内容更贴近真实生活的交际场景, 且每句之间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和关联性, 因此相较于普通单句而言, 更容易被学习者掌握, 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再次, 作为马六甲英华书院的英语教科书, 《英华学生口语手册》具有一定的针对性。按照《马六甲英华书院计划书》规定, “书院将向本地学生教授英文。学生还可选修地理、历史、算术和别的课程, 如果开课的话, 也可选修道德哲学、基督教神学和中国经书” (转引自马礼逊夫人 141)。正因为如此, 袁德辉在《英华学生口语手册》中也加入了相应的内容。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地理、天文、神学等多个主题。在历史方面 (词条 Celebrated men, Chronology), 袁德辉简要介绍了中、西方历代名人以及历史演变, 例如:

- (4) a. Socrates, Aristotle and Plato were famous Grecian philosopher (所客拉铁斯、亚里斯多爹尔、不拉多是厄利革国有名格物师)
 b. The famous sage Confucius flourished about 500 years before Jesus descended into this world (孔夫子大圣人出世在耶稣未来世间之前大约有四百年)
 (SHAOU TĪH 46, 69)

在地理方面（词条 Geography），袁德辉列举了中国、印度、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俄罗斯、德国、美国等国的地理位置及人口概况，例如：

(5) London is the Metropolis of England, Edinburgh is the Capital of Scotland, and Dublin is the chief city of Ireland（论顿是英吉利首城，衣领马尔是斯哥铁郎的首城，拉木材是噶爱尔兰的首城）

（SHAOU TĪH 49）

在天文方面（词条 Astronomy），袁德辉对太阳系中的水星（Mercury）、金星（Venus）、地球（Earth）月亮（Moon）、火星（Mars）、灶神星（Juno）、谷神星（Ceres）、智神星（Pallas）、木星（Jupiter）、土星（Saturn）和彗星（Comet）的基本情况做了介绍，同时还对日蚀、月蚀等天文现象做了解释，例如：

(6) An eclipse of the sun, is occasioned by the dark body of the moon passing between the earth, and sun, or by the shadow of the moon falling on the earth, at the place where the observer is situated; hence all the eclipse of the sun happen at new moon（日蚀乃月之黑体行在日头、地球之中所成，或月影射在地上看日月所之处，所以日蚀常遇朔日）

（SHAOU TĪH 63）

作为教会学校的教科书，神学（词条 Theology, Divine Revelation, Evidence, Prophecy, Miracle, Testimony）自然是袁德辉必须关注的内容之一。他在书中通过近 70 条例句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耶稣的生平事迹等相关内容做了介绍和说明，例如：

(7) Jesus the Son of God pitied us mankind, came into this world, and suffered a most painful death, in order to atone for the sins of men（耶稣神天之子，可怜我们人类，来到世间受最苦之死，代赎人罪）

（SHAOU TĪH 73）

袁德辉希望，通过这些有针对性的补充，使这本《英华学生口语手册》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学习英语口语，而且能够有助于他们掌握除语言之外更多其他方面的知识，正如他在书中正文之前一篇类似前言的文字中所言：“书院的学生必须要阅读英语作家所写的不同主题的作品，而这些主题在本书中亦有所提及。编者希望书中所列出的句子，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对学生日后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有所帮助。”（SHAOU TĪH Preface）

五、影响及意义

1826年1月27日《英华学生口语手册》出版发行之后，该书便很快投入到书院的实际教学中去。据1826年书院的年度报告记载，“从去年开始编写的一本中英文小册子目前已经完成印刷并开始在书院中使用。该书包含了大量的口语句型，以及与地理、天文、历史、神学相关的介绍，还有一些书信、账单的样本”（*The Fourth Annual Report* 5）。从报告中所记载的小册子内容来看，这本小册子应该就是《英华学生口语手册》。据一位曾参观过英华书院的人介绍，“英华书院的目标是培养教育这些中国孩子，……他们学习中文和英文以及实用的科学知识。……整个参观过程都令人非常满意，随处可以听到每一位学生用熟练的中、英文朗诵《圣经》。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写得一手漂亮的中、英文，并对算术、地理、地球仪的使用以及历史常识深为精通”（Morrison 61）。由此可见，《英华学生口语手册》在书院的英语教学中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

不仅如此，《英华学生口语手册》所强调的实用性、针对性无论是对当今英语口语教科书的编写还是英语口语教学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众所周知，和书面语相比，口语对语法要求不高，强调说话者的实际应用能力，因此，袁德辉在编写时并没有将英语语法纳入书中。事实上，这种淡化语法概念的做法恰恰是强调了语言使用的实用性，有助于学习者提高语言使用的自信心。此外，书中结合书院宗教特色所编写的有关基督教义的例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初显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的特征，为学生日后从事宗教活动奠定了一定的语言基础；而对西方地理、科学知识的介绍，则无异于给对西方文明相对陌生的学生打开了一扇窗，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好奇心。

当然，毋庸讳言的是，《英华学生口语手册》本身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憾，例如，书中词条的排列随意性很大，词条与词条之间缺少一定的逻辑关联，书中英文也存在一些语法错误。尽管如此，作为近代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英语教科书，其历史地位不容置疑，其在英华书院教学中发挥的实际作用亦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Ding, Wei. "London Missionarie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English Teaching in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Guangxi Social Sciences*, no. 2, 2004, pp. 191-93. [丁伟:《伦敦会新教传教士与马六甲英华书院的英语教学》,载《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191-93页。]
- Harrison, Bria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UP, 1979.
- Hunter, William C. *Bits of Old China*. Translated by Zhengbang Shen.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1992. [亨特:《旧中国杂记》,沈正邦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 Ji, Yaxi, and Weimin Chen. *Starting From Tong Wen San Guan*, Academy, 2007. [季压西、陈伟民:《从“同文三馆”起步》。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 Liu, Shaolin. *The History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2001. [刘绍麟:《古树英华——英华书院校史》。香港:英华书院校友会有限公司,2001。]

- Milne, William, editor. *The Indo-Chinese Gleaner*, vol. II. Malacca: The Mission, 1820.
- Morrison, Eliza, editor.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 London, 1839.
- .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Translated by Changsheng Gu. Guangxi Normal UP, 2004. [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 顾长声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Uchida Keiichi. "Pidgin: A Phenomenon of Language Contact." *The Study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East Asia*, no. 2, 2009, pp. 1-11. [内田庆市:《Pidgin——语言接触中的一种现象》, 载《东亚文化交涉研究》2009年第2期, 第1-11页。]
- Report of the Eleventh Year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Malacca: The Mission, 1829.
- SHAOU, TĪH.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Students Assistant, or Colloquial Phrases, Letters & c, in English and Chinese*. Malacca: The Mission, 1826.
- Sun, Guangping. *Development of English Textbooks in the Late Qing*. Diss. Zhejiang University, 2013. [孙广平:《晚清英语教科书发展考述》。博士学位论文, 浙江大学, 2013。]
- Tan, Shulin.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ranslato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entered on Yuan Dehui and John Robert Morrison." *Historical Research in Anhui*, no. 2, 2014, pp. 63-72. [谭树林:《英华书院与晚清翻译人才培养——以袁德辉、马儒翰为中心的考察》, 载《安徽史学》2014年第2期, 第63-72页。]
- The 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Malacca: The Mission, 1826.
- Zhang, Zhengdong. *The Theories and Schools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 Science, 2000. [张正东:《中国外语教学法理论与流派》。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 Zhou, Zhenhe. *Endless Journal*.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周振鹤:《随无涯之旅》。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责任编辑: 陈忠平

《外国语言与文化》征稿启事

由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语言与文化》是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新广出审(2016)5011号]的外语类学术期刊。本刊热切期盼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 热忱欢迎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踊跃来稿。现就投稿事宜说明如下:

1. 本刊欢迎以下领域具有独到见解的理论性、实证性和综述性论文: 语言与语言学研究、文学理论与批评、区域与国别文化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与测评等, 也欢迎介绍相关学科最新动态的新书评介、名家访谈等。
2. 研究性论文篇幅一般在 8,000 ~ 12,000 字左右, 综述性文章 8,000 字以内, 新书评介、名家访谈等一般为 4,000 字左右, 特别优秀的稿件可适当放宽字数限制。
3. 为便于匿名审稿, 请另页注明作者姓名、性别、出生年份、最后学位、职称、工作单位、通讯地址、电话号码、E-mail 地址等。投稿后 3 个月内若未接到稿件修改意见或录用通知, 作者可自行处理。
4.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优稿优酬。
5. 投稿方式: Word 电子稿请发编辑部邮箱: jflc@hunnu.edu.cn
6. 编辑部电话: 0731-88873041 传真: 0731-88872636 网址: <http://jflc.hunnu.edu.cn>

2018年卷总目录

2018年第1期(总第3期)

文明的壮大	阮 炜
文化研究视阈下的创伤小说	刘 玉
20世纪60年代好莱坞电影中的美国青年文化	谢文玉
符号学视角下罗兰·巴爾特的文学思想及其发展路径研究	司文会
中日思乡诗的意象文化论考——以唐诗和《万叶集》为例	闫 秀
《欢迎来到哈德泰姆斯镇》中的斯芬克斯因子	陈世丹
人物关系和情节形式的双重性对《洛丽塔》中叙述距离的控制	费云枫
“快乐缔造者”的两难处境——《聚敛者与挥霍者》吟游诗人叙事者研究	刘 进
“我-你”关系——论勃朗宁戏剧性独白的戏剧性	刘 莉
基于图形-背景变化的意义生成——劳伦斯诗歌《钢琴》的认知诗学解读	马若飞 曾方本
民国时期湖南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	张 旭
新时期我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未来发展	蓝红军
图里的翻译描写模式述评	顿官刚
时态构式“N1有V过N2”的语用修辞学研究	邢秋红
修辞视角下习近平“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主旨演讲中“路”的隐喻研究	柳 晓 石 超
美国反恐话语中的合法化策略分析——以《国别反恐报告》为例	丰建泉 丁邵君

2018年第2期(总第4期)

Cries in the Wilderness: African-American Poetry of the 1930s	Jon Woodson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20th Century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Jerry W. Ward, Jr.	Yukuo Wang
先锋与恪守——20世纪20至40年代美国文学思想研究	叶 冬
试论H.L.门肯激进思想及其矛盾性	王程辉
论欧文·白璧德的文学思想	刘 白
北京:《红衣新娘》中被边缘化的一维乌托邦	申育娟
论《世代相传》中的文类杂糅与后现代真相书写	刘 坤
犹太污名与身份重构——读亨利·罗思的《任凭狂涛摆布》	张淮海
翻译理论综述的翻译中心法——兼评《翻译理论》	韩子满
从《苏东坡传》看作者和译者的读者意识	栾雪梅 卞建华
阿连璧《诗经》丰厚翻译研究	冯全功 彭 梦
论儿童文学翻译中游戏精神的再造——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为例	徐德荣 何 芳
构式与规则——英汉动补结构的语法共性	石毓智
国内关系从句研究动态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	申小阳 邓云华
世界视野,“跨越”意识——评《英美中狄更斯学术史研究》丛书	周子玉
“中朝关系发展与中国半岛政策”学术研讨会综述	梁 斌

2018年第3期(总第5期)

边沁功利主义批判与文本的内在矛盾——再论狄更斯的《艰难时世》	赵国新
主体、自我与身份——门罗短篇小说《阿尔巴尼亚圣女》的拉康式解读	黄川 王 岚
由山姆·费舍谈起：论《自由生活》中的诗歌主题	王 凯
卜水者之杖——谢默斯·希尼的地名诗书写	刘 燕 吴昱璇
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的性别批评理论关键词：同性社会交际	徐 振
乔治·奥威尔《1984》中的文化保卫战	李兆前
《浮士德》“水”“火”意象的文化探究及歌德的自然观	曾 悦
汉英交替传译中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功能	赵军峰 柯迪茜
口译学员主体性运作障碍要素评估	谌莉文
修辞与说服——政治说辞批评分析模式探讨	张箫雨 张美芳
公示语英译研究可视化分析与思考	何 航 王银泉
“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跨文化诠释——以理雅各《中国经典》英译为例	薛 凌
基于语料库的西方媒体涉华反腐报道的批评话语分析	江进林 张美惠
基于扩展意义单位理论的多维译义探讨——以“教育”为例	杨 蓉
石黑一雄小说研究综述	邓颖玲 王 飞

2018年第4期(总第6期)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中国化”和全球化——重读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王 宁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考察文学阶级性的三个维度	季水河
《英格兰，英格兰》中的景观社会与超真实的“英格兰特性”	苏 忱
从史诗《尼伯龙人之歌》看鹰隼在中世纪欧洲宫廷文化中的意涵	史敏岳
《安德鲁的大脑》中的个体创伤与记忆伦理	朱 云
民族性格范式下的美国革命——霍桑革命题材短篇小说的新历史主义研究	胡 杰
论女侦探为主角的早期英国小说的文化功能	李 琼
创榛辟莽，前驱先路——论《海国图志》中的地理术语译名	张景华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观照下的翻译现象剖析——以徐光启、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为例	辛红娟 费周瑛
寻根小说文化特色词英译过程研究——以蓝诗玲版《马桥词典》英译本为例	卢晓娟 岳 霞
中国网络文学外译与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武侠世界”为例	彭石玉 张慧英
中央文献中的副文本翻译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例	陈双双
执拗消解与多元建构——《语言之会》评介	刘 宏
创造力及英语水平对外语学习者多模态隐喻识读能力的影响研究	蔡 晨
国家安全视角下新疆高校外语规划研究	贾春燕
近代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英语口语教科书——《英华学生口语手册》研究	卞浩宇